

编号 000134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

(送审稿)

(二)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

一九九二年八月

十三、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

“文革”初期，1967年1月和1968年4月，上海曾两次发生大规模地反对张春桥的事件。从部分红卫兵和造反派队伍中发动起来的揭露张春桥丑恶面目的这两次事件，都曾搞得满城风雨，使张春桥狼狈不堪，惶惶不可终日。但张毕竟是老奸巨猾，玩弄权术的老手。他紧急求援于江青和“中央文革”为他解围，又倚仗“工总司”王洪文等以及卖身投靠的马天水之流的效力保驾，终于压倒了对立面，度过了难关。后来，张春桥一伙人说反对他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把这两次事件简称之为“1·28炮打”和“4·12炮打”（我们姑且移用这种名称，因为人们比较熟悉了），对参加“炮打”的一些组织的头头和群众进行了残暴的镇压与报复。

（一）“1·28炮打”

1、“炮打”的酝酿和发动。

张春桥擅于玩弄权术，曲手为云，覆手为雨，早在他处理“安亭事件”后，已在上海广大群众中留下印象。1967年1月4日，他偕同姚文元从北京窜回上海，从幕后阴谋策划转为幕前

直接指挥，来篡夺全市党政领导权。在这个过程中，他拉帮结伙，以是否俯首听命于他作为决定亲疏的标准，竭力培植个人势力，排斥和剪除异己。他的阴险的两面派嘴脸和毒辣手段，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队伍中，也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觉察。一些红卫兵发现了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事，正在进行调查。张的老婆李文静历史上曾被日伪逮捕后自首变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少。1967年1月中旬，上海市区马路上出现过“打倒大叛徒李文静”的大幅标语。人们开始怀疑张春桥究竟算是什么样的人？红卫兵中还流传着“张春桥也是当权派，可以冲击”的说法。

1月中、下旬，夺权的准备工作密锣紧鼓地进行着。各派造反力量分化组合，为了在未来权力机构中的位子，你争我夺，各不相让。根据张春桥的意旨，有些组织或被排斥在所谓“上海人民公社”的筹建活动之外，或受到很大压制，引起这些组织的成员的强烈不满。其中有“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革会”）、“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红卫兵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等），都是当时有声势的、十分活跃的红卫兵组织，但被张春桥、姚文元看作是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派别，受到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排挤。于是，这些组织在准备抢先夺取市委、市人委的权的同时，酝酿着反对

张春桥的行动。这是诱发以红卫兵为主力的第一次大规模“炮打”张春桥的直接原因。

1月14日、15日，“炮司”和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孙悟空”战斗队的一些人，几次讨论了张春桥的问题，整理了材料，在一些红卫兵组织中，秘密流传。1月17日，“革会”二处（所谓“情报处”）得到了“炮司”整理的材料，认为“材料”中提出的有关张春桥的问题，张是无法回答的，更加加深了对张春桥的怀疑。正在此时，从北京传来消息，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中央文革”的大幅标语和“炮打康生”的大字报，“首都三司”和“清华井冈山”等红卫兵组织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革会”驻北京办事处的贺军多次打电话给上海的“革会”常委劳元一，说北京出现了大幅标语，讲“江青、陈伯达、姚文元是坚定左派，但没有提张春桥的名”，提醒上海“革会”，要他们“在张的问题上，不要被动”。1月15日和22日，以“上三司”为首，联络其他一些组织，进行了两次全市性抢先夺权行动，都被张春桥干预破坏，最后“上三司”总部被“工总司”砸掉，头头赵全国被捉送专政机关监禁。1月23日，“革会”总部召开“勤务组”扩大会议，讨论和部署了由“革会”牵头进行全市性夺权，为此成立了“夺权指挥部”；同时讨论了张春桥的问题，认为张春桥许多做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可以“炮打”。会议决定从调查李文静的历史问题

着手，再从市委写作班去挖张春桥、姚文元的“修正主义”材料。

1月24日凌晨，就在“革会”进行全市性夺权的同时，大规模的“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开始了。复旦大学“孙悟空”战斗队在外滩、南京路等繁华闹市处，贴出了“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个问张春桥！》①等大字报在市区主要街道的墙上纷纷出现。1月25日在外滩、南京路、淮海路等处张贴出由红卫兵“南洋模范中学兵团‘敢死队’”和“复旦大学北京公社‘迫穷寇’”署名的大标语：“张春桥在上海活动是一个大阴谋”、“警惕张春桥把上海运动拉向右转！”“革会”还大量印发了《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和《三十个为什么问张春桥》等宣传品。

但是，以“革会”为首的夺权只夺得市委和市委办公厅的几颗“大印”。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压力下，夺权又失败了。受张春桥的指使，徐景贤到“革会”的“夺权指挥部”进行

① 质问张春桥的大字报的大体内容：一类是揭露张的两面派嘴脸，如挑拨“炮司”与“革会”的关系，挑动群众组织之间不和、打内战；张1月4日到上海后就发生了一系列不正常现象；一类指出张是某些事件的罪魁祸首，说张到上海经济方面既风纪愈加厉害，张是专写修正主义文章的市委写作班的黑后台，等；一类直接追问张本人的问题，三十年代在上海干了些什么；“狄克”是谁；李文静是什么货色；张也是当权派，为什么不能不得；提出张春桥必须接受上海一千万人民的审查考验等。

威胁，说没有张、姚同意谁也别想夺权。徐景贤又召集一些造反组织，在市委党校（“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所在地）开会，与复旦大学“孙悟空”战斗队等辩论，指责他们反张春桥的“大方向错了”。“革会”头头劳元一反驳说，“‘孙悟空’如果确有材料，他们要怀疑张春桥，大方向也还是对的，因为张春桥（原来）是当权派。”

1月26日，“革会”头头们召开会议分析了上海的形势，认为张春桥对群众组织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对曾经是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的徐景贤特别反感，认为市委写作班是“全民造反”，即“假造反”，现在却“夺了上海大权，在那里发号施令”。“市委写作班是黑市委的御用工具，揭发的问题很少，它自身肯定有问题。”“市委写作班控制着上海的机关造反派，上海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面临流产的危险。”他们认为徐景贤是张春桥的“材料袋”，“只要抓住徐景贤，不怕搞不到张春桥的材料”；如果“我们不干，这个‘材料袋’就要落到别人手里”。1月27日夜10时3刻，“革会”在复旦大学1100楼组织抓徐景贤的行动，决定分兵三路，一路去“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机关联络站”）盘踞地市委党校，一路去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一路去武康路原市委写作班所在地。每路队伍中都配备了认识徐景贤的人。会上各路人马对好手表，决定在1月28日凌晨1时动手。

2. 徐景贤被揪走，张春桥慌忙调动部队追查，斗争白热化。

1月28日凌晨，“红革会”去“机关联络站”的人冲进市委党校，首先控制了电话，然后声称要“请”徐景贤到复旦大学去看大字报，“要徐景贤回答几个问题”，到处寻找徐。徐景贤得知，感到来者不善，就叫郭仁杰出来应付，自己躲藏起来，但是结果还是被“红革会”的人搜了出来。他们把徐景贤、郭仁杰带到复旦大学。“红革会”的人高兴地说：“这个‘材料犯’已经到了我们手里了。”他们责令徐交代市委写作班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推行“修正主义”的问题。

徐景贤、郭仁杰两人被揪走后，“机关联络站”的朱玉佩立即打电话向张春桥报告，说复旦大学一些红卫兵到市委党校将徐、郭两人“绑架”走了，王承龙被红卫兵推倒跌伤，有些脑震荡，人在休息室。王承龙接过电话对张说：“我的伤势不重，可以支持得住。”表示他随时可以听候调遣。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为吃惊：当时张已经估计是“红革会”所为，立即叫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红革会”常委缪才生，要他们立即释放徐景贤。但“红革会”置之不理。“机关联络站”又有人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说，“有些不明身份的人”把徐景贤抓走了，还打了人。要求警备区根据中央关于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派部队追查，保护徐等的人身安全。警备区接到电话后，负责人说此事应请示张春桥决定。

粉碎“四人帮”后，据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揭发交代，张春桥虽然明知是红卫兵所为，但在答复警备区作战处的电话请示时，当即明确表示要“派兵追查”。作战处又问：“部队是全副武装还是徒手？就是部队要不要带武器？”张春桥说：“这是什么意思？当然要带武器，不带武器，还算什么兵？”姚文元也说：“当然要带武器，是什么人抓的还不知道，如果是坏人搞的，没有武器，怎么对付？”电话挂断后，张春桥对姚文元说：“这倒是个怪问题”，“这还需要请示”，“不然我要出动部队干什么！”“军队老是‘不介入’，现在成了什么状态！”“一旦真的发生战争，象这样怎么能打仗？”

上海警备区根据张春桥的命令，立即派警备师政委徐海涛，带了一个参谋，调动了驻在人民广场附近的四个摩托车排和一个步兵连，全副武装赶到市委党校，接着又追到复旦大学。

徐海涛带部队到达复旦大学后，借口找寻徐景贤，要向校内冲，引起了学生的愤慨。他们把部队堵在校门外，质问徐海涛等：“你们到学校来干什么？”“把枪口对准谁？”“为什么出动军队镇压红卫兵？”追问“是谁派你们来的？”“是谁下的命令？”等等。这一连串的质问，搞得徐海涛等晕头转向，十分尴尬。这时，天已经亮了，复旦大学校门口人越来越多。徐不得不打電話向张春桥“请示”，由张的秘书何秀文接电话。徐问：“是否可以把谁下的命令告诉红卫兵？”“部队是否可以撤回？”张春

桥听后，怕徐海涛把命令是他下的“插”了出去，恶狠狠地对接电话的何秀文说：“他们怎么搞的？这么慢吞吞的，都三四个钟头了，才到复旦。现在天亮了，既已发现人是在复旦，部队就先撤回来吧！”但对徐所提红卫兵质问是谁下令出兵这个问题采取回避态度，说“这事我不管，随他们怎么办。”徐海涛听后，感到把真相说出去不是办法，在学生连续质问二三个小时中，采取“泡蘑菇”办法，始终拒绝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最后，在学生的“军队镇压‘左派’”，“军队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撤出调动军队的‘后台’”的口号声中，徐海涛狼狈地被迫带着部队撤走了。这次，是徐海涛保了张春桥的驾，没有把下命令的正是张春桥这一点讲出来，张春桥十分满意。后来，张春桥对他老婆李文静夸奖徐海涛说：“他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不久，徐海涛被张春桥任命为“市革会”的文教办公室的头头，1969年又提为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当张春桥窃据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时，又擢升徐为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徐成了张的一名亲信羽翼。）

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们奔走相告，群情激愤。当天，“革会”总部在全市散发了《1·28事件真相》的传单，在南京路上贴出“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的大幅标语。上海体育学院“八·一八”兵团（属“革会”系统）和上海机械学院等单位“革会”也派人出来刷“炮打”张

春桥的大字报。反对张春桥的浪潮更加高涨。

28日晚上，“革会”系统的各校负责人和被砸的“上三司”等组织的红卫兵代表在友谊馆开会，商量进一步的行动计划。张春桥、姚文元心怀鬼胎，以“接见”“革会”代表为名，来到会上，企图“动员”红卫兵放出徐景贤。

张春桥、姚文元到达友谊馆时，立即被“革会”的一些人围住，拥进了咖啡厅，在他们二人的面前，放上了两架录音机，很多照相机镜头对准他们拍摄。一些红卫兵高呼“张春桥是口头革命派”，“张春桥是两面派”等口号。张、姚带来的秘书、警卫员和汽车驾驶员等则被人“盯”上。

“接见”一开始，有人首先质问张春桥：“今天凌晨是谁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的？”“为什么要派解放军来镇压学生？”要张春桥立即回答。张春桥先是不肯承认他曾调过部队。人们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最后在“革会”提出的确凿证据面前，张才尴尬地说，这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才请部队去寻找徐景贤的。他阴阳怪气地说：“徐景贤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嘛”，最后恶狠狠地说：“你们绑架徐景贤是错误的”。张的狡辩，引起了全场愤慨。有人站到凳子上，要张春桥对派部队到复旦去镇压学生事件负责，提出要为“革会”平反，说“这次镇压学生，是有计划的阴谋”。等等。会场内人们高呼，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①接着，又有人说，徐景贤为什么不能报？他也是“当权派”嘛？有的说，徐景贤是“假造反”，是“牛鬼蛇神”，高呼“砸烂写作班”，“打倒徐景贤”的口号。并提出“写作班的后台，就是你张春桥”，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张春桥。这时张春桥面孔阴沉下来，急着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陈丕显、曹荻秋所利用……”，话音未落，马上有人插上来问：“张春桥，你曾经说过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那你也是旧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吗？”“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没有责任吗？”并高声地说：“张春桥，你也是当权派，为什么我们怀疑不得？”“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你的老虎屁股”。人们振臂高呼：“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反对姚文元当第二书记！”“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会场中口号声此起彼伏。张春桥被这一连串的质问搞得哑口无言。会上“红革会”的一些人进一步揭张春桥、姚文元的“老虎”，问：“张春桥！你屁股上有屎，你三十年代做了些什么？”“狄克是谁？”“你的老婆是什么

①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这是毛泽东的话。他强调吴胡、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如果也镇压学生运动就是犯方向路线错误。红卫兵运动起来后，《人民日报》即发社论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中央还曾明令各地“文革中非经中央军委批准不准动用部队。”“红革会”即抓住了这个理！

货色？”宣读了《十问》张春桥的传单。又问姚文元：“姚蓬子是什么货色？”高呼：“揪出上海地下黑市委！”“揪出张春桥！”在愤怒的口号声和一连串的责问下，张、姚显得狼狈不堪，面色灰白。张春桥全身冒汗，脱去了军大衣。姚文元双手发抖，连茶杯也拿不稳，泼出了水。

最后，“红革会”的常委们提出，要将张春桥派部队镇压学生事件，向周总理、陈伯达、江青三人“汇报”，叫张春桥立即打电话。张春桥深感在当时形势下难以下台，为了摆脱困境，他提出“周总理、陈伯达、江青，他们很忙，不易找到，是否可以找王力，由王力转告？”于是，张春桥慌张地挂电话到北京“中央文革”找王力，向王简单介绍了他的情况。“红革会”的一些人认为，王力是张春桥的“部下”，不可能向“中央文革”反映真实情况，一定要找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听电话。张春桥则一再说这三个人找不到。“红革会”的人拒绝和王力通话，把电话挂断了。这场面对面的交锋，持续了6个多小时，直到次日凌晨1时许，在没有具体结果的情况下散了。

姚文元先回到了兴国路招待所，他惊魂未定，一进房门，瘫在沙发上，脸色苍白，直喘粗气。李文静看到张春桥没有同时回来，姚文元又这副样子，忧心忡忡地问起情况。姚说张到《解放日报》社去了，并即要李文静替他打电话到“中央文革”再找王力。王力接电话，连连问他们两人在上海的情况，姚文

元乘此大肆攻击上海“红革会”围攻张春桥和他两人，说事情棘手，还在发展。王力建议立即写个报告送“中央文革”，以便表态采取措施。后来李文静向张谈起姚文元回来时的狼狈相，张春桥强作镇静地说：“这位真是没有用。”在张的指使下，“机关联络站”派人分八路到南京路等处，抄写街头上的标语、大字报，密切注意“红革会”的动向，随时上报。

“红革会”也在积极行动，扩大宣传，争取其他组织一起，掀起更大规模的“炮打”活动。1月29日下午，北京“首都三司”的包炮，来到“红革会”，对劳元一说：“张春桥派军队是不对的，我支持你们。”“工总司二兵团”常委张虎根到复兴中路1367号“红革会”驻地，表态说：“张春桥是要搞的，不过材料不足，现在还不是时候。”又说：“你们‘炮打’提得太高，应该提‘火烧’。”当天晚上“红革会”联合七、八个其他红卫兵和造反组织，在复旦大学大礼堂内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他们放了在友谊馆咖啡厅斗争张春桥的录音，声讨张春桥破坏他们“夺权”和镇压学生的罪行。会议最后决定于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10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会。

徐景贤、郭仁杰被“红革会”带到复旦大学后，被羁留在一幢学生宿舍的二楼内，和学生住在一起。这天晚上“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在礼堂里开会，只派了一个人看管他们。会议的情况，通过全场喇叭广播，全校都听得到，也被徐、郭两

人听到了。徐景贤确实吸烟，他借口有什么事要“出去打个电话”，和那个“看管”商量，恰好那个学生和郭仁杰在复旦是同一个系的，相互比较熟悉，就同意了。于是，徐就溜了出来，直拨电话给张春桥，报告情况说，明天“红革会”要召开10万人大会，并要将他作为“材料袋”，“拉出去游斗”。张回答说：“知道了”，要他“继续注意‘红革会’的动态”。

张春桥接到电话后，感到形势紧迫，部队是不能再调动了，“机关联络站”的人又难以上阵，只有求助于“工总司”的那帮小兄弟，把“红革会”压下去。晚上9时左右，王洪文、耿金章、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等人遵召来到复兴路招待所。张急不可待地讲了“红革会”绑架徐景贤，“围攻”他和姚文元的情况后，说：“我和你们工人造反派在‘安亭事件’中共同战斗过，我们永远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现在‘红革会’要‘炮打’，你们研究一下，要采取什么措施？”张春桥的话音未落，王洪文立即表示对张春桥“全力支持”，并摆出一副流派腔说，“他妈的！马上调人，今天晚上就把复旦大学堵平。”张一听，很是高兴，但又怕事态闹大，收不了场，连连说：“堵平不必要了。”马上又发号施令要“工总司”调动队伍封住人民广场；各区联络站派人把守全市各交通要道，阻止群众参加“炮打”张春桥的大会；还要准备一些人，在“红革会”召开大会时冲击会场。王洪文不等“工总司”的那帮小兄弟发表意见，

就表态说，立即通知各区、局联络站，都不准派人参加“红革会”召开的“炮打”大会，而且要组织人写大标语，上街复盖“炮打”的大字报和标语。然后又吆喝那帮小兄弟随他去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向“红革会”示威。

3、“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的由来。

王力建议写报告给“中央文革”以便表态这件事，张春桥叫王承龙去办，以“机关联络站”的名义发出去。王承龙马上组织“写作班”的吴瑞武、王绍玺起草，他和朱玉佩二人参加讨论。这些人写了一份“1·28事件”的电报稿，于29日晚，送至市委办公厅拍发给“中央文革”。但这份电报稿被当时正在市委办公厅的“红革会”的马立新和“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人看到，认为电报内容不符事实，经研究后，他们在“机关联络站”送来的电报稿上加上了按语。按语说：“市委机关联络站的电报，是欺骗中央，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黑电报。”“1·28事件”实际上是一次调动武装军队，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为保徐景贤，竟把枪口对准赤手空拳的革命学生，张春桥、姚文元完全错误地和“联络站”站在一起，保徐景贤、保自己。”王承龙、朱玉佩看到后，和这些人吵了一架。但电报还是被扣押了。王、朱二人急忙赶到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报告。张听后极为恼火，焦急异常。

王力在北京等不到上海的电报，也很着急，他向康生、陈

伯达、江青请示取得同意后，于29日深夜，又与张春桥、姚文元通电话，把准备以“中央文革”名义发电报的内容告诉张、姚，征求意见。还说“这份电报何时发，发不发？授权给你决定”。张春桥随即叫人把电话记录稿誊清，作为“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注明日期是1月29日，亲自批上：“印八开，二十万份”，下令火速付印。当李文静拿了电报稿找何秀文打电话给“机关联络站”，问收到中央电报没有？王承龙说没有。这时，已是1月30日早晨6时左右。何说：中央已有特急电报来了，要王承龙立即派人到市电报局去等候，直到8时左右，才拿到了明码电报。

这份所谓“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严厉谴责“‘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绑架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还“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按这点纯属造谣歪曲），说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绝对不能允许的。最后凶相毕露地号召“‘红革会’的同学们”起来“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人负责”。

“中央文革”的这份特急电报，上海收到是30日上午8时，而上海印出的日期是29日，当时就有人怀疑这份电报是张春桥

伪造的。事实上，它确是张春桥、姚文元与王力多次通话，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共同策划制造的，而真正起主谋作用的主要操刀人正是张春桥。这有张春桥的一次饶有趣味的自供可以证明。1967年9月11日上午，“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由王承龙、朱玉佩两人传达张春桥接见“工总司”全体委员和接见部分高校红卫兵的两次讲话内容。其中张春桥又提到“炮打”和“红革会”的问题。张说：“中央的电报28日写好了。我当时对‘红革会’是有感情的，我说电报不要发。（到）29日不行了，‘工总司’的队伍已经集中了，如果不制止下来，就要搞成几万人的大武斗。……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的我和姚文元在上海，他们来斗我，岂不是跟谢富治、王力在武汉被斗是一致的吗？是反革命的行动，因此我叫中央（文革）发一个电报。”这里有一个老大的漏洞是，张、姚的被斗在28日晚，一直搞到29日凌晨1时，怎么可能就由中央（文革）在28日就写好电报呢？“我叫中央发一个电报”倒是道出了真情。

“中央文革”用明码从电报局拍来的“特急电报”，除主送“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外，还同时发给《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要求报社印成传单，广为散发。“红革会”得悉后，曾到东海舰队打电话向中央军委询问是否确有这个电报？后来有人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张春桥，他听了很恼火地说：“（1）说明军队有人支持他们；（2）军用电话给他们使用，万

一打仗或紧急通讯就误了大事了。”张春桥怀疑军队里也有人要搞他。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传单印发后，“工总司”调动大队人马包围了复旦大学，派了大量广播车开进校内，把原定在30日召开的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破坏了。可是，“炮打”并没有结束。很多单位还是举行了“炮打”张春桥的集会。1月31日，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之一“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赤革会”）下属的复旦“赤革会”发表7点声明，表示支持“炮打”，上海外语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铁道学院等表示拥护。2月1日，上海师范学院红卫兵举行了炮打张春桥的游行。“红革会”、“上三司”、“炮司”、“孙悟空”等组织的头头准备去北京告状。有些红卫兵还在继续收集张春桥的历史材料。

4、狠整“红革会”，整死郭仁杰。

“炮打”张春桥的大会夭折后，“红革会”处境困难。2月1日、3日，张春桥在筹建“上海市人民公社”有关会议上，向一些造反组织代表赤裸裸地说，他和姚文元二人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建议”，“毛主席指示”，“代表革命干部”“参加公社的‘领导’工作的”，对他们二人“炮打”“还不是反革命？”“这笔帐是要算的。”还要追查“‘红革会’这个组织的幕后是什么人？”“头头是什么性质？”还说，“对于广大‘红革会’的

群众不是请罪，而是起来同少数坏头头划清界线，造他们的反。”张春桥还进一步说：“对‘红革会’的这一场斗争，不是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因此，“要彻底肃清‘红革会’中少数头头对这次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工总司”、“机关联络站”等造反组织，按照张春桥的调子，发表了《告上海人民书》的联合声明。声明说：“目前上海地区出现的（以‘红革会’某些头头为代表的）一股‘炮打’张春桥、姚文元××，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毛主席的反革命逆流，必须予以痛击，坚决镇压，揪出幕后策划者，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在全市成立了“反逆流联合指挥部”，掀起了所谓“反逆流”的狂风恶浪。

在张春桥的高压下，有一些组织纷纷“倒戈”。交通大学“红革会”所属的“遵义纵队”起来造“总部”的反，宣布接管“总部”，并打出了“反逆流”的旗号。上海师范学院“红革会”成立了“造反联络站”，对“总部”宣布“二月起义”，要彻底清算“总部”头头的罪行。《红卫战报》原来是以“红革会”为主与“红三司”（全称“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合办的，这时“红三司”趁机宣布由他们单独主办，排斥了“红革会”。2月4日，“红革会”所属38个单位在文化广场集会，勒令“总部”头头交代。3月15日，“反逆流”联合指挥部又在文

化广场正式召开“反逆流”大会。徐景贤、郭仁杰作为“机关联络站”代表参加了大会，实际上起着操纵大会的作用。会上，揪斗了一些“红革会”的头头，劳元一被宣布开除出“红革会”。同时，“红革会”总部也宣告解散。会后徐、郭二人到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他们认为“红革会”总部垮了，复旦“红革会”也被搞得灰溜溜了。与“红革会”一起参加“炮打”的一些组织也整垮了，如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即抵制拍发谎报情况的电报的），也通过“内部造反”，揪斗其头头，改组了“勤务组”。这时，张春桥批准抛出由“市委机关联络站”编写的《‘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逆流纪要》，但张春桥恨死“红革会”对他“炮打”，他的报复心理远未消除。3月20日晚，张春桥把徐景贤、郭仁杰二人再次找去，进一步策划对“红革会”的镇压。他在讲话中竟捏造说：“毛主席说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就是反革命，性质是清楚的。搞游行，扣部队，围攻（张、姚）就是反革命，就要抓起来。”“‘红革会’这笔帐一定要算，也是毛主席说的。”长时期来，关于毛泽东是否说过这些话，在人们的头脑中曾经是一个谜。但后来郭仁杰照搬张春桥这些话，却指责为“郭仁杰伪造毛主席指示”，将郭仁杰往死里整，恰恰说明张春桥假借毛泽东名义说的话确实是伪造的。张春桥还说：“反逆流要和两条路线斗争，和刘、邓路线联系起来”，“实际上，当时在全

国范围，（有）反‘中央文革’的逆流，拆穿了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是“从政治上、组织上反对十一中全会决议”。就在3月20日的召见中，张春桥决定郭仁杰正式回到复旦大学去工作，其任务是“整顿”复旦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把学校里的“权”，一个系、一个系地夺过来。

郭仁杰原是复旦大学青年教师，“文革”前借调到市委写作班工作，任党支部副书记，参加所谓“后院起火”，后为“机关联络站”负责人之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成为市文教组头头之一。郭仁杰与复旦大学的“革委会”红卫兵关系比较密切，曾经担任过“革委会”的顾问。“炮打”张春桥事件后，郭仁杰一度参与了对“革委会”的镇压活动。如3月2日，郭在“机关联络站”召开的会议上对各校红卫兵头头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大骂“革委会”的某些头头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投敌叛变”，“相当于1927年北伐军打到上海时，蒋介石和陈独秀所起的作用”。“革委会”的“领导权已被坏人掌握”，要“革委会”战士“举行南昌起义”，“内部造反”。郭仁杰回到复旦大学，又把张春桥伪造的毛主席关于“反对张、姚就是反革命”的讲话，照搬出来，并于3月24日，在文化广场再次召开揭批复旦大学“1·28炮打”的“反革命事件”大会，迫使“革委会”所有“战士”，集体向毛主席“请罪”。

然而，“革委会”在当年红卫兵运动中曾经风云一时，也不

是那么容易压服的。张春桥等对“革委会”的镇压行动，在广大红卫兵中得不到热烈响应。“革委会”的头头们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后来成立的复旦大学红卫兵师负责人还是复旦原“革委会”头头赵基会，原“革委会”总部负责人廖才生仍是上海师范学院红卫兵的负责人。各基层的头头很多还是原班“革委会”头头。张春桥、徐景贤等策划召开“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想扶持“同济东方红兵团”、“交大反到底兵团”等负责筹备，但这些组织的“号召力”还难与“革委会”相抗衡。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接着，4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10条，并要“迅速传达，广为张贴”。命令中提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还提出：“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而且规定“对业已违反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在这样情况下，徐景贤、郭仁杰不得不再次承认“革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4月中旬宣布劳元一等人“解放”，“参加工作”，并于4月

14日成立“‘革会’大批判、大联合联络站”（简称“联络站”），代替“反逆流联合指挥部”，由郭仁杰当顾问。

“联络站”一成立，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内，贴出了“革会是左派组织，其历史功勋不许任何人抹煞！”“革会的大旗是广大革会战士用鲜血染红的！”“历史不许颠倒，老保不许翻案，不许往革命小将脸上抹黑！”等大幅标语。4月25日，他们又在复旦大学举行纪念“8·25”大串联的集会。会后，组织了2千余人开进‘师院’，要捣垮‘千钩棒’红卫兵团组织，打击‘同济东方红’和‘交大反到底兵团’，并和‘红三司’在各校争夺‘地盘’，以扩大‘革会’的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郭仁杰便改变了腔调。6月初，他在文教组内说：“那时，对反逆流怎么反法，不理解，未很好引导，和‘革会’伤了感情。”“有些组织反逆流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反‘革会’”，“‘革会’是革命的左派组织，否定了这一点就是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成果”，“对此我要作自我批评，那些反对‘革会’的也要作自我批评”。郭仁杰还要“红三司”的红卫兵“退出‘红三司’组织，马上加入‘革会’”，而且“越快越好”。从6月3日到6月8日，郭仁杰连续去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上海铁道学院等大专院校，接见群众，参加会议，发表讲话，支持“革会”。

郭仁杰转而扶持“革会”的态度，与张春桥蓄意报复

“革会”的做法发生了尖锐矛盾。粗鄙不认人的张春桥，对昔日手下的这名亲信也不惜下毒手了。他说，郭仁杰支持“革会”重振军威是错误的，要徐景贤和“市委机关联络站”出面四处讲：“郭仁杰伪造毛主席的讲话”；“上海警备区出动部队是由于郭仁杰谎报了徐景贤被坏人抓去的情况”等等。张春桥要各造反组织“对郭仁杰要独立思考”，暗中却批示给“游雪涛小组”（“游雪涛小组”是张春桥组织的一个专门为他收搜集情报、搞破坏活动的特务小组）露骨地指责“郭仁杰走得太远了！”“游雪涛小组”按张春桥的示意追查所谓“一个革会——联司——郭仁杰的统一战线”。郭仁杰被“红三司”控制起来，揪到各造反组织去批斗。“红三司”专门成立了“郭仁杰专案组”，由王承龙、王少庸直接领导对郭仁杰的问题进行专案“审查”。在“游雪涛小组”的策划下，以“红复旦编辑部”名义写出长达9千字的《还郭仁杰的庐山真面目》的大字报，追查郭仁杰所谓“捏造”毛主席讲话、炮打“中央文革”等“罪行”。市委机关的造反队也参与围攻，贴出《十问郭仁杰》等大字报，追查郭仁杰怎样与“联司”的坏头头相勾结的活动。1967年8月，“游雪涛小组”秘密逮捕了郭仁杰，刑讯逼供，要他承认伪造毛主席的指示，郭不肯承认，并说：“这些话明明是张春桥亲口对我讲的，我要上告中央”。9月底，郭仁杰虽被释放，但仍由“市委机关联络站”继续组织批斗。12月，张春桥在一份材料上又

批，“郭仁杰问题搞不清，对不起上海一千万人民。”接着郭仁杰又被秘密逮捕审查，搞得狠凶。1968年1月6日，郭仁杰竟在卢湾公安分局关押处离奇地“坠楼”身亡。总之，郭是被整死了，灭了口。

(二) “4·12炮打”

(1) 第二次“炮打”的经过。

1968年4月12日，上海又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反对张春桥的事件，后被称为“4·12”炮打事件”。这次“炮打”，为首单位是《文汇报》社，其核心人物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政宣组组长朱锦琪。朱也是当时有一定权势、相当活跃的“造反派”头目。参加“炮打”的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红卫兵组织以及七〇八、七一一研究所等部分人员。

这次“炮打”，是第一次“炮打”的延伸和继续。1967年“1·28炮打”后，“革会”总部虽然被捣垮了，但在一些大专院校中，反对张春桥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交通大学“炮打司令部”(简称“交大炮司”)的头头，与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师范学院等单位的一些红卫兵组织进行“反张”的串连。在交通大学的一次辩论会上有人明确提出“张春桥是叛徒，

是江青保了他”①“炮司”头头胡守钧、周谷声等人还派了“炮司”常委、时代中学原团支部书记红鸥参加了“中学生串联会”(简称“中串会”)，联系了清华大学“井岗山”蒯大富等人收集材料，进行反对张春桥的活动。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文章。1967年8月、9月份，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揪出并被逐出“中央文革”，有人提出“要揪比戚本禹更大的黑手”，于是，“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张春桥是叛徒”的消息在社会上沸沸扬扬，不胫而走。国防系统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旗造反兵团”也酝酿要“打倒张春桥”。这时，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气候已经形成。风声传到张春桥的耳朵里，虽然还只是零星讯息，已引起张惶惶不安。

在1968年1月3日的“市革会”常委核心扩大会议上，张春桥咬牙切齿地讲：“说我是叛徒，我要羞人的。说是江青保我，那把我们党说成什么了？”1月25日，在复旦大学“校革会”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又对反他的人威胁说：“我看见这种人就觉得生气”，“你们这批人起来造我们的反呀？靠不住，可能是我们造你们的反呐！”2月26日“市革会”扩大会议上，当有人讲到上海有反张的迹象时，张春桥威胁说：“反对我是小事，反对

① “1·28炮打”后，江青于1967年4月13日打电话给马天水，说：“张春桥的历史没有问题，反对张春桥是错误的。”

‘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还说：“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不要上敌人的当。”企图扑灭“反张”的怒火。

1968年3月，北京从打倒“王、关、戚”发展到贴“打倒谢富治”的标语，上海街头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幅标语。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怕群众的这把“火”烧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就由陈伯达出面，提出了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说“目前全国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散布“有人替‘二月逆流’翻案”的流言，说要“在组织上抓黑手、坏人”。3月24日，由林彪直接出面，伙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突然宣布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互相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谢富治，排挤黄永胜，迫害江青的“罪行”。康生在会上说：“杨成武后面有黑后台。”3月27日，他们又召开了所谓“彻底粉碎‘二月逆流’反扑大会”。会上江青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是“王、关、戚的真正的后台”，企图转移视线，保护他们自己。由于这两次大会张春桥都未参加，有些人便猜测张春桥出了问题，又联系到张春桥历史上的问题，上海街头又出现了反对张春桥的大标语。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红旗造反兵团”首先贴出了“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大标语，4月6日直接贴出了“打倒叛徒张春桥”的大标语。接着，七一一所“革命造反兵团”刷出了表示声援的大标语，复

旦大学等也跟着有所动作。从4月10日到12日，连续三天在南京路和外滩等闹市街头，张贴出一大批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次“炮打”被张春桥镇压下去的怒火，又一次爆发出来了。

《文汇报》社驻北京办事处艾玲等人，参加了3月24日的大会，3月25日凌晨就把大会的情况电告在上海的周国荣，特别点出康生在会上讲“杨成武后面有黑后台，但不知是指谁”。3月27日晚，艾玲又将当天下午北京召开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反扑大会”的情况电告周国荣，说：“现在形势很复杂，要揪杨成武的黑后台，各种谣传很多，有些事情涉及到张春桥，有些学生在整理张春桥的材料。”周国荣接完电话后，找了几个人分析，认为现在张春桥在公开露面时，名字已不挂“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张最近公开讲话也很少，可能有问题。后周国荣又将艾玲来电话的内容告诉朱锡琪、邵传烈，邵传烈却提出“千万不能怀疑张春桥”。3月30日，朱锡琪打电话到驻京办事处，了解北京反张春桥的动向。邵边回答：“在中央未表态之前，我们只是怀疑。”朱锡琪揣测张春桥出了问题。他们原来是跟着张春桥跑的。但当他们认为张春桥地位不牢靠时，又投机“反张”了。朱认为已经有这么多征兆了，可以动手了，决心打出“反张”旗帜，他对周国荣说：“我们要准备第二次造反，第二次革命。要不怕杀头，坐牢，不

怕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

4月4日深夜，朱锡琪与周国荣密谋后，准备组织“反张”的战斗队。朱锡琪说：“中央不是号召要揪黑后台吗？这是一场战斗。先把问题向社会上揭开，向全市人民提几个为什么。”4月7日，周国荣等密商，认为“无限风光在险峰，干革命就不怕冒风险”。“即使犯了错误，中央也会原谅的”。他们说：“这几天，朱锡琪完全拿出‘一月革命’时的造反劲头来了，我们又搞第二次地下工作。”4月8日晚上，有上千人去第二军医大学，要与“红旗造反兵团”辩论，后来了解是“市革会”、“工总司”策动的。复旦大学红卫兵赵基会等率领近千名红卫兵去声援“红旗造反兵团”。

4月8日上午，驻复旦大学军训团负责人方耀华（原空四军航空兵二师政治部主任）向空四军军长周建平和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左平汇报复旦大学校园内出现反张春桥大字报的情况，周建平与王维国商量的意见是：“军训团暂不表态，由方耀华向徐景贤请示。”接着方耀华向徐景贤汇报了复旦大学“炮打”动向。徐景贤听后说：“不是什么新情况，社会上早传张是叛徒，小混蛋翻不起大浪。如果复旦大学出现‘炮打’，一让他们表演；二不要反击；三军训团不要表态。”周建平得知徐景贤的意见后，对方耀华说：“按徐的三条指示办，复旦出现‘炮打’由他负责。”

4月10日晨，朱锡琪与北京的艾玲通电话，得知社会上传

说“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用党票保证张春桥是叛徒。”这更加坚定了朱锡琪“反张”的决心。晚上，张春桥拉朱锡琪到家里吃饭，朱耳机试探张春桥的态度。张春桥对朱锡琪说：“我要去北京汇报工作”，并表白自己没坐过牢，不知道坐牢的滋味，暗示朱锡琪不要“炮打”。但张的暗示未起作用。晚上，朱去市里参加“市革会”扩大会议，报社内由周国荣召集少数人开会，传达了朱锡琪的“炮打”意见，并酝酿成立战斗队。会后，北京办事处给周国荣来电话，要《文汇报》转载《北京日报》4月7日的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说“谎言有85%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原话”。

4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坚决打击右倾翻案的妖风》的社论，朱锡琪在修改社论中加了“现在有人竟认为上海情况特殊，认为我们这里的主要危险不是右倾翻案，这完全是错误的”等内容，暗示张春桥在上海有问题。同时，朱锡琪又拟写了7条口号，经周国荣扩充改写为他们新成立的“炮打”张春桥的“为什么战斗队”的《十条宣言》。晚上，朱锡琪要评论组写一篇“大胆怀疑”的社论，并决定转载《北京日报》社论。朱要周国荣在当天编前会上申明：（1）这篇社论具有重大意义；（2）转载这篇社论是有斗争的；（3）加强保密工作，要用党性来保证。在朱锡琪、周国荣的压力下，原来认为对张春桥“连一点怀疑都不行”的邵传烈，这时也改变了态度，同意朱、周

的做法了。

4月12日凌晨1时许，徐景贤打电话给《文汇报》社，说张春桥和他都不同意转载《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朱锡琪自己不接电话叫别人去接。朱锡琪说：“他（指徐景贤）来了，我们也会登出去。”周国荣讥讽说：“徐景贤又不是《文汇报》社总编辑。”凌晨3时，“十个为什么”的《宣言》大字报，贴到了南京路和第二军医大学处，后又把《宣言》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在当天《文汇报》的版面上，第3版上半版用特大黑体字刊出5条标语：“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下半版转载《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以及《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十条宣言》。报纸一出版，引起全市轰动。南京路上，很快出现了许多大专院校贴出的“炮轰”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观看大字报者人山人海，有一张大字报前挤着看的人最多，这张大字报揭露了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和张春桥的父亲张开蓝的丑恶历史，说李文静在1943年抗日战争反扫荡中被日军俘虏，自首变节，说张开蓝是恶霸地主，在汪伪济南警察局中任职，抗战胜利后当上了国民党济南市戒烟所所长，是汉奸、反动官僚等等。

《文汇报》社门前，来来往往看大字报的人一直没有断过，

估计有一万人左右。在复旦大学校园等处也到处贴满指责张春桥的大字报。人头济济，挤得水泄不通，气氛紧张热烈。

4月12日上午，朱锡琪到办公室找徐景贤，专门谈了张春桥是叛徒等问题。徐景贤反对朱锡琪的看法，和朱锡琪吵了一通。同日上午稍后，复旦大学军训团负责人方耀华又去向徐景贤汇报复旦大学的情况，徐听了复旦大学“炮打”声势，惊得脸色如土色，惶惶然坐立不安。这就是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发动经过。

2、张春桥惊恐万状，向江青求救。

4月12日上午，王少庸、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朱玉佩等一伙人聚集在兴国路张春桥的住处商量对策。王少庸说：“别的都好办，就是有穿军装的刷‘炮打’大标语很麻烦。”张春桥问是哪里的，王少庸回答：“估计是二军大的，是国防科委系统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张春桥说：“下午找夏政国同志（当时上海警备区司令）谈话。”张春桥对在场的几个人说：“文化大革命，我还未被批过，可能要轮到我受批了。”表现忧心忡忡。张春桥为了摆脱困境，又要乞求江青保他了。他要王少庸打电话给江青“汇报情况”。王少庸因自己耳朵不便，转叫王承龙去打电话。王承龙把电话打到姚文元处。姚文元复电说，他已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准备找军队负责人谈这件事。江青得知张春桥在上海再一次“遇难”，即找叶群密谋。由叶群

出面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要他们向驻沪三军表态保张春桥。空四军姪应伍接到吴法宪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张春桥，报告说：“吴司令（指吴法宪）打电话来了，作了三点表态：军队不上街；不贴大字报；不支持炮打。”张春桥称赞说“空四军行动真快”。江青又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张春桥，要张“不要怕，事情很快会平息的，但无论如何不要组织反击。”“我还是要保张春桥的”。张春桥听了江青这些话，心神稍定，粉饰自己说：“我没有坐过牢，怎么成为叛徒？”接着，“市革会”向各单位下达要求，对于出现的“炮打情况”，“要沉着”，“不要急于反击这股逆流”等四条意见。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打电话给张春桥、王少庸，说东海舰队接到海军党委的电话，传达了李作鹏关于不赞成炮打张春桥，不准部队上街，不准贴大标语等几条指示。高志荣说，他已把李作鹏的表态内容，传达到舰队的全体战士和家属了。张春桥、王少庸听后大喜过望，立即布置把李作鹏的“几点指示”传达到全市各单位，说“这比我们自己表态管用”。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张春桥危难之秋再一次解救了他。4月12日晚，吴法宪亲自打电话给张春桥，说专机已经安排好了，明日上午到上海接张去北京。

王洪文也积极地为保张春桥出谋划策。4月12日晚，王洪文对“工总司”部分头头讲话中要大家“静观事态的发展”，“要坚决稳住”。阴险地说：“动手还没有到时间，……实质（问

题）没有暴露就行动不行，要等待时机。”埋伏了杀机。当天深夜，王洪文、王承龙去了一次《文汇报》社，回来向王少庸谈了他们去摸底的情况，说“比较起来还是邵传烈的态度好一些”。王少庸决定由徐景贤、王承龙连夜找邵传烈谈话，传达李作鹏的“指示”，要他们把《文汇报》的版面掌握好，明天再也不许出纰漏。王少庸说，对朱锡琪要狠整一下。

4月13日凌晨，徐景贤通知朱锡琪去听海军副司令高志荣的传达：“北京三军首长（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反对炮打张春桥。”朱锡琪听后说：“三军表态仍然可以炮打。”这天，张春桥已去了北京。上午9时，朱锡琪不甘心失败，决定派人去北京找姚文元或聂元梓、蒯大富等“五大领袖”摸情况。下午，“市革会”在延安西路200号开大会，马天水照搬张春桥的话，在会上说“张春桥没有坐过牢，怎么会变成叛徒？！”下午4时，有人贴出“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朱锡琪”的大标语。当天晚上在外滩“市革会”机关后厅开大会整朱锡琪和“为什么战斗队”的成员，由马天水代表“老干部”，徐景贤代表“造反派”，高志荣代表“军队干部”分别在会上讲话。朱锡琪等同马天水、徐景贤等进行争辩，马天水端出江青对张春桥问题表态的所谓“指示”进行高压。朱锡琪等挨整后返回报社，扬言要去北京告状。晚上12时许，“工总司”、“文攻武卫”的张宝林、黄金海、戴立清一伙到报社“发动”群众揭发，又把朱锡琪、周国荣等

人狠狠批斗了一通。

4月14日、15日，“市革会”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各组、办负责人会议。当时主持“市革会”日常工作的王少庸在会议上说：“这一次是‘4·12事件’，41年前的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也搞过一次‘4·12事件’，两次都是反革命事件。”王少庸竭力为张春桥保驾，说：“别的情况我不知道，春桥的历史我知道，他根本没有被搞过，怎么是叛徒。”会上有人问：炮打张春桥是不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王少庸说：“炮打‘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不是反革命逆流是什么？”

4月14日，朱锡琪、周国荣等在报社内遭到批斗，宣布“靠边”。在北京的艾玲则表示自己犯了错误，随时等待调回上海。5月13日，《文汇报》社“革委会”向张春桥、姚文元写了报告，宣布停止朱锡琪、周国荣两人的报社“革委会”的职务，下放到部门去当记者。11月7日，《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艾玲等全体工作人员被调回报社，随即下放到上海柴油机厂劳动。11月中旬，因朱锡琪、周国荣等人多次秘密串连，说自己是“老道反犯错误”，提出要恢复他们的报社“革委会”委员职务，又遭到了批判。后称这次对朱等的批判为“4·12再批判”。

4月18日晚，王洪文、徐景贤等窜到复旦大学，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王洪文那时气焰嚣张地说：“4·12那

天我已准备好人马，要来‘复旦’砸第二个‘联司’，谁‘炮打’就砸谁！”徐景贤则得意地嘲笑某些人说：“朱锡琪是炮打司令，二军大是炮打基地，你们‘复旦’充当了炮打炮灰”。

3、两面三刀，张春桥挟嫌报复。

4月16日，王洪文在“工总司”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传达张春桥打来的电话指示。张春桥对上海“4·12炮打”问题，故作姿态地一再表示：反击的标语应该全部覆盖掉，不要反击、不要压；对他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要去揪斗，不要整人，包括艾玲也不要整，不要回上海去，叫她在北京工作。《文汇报》也不要整人，姿态要高些，就是朱锡琪、周国荣，都可以让他们继续工作，事情过去就算了，不记这个帐；材料也不要拿，等等。一个月后，5月16日，张春桥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上又说：“炮打几次，不要当作一个包袱背起来，我在北京首先找了《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同志谈了，不要背包袱，鼓起干劲干。昨天我找了邵传烈，（要他）把文汇报办好，……就是朱锡琪，我们还是寄予希望，不要一棍子打死。”张春桥还下了保证：“我决不会报复。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自己认识错误，改正了就好了。”甚至乔妆张致、煞有介事地说：“如果（对炮打）还不过瘾，下次还可以炮打，随时可以炮打。”

听了张春桥的这些话，好像他真是“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谦谦君子”。但是且慢，张春桥一惯两面三刀，翻手为

云：覆手为雨。在“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中他都有过表演。早在“4·12炮打”之前好几个月，1957年11月间，张春桥在兴国路办公室召开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曾口吐真言：“谁再这样提（按指当时已有大字报揭发他历史上有问题），我就要整人了，不要讲我不安好心，我只要说一句话，动一动小拇指头，你就要垮台、完蛋！”张春桥决不是什么“谦谦君子”。他对“4·12炮打”保证“决不报复”的语音刚落，疯狂报复就开始了。

1968年5月21日，张春桥在一次新闻界座谈会上讲话时，对广播电台施加压力，恶狠狠地说：“‘4·12炮打’时，你们广播电台的音调都变了，就差没有点我的名，很带劲。”接着，他提了三个“怎么办”：“如果有更大的风浪，你们怎么办？你们（电台）如果被敌人占领了，怎么办？发表反革命宣言、传单，你们怎么办？”说着，气势汹汹地站起来责问：“‘4·12’问题（为什么）没有报告我？”“你们军代表干什么去了？”说“对电台我可不放心！”

张春桥对“4·12炮打”的态度一挑明，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洪文等一伙人便紧紧跟上。当时市委组织组负责人是造反上台的朱俊、徐先昆，他们曾看过李文静的档案，知悉李的历史问题。张春桥因此十分忌恨，竟说：“组织组全部烂掉了。”徐景贤说：“材料送到老虎口了”，“组织组是资产阶级奇

丁无产阶级的政”。朱俊、徐先昆都被拉下来批斗。风刮到市直机关中，到处揪“黑炮手”，许多干部受到迫害。对朱锡琪，更是反反复复地“翻烧饼”式揪斗，隔离解除后一度恢复其记者工作，可是不到年底，经徐景贤等人批准，朱再次被停职检查，并被撤销记者工作，下放劳动。

1968年8月5日，在“市革会”的扩大会议上，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公开点了七〇八研究所的名，提出要揪参与“4·12”事件中的“反革命”。8月6日，王洪文控制下的《工人造反报》刊登文章，发出要算“4·12炮打”这笔帐的信号。文章点了七〇八研究所，七一一研究所等单位的名，说：“七八八所（即七〇八研究所）、十一所（即七一一研究所）某些头头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但他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么起劲，那么积极”。“这些积极炮手到目前为止，还逍遥法外，老老实实告诉你们，过去‘炮打’这笔帐是要算的。”威胁说对“炮打”的首恶分子“就是要迎头痛击，坚决镇压”。当天晚上，王洪文等派人抄砸了七〇八、七一一所，抢走了一批保密手册和材料，并抓走了七〇八所所长李志侠等12人。8月下旬，又捏造了一份所谓“炮打”的“罪行材料”，诬陷“4·12炮打”幕后是最崇拜元帅支持和纵容的。8月底，又组织几百名打手手持长矛、头戴麻帽冲进七〇八所，进行武装搜查。9月下旬，宣布李志侠为“现行反革命”、“黑炮手”，“二月逆流干将的代理人”等，进行

隔离审查，不久由王维国下令将李逮捕，关押达6年之久。这两个研究所内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也因“4·12炮打”事件遭受严重迫害。

对几所参与“炮打”事件的高等院校，张春桥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1968年8月，按照北京的做法，向上海各高等院校派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等在集训“工宣队”负责人的“学习班”中，大讲高校的“复杂情况”，特别点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的名。张恩狠狠地说：“复旦大学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阶级斗争有什么风浪，（复旦大学）就反映出来，‘复旦’是炮打我最早的地方。”他认为上海师范学院是“炮打”的老窝，是“四大金刚”之一，情况“特别复杂”，原定派500名“工宣队”员进驻，后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114名，为全市各高校之冠。

1968年9月3日，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头头向王秀珍报告：“师院留学生办公室是‘红革会’总部，三楼不准任何人上去，有‘白公馆’、‘马蜂窝’之称；‘红革会’的人经常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拿出院外。”王秀珍听后说：“什么马蜂窝，我们要捅，什么白公馆，叫他们让出来，我们要上三楼去看看，我们要住。”又说：“材料（指报告中谈到的大包小包东西）我们要搜查，这个权我们要夺回来，是谁给他们（红革会）这么大的权利？你们怕什么？我们支持你们！”在王秀珍的煽动下，9

月4日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在校内对2500多人进行非法搜查和抄家。他们翻箱倒柜，“上天”（摘穿天花板）“入地”（撬开地板），搜查所谓“炮打”的“黑材料”。张春桥对这次行动大为赞赏，说“师院的行动干得好，全市高校都要学师院”，决定全市大专院校内都要这样搞。徐景贤说：“重点对象（指参加过‘炮打’的人）要彻底清查。”9月5日清晨，王秀珍赶到复旦大学工、军宣队①团部，对该团的头头说，“昨天师院采取了革命行动，进行了大搜查，搞到了许多武器、弹药（指武斗工具）和整‘中央领导同志’（指张春桥、姚文元等）的黑材料，你们这里比师院复杂得多。”催促他们尽快行动。还说，“时间不能太长，要遗漏风声的。你们干好了，有什么事我来负责。”于是，复旦大学工、军宣队奉命在全校进行了大搜查行动。接着，王秀珍又赶到“市革会”一办召开各高校“工宣队”负责人会议，由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负责人介绍大搜查的“经验”，组织到会人员参观大搜查的“战果”展览会，又布置了9月5日、6日在25所大专院校进行大搜查的所谓“统一革命行动”。这次大搜查，在大专院校中抓了一些人，斗了一些人，主要是参与“炮打”的干部和群众，在全市引起震动，反应强烈。

① 在各大院校深驻“工宣队”以前，复旦大学等一些院校已由部队派出干部帮助搞“复课闹革命”和军训。见驻人员后统称为“军宣队”，“工、军宣队”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少数受张春桥等一伙控制和利用，有的甚至阴谋捣乱。

许多学生抗议说“非法搜查行动是侵犯人权”，“我们红卫兵照样要造反！”社会上流传各种对张春桥一伙的责难，沸沸扬扬。9月8日，张春桥不得不承认：“这几天的行动，怎样评价，说法不一。”于是被迫宣布：“公审会不宜开”，“抄家问题必须慎重考虑”，“不应普遍抄”。面对群众不断的抗议浪潮，到了11月，张春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哀叹道：“再不要去查红卫兵小将的事儿啦！否则弄不好又会造成群众斗群众的。到那时又麻烦了。”

但是，迫害仍在继续。他们在“清队”运动中，对各高等院校参加两次“炮打”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全面“审查”，“深挖阶级敌人”。1969年，王秀珍还说：“要把阶级敌人都挖出来，不能把阶级敌人漏掉。”

1970年1月11日下午，张春桥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借口“研究革命大批判”，追查参加“炮打”的人。张春桥在会议开始时就说：“了解一下‘师院’（上海师范学院）革命大批判，‘师院’政史系的情况值得注意，我对这个系很担忧，昨日看了一份材料，一夜没有睡好。怎么革命大批判搞不起来呢？”张春桥看的那份材料是《文汇报》记者写的简报《上海师院政史系无动于衷，死水一潭》，其中提到“政史系‘炮打’情绪至今没有收敛”等情况，竟使张春桥彻夜未眠。当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汇报“革命大批判”的情况时，王洪文对参加会议的“师院”政史系马××严厉质问，“马××，你参加炮打没有？”

“你的有些话是很恶毒的！”当马××刚要申辩“我没有……”，就被王秀珍蛮横地打断说：“你不老实，现在还在炮打。”徐景贤接着又质问马××，“你到底站在那一边，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结果，把马××打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王洪文说：“问题是现在还有人炮打”，“炮打的逆流在你们系没有收效。”张春桥说：“你们怕什么，不要怕难，针插不进就用锥子”，“要动刀子！”“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拳头破血流是不行的。”座谈会后，在全市各高等院校又掀起了层层揪“资产阶级代理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恶浪。

“四人帮”被粉碎后，据中共上海市委揭露“四人帮”运动办公室不完全统计：在上海两次反对张春桥事件中，仅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外语学院、上海科技大学等7所大专院校，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就有856人。其中遭逮捕拘禁的有368人，迫害致死12人，逼疯12人。

1972年2月后，张春桥及其党羽，借开展“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之名，对参加两次“炮打”的干部和群众，继续进行更为残酷的迫害和加倍的报复。

十四、造反派的内讧和大规模武斗

1967年2月“市革会”成立到各区、县、局和各大企、事业单位的“革委会”相继组成前后，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和内讧日益激化，全市发生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武斗事件。为那场互相打砸的暴力行动煽风点火、叫好的正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江青首先提出了“文攻武卫”口号，鼓吹要采取所谓“革命行动”。张春桥说：“有些地方夺权很顺当，一顺当，敌人就会隐藏下来。对于风平浪静的地方，我是很不放心的。这些地方究竟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他叫嚷“我是来放火的”，“要闹就闹，要斗就斗，几万人武斗也可以。”“不要怕乱，不要怕武斗，不要怕破坏，乱进了再去治”。姚文元摇着笔杆说，“大乱者，治中国之良药也，大乱是大好事。”王洪文及其小兄弟是最积极最猖狂的武斗参加者。王洪文说“（武斗）死了几个人没啥关系，只要把权夺过来。”

在这段时间内，全市究竟发生了多少起内讧和武斗事件，缺乏全面的参考资料。据“市革会”办公室、市政法指挥部等编写的《简报》中一鳞半爪的记载，仅1967年4月下半月，全市就有95个单位发生武斗，计156起。进入5月，前8天就发生武斗140多起，平均每天18起。全市大专院校有一半以上单位

发生武斗。中学发生武斗的也不少。如杨浦区59所中学中有三分之一的单位发生武斗。后来每场武斗中，参加的单位越来越多；砖瓦、石块、木棍、铁棒、长矛、硝酸、氯水，以至枪支，消防车等等都成为武斗工具。武斗的手段残忍，伤亡众多。如上海第九棉纺织厂一场武斗有190多个单位参加，打伤40余人，重伤16人。1967年8月上半月150多次武斗中受伤的达4500余人，其中重伤173人，死亡12人。

下面，记述几件重大的内讧以及武斗的情况。

(一)“工总司”的“内讧”——王洪文摧毁“直属兵团”等 在筹建“工总司”时，王洪文自吹造反早、又是党员干部，他拉起的造反队人数多，坐上了“一把手”的交椅。“安亭事件”后，他野心勃勃，到处伸手扩展势力，培植爪牙，翦除异己，在“工总司”内部不断制造内讧与火并。

“安亭事件”中张春桥虽对王洪文表示支持，但又不完全放心，因之他在后来一段时间内也鼓励耿金章扩大山头，发展势力，同王洪文相牵制，以便操纵。于是，耿金章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得以迅速发展到号称40万人马。耿金章把长兴岛农场的大批青年拉出来住进上海大厦，作为武斗的打手队，并将上海禽蛋公司和上海公共交通公司三场车队人员拉过来作为搞打砸抢的机动力量。有了这些资本，耿金章自吹他在“工总司”内实力最强，人数最多，而且在上海发生的多次事件中，总是冲

在前头，因之“贡献最大”。他为了在“市人民公社”成立前，争名次、抢席位，拼凑了36个造反组织，准备抢先夺取上海市党、政权力。耿金章的所作所为，威胁了王洪文的霸主地位，也打乱了张春桥关于夺权的阴谋策划。张春桥提出了“工总司”要“按系统、按地区联合”，“把干部选到总部”。这一着棋明显有利于王洪文，不利于耿金章等人。2月19日晚，耿金章召开了“二兵团”常委扩大会议，要所属各单位通知各区分部，调动队伍，先驻“工总司”的各区指挥部，再驻“工总司”总部。2月21日“工总司”发出通告，决定“解散各直属兵团，各基层造反队接受各区、县、局联络站的领导”，“‘工总司’直接领导各区、县、局的联络站”。这个“决定”激起了各直属兵团的头头们的强烈反对。“二兵团”耿金章等联合其他组织人员，出动几百辆卡车，在上海闹市区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王洪文”的口号，最后包围了王洪文的工作单位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要揪斗王洪文。他们在全市街头贴出要同王洪文进行电视大辩论的大幅标语。“工总司北上返沪一兵团”头头戴祖祥则吹嘘他们过去“吃的苦最大，立的功劳最高，总司令部完全靠我们撑起来的。没有我们，总司令部就不行，我们不能解散。”还说，“总司令部是空的，王洪文右倾，潘国平修了，这面旗子他们扛不了，我们来扛。”他也带人砸“工总司”的区分部。

在耿金章、戴祖祥的威胁下，王洪文到处拉拢人。他找到

上海第一钢铁厂的沈阿友，组织“钢铁兵团”，作为他的“御林军”。谁知沈阿友有了“势力”之后，也自拉旗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工三司”），与一、二兵团联合起来反对王洪文。还有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组成的“工总司到底兵团”，也打出了旗子，参加了反对王洪文的行列。

此时，在“工总司”总部内，也有一些人在北京南下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要改组“工总司”，说要“把王洪文的名字除掉”。“工总司”发起人之一、秘书组长黄文海同一部分区联络站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简称“双造司”），要抢王洪文藏在腰里的“工总司”大印。“工总司”常委范佐林和一些区联络站也发动了一次内部“夺权”，组织“新工总司”，发表了宣言。这些内部“造反”，相互倾轧，王洪文惊呼为“宫廷政变”。

在这一段日子里，王洪文一伙确实是风雨飘摇，坐立不安。但是，由于当时王洪文对张春桥、姚文元表现恭顺听话，博得张的欢心和支持，也由于耿金章、戴祖祥、黄文海等人各拉山头，各有打算，貌合神离，后来被张春桥、王洪文采取了各种狡诈手段，镇压与分化并用，打打拉拉，又恐吓又封官许愿，最后被各个击破。

王洪文等对待“宫廷政变”，先是大造舆论，指责某些支持对立派别的首都南下红卫兵是“肆意插手工人运动的保姆”，将

他们赶出“工总司”，批判“潘国平有野心”，将他排挤出“工总司”的领导层，调动队伍，抓走了黄文海和范佐栋；同时组织人开了卡车，四出铲掉“新工总司”张贴在街头上的“宣言”。这样，王洪文等首先清除了“工总司”总部内部的对立派势力。然后，王洪文又对黄金海布置说：“春桥已经同意，把耿金章抓起来”。黄金海即将耿金章骗到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去，假说王洪文在该厂等耿去研究电视辩论之事。待耿进了三十一厂，黄一声招呼，厂门立即关闭，四面涌上人来，把耿揪住，推上卡车，直送王洪文掌握的杨浦公安分局，关了起来。这个一度被张春桥封为“市革会”常委的耿金章，不到三个月，就成了阶下囚。接着，王洪文、黄金海又唆使上海第七纺织机械厂等“工三司”的基层起来“内部造反”，砸掉了“工三司”总部，下属组织都并入了“工总司”。王洪文、戴立清派了渔轮厂的王××，打入“战到底兵团”内部。后探悉“战到底兵团”正在召开各区头头会议，密报王洪文。王认为“差不多了！”“可以动手了！”派人把兵团的头头抓了起来，并宣布“战到底兵团”是非法的秘密分裂组织，迫令解散。对于“一兵团”头头戴祖祥，是王洪文直接派了岑麒麟动手去抓的。这些人都被关在杨浦公安分局。至此，“工总司”系统内同王洪文争夺领导权的对立派别都被王洪文等各个击破，先后垮台。

（二）上海铁道学院“革委会”与“红三司”的武斗

在张春桥一伙人教唆策动下，1967年1月以后大、中学校的武斗成风，持续半年多时间。上海铁道学院“革委会”与“红三司”的武斗，仅是其中一例。

上海铁道学院“革委会”是该学院主要的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他们在市“革委会”统一部署下，夺了学校的权。“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后，张春桥、徐景贤、王承龙等在大专院校中煽动搞所谓“反逆流”活动，打击“革委会”总部，又挑动“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组织向各学校的基层“革委会”发起冲击。上海铁道学院的“红三司”宣布该校“革委会”单方面夺权无效，要“革委会”承认错误。但该校“红三司”力量较弱，重新夺权的目标无法实现。于是，2月3日，市“红三司”总部调来了华东政法学院和嘉定第一中学150余人，协助该校“红三司”强行占领了“革委会”的广播台，抢走了广播器材。同时，他们又向市公安局密报了该校“革委会”有24人参加“炮打”的“罪行”材料。但消息走漏，该校“革委会”提出要追查“炮制者”和“罪魁祸首”，加深了矛盾。两派都积极扩充力量，准备压垮对方。“革委会”一方纠集一些组织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同样“红三司”也拉拢一些组织成立了“东方红兵团”。终于在5月和7月发生了两次大武斗。

第一次大武斗，发生在5月29日至31日。在该校“井冈山兵团”占领的第一教学楼内，有“东方红兵团”的办公室，5

月 29 日被“井冈山兵团”全部砸掉。同样，在“东方红兵团”占领的“红旗楼”内，也有一些教室，为“井冈山兵团”下属大队占用，31日晚，“东方红”发起了进攻，要拔掉“井冈山”安放的这些“钉子”，但遭到“井冈山兵团”的猛烈抵抗，从二楼打到三楼，最后插开屋顶，互掷瓦片、砖块。后来因“井冈山兵团”总部派出了“突击队”增援，力量超过了对方，“东方红兵团”溃退。这场武斗，受伤近 50 人，重伤 5 人，“红旗楼”基本上被捣毁。

在这次武斗中，“东方红兵团”吃了亏。他们举行了数百人的“祭尸”游行，向“市革会”请愿，提出要“严惩凶手、讨还血债”。其实，他们抬的是个受伤的学生，并非“尸体”。次日，在他们占领的大楼屋顶上挂出了花圈。还演出了什么“送葬仪式”。从此，两派以校内小河为界，将自己一方称为“解放区”，对方称为“敌占区”，各走各的大门。双方相互揪人，捉住后就进行毒打。

第二次大武斗发生在 7 月 14 日、15 日。14 日下午，“井冈山兵团”抓了一个在该校的市“红三司”常委作为人质，“东方红兵团”立即也抓了“井冈山兵团”的 3 个成员。解放军来校调解时，“井冈山兵团”认为吃了亏，派人冲进谈判场所，将“东方红兵团”两个代表打了一顿。同时，还把“东方红兵团”占领的二幢大楼包围了两天两夜。这次武斗计伤 16 人，重伤 1

人。9 月，经“市革会”调解，双方表示要联合。但由于对名额分配、机构设置、干部结合、人事安排意见不一而流产。直至 1968 年 2 月，经过多次谈判，最后确定，在学校“革委会”的常委名额中，双方各占 6 人，工作人员也完全按对等数量参加，这才于 2 月 23 日实行了联合，平息了武斗。

(三) 各有背景的“版司”与“版联”之争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版司”)成立于 1966 年 12 月 11 日。12 月底，在“康平路事件”中，“版司”乘机砸了出版系统的“红卫兵、赤卫队总部”，抓走了“总部”的头头，并将二人毒打致残。以后，“版司”与“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挂上了钩，同徐景贤等联系密切，并成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和“市革会”的帮委单位之一。“工总司”王洪文、陈阿大等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在出版系统的印刷厂中发展挂钩于“工总司”的造反队。1967 年 3 月 7 日，在陈阿大等积极推动下，决定在上海音乐厅召开大会，成立“工总司上海出版系统总联络站”(简称“版联”)。这就与徐景贤一伙人产生磨擦。徐景贤宣布“版联”为非法组织。当时“市革会”宣传文教系统头面人物朱锡琪等也表示不承认“版联”。“版司”决定在“版联”开成立大会时去冲会场。“版联”得到消息，迅速将成立大会改在上钢三厂礼堂举行。“版司”一伙人赶去，被上钢三厂的“工总司”造反队挡回。5 月 8 日，“版司”带人冲进

印刷公司，宣布“接管”公司。印刷公司的“造反队”联合“版联”抵制“接管”。“版司”向“上体司”胡永年求援，又和化工局所属技工学校的“武斗队”联系，借重这些力量，强占了公司大楼。在陈阿大支持下，“版联”和印刷公司“造反队”进行“反击”，又把“版司”赶出公司。5月12日，陈阿大派了“工总司”纺织系统化纤联络站的人砸了“版司”总部，抢了办公桌和保险箱。“版司”不服，刷出了“撤出‘版联’后台陈阿大”的大幅标语。陈阿大等借口经张春桥批准，出版系统造反组织要“归口”，归入“工总司”的轻工业系统，企图兼并“版司”。“版司”为了抵抗“并吞”，以实现“自下而上的大联合”为名，联络了一部分基层造反组织，于6月12日召开了“革命职工代表大会”，但受到了“版联”的激烈反对。7月下旬，在王承龙的布置下，“版司”成立“文攻武卫”组织，由“上体司”派人指导，配备燃烧弹、催泪弹、硝镪水等武器，还进行实战演习。双方你来我往，武斗不止。据不完全统计，有840多人参加武斗，当场打死2人，重伤后又死2人。8月以后，经过调停，“版司”与“版联”联合组成“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武斗才平息下去。

（四）“公革会”与“消革会”“义革会”大打出手

1967年1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公革会”），联合“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等夺了市公安局的

权，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但张又狡诈地声称“群众组织对公安部门可以冲击”。“工总司”王洪文、陈阿大等早就想控制市公安局，对于以王维革为首的“公革会”与“工总司”二兵团耿金章等关系密切很不满意，他们乘机多次冲击公安部门，并挑动市公安局内其他造反组织与“公革会”对抗，反对“公革会”一派掌权。

1967年7月26、27日两天，在建国西路25号市公安局礼堂周围，爆发了一场大武斗。一方是“公革会”，另一方是受“工总司”背后支持的“消革会”（全称：“上海市消防民警革命委员会”）和“义革会”（全称：“上海市消防义务兵革命委员会”）。冲突的起因实在微不足道，26日上午10时左右，“义革会”为大连路消防队成立“革委会”，组织了报喜队，乘车敲锣打鼓向“消革会”总部报喜。锣鼓声影响了“公革会”正在礼堂召开的会议，便出面阻止，从而发生冲突，殴斗。“义革会”有人被打伤。11时“消革会”、“义革会”大队人员分乘10余辆消防车到来要“公革会”交出打手，冲突加剧。最后，“公革会”在压力下撤离了大院。当晚，“公革会”头头王维革在“上体司”召开勤务组会议，决定迅速把武斗情况报“市革会”和市政法指挥部，争取上面支持，联络社会各造反组织，准备以“文攻武卫”的方式，重返大院。

27日上午，“公革会”在市体育宫集中人马，分成四个大队，

由“公革会”头头董松岩等带队重回大院。“消革会”等闻讯后，立即布防，用大礼堂的长凳作路障，堵塞门口，并调集人员和消防车在吴兴路消防队队部待命。下午4时，“公革会”整队进入大院席地而坐，召开“控诉会”，双方冲突又起，“消革会”出动20余辆消防车从吴兴路急驶而来，但大院的大门已被“公革会”的卡车堵塞，“消革会”人员手持消防斧头翻越墙头蜂涌而入。一时间，院内一片混战，一方是凳脚、砖块乱掷，一方是斧头、皮带砍杀。“公革会”形势不利，有人翻墙夺门而逃，而“消革会”人员施放二氧化碳灭火剂进行堵截。双方厮打到28日清晨，受伤计达300多人。后来，王洪文打电话给“消革会”头头说：“还是撤出来好。”“消革会”等组织的头头找到王洪文，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打就打了，今晚‘市革会’开会研究市公安局两派武斗问题。”晚上23时，在“康办”小礼堂由王承龙和李彬山、姬应伍出面召开了“调解会”，双方各持己见，直到9月23日，组成了以“公革会”头头王维章为首的，有“消革会”、“义革会”等组织头头参加的“上海市公安局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公联指”），局面才逐渐稳定下来。

（五）“上体司”和“工体司”、“交运局造反队”武斗

1967年5月底，“工总司”下属由“文革”前分配在工厂的运动员组成的“工体司”，派人潜入“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准备在体委成立“革委会”时抢占席

位，被“上体司”发觉，抓住这些人毒打了一顿。于是，“工总司”下属杨浦、虹口、黄浦等区联络站出动了22辆卡车，1万余人，包围了上海体委大楼。胡永年急向朱玉佩求援，朱找到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等人谈判。谈判不成功，陈阿大给了胡永年的一巴掌。大楼外“工体司”攻打更急。胡永年摆出一副光棍流氓架势，脱光了上衣，只穿短裤，跳在台上说：“我拼了，26年后，还有我胡永年……有胆量，不怕死跟我冲。”于是，100多人手执大刀、长矛，又叫又喊，冲出大楼，抓了对方4个人进来，严刑拷打。而“上体司”有几个人也被“工体司”抓去关押在上海砂钢片厂，胡派人去抢回来，又抓回来“工体司”7个人。这次共打伤54人，其中重伤11人。31日，马天水、徐景贤在康平路办公室召集王洪文、陈阿大、王承龙、胡永年开会，表示支持“上体司”，还要追究“工体司”的责任，王洪文、陈阿大承认对基层教育不严。

7月9日，上海红卫兵汽车学校和红旗汽车学校学生发生斗殴。“上体司”的人出来干预，又受到红卫兵汽校学生围攻。“上体司”抓了红卫兵汽校学生4人。其中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工总司”交通运输局（简称“交运局”）联络站的头头，他要“上体司”放人，但这4人放出来时都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其中2人已不能走路，这就激怒了“交运局”造反头头们。他们出动四五十辆运输车在“上体司”门前游行抗议。胡永年立即组织

人保卫大楼，双方对峙。7月10日，“交运局”又出动了100多辆运粮车及大吊车，堵住了体委大门，手执竹片向内进攻。胡永年同样脱光上衣，穿了短裤，手执大刀，两次带人冲出大门，抓了100多人进来。11日、12日，“交运局”连续两天开了卡车，载着“伤员”到市政法指挥部和“上体司”门口示威，高呼“交出打人凶手！”13日，马天水、王承龙、朱锡琪等人到“上体司”，讨好胡永年说：“你们打击流氓阿飞做了许多工作，是有成绩的。”还问：“你们伤了多少人？”表示“慰问”。14日，在王少庸、王承龙授意下，“公革会”、“上艺司”、“上医司”、“版司”、“科司”、“财革会”、“交大反到底”、“铁联”、“红东北”、“机管局造反兵团”等28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上体司”。“交运局”造反头头大为不满，又开来了100多辆卡车、吊车，摆在南京路，严重堵塞了交通。15日，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召集双方谈判。胡有恃无恐地说：“我151斤，今年26岁，你们看着办吧，为什么拿吊车把门口堵起来，‘上体司’不是好惹的！”而“交运局”一方，因受伤的人较多，打红了眼，也是不服。谈判破裂，双方剑拔弩张，形势骤然紧张。直至17日，马天水等将胡叫到“康办”，劝说胡在两派头头会上作了“高姿态”的自我批评，好说歹说，最后总算双方都表示愿意“握手言欢”。

（六）上海最大的一次武斗——砸“联司”

1967年初，上海柴油机厂（简称“上柴厂”）成立了两个造反组织。一个是“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联司”），另一是“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兵团”（简称“东方红”）。后者挂钩于“工总司”，受到王洪文的支持，他们反对“联司”，并称“联司”是受“走资派”操纵的“老保”组织。以杨仲池为首的“联司”向社会求援，得到上海交通大学助教汤福坤（化名“全向东”）及上海汽车配件厂“革委会”主任陈卜昌等人支持，组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联络总站”（简称：“支联站”）。

1967年1月，上柴厂“联司”和“东方红”在厂内发生摩擦，“联司”抓了人。王洪文、王维国等派出有公安干警参加的200余人冲进厂内砸了广播站，也抓了人。“联司”包围了这些人，王洪文又增派5000人进行反包围。“联司”出动了工人和家属千余人，分乘10辆大卡车，身悬“我是反革命来自首”的牌子，到市公安局游行示威，表示抗议。4月，张春桥、王洪文、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等以“政法指挥部”名义，派出“上柴联司调查组”，由陈阿大蛮横地宣布解散“联司”，还抓了“联司”的柏广山、卢国兴两人。27日，“联司”头头杨仲池带了2千余人在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柏、卢二人；他们并成立了“接待站”，对外进行广泛宣传和联络。汤福坤、陈卜昌等串联100多个组织筹建的“支联站”积极开展活动。5月

3日，张春桥、王洪文等看到事态扩大，以“市革会”名义发出通告。谴责“联司”头头煽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妨碍公安机关正常行使职权。“联司”就和“支联站”在人民广场召开“誓师大会”驳斥这个通告。当时社会上确有不少人对“工总司”横行霸道行为强烈不满，同情“联司”，因此一时间，“支联站”基层组织迅速增加，发展到627个，并酝酿建立全市性的“支联总部”。7月28日，“上柴厂”两派斗争中，“东方红”派的工人解福喜被打死，市公安局抓走了“联司”8人。王洪文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会、追悼会。会后组织上百辆卡车的人游行。“联司”等又在人民广场多次组织“辩论会”，并在闹市进行广播、宣传、对抗“市革会”支持的“工总司”。

“联司”和“支联站”的活动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支持，威胁着张春桥、王洪文等的帮统治。王洪文惊呼：“‘联司’人数在全市不多，但能量很大，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各单位的反‘工总司’和反‘市革会’的人支持‘联司’……包括‘市革会’机关都有支联的，全市都搞起支联站，上海就要第二次大乱。”张春桥等决心搞掉“联司”。王洪文在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内，筹组砸“联司”（行动代号“888”）的秘密指挥部和一二、三线的指挥点，又派了“工总司”直属野战兵团头头陶国正（原江南金属制品厂人事科长，“四清”时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伪装“支联”，打入“支联总部”卧底，刺探情报。

7月31日，陶国正向王洪文密报“支联总部”在兴国路一幢房屋内开会，筹备成立全市“支联站”的统一组织。王洪文急调“上体司”的“搏斗兵团”50人和上海砂钢片厂100人，由陈阿大、张宝林和胡永年带领去抓人。共抓了26人，送备公安分局关押。除杨仲池、汤福坤、陈卜昌三人未到会，没有抓到外，“支联总部”主要头头几乎被一网打尽。

8月3日，王承龙以“市革会”名义派人递去《致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公开信》，指责“联司”大方向错了。遭到“联司”的人拒绝，派去的人被扣留。8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十万人民集会示威，怒斥上柴联司绑架市革会代表和解放军的政治事件》的报导，还刊登了“工总司”等20个组织的《紧急声明》，为用暴力砸掉“联司”制造舆论。

8月4日，人民广场集中了二三十万人，近千辆卡车、吊车、消防车，一齐驶向“上柴厂”。黄浦江水面上有“上体司”、海运局、打捞局、船舶公司和江南造船厂造反派控制的拖船、运输船、打捞船等20余艘船只，分水陆两路包围了“上柴厂”。王洪文、张宝林、王胜利等在现场指挥。李彬山、王承龙、朱玉保等也到现场助威。开始，王洪文指挥的队伍，从大门进攻。在厂内的“联司”人员，一面进行还击，一面用高音喇叭喊叫：“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工总司”的人久攻不下，王洪文高喊：“他妈的，把‘联司’门口造谣的高音

喇叭拆下来！”气急败坏地下令切断厂里的总电源。高音喇叭因断电而停播了。接着，王洪文等又派大吊车撞工厂的铁门，但因“联司”防守严密，还是攻不进去，于是改从侧面拆毁工厂围墙冲了进去，先占领食堂，断掉“联司”的水和粮，再将各个大楼车间分割包围，消防车架了云梯登上屋顶追打，并用高压水枪喷射。“联司”人员在屋顶上进行抵抗。到下午4时，“联司”人员在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的情况下，被迫“投降”。“被俘”人员在押送途中，男的都被强迫脱去上衣，女的则被撕破上衣，举起双手而行，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浑身血迹斑斑。凡是见伤势不重的，就拖住再打一顿，说这是“补一补课”。聚集在厂工房面前的职工家属个个泣不成声，有的甚至向现场指挥的头头跪下求情，回答他们的却是拳打脚踢和恶毒的辱骂。很多“被俘”人员被押送去杨浦公安分局、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等处过堂受审。总计在这场血腥镇压“联司”的大武斗中，打死一人，关押和伤残650人，其中有11人被关押8年之久。上海柴油机厂厂房被严重破坏，大量物资损毁，停产二月，国家损失严重。而张春桥、王洪文等却认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砸“联司”前，市政法指挥部下令上海电影制片厂运动办公室制订计划，把整个砸“联司”过程拍摄成电视剧，在全市各机关放映。

（七）普陀区一〇一厂武斗

1967年春，普陀区有两个区级工人造反组织，都挂钩于“工总司”。一个叫“工总司普陀区联络总站”，一个是“工总司普陀区区分部”。为了夺全区的权，两者明争暗斗，关系剑拔弩张。

一〇一厂在普陀区江宁路桥畔，地理位置重要，谁掌握了该厂实权，就象占领了一个“桥头堡”、“制高点”。1967年3月，该厂的“联合造反纵队”（简称“联纵”）夺了厂的领导权，成为掌权派。“联纵”有1000多人，挂钩于“工总司普陀区区分部”。该厂另一派造反组织“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有700人左右，成为在野派。他们挂钩于“工总司普陀区联络总站”。

“普陀区联络总站”为了夺普陀区的权，于5月组织了名为“毛泽东思想联合宣传队”的专业武斗队伍，怂恿与支持一〇一厂“总部”向“联纵”夺权。6月3日，他们集中外厂9个单位约1500人冲进一〇一厂，砸了“联纵”。冲突中“联纵”被打伤64人，“总部”也伤了20人。“联纵”被迫撤出工厂，住进延安西路33号市委大院内。

“联纵”垂谋报复，在“工总司普陀区区分部”支持下，提出“血债要用血来还！”“杀回厂去”的口号，组成“司令部”、“参谋部”和“突击队”，建立秘密据点，制订作战图。并且制造舆论说有材料证明“总部”是“支联站”。“材料”指王洪文

后，王洪文表示同意再夺权。于是“工总司普陀区区分部”组织了 80 多个单位 1 万余人，动用了公交“巨龙车”、消防车、大卡车，使用了铁锤、长矛、铁棍等武器及氯水、硝酸等，于 8 月 6 日凌晨 2 时向“总部”发起攻击，5 时攻入厂内，武斗到上午 10 时才结束。打死 2 人，致残 33 人，受伤 500 多人。工厂损失严重，被迫停工 49 天。王洪文赶来现场推卸责任说：“我同意你们打，但没有叫你们打死人。”陈阿大也叫嚷要“追究责任”。此事吵吵嚷嚷几年，一个打人凶手也未查清，更谈不上惩办了。

（八）青浦武斗

青浦县的武斗，在上海郊县中最为突出。这是在张春桥的煽动和“工总司”王洪文等直接策划下造成的。王洪文极力鼓吹：“青浦要大乱”，“我觉得青浦没有乱够，坏人没有暴露出来”。陈阿大叫嚣：“‘工总司’的大旗在黄浦江边树起来，难道会倒在青浦的小河里？”青浦县的武斗，从 1967 年 1 月开始至 1968 年 7 月，延续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其中大规模武斗有 3 次，小规模武斗次数难以确计。在武斗中，死亡 23 人，受伤近千人，重伤近百人，国家、人民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青浦在 1966 年夏秋间就有了一些红卫兵组织。以后又在市镇和临近农村陆续出现了“造反队”。同年 12 月徐景贤等所谓“后院起火”以后，“造反组织”多起来。到 1967 年初，全县各行各业、形形色色、大大小小“造反组织”有一百几十个

之多，经过按系统的所谓“大联合”，逐步归并为十几个全县性的组织。这些造反组织，在“夺权”问题上，在建立所谓“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问题上，在对县委主要领导干部中要打倒谁结合谁的问题上，分化组合成为多数派（或称“大派”）、少数派（或称“小派”）两大派。多数派得到同济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 12 所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的“炮打青浦县委联合兵团”（简称：“炮联”）、“上海市委党校造反队驻青浦分队”（简称“市党校小分队”）和县委人民武装部的支持。少数派得到了“工总司”王洪文、陈阿大、黄金海等支持。

1967 年 1 月 16 日，少数派抢先夺了县委和县人委的权，1 月 20 日“炮联”贴出大字报表示反对，并和多数派组织了“青浦县革命生产筹备委员会”与少数派相抗衡。2 月 4 日以少数派为主召开各造反组织万人大会，批斗县委和社、横局领导干部共 104 人。会上，两大派在打谁保谁问题上的分歧明朗化：多数派中的主要组织“农革司”（全称：“青浦县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途退出会场。少数派冲击了县公安局和邮电局，抢夺档案材料。

1967 年 2 月 14 日，在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下，“农革司”、“炮联”砸了“红卫军”（全称：“上海红卫军青浦县军分区司令部”）并由县公安局出面抓了“红卫军”头头 17 人；县“公革会”（全称：“青浦县公安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也砸了“公安

局联合兵团”和“县人委造反团”，少数派当晚举行游行示威，包围县公安局，抢占了广播站。2月17日，多数派调动了所属53个造反组织人马，砸了少数派的“联总”（全称：“青浦县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联总”组织了“反逆流兵团”，动员9百余人来上海“控告”。以后，“反逆流兵团”被县“公革会”取缔，21个头头被批。3月19日，多数派一方在“炮联”和“市党校小分队”的支持下，实行三结合联合夺权，成立了“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由县武装部政委及副部长任负责人，委员全部是多数派及其拥护者。

王洪文等听说与“工总司”挂钩的少数派受到打击，多数派夺了权，大为光火。3月24日黄金海等纠集上海“红西南”、“红东北”、“红中技”等中学红卫兵组织，组成“赴青浦调查组”，要求他们支持少数派，把已经砸掉、打散的少数派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他们宣称：“青浦是白色恐怖”。要“工总司青浦联络站”人员“不怕杀头，不怕坐牢”。王洪文直接到县武装部，找到政委，指责武装部支持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带人围攻朱家角公安派出所，大闹县公安局。在市“工总司”的支持下，少数派的“联总”等又重新活跃起来，组织了所谓“反复辟火线指挥部”，宣称“青浦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要把“‘工总司’大旗扛到青浦”，先后冲砸了县广播站和“县革会”筹备处等机关。4月1日，王洪文

接见“反复辟火线指挥部”头头杨宝才，公开表示“支持你们革命行动”。5月4日，“赴青浦调查组”和“火线”一些人与“农革司”在徐泾发生武斗。“火线”两次出击失利，40多人被打，一些人被抓走。5月19日，少数派调集人马，绑架了倾向多数派的县委副书记和4名县局级干部以及4名职工，带到上梢三十一厂严刑拷打，要他们交代“挑动武斗的罪行”。6月4日，重固公社发生武斗，混战一夜，双方伤百余人，死1人。这样，为夺权而进行的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事态越来越大，至7月21日，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武斗，双方参与武斗的上万人，受伤400余人，死亡3人，砸毁房屋430余间，单毁房一项估算损失即达数十万元。

“7·21”武斗后，少数派仍未得到便宜，部分人员来市区求援。王洪文纠集了120多个组织，在市人民广场召开声援大会，对少数派还赠送了大刀、长矛、柳条枪等武斗工具，并派汽车送他们回青浦。8月22日，“火线”出击，打死对方2人，重伤5人。25日对方在赵巷公社发起反击，双方死2人，伤数十人。9月，王洪文、王承龙和张宜燮等以“市革会”名义，在军人俱乐部召开两派头头会议，支持少数派，说他们是“革命组织”，“大方向完全正确”；同时指责多数派下属的“工革司”（全称：“青浦县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打倒兵团”（全称：“青浦县打倒刘少奇兵团”）是“赤卫队”的“变种”，是“保守

组织”等。他们特别点了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和县委副书记的名，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火线”所属“联总”得到所谓“平反”，又神气起来了。他们派人冲击“革司”和“打刘兵团”，洒汽油焚烧大楼。“打刘兵团”学生在大楼内用喇叭呼喊，“农革司”即调四乡农民进城，结果，“火线”有2人被打死。为了报复，“火线”的人在青浦中山公园用长矛戳死进城农民3人，在东门戳死“农革司”队员1人。还带人冲砸城西公社，公社机关的办公用品、仓库物资被抢劫一空。“农革司”调动人马集结在城东公社，11月13日冲砸西岭“火线”分部，打伤“火线”12人，重伤2人。10月17日，双方发生第二次大规模武斗，当场打死7人。以后从城厢到乡镇武斗不断。

经过多次血腥的武斗，两派谁也压不倒谁，僵持不下。只好再由“市革会”出面，召双方进行谈判。关键问题是双方在县革命委员会中的席位问题。后来互作妥协，在“对等”条件下实现了“大联合”，于1968年3月成立了县“革委会”。

县“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两派斗争并没有完结。1968年6月6日，因“权力之争”再度分裂，爆发了第3次大规模武斗。当时“火线”占领了县招待所和青浦中学，“农革司”等占领了商业大楼、青浦剧场和城厢二中，它们都在据点内用铁丝网、沙包、木材、铁器、水泥砖等构筑工事。房顶架上高音喇叭，呐喊冲杀，相互叫骂。一方抢了物资局的钢材作武器；另一方也

抢了2千余公斤“敌敌畏”作为武器。这一场大规模武斗又持续50天之久。直至7月26日，再由“市革会”出面，进行调停，双方开始撤出占据地盘，交出武器。武斗才逐渐停下来。

所有上述这些内讧和武斗，起因虽有所不同，有的要整顿对立面，自己独霸一方；有的因帮派之间的利害关系，相互磨擦；有的是头头之间的泄私愤、报私仇；也有的是在别人的策动和教唆下，充当炮灰和打手，但他们都把“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都自夸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之间的分歧和斗争的主要关键问题，说得文雅一点叫“权力的分配”或“再分配”，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各派在领导班子中各占多少席位和名位商底（谁当把手）。争的就是这个！为此而打得伤亡累累，头破血流！为此而不惜破坏生产，搞乱教学和社会秩序，毁灭国家大量财产！为此而造成工人阶级队伍和人民群众中的严重分裂，物质上的尤其是精神上的破坏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十五、“改朝换代”的叫嚣和迫害干部的主要手段

1967年1月6日“打倒市委大会”的召开，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后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市革会”）成立，标志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人已经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从那时起，张、姚等凭借着手中的权力，猖狂地在全市全面进行所谓“改朝换代”的罪恶活动，力图把上海搞成他们的“帮”天下。

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他们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紧密勾结，狼狈为奸，在开头几年中也积极参与了对上海的所谓“改朝换代”。他们指使少数亲信，通过“军管”和派遣军代表等形式，插手上海的运动。但“九·一三事件”^①后林彪的势力受挫，在上海形成了由江青反革命集团独霸的局面。他们积极推行“稳

①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暗中加紧进行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的准备，毛泽东、周恩来及时发觉并机智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叛变阴谋。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飞机仓惶叛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身亡。当年因林彪叛变事件发生在9月13日，故简称为“九·一三事件”。

住上海，进一步搞乱全国，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妄图把上海变成他们的反革命基地。

（一）张春桥关于“改朝换代”的叫嚣和其两方面实际内容

早在1967年1月初，张春桥就起劲地叫嚷“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他并反复强调“要砸烂旧（国家）机器”，说这是巴黎公社的经验。他不仅大肆攻击污蔑各级领导干部，而且把党、政机关一概诬之为“旧衙门”，把广大机关干部一概诬之为“旧人员”。张春桥说：“要搞一个巴黎公社，彻底砸烂旧机器。”“市革会”成立后，张春桥多次叫嚷：“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事实上，他们那种“改朝换代”的阴谋活动，也确实贯穿于“文革”的整个时期，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张春桥“新桃换旧符”^②的梦想彻底破灭为止。但从上海来说，“改朝换代”的“高潮”是在“市革会”成立后连续约三四年的时间内。这是一个残暴地迫害干部的时期，也是“四人帮”即“上海帮”形成并确立其在全市的帮派统治的时期。“改朝换代”，实际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方面，系统地、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残忍无比地迫害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其用心与手段之

次回

① 1972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宣布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张春桥日思夜想要当总理的迷梦破灭了，大为光火，于1972年2月3日写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有感》，发泄心中不快。《有感》中引用了宋·王安石《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暴露了张春桥的心迹，妄想有朝一日篡夺得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狠毒，后果之严重，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招兵买马，迅速扩充他们的帮派势力。他们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利用造反夺权的机会，从造反派的队伍里，网罗了一批“忠实”于他们的人，安插到全市的要害部门；又在激烈的内讧和武斗中剪除造反派中的异己者；还趁筹建各级“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召开党的“九大”等机会，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到区、县、局、部、委、办以及重要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岗位。同时，用各种手段残酷镇压群众中反对他们的力量。最后形成了以反革命野心家、投机家、卖身投靠分子、打砸抢分子、反动文痞为核心的帮派统治体系。

下面，我们着重记述为了“改朝换代”而疯狂、残酷地迫害干部的几种主要手段。

（二）迫害干部的主要手段

1、利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干部。

“文革”初期，对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迫害，是从批判他们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开始的。1966年10月以后，着重批判他们执行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这种“批判斗争”，在全市搞得最热闹最厉害的时期是1966年10月到各级“革委会”建立前后。在这段时期内，从市委、市人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各部、委、办、区、县、局、公

司的负责干部直到各行各业基层单位的负责人，除极少数人外，几乎都成为被批斗的对象，“理由”是因为他们都执行了“资反路线”。

究竟什么是“资反路线”呢？1966年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文中，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名词，发出“彻底批判”的号召，说这种批判是贯彻执行《十六条》、正确进行斗、批、改的“关键”。在同月9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两人讲话中，都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说刘、邓的路线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林彪大肆鼓吹“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谬论，否定党的领导，宣扬无政府主义。陈伯达将所有对所谓“造反”行动困惑不理解、不支持和抵制的人都扣上“怕字派”的帽子，大肆诬蔑他们是“怕群众，怕革命”。但是，无论是《红旗》杂志的社论，或林、陈等人的讲话，对于所谓“资反路线”，都只是作笼统的“挞伐”，没有确切地列举其具体表现，因此，它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

从上海当年“批判斗争”各级领导干部的批判发言内容来看，所谓执行了“资反路线”，大体是指：(1)派工作组。但工作组很快就撤销了。派出工作组这个问题只涉及市委和区、县、局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然而，众多的工作组组长以及部分组员

也被认为执行了“资反路线”而遭揪斗。(2) 主张“文革”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措施。说这都是压制群众起来闹“革命”，是搞条条框框束缚群众手脚。(3) 维护生产、教学等社会正常秩序的主张以及对于乱揪乱斗、打、砸、抢等破坏法纪的“造反”行动的抵制或不支持。说这是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怕”字当头，是“以生产压革命”，是“国民党式的训政”，等等。(4) 凡群众中有不同意见的对立和斗争，都归罪于“当权派”。由于对“造反派”冲击党委、破坏生产和工作秩序的不满，群众中不同意见的对立和斗争是客观上必然要产生的，是不可避免的，但却被“造反派”指责为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5) 所谓“搞经济主义”。1966年年底前后那股“经济主义妖风”原本是江青、康生等人亲自煽动起来的，后来却倒打一耙，说是市委和各级党委主要领导干部的“罪行”，在批判“资反路线”浪潮中列为重要的一条。(6) 在干部问题上“包庇”所谓“坏人”。诬蔑各级领导干部本身有各种严重问题甚至已经“烂掉了”，于是在“文革”中实施“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或“丢卒保帅”的阴谋策略，等等。还可以举出一些，但在“揭发批斗”中列举“罪状”最多的是以上 6 个方面的问题。这些所谓执行“资反路线”的表现，后两条完全是倒打一耙与造谣诬蔑，前 4 条也是颠倒是非，把本来是正当的或

正常的行动说成是问题和“罪行”。这些行动，说到底，只是在“文革”已经错误地发动的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仍然试图坚持党的领导，对破坏法纪、制造动乱的“造反”行动有所遏制而已。正如 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根本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个论断。

在张春桥等人的操纵指挥下，造反派利用“彻底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号来迫害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是极为蛮横、残酷的。他们给被批斗者普遍地挂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衔”。揪斗时一般要颈上挂黑牌（有的重达几十斤）、身上贴纸条（倒写姓名并打叉如以侮辱）、强迫长时间低头弯腰站立听取所谓“揭发批判”（称之为“低头认罪”）、揪头反拎双臂（名之曰“喷气式”）、罚跪等等。有段日子还流行将被批斗者戴上高帽，先照相、再押上卡车游街之风（甚至把供电所、电车公司的高架车也借用来押解负责干部游街）。总之，千方百计地丑化和打倒全市各单位的领导干部。

许多单位召开了多次以揭批“资反路线”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矛头向上斗争会”。这是黄浦区一些造反派头头首先“创造”，为张春桥所赞赏，而在全市积极推广的。1967 年 2 月下旬，“市革会”在黄浦区和川沙县搞建立“革委会”的试点工作。从那时起的 20 天中，张春桥、姚文元曾 5 次亲临黄浦区加以“指

导”。黄浦区一些造反派头头，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物，秉承张、姚的意旨，大肆造谣诬蔑，把区里领导干部描绘得一团漆黑，说他们都是“隐藏在党内窃据要职的老反革命”、“区委区人委是黑窝”，“区委四代书记不是叛徒就是特务，都是牛鬼蛇神”。这就为他们“矛头向上大方向正确”制造了所谓“理论根据”。从2月28日起连续3天，那里的造反派召开了有58人参加的“矛头向上斗争会”，面对面地斗争区委书记李东鲁等同志。这次会议的主要特点是选择一部分部、局、科级干部参加会议，在造反派代表的监督下，诱使和逼迫他们面对面地“揭发”斗争主要领导同志。“创造条件让当权派表现”，叫他们“火线亮相”，以达到“分化当权派，斗倒区委主要负责人，并为‘解放’‘结合’一些干部打基础”，这就是“矛头向上斗争会”的主要“经验”。

3月2日，“市革会”开会听取黄浦区、川沙县两个试点单位汇报。张春桥对黄浦区的“经验”大为称赞。他说：“黄浦区这种做法，其他区都可以试行，全市也可以召开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会，让市（里）的部、局长、区委书记出来亮相。”他下令“开一次（有）‘黑市委’干部包括市一级、部、局长一级干部（参加的）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大会，可加上部门的造反派代表，准备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开，给他们一个亮相的机会，便于我们观察。区、县也可以搞这样的活动。”从那

时起到1968年上半年，区、县、局、大专院校等大多数“革委会”相继建立之前，这种“矛头向上斗争会”曾普遍流行。

广播电视台这个现代化的宣传舆论工具也被利用来批批“反路线”、揪斗迫害领导干部了。这从1967年1月6日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时已经开始。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年一年中，上海电视台就转播了51场批斗大会，每月转播约4至6场，也有一天内转播两场的。每次大会之前，层层通知布置会场、组织收看；会议设专线电话并由主持者随时报告收看电视的群众的反映，这叫做“会内与会外相结合”；会后，还要收集反映，特别要那些被批准来看电视的一部分靠近的当权派谈感想、体会，以“促使”他们“低头认罪”，交代和揭发“问题”。这种电视批斗大会，由于同成百万以上的观众直接见面，使之似身临其境；大量造谣诬蔑之词，各种颠倒黑白的恶毒言论，以最快速度在全市传播、扩散，因之影响特别恶劣。许多摧残、侮辱领导干部的做法，也由于电视批斗大会的“示范”作用而在全市迅速推广。例如1月15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所谓“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大会”，对陈丕显、曹荻秋、石西民以及市里宣传、文教系统一批领导干部搞“喷气式”、挂大牌子，揪头发，罚跪，甚至推倒在地，脚踩背部（叫做“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武斗会。在会议中途已经有不少单位把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批斗对象拉来。电视

转播一结束，接着就揪斗本单位的对象，上行下效，如法炮制。

自从张春桥下令推广黄浦区“矛头向上斗争会”的经验后，电视批斗大会也增加了“让当权派登台表演”的内容。他们选择并威胁、逼迫某些部、局级和区、县负责干部以及秘书等所谓“知情者”，在造反派代表作批判发言的中途，起来作补充发言或插话（有的事先要写好发言稿经审查同意）。面对面揭发陈、曹或市委其他负责同志的所谓“问题”、“罪行”。于是，演出了争先恐后抢话筒等闹剧，不仅当场电视转播了，并且拍了实况纪录片。

2、利用“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搞专案审查迫害干部。

“抓叛徒”和“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两者是结合的，但在时间上“抓叛徒”发动在前，“清队”在后。为了抓“叛徒”和“清队”，广泛采用了专案审查的方式，成为残酷地迫害干部（也包括部分群众）的主要手段，其“高潮”约有三四年之久，持续时间包括所谓“定案处理”等则更长。

1966年8、9月起，康生、江青阴谋策划，煽动与支持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等搞所谓“抓叛徒”活动。1967年3月16日，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义，正式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

中共中央批准先后出国民党监狱的61位同志错定为“自首叛变”，^①诬陷刘少奇包庇“叛徒集团”。康生、戚本禹、关锋等大肆吹捧红卫兵在揭露“叛徒集团”中的“功绩”。在上海的张春桥立刻感觉到了此事关系重大。在他的授意下，窃据“市革会”常委的市委机关造反头王承龙，于1967年5月在康平路办公室召开有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水产学院等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10余人的会议，进行组织和发动，旋即又用“市革会”材料组名义，在徐家汇图书馆搞了一个“抓叛徒查黑线小组”，有20多名造反派和来自11所大学的150多名红卫兵参加。从此，“抓叛徒”这股风也在上海刮起来了。

在“市革会”和其他会议上，张春桥、王洪文、王少庸、王承龙等大肆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谬论，进行了恶毒的煽动。他们全盘否定以前的镇反、肃反运动和审查干部工作，说：“过去肃反、审干都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的，包庇了大

^① 1935年，由于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需要党的干部去做，然而当时干部十分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并报经党中央批准，让尚未归党在国民党北平（即北京）军人反省分院中的共产党员，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从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南一渡等61名党员分9批出狱。出狱后，立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及时被安排了工作。这些同志出狱后，服从组织上的安排，积极工作，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些同志是根据组织上的决定而出狱的。事情本来是清楚的，“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等一伙出于打倒老干部的目的，把这批出狱的党员诬陷为“六十人叛徒集团”。

批坏人，原来的结论不可靠，不算数，要重新审查。”“过去已做的审干结论受到刘少奇极左哲学的影响，现在要冲破框框，都要重新认识。”在这种蛊惑人心的煽动下，红卫兵和所谓“革命群众”冲击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全市出现了大揪干部的历史档案材料，肆意诬蔑、陷害的歪风。凡是历史上曾经被捕过的干部，都被当作叛徒，先戴上“大叛徒”的帽子来批斗、审查；被捕而又获释了的就作为特务来批斗、审查。他们的逻辑是：敌人的特务机关不是“吃素”的，为什么别人牺牲了，成为烈士，你却活下来了？你出狱敌人就会放过你吗？一定是领受敌人的任务做了特务了，等等。

配合“抓叛徒”的活动，进行了清查敌伪档案的工作。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在上海，张春桥抢先四五个月就已动手了。张春桥抓清理敌伪档案工作，有两方面的阴谋：一方面，可以随意诬陷、打击一批中央和市委负责同志，此即所谓“为中央专案服务”；另一方面，掩盖、封锁和销毁有关江青、张春桥等自己丑恶历史的资料，此即后来所谓“防扩散”材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要另列专章详细记述。

1967年下半年，王少庸、王承龙等发动和支持一批红卫兵冲击市委组织部，诬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盐委书记杨士法是“假党员”。11月29日，在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等主持

下，召开了电视斗争大会。从此，凡是入党介绍人一时没有找到，或介绍人死亡，或介绍人一时未能作证明，或入党志愿书等证明材料不全的，都作为“假党员”批斗审查。这样，在全市又刮起了揪“假党员”的邪风。

“清队”在上海开始于1967年底，其推开则在1968年上半年。各区、县、局等一般都是在所谓“三结合”的“革委会”正式建立以后，进行“清队”的全面动员，并且把它列为“革委会”的首要任务，是“抓革命”、“抓阶级斗争”的具体体现。1968年6月初，王洪文、王少庸等在文化广场召开动员大会，从此，“清队”运动全面展开。“清队”任务正式见之于规章，已经是1968年8月下旬的事了^①。同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则把“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写进了《全会公报》。

“清队”所要“清理”的究竟是些什么人？直到“清队”大规模展开后，并未见之于明文规定。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中也没有明确地列出来。如果就性质相近的文件来说，那么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关系比较密切。这个文件后被称为

① 1968年8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一篇文章中引述毛泽东的话：“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清理阶级队伍作为一个阶段提出来了。

《公安六条》，其第四条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造会头目的中小造首和职业造会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一条规定范围广泛，内容庞杂，但既然讲了对这些“分子”有几个“不准”，自然理成章地产生了把他们清理出来的必要性。^①到了“清队”大面积展开后，逐渐就有要清理“九类人员”的说法，这是指：（1）叛徒；（2）特务；（3）死不改悔的走资派；（4）地主；（5）富农；（6）反革命分子；（7）坏分子；（8）右派分子；（9）反动资产阶级分子。（这第（9）类又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反动学术权威”；也有说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把第（6）类改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但这些也都是在运动中的“约定俗成”，并未见有明文规定。

^① 1972年10月8日，张春桥、马天水、徐景贤在听取“市革会”专案办公室关于“清队”工作汇报时，张春桥说：“历史上符合《公安六条》的政治问题要清理”。由此可见《公安六条》是作为“清队”中要清理的问题的依据的。

为了搞“清队”，“市革会”和各级“革委会”都设立了清队领导小组和专案办公室，下辖众多的专案组。以“市革会”专案办为例，直辖的专案组就有26个，几乎把华东局、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列为专案审查对象；还有一批重点抓的“集团性案件”的专案组，每个专案被审查对象从十几人、几十人到上百、几百人不等。据统计，全市经过一定的组织同意建立的“专案”有八百几十个，但未经审批的专案组以及不列专案的批斗审查对象那就无法计算了。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等而立案审查的有24万余人。凡是干部的经历中有被捕、被俘、服刑等等关节问题的，或曾经在敌占区从事地下斗争的，不管过去是否已经审查清楚，是否已有明确的审查结论，都要受到批斗审查。凡是家庭出身成份“不好”的干部，本人也可以被怀疑为漏划的地主、富农或资产阶级分子，或戴上“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之类的帽子受到批斗。凡是社会关系复杂的、有“海外关系”的，那么怀疑的阴影就笼罩着他。许多人因追查与那些社会关系的往来情况而受到批斗。凡是过去有过一些被认为不恰当的言论（不管是在学习讨论中或自我检查中），在运动中被人“揭发了”，都可以戴上“漏网右派”的帽子受到批斗审查。更有甚者，有些部门（如公安部门、外事部门等）完全正常的业务工作，也会被诬为资敌、通敌，以及什么“侦探无产

阶级司令部”等莫须有的罪名，使那里大批干部受到批斗审查。

“清队”中对干部的“审查”除靠边审查外，还大量地采用隔离审查和拘留审查（后者莫其名曰“保护性拘留”）两种方式。市委常委、市人委副市长和华东局局长以上干部受拘留和隔离审查的有 22 名；全市被逮捕、拘留、隔离审查的部局级干部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 40% 以上，靠边审查的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 45% 以上。两者相加，达 80~90%。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受审者均须接受日夜批斗、长年累月的关押以及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和侮辱。整个“清队”运动中普遍地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很多单位的刑讯逼供是骇人听闻的；因之，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3、利用所谓“精简机构”分大小班子、把绝大多数干部赶出机关，到“五·七”干校去。

张春桥早在“市革会”成立前后就把全市广大机关干部看作是旧政权留下来的“旧人员”了。对付这批“旧人员”，他叫嚷“象 1949 年解放时对旧人员那样，只要派二个军代表就可以了。”但庞大的机关干部队伍究竟如何处理呢？或者用张春桥的说法究竟怎样“改造旧人员”呢？他的办法首先是把绝大多数机关干部赶出机关。1968 年 3 月底 4 月初，张春桥即利用“革委会”要“精兵简政”作为借口，下令公司以上机关一律分成大小两个班子。他提出大班子人员要占机关干部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小班子人员只能占不到三分之一。（实际上，许多区、县、局机关 90% 的干部被编为大班子，留下进小班子的不到 10%）大班子人员离开机关另找场所集中去搞所谓“斗、批、改”；剩下小班子人员基本上是“造反”早的、信得过、用得上的人，搞机关业务工作。这是一箭双雕的恶毒阴谋，既把绝大多数机关干部排挤出机关，又利用他们去整各级领导干部和所谓“有问题”的人。但是，剩下小班子，机关是否从此精简，人员不再增加了呢？不！“市革会”刚成立不久，张春桥急如星火地向王少康、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提出，要立即挑选 100 名工人分到“市革会”各组、办当干部，“要求快选，要重视任用这批干部，以后再逐步挑选。”以后，“市革会”和各级“革委会”确实不断地把那些被看中了的、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有感情”的、“老造反”等等，大批挑选上来脱产当干部，以致机关的机构、人员迅速膨胀起来。这是从领导骨干到一般干部的大换班，“改朝换代”，建立“帮天下”。

1968 年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刊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在庆安县柳河办“五·七”干校^①的经验。上海“市革会”和区、局、县等机关纷纷到崇明岛和奉贤县海滨，去创办“五·七”干校。大班子人员暂时有了去处，即进“五·七”干校，搞“斗、批、改”（当时主要是搞“清队”）和生产劳动，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去“五·七”干校，上海实行的是大班子“一锅端”的办法，不管干部的身体状况和有无特殊困难。特别是对内定有“问题”的干部，一律赶到“五·七”干校去。徐汇区“革委会”主任黄克（当时他还兼任“市革会”“机关干部工作小组”组长）和卢湾区“革委会”主任金英在动员干部去“五·七”干校时都提出“以不死为原则”。即大班子的人不管是老弱病残，只要一时死不了，都必须去“五·七”干校。有人向黄克反映一位同志的腿不好，不能到干校去，黄克说“不能走的叫人背着去！”有个住医院手术后出来不久的干部，要求不去干校。黄克蛮横地说：“抬也要抬到干校去！”

据“市革会”办公室调研组编写的《“五·七”干校和机

① “五·七”干校的“五七”两字，来源于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后来通称“五·七”指示。里面指出人民解放军以及各行各业都要以一业为主，兼学其他，即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农副业生产，办工厂，批判资产阶级等。黑龙江省革委会于1968年5月7日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去，在柳河办了一个“农场”，搞了约5个月，写出了一篇所谓“经验”，此即“五·七”干校的由来。

关大班子情况》刊载，到1969年6月中旬止，全市办了“五·七”干校19所，在校人员有15000多人，其中处长以上领导干部都有1700多人。以后学员陆续增加到约2万人。由于当时干校的所谓“斗、批、改”任务主要是搞“清队”运动，各区、县后来把所管辖的剧团、地段医院以及某些服务行业等集体企事业单位人员也放到“五·七”干校来了。

除“五·七”干校外，市轻工业局、市手工业局等还在市区办“五·七”工厂，把大班子人员赶下去。另外，在工业、交通、财贸系统，还有29个单位采取所谓“办学习班的形式，借基层单位的场所，把大班子人员放下去，搞“斗、批、改”和劳动。以上这些留在市区但脱离了机关的大班子人员，共有10900多人，其中处长以上领导干部900多人。1971年5月2日，市委组织组向市委写了《关于落实中央二十二号文件，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请示报告》，内称“1968年10月以来，创办了54所‘五·七’干校，共有机关干部人员4万余人。”

“五·七”干校的“创业”时期，生活条件很差。广大的机关大班子人员，尤其是靠边的没有“解放”的干部，不得不承受生活上和生产劳动中种种艰辛。他们到长江口老鼠沙等地割回芦苇，造草房御风寒，泥地上铺稻草就是床，没有桌椅蹲蹲在地上吃饭，开堆涂荒田，种菜、种粮、养猪，几乎是白手起家！

但是“五·七”干校的“主课”仍然是所谓“抓革命”，搞“斗、批、改”。在干校普遍建立了“牛棚”——那就是关押隔离审查对象的地方。被隔离审查的干部是完全丧失自由的。对许多干部规定他们必须佩戴白袖章等特别标志，并且每人有编号，不喊姓名，与监狱里犯人一样。他们遭受无数次的批斗，要写不完的交代，除此以外，还要干各种累活脏活。每逢别人不愿干的活，干校管劳动的头头就说：“到牛棚牵一条牛去干。”这就是被隔离审查者在干校的遭遇。有些干校，如在奉贤的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还有所谓“羊棚”，这是靠近审查对象集中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处境比“牛棚”里的稍好一些。如果细分一下，那么在各干校被审查者大体有以下几个层次：(1) 隔离审查者；(2) 半隔离者（不能回市区，休假日也不能回家，通讯也受限制）；(3) 靠近审查者（行动进出要向造反派报告，早晚要向毛主席像低头“请罪”）；(4) 回班人员（编入连队班组参加劳动，但还没有“解放”）；(5) 虽已宣布解放，但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直到宣布恢复了组织生活，才算过完了“审查”关。有些干部直到“四人帮”彻底垮台之日，也没有走完这个过程。

在“五·七”干校里，对于受审查者的批斗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由专案组搞的审讯逼供外，还有(1)联合批斗会（由几个连队或兵团联合组织）；(2)拉出去批斗（被校外单位

“借”出去作批斗对象）；(3)田头批斗会（在田间劳动时组织的批斗）；(4)突击搜查批斗（往往是半夜里紧急集合，搞突然袭击，对被审查对象进行搜查，然后即组织批斗）；(5)举办“集训班”（把靠近、隔离、“打倒”对象集中一起，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相互检举揭发，开“讲用会”等，逼迫交代问题）；(6)召开对敌斗争大会；(7)召开“宽严大会”（所谓进一步“交代政策，指明前途”）；(8)“九类分子评审大会”；等等。

在徐汇、卢湾、南市、虹口等区，一度把所谓“刮红色台风”^①捉到的人关押进“五·七”干校里来。每个干校关押五六十人到100多人不等。区“革委会”将关押看守这批“人犯”的任务交给“五·七干校”的“学员”们，美其名曰“参加社会的斗、批、改”。从干校来说则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来种干校的田，因为干校“学员”们的体力毕竟较差，各干校都深感劳动力不足。但另一方面，干校又增加了一项抽调“学员”担任值班警戒的任务。当时在崇明岛上前进农场的徐汇区“五·七”干校的头头们，对这项任务十分卖力。他们专门设计了劳改营地，

① 所谓“红色台风”，即在某几天内，动用专政工具，打击社会上的一些刑事犯罪活动。但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操纵下，他们在“刮红色台风”中，扩大打击面，乱抓乱捕，把属于人民内部问题不应拘捕的也拘捕了，甚至株连报复，因此，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在这批“人犯”住地周围拉起了铁刺网，东西两面搭起了瞭望台，架起了可以旋转的高强度光黑的探照灯，夜晚一片森严气象。更为突出的是这个区的“五·七干校”把关押隔离审查对象的“牛棚”也搬迁到铁刺网内去了，与那些“小光头”（那些人都剃光头发，并在头皮上涂上红墨水以作为标志）为邻。这样一来，“五·七”干校的外表也更象“集中营”了。

4、提出“四个面向”的口号迫害广大干部。

何谓“四个面向”？“四个面向”就是“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文教基层单位”，号召干部去那里工作或就业。这是张春桥、马天水、徐景贤等共同策划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消化”掉那数万名因“改朝换代”而被排挤出机关的干部，以巩固他们的“帮”统治。

“四个面向”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自从各机关大班子人员被送到“五·七”干校等处后，不少干部不满那种歧视他们的态度。过了一些日子，有些干部包括大班子子里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提出要与小班子人员进行轮换。这种要求愈来愈强烈。1968年年底，马天水向张春桥反映了“五·七”干校困难很多以及那里干部提出的轮换要求，张春桥听了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无论如何，不能和机关干部轮换！”又说“实在不行，以后下工厂劳动可以。”

1969年初，“市革会”几个头头在康平路机关203会议室开

碰头会，张春桥参加了。当时正值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时期，徐景贤说了一句“‘五·七’干校也有人想到黑龙江去”，这本是干校个别人员随便谈谈的，却让张春桥立即抓住了做文章，提出以所谓“帮助上山下乡知青”名义，动员“五·七”干校等处干部去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紧接着又逼南京九四二四工程梅山铁矿缺少工人，马天水即建议动员一批干部去那里当工人。张春桥立即表示赞同，说“很好”。到了1969年夏初，王少庸、马天水和当时市直属“五·七”干校的负责人丁庆丰在一起交谈干校的工作。马、王二人叫丁回去后写个报告，提出“五·七”干校内的绝大部分干部可以下放工矿当工人的意见，后来报告送上来了，马天水却又怕这么多干部一下子下放当工人会触发强烈的不满，于是他又玩了一个花招。借口暑期高温季节工厂里缺勤多，劳动力紧张，用“战高温”的口号，动员干部去工厂劳动，“支援工业生产”。还说行政、供给关系一切不变，劳动3个月，过了高温季节再分配工作。当时一部分中、小学校缺少师资，于是也趁机在那些大班子人员中挑选和动员一些人去当中、小学教员。另外，又以“上山下乡知青慰问团”名义，分批派出干部，到江西、安徽、贵州、云南等地农村去，较长时间与在那边“插队”的上海“知青”生活、劳动在一起。以上就是“四个面向”提出的经过和其具体去向。

从1969年4月起，已经有一些单位（如杨浦区、南市区、“市革会”机关事务管理局、商业一局等）根据“市革会”的布置，动员“五·七”干校的干部去“四个面向”了。1969年8月27日，“市革会”召开了动员大会，正式打出“四个面向”旗帜，并且内部层层分配任务，压数字指标。^①于是各区、县、局、大专院校等“革委会”以及各“五·七”干校等纷纷召开大小会议传达动员。他们提出了种种响亮的“革命”口号，形成政治压力，胁迫干部申请“四个面向”。他们提出：

“‘四个面向’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到黑龙江去是到‘反修’最前线去，为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出一份力量。”

“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上山下乡干革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四个面向’是又一次‘路线站队’，要在‘四个面向’中检验自己立场、感情的变化。”

“响应不响应‘四个面向’的号召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

“要用‘四个面向’的实际行动批判‘入党做官论’、‘公私

^① 各系统、各区、县部分配了动员的数字任务，例如当时给教卫系统的动员任务是1410人，计：去黑龙江240人，去中小学600人，去南京铁矿400人，云南、贵州、江西慰问团170人。

落化论’、‘劳动惩罚论’、‘下乡镀金论’。”

“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

机关干部中很多人本来就是工人、农民出身，现在又要去接受“再教育”了，不免有所议论。于是，他们又提出“工、农出身的干部也要回炉锻炼”的口号。

在“动员”中，他们特别把那些靠近多年没有“解放”但又打不倒的区、局、科等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对象。徐景贤出了个鬼点子，说：“半解放的干部（按：这个词又是徐景贤创造的）可以在‘四个面向’中亮相，取得群众的谅解。”于是，各单位都搞什么“火线亮相”、“火线解放”，逼逼那些干部提出“四个面向”的“申请”。

为了进一步排挤那些“疙疙瘩瘩”的、“不顺手”的（其中不少是“派性”作怪）干部，不少单位的“革委会”机关再次分大、小班子，除留下一部分人外，其余也归入“四个面向”的动员范围。当时窃据“市革会”常委职务的市委机关造反头头王承龙在小会上恶狠狠地说：“趁这个机会，把那些‘老保’送掉一批。可以多送一些。这样，这些人可以少积极一些，机关可以太平一些！”长宁区再次分大、小班子后，把“革委会”主任贾晋——他是全市唯一没有经过打倒就结合进班子的区委第一书记，又拉下来送到黑龙江去。

在这种气氛下，各“五·七”干校除了仍在隔离审查的对

象以外，几乎人人都要“表态”响应号召，不然过不了关。接着校方又发动各连队班组互相“报喜”“促进”，进一步推动报名运动。市直干校被称为“决心大”“行动快”，大部分兵团、连队百分之百报名“四个面向”，只待组织“批准”了。“火线解放”也搞得热热闹闹。大多数被动员的“半解放”对象，怀着不甘心长期靠近受歧视、想为党工作的复杂心情，写了“四个面向”去黑龙江的申请书，于是立即得到批准，并同时被宣布“解放”、恢复组织生活、发还扣发的工资，“欢送”出“五·七”干校和机关。

据不完全的统计（“四个面向”动员时间比较长，大体从1969年到1971年，各单位行动有前有后，统计不全）：“四个面向”中去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的约1700多人（其中51岁以上的就有98人，还有一些健康状况很差的病号），另有少数人去了吉林、内蒙古的农村；去外地工矿的以南京梅山铁矿为多，约去了4000多人，另有一部分干部去了山东大屯、莱芜、张家洼、安徽铜陵等煤、铁、有色金属矿区；去本市中、小学校工作的因受文化程度等条件限制，人数较少，也有约二三千人（以普陀区为例，本区抽调下放中、小学校的48人，市文教单位下放的132人，市直机关和市属工交、财贸等“五·七”干校来的108人，合计下放到该区中、小学校的共288人）；去江西、安徽、贵州、云南等地“知青慰问团”，是分批组织的，这些同志

的干部身份不变，数量最大的是去本市工业、交通基层“战高温”的干部，1971年7月14日统计已达16870人，加上以后陆续下去的总数有2万人之多。

去黑龙江的干部分批出发，比较集中的在1969年的8、9、10三个月。徐景贤吹嘘“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他还对那些带队的人说：“你们到那里去，要打好基础，把那里搞好，成为上海的一个基地。”后来，马天水和当时的“市革会”组织组负责人金祖敏等曾三次派人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协商，要求把这些干部“就地消化掉”，不回上海了。但黑龙江省有关方面不同意，马天水他们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到1975年初，组织组另一负责人徐世玉提出安排这批插队干部去“小三线”工作，还是想把他们排挤出上海，但受到插队干部的抵制而未成。

“战高温”干部大批下放工业、交通各基层单位的时间是1970年6月至9月间（后来，1971年7、8月又集中下去一批，其他时间零散下去也有）。当初，各“五·七”干校动员时都说明“战高温”三个月，过后分配工作，并强调下去的干部人事组织关系和工资福利待遇等不变。但是，高温季节很快过去了，作为劳动力使用的大批干部，既不分配工作，也不能回干校，就这样“拖”着。到了10月底，“市革会”发了一个74号文件，要求“参加战高温劳动的同志继续留厂劳动”，说是要“继续劳动锻炼”，“重新学习”，“虚心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彻底改造

世界观”。到了 1971 年 12 月，“战高温”干部已经从高温“战”到低温，再到高温，再到低温，岁月蹉跎，反映强烈。于是，马天水又与金祖敏等共同策划对付办法。12 月 24 日，市委发了沪委〔1971〕54 号文，干脆把“‘战高温’干部”这个词换掉了，改成为“下放干部”，提出把这批干部的行政供给关系、党、团组织关系，公费医疗关系以及干部、人事档案材料统统转下去。同时，“动员”这批干部“申请”当工人。这样就彻底露穿了马天水玩弄的“战高温”花招，也进一步暴露了张春桥一伙为了“改朝换代”，迫害几万名机关干部（包括到外省工矿的）的凶恶嘴脸。但是，他们迫使干部“申请”当工人，受到了大部分人的抵制。于是，又这样“施”着。一直到 1976 年 8 月，“四人帮”及其上海党羽们垮台的前夜，当时“市革会”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还说：对“战高温”的干部，“要尽最大努力安排到基层，不回干校，不安排在公司以上单位，不调出工交以外系统，采取就地消化的方针。”他们坚决不让大批干部回机关。卢湾区那个金英（姚文元的老婆）说：“老人马再回来，文化大革命不是白搞了吗？”“老人马回来，那么文化大革命中提拔的新干部往哪里摆呢？”她讲得多么露骨、彻底！王少庸还叫嚣：“（这一大堆原）机关干部，现在机关不要，工厂不要，郊区不要，我看可以投亲靠友，自找出路！”为了“改朝换代”，王少庸死死堵住这批干部回机关的门，把话说绝了。

5、利用从严从重处分和明拖暗挂等手段迫害干部。

“清队”运动的后期，大体上从 1970 年下半年起，全市各单位陆续进行了对所谓“犯错误干部”的组织处理工作，在残酷斗争之后又给以从重从严的无情打击。然而，大量的受审查迫害的干部虽然长期关押隔离批斗，实在没有因而也搞不出什么问题，不得不予以“解放”，并且难以给予处分。于是，张春桥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以及“市革会”组织组的金祖敏、王日初、徐世玉等采取了明拖暗挂等各种阴谋手段，对这些干部或长期搁置不理，或作了充满诬陷不实之词的审查结论，继续进行迫害。

1970 年 6 月 24 日，秉承张春桥和马、徐、王的旨意，金祖敏等在上海锅炉厂召开现场会，介绍这个厂和金山县朱行公社组织处理工作的经验，在所谓“正确掌握政策”的幌子下，强调从严处分，开除党籍、党内除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以及劝退的比例要大大超过其他党纪处分的比例。1971 年 6 月 15 日，市委组织组向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说：根据 7300 多个基层党组织的统计，已作各种组织处理的党员数为 10120 名，其中开除党籍、党内除名、劝退、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合计 6431 名，占处理数的 63.5%，留党察看以下党纪处分的占 36.5%。1972 年 10 月 18 日，市委组织组向市委写了《关于对犯错误党员组织处理工作情况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到 9 月底止，全市处理了

18941人，其中给予出党重处分的达10530人，占55.6%。又据市委组织组1976年不完全统计，全市受党纪处分的干部和党员约28600余人，处级以上干部受到各种处分的665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组织处理问题，按照干部管理制度规定要上报审批，下面报来的处理意见，到了市委组织组或马、徐、王那里，又往往加码，加重处分；不仅加重党纪处分，而且在行政上又给予降级降工资处分（被降1、2、3级不等，最多的降9级）。对于历史上有过错误，早已作过处理的干部，重新算老帐，再给予处分。（粉碎“四人帮”后，各级党委经过认真复查，对于“文革”期间受到过严过重处分的党员，实事求是地重新作出恰当的组织处理的决定，特别对于不应该处分的错案，坚决地撤销了原处分决定。）

马、徐、王等任意给老干部作出“犯走资派错误”的结论，有的还被扣上了“三反分子”^①、“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四人帮”被粉碎后，经过拨乱反正，市委组织部查阅324名局以上干部的结论材料，当初被戴上“走资派错误”帽子的有103名，占31.3%），而且，这些审查结论是不准本人看的。1970年6月，市委组织组对于审查结论同本人见面不见面问题曾明确规定“结论（指组织批准后的）只限于口头见面，不能给看

书面结论；内审的对象，如本人不来问就算了，来问的也只能口头说一说。”他们怎样对待来询问的干部呢？绝大多数是轻描淡写地说：“你有问题不需要做结论！没有结论！”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努力纠正“左”倾错误。1972年4月，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打击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情况，指示《人民日报》起草并亲自审改批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申党的干部政策，推动了“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而“四人帮”及其上海羽翼拒不执行，对“解放干部”工作设置种种障碍。上海广大干部对于马、徐、王及其控制的组织部门和专案机构那种极不严肃、极不负责的态度强烈不满。1972年底、1973年春，随着“清队”逐渐进入尾声，被审查干部要求作出正确的结论的呼声更加强烈。在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和其他干校，许多老干部要求看对自己的审查结论。他们说：“审查了好几年，最后连个结论也没有，说‘不需要作结论’，谁能相信呢？”“究竟我有什么问题？究竟我是什么问题？最终总该有个结论啊！”“谁知道专案组是怎样写我的结论的呢！”有的尖锐地提出，“审查我这么多年，兴师动众，内查外调几乎跑遍了全国，化了国家那么多钱，最终连个书面结论也没有，说不过去吧！”在众多干部的强烈要求下，1973年4月，市委组织组的负责人之一徐世玉被迫在市直“五·七”干校表态“结论可以给

① “三反分子”的“三反”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本人看”，“但要作准备工作”。但是到了同年年底，却又变卦了，市委组织组的另一个负责人马建村说：“结论问题很多，不能给看，算了吧！”竟想用“算了吧”三字把广大被审查干部看自己审查结论的正当要求挡回去！事实上当时对干部的专案审查是对干部的一种迫害手段，大量的所谓“审查结论”充满了诬陷不实之词和各种“悬案”、“尾巴”，他们确实拿不出手，拿出来就露馅了！

这也和马天水的阴谋策划有关。经过六七年的所谓“审查”，还有相当多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处在长期靠边站的境地。对他们的所谓“问题”，都已经反复查过，再没有什么可“审查”的了，但“四人帮”和马、徐、王等又不甘心实事求是的。对他们作出结论，更不要说平反昭雪了。约1973年初，针对这些干部和家属们的强烈不满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马天水在“市革会”常委会上提出“分两步走”的意见：即“第一步先把人‘解放’出来，第二步再慢慢地作审查结论。”他冠冕堂皇地说这是“关心被审查的干部，也使他们的亲属亲友都高兴”，其实是一则缓和一下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二则变换打击迫害的方式，“慢慢地作审查结论”即长期拖着不作结论，作为各种悬案。马天水说他与张春桥、王洪文联系过，他们都同意这个主张。当时“市革会”常委会中有人认为：这样做，对每个专案审查对象至少得讨论两次，解放时一次，以后作结论时又一次，增

加了麻烦。马天水狡猾阴险地说：“麻烦总归是有的，不然你也很麻烦的！”

“四人帮”和马、徐、王等这种“久拖不决”的策略确实是十分恶毒的，他们就是阴谋把一大批原来领导干部拖垮拖死，“自然消亡”！在“四人帮”和其党羽的阻挠下，到了1973年10月，全市还有119名局以上干部没有得到“解放”。但即使是宣布“解放”了的，大量地也是撂在一边不用的，或者降级使用，做一般干部的工作。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等多次说过干部的“解放”不等于结合，结合不等于复职。1970年7月在“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会议上，张春桥更具体地说：“（干部）‘解放’不等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不等于使用，使用不等于官复原职。”大批领导干部就在这几个“不等于”下拖着、挂着。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原是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数学学会理事长，1959年3月入党，一贯表现好，“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审查”，并未发现任何“问题”。1972年11月复旦大学党委上报要恢复苏的组织生活，但马天水在市委讨论时说，“不恢复组织生活，也不开除，拖下去算了。”（直到“四人帮”彻底垮台后，苏才得以恢复组织生活）此类情况，不是少数人。按照马、徐、王的打算，拖下去就“自然消亡”了。当年的市直“五·七”干校九连是遭受此类待遇的干部比较集中的场所。

6、株连家属子女——迫害干部的一种特殊手段。

中国封建传统中的所谓“株连”，也充分反映在张春桥等为了“改朝换代”而对干部尤其是对大批老干部的残酷迫害中。凡是负责干部被揪斗审查的，受株连者首当其冲是其配偶，或被逼迫作揭发交代，或直接被揪去陪斗。或甚至作为“同案犯”，如说“丈夫是叛徒，妻子是特务，结婚是政治交易”，等等。从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起，到区、县、局、公司等各级领导干部，他们的配偶，少有不遭受此种迫害和侮辱的。有些人还被造反派威逼着办理离婚（多未得逞）。随着抄家（美其名曰“政治搜查”）之后，接着是冻结银行存款，停发被审查者工资（只发少量生活费），使家庭经济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借贷无门者则只能变卖衣物度日。有的还被压缩住房或被迫搬家。这些情况，“文革”中比比皆是，不在这里具体记述了。

这里要讲一讲的是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株连到下一代身上，是张春桥、王少庸、黄克一伙人的一个“创举”。

1968年2月起，王少庸两次布置当时任徐汇区“革委会”主任的黄克，要他把家住在徐汇区的华东局、市委负责干部的子女管一管。黄克以徐汇区红卫兵军区的名义，在郊区的上海县北桥公社黄二大队一座孤立的房子里，办了两期“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第一期从5月9日到6月中旬，共35天，

“学员”有46人，第二期从7月初至8月中旬，共45天，92人。二期共138人，都是14岁到20岁的初、高中学生。他们的父、母亲共112位，都是华东局、市委、市人委、区委等领导同志，都是正在被关押、隔离、靠近审查的对象（其中5人已被迫害而死）。

在这个“学习班”中，对那些青少年学生，用尽威胁、恐吓、欺骗等手段，施加不堪忍受的压力。“学习班”不给回家，不许给家里通信，有的还有“一帮一”的监督。大会套小会，先要“端正对造反派的看法”，个个要表态，搞人人过关。接着就要这些青少年揭发其父母亲的“问题”。如果揭不出什么问题，那就是“没有划清界线”。办班的工作人员不断找“学员”谈话，说认识不提高，不能毕业，要在学习班长期蹲下去。如果暴露思想说自己父母不是反革命，那就不仅要遭到大会点名批评，还要遭受围攻殴打。仅仅在“学习班”揭发自己父母还不够，还要参加批斗大会作面对面斗争，回到家里要搞“家庭斗争会”（叫做“回家实践”），让这些子女的揭发批判（揭发批判稿要在学习班里写好经办班人员过目批准）成为打击那些领导干部的“重磅炮弹”。

两期“学习班”，黄克都去“训话”，大放厥词。他先点负责干部之名，然后叫其子女站起来让大家看，凶相毕露的诬陷那些孩子的父、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逐一加以痛骂。他要这些青少年学生大义灭亲，与“反动父母”划清界限，说“他们是敌人，是蒋介石，要跟他们斗”，“这是真刀真枪的斗，这就是上战场。……蒋介石摆在面前，你打不打？”“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没有把反动的老子作为蒋介石，作为美帝、苏修、所以恨不起来。”“你们不起来揭发反动老子，不同反动老子划清界限，你们自己也就变成小叛徒、小特务、小反革命、成为革命对象！”“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嘛，在古时封建王朝，也是老子为了做官杀儿子，儿子为了做官杀老子，这多得很嘛！”等等。

在第一期“学习班”中，组织这些青少年“学员”先后8次参加批斗他们中的父母的大会；第二期“学习班”中，组织了3次批斗大会，逼迫42个“学员”向所谓“反动父母”面对面揭发问题。至于所谓“家庭批斗会”，次数也不少。

这些“学习班”造成极为恶劣、严重的后果。一部分被蛊惑、受蒙骗的孩子在大会上斗争他们的父母，回家后把父母作为“阶级敌人”监视、批斗，引起家庭分裂，对两代人的心灵都是残忍的折磨、蹂躏。“学员”中先后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杀身亡，1人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所有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在“文革”期间不论是在学校里还是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抬不起头来，后来大都被迫远离家庭去农村插队落户。

1968年7月上海《支部生活》第46期首先发表了《徐汇区举办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子女学习班》的报道。7月13日《解放日报》第一版整版篇幅报道了“红卫兵军区为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子女举办学习班；教育阶级敌人的子女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8月12日《文汇报》又由记者捉刀用孩子的名字署名发表《坚决造反派老子的反》等蛊惑人心的文章并加上编者按语。这些报道、文章、流毒全国，影响极坏。

1968年7月1日至月底，徐汇区还由“机关造反联合委员会”出面，举办了一期“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家属学习班”，或称“老婆学习班”。被勒令来参加的大多是市委、市人委、华东局机关正在受批斗审查的干部的爱人，共38人。学习内容也是要她们大义灭亲，划清界线，揭发问题，使这些同志的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

1969年初，控制市检察院的造反派，也办了“受审查干部子女学习班”。被迫集中“学习”的子女有16人，在2月28日召开的批斗大会上，胁迫3个孩子揭发批判他们的父亲，还搞了什么《敦促反动老子投降书》。第二天，又强迫被批斗迫害的干部学习这个《敦促投降书》，“谈体会”。这种恶毒的做法，在父子两代人心灵上，都落上了难以弥补的创伤。市公、检、法军管会将这个学习班的情况和《敦促投降书》作为经验印发全市政法部门参照执行。

以上 6 条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改朝换代”而在上海残
酷迫害广大干部的主要手段，但还不是他们的罪恶行为的全部
内容。特别到“文革”后期即 1974 年以后，在“批林批孔”和
“诬邓”运动中，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贩卖“老干部等于民主派，
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继续恶毒地诬陷打击
原各级领导干部，妄图篡夺党与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十六、一桩重大的政治阴谋

——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荻秋

在迫害干部的狂潮中，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
委书记、市长曹荻秋首当其冲。对他们的诬陷迫害，完完全全
是政治阴谋。“文革”初起，陈丕显患病较重，中央批准疗养，
市委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曹荻秋反对张春桥阴谋搞乱上海，
坚决与江青、张春桥对着干，成为他们的眼中钉。约 1966 年底，
江青、张春桥企图逼迫陈丕显就范，对陈又拉又打。江青对陈
说，只要陈肯出来“搞好文化大革命”，她可以做陈的“顾问”，
还说：“你以前的什么账都不算了，我们都包了”。陈丕显蔑视
江青的威胁利诱，坚决拒绝了她的拉拢。1967 年 4 月 12 日，江
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放厥词，说上海“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
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
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可是他死不回头”。她这里指的
就是陈丕显。在“文革”的漫长岁月中，江青、张春桥一伙为
了打倒陈、曹，使之永远不能翻身，施尽了各种阴谋诡计和卑
鄙手段。陈丕显、曹荻秋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上，坚持党性原则，始终与江青、张春桥等人作针锋相对

的斗争。他们无私无畏的示范作用和原市委绝大多数领导成员在斗争中站在正确的方面，反映了上海党组织是坚强的，代表了上海广大干部、党员和全市人民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主流。

（一）为了打倒陈、曹，蓄意进行诬陷

对陈、曹的迫害，所用的手段基本上是相同的。“文革”初期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矛头向上大方向正确”等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下，他们受到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批判会的折磨和侮辱，挂牌示众，戴高帽子游街、揪头发辱，都曾施之于他们身上。还有报刊点名批判和电视转播批斗实况（以陈、曹为主要对象的电视批斗大会，就有30多场次）等。

1967年6月，对陈、曹的迫害进一步升级，进入了所谓“专案审查”。“市革会”成立了材料组，后来改名为专案办公室（简称“专案办”），下面设置一批专案组。对付陈、曹的各有一个专案组。原先“市革会”有个由张春桥老婆李文静控制的对陈、曹的大批判组，这时其部分人员就转而搞专案了。专案办调集了庞大的工作人员队伍。在这两个专案组工作过的专案人员先后约有300多人。张春桥、王洪文多次听取陈、曹专案组的汇报，作“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当时抓专案工作的王少庸对这两个专案也是特别重视、特别卖力，费尽心机。

陈、曹的两个专案组的主要活动都是经张春桥、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等人审定批准的。”

对陈、曹的“专案审查”都长达七八年之久，究竟是怎样“审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王少庸说过一番很值得注意的话。1967年10月23日，对陈、曹已作了几个月的“专案审查”，王少庸召开“市革会”材料组组长会议，他在会上说：“张春桥说，按陈、曹问题，现有材料（定）走资派已足够了。（但）走资派、路线问题，用词松一点，还是内部问题。投敌叛变首是政治问题，就不同。……他这一讲，我就领会了。”好一个“我就领会了”！王少庸领会了什么呢？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8年7月4日，王少庸在《认罪书》中交代：“陈、曹大批判组的解散，随之成立了陈、曹两个专案组，这是对陈丕显、曹荻秋两同志的迫害的继续和加紧。从两个专案的情况反映上看，‘四人帮’早已把诬陷的内容、情节编造好了。张春桥还亲自听取专案组的汇报，出题目，提要求，阴谋诬陷陈、曹为叛徒。我就是顺着这条路子看材料，听汇报，考虑问题的。”王少庸领会的路子就是：为了打倒，蓄意诬陷！在他看来，一定要把陈、曹打成“叛徒”，其他问题，都不重要。

陈丕显、曹荻秋的政治历史，都是经中央审查过的。他们长期参加革命，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不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的历史是清清楚楚没有问题的。但江青、张桥等，为

了逼迫陈丕显、曹荻秋就范，以便于他们趁机篡夺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根本就不顾什么客观的历史事实。在前面一章中，我们曾提到：“文革”中通过“清队”运动迫害干部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大抛干部人事档案，从干部本人参加革命的经历中找借口。例如凡是本人历史上有被捕等问题的，不顾这些问题实际情况如何？是否早已审查清楚？是否有明确的结论？一概先戴上“叛徒”“特务”等帽子，同时以各种残忍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假材料、假罪证。因此而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江青、张春桥一伙也是这样从陈丕显和曹荻秋身上下毒手。

江青、张春桥等诬陷陈丕显是什么“黑小鬼”、“老反革命”，主要借口是1930年陈14岁时在闽西苏区因病随同一批红军伤病员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扣留约二十天的事，此外还有什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控”等问题；诬陷曹荻秋为“叛徒”是借口1932年曹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的事。其实，陈、曹这些事不仅早已由党组织审查清楚，他们本人没有问题，而且正象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应当看作他们早年参加革命与敌人作英勇斗争的光荣史！至于诬陷陈丕显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控”，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但是江青、张春桥等为了篡夺上海市领导权，必须打倒陈曹，他们蓄意诬陷的方针早就定了。

1967年2月1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的批斗陈、曹的大会

上，徐景贤讲话中第一次公开诬陷曹荻秋是“大叛徒”。并说陈丕显等“包庇叛徒”。

1967年7月间，在杂技场召开的电视批斗大会中，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一起跳出来恶毒诬蔑陈丕显“不是红小鬼、是黑小鬼”，“老反革命”。王少庸装腔作势地说他这是向大会“郑重宣布”。

（二）兴师动众搞外调，逼供、诱供制造假材料

江青、张春桥一伙既然在军委扩大会以及电视转播批斗大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郑重”宣布陈、曹历史上都“叛变”了革命，于是，顺着那条路子就要千方百计搞出所谓“罪证”来。他们一方面对陈、曹采取所谓“监护措施”即隔离审查，指使受他们控制的专案组人员批斗逼供，一方面兴师动众，多次多派人“外调”。

陈丕显专案组抽调人员专门成立了“闽西调查组”，从1967年底到1970年，前后二十多次去闽西，跑遍了陈丕显的家乡和三十年代他活动过的地区，涉及7个县、13个公社、135个大队，妄图挖取陈丕显“叛变投敌”的“罪证”。

“调查组”所到之处，首先是动用宣传工具，制造舆论，用大量诬陷不实之词，蒙骗陈丕显的亲友和当地干部、群众，对他们进行威胁、迫害。1968年5月31日的《材料工作简报》上，对“调查组”在某地的活动中有一段描述：“调查组同志

除了自己开了四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外，前后还出了四期批判陈丕显罪行的大字报，散发二百多份揭穿陈丕显罪行的资料，召开三次文娱晚会，借公社广播站批判陈丕显的罪行，揭露陈的反革命真面目。”由此可见，为了从政治上诬陷陈丕显，他们真是使尽了各种手段。

与此同时，“调查组”一些人到处逼迫陈丕显的家族、亲戚、战友、朋友，当地干部、群众，以至“四类分子”，揭发、交代材料。三年多来，前后涉及的人数以千计。不少人受到迫害，有几个被摧残致伤致死。有一位老红军，“调查组”前后 11 次找他，使用了捆绑、拳打脚踢、关押、罚跪、手枪威吓等各种手段，刑讯逼供，逼迫他“揭发”“陈丕显曾在长汀出卖革命同志，打死伤员一名”等问题。这位老红军，面对“调查组”一些人的威胁，不为所动，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捏造的材料。他说：“陈丕显是个红小鬼，他没有打死过伤兵，没有变节行为。”“要我捏造事实，陷害陈丕显同志，（说他）在麻场打死伤兵，叛变革命，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就是枪毙我全家四口，我也不说。”这位当时 70 高龄的老红军，在那些外调人员长期折磨、迫害下，含冤自杀身亡。

“调查组”在闽西查阅了那里几个县的敌档，一无所获。他们又遍访与陈丕显“同时代人”，妄图猎取所谓“线索”，最后，把一些所谓“有关当事人”扣押起来，在当地搞“革命大批

判”和批斗会，即用严重的逼供、诱供手段，搞来一些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材料”，并且不顾“当事人”屡次翻供，用来迫害陈丕显。

他们为了搜寻曹荻秋 1932 年在上海被捕后所谓“叛变”的“罪证”，派出大批人员，到 24 个省、市的档案馆、图书馆、公安局、“清档组”，查看了大量材料，仅在上海和江苏就翻阅了 25000 余卷敌伪档案（包括 9 千卷外文档案）和 10 万卷档案的目录。在张春桥等指使下，他们先后提审过敌伪人员等 120 余人，只准“揭发”曹的“问题”，不让反映全面真实情况；经常反反复复逼使同一个人写 10 多份、几十份前后矛盾的所谓“证明”，有时还抛材料诱使伪犯人员“交代”，甚至由外调人员拟好稿子，叫证明人照抄一份作为“罪证”。

“专案组”和它派出的外调人员为了迎合张春桥等的诬陷意图，对证明曹荻秋在敌人监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的旁证材料，根本不感兴趣。曾有一些与曹同关押在国民党反省院的人提供材料说：曹参加了狱中斗争，指导政治犯学习革命理论，还被大家推选为政治犯组织的“同难互济会”的领导人，后因政治犯中混进叛徒、托派，“同难互济会”解散，旋又秘密恢复，转为隐蔽活动，曹是始终参与的。这些证明曹荻秋在狱中真实表现的旁证材料，被抽掉作为无用的“待销毁材料”。

他们还采取了篡改旁证材料的恶劣手段，把诬陷不实之词

强加给曹荻秋。有个与曹一起坐监狱的人在“专案组”外调人员的威胁下，写了份旁证材料，尽管材料中加了“逃避斗争”的帽子，但实际内容恰恰反映了曹荻秋在狱中是讲究斗争策略的。“专案组”那些人对此材料不满意，竟自己动手在材料末尾加上：“行动是消极敷衍的，整天埋头研读英文”，“我们仍坚持斗争，而大曹情绪消沉，等待出狱”等语句。他们感到加上的文字不是本人亲笔，是个漏洞，便重抄以后，要本人签名认可。他们估计被“审讯”而写材料的人不会细看的，谁知加上的语句被本人发现，全部删去。“专案组”几个人不肯就此罢休，又以上海市“专案办”名义发信给提供材料人的原单位政治处，信上还点明指明“原来写的材料”那些地方要增，那些地方要删，强迫要按原来的日期重写。

1967年7月，“专案组”外调人员向原国民党江苏反省院的训育主任梁莺调查曹荻秋在反省院的表现。梁莺交代：“他（曹）在反省院里未暴露自己的身份，未讲出参加什么组织，只知道他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我知道张云卿（曹荻秋在狱中的化名）就是曹荻秋，是最近一些单位来了解情况时告诉我的。”“专案组”未能从梁莺嘴中“挖”出材料，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梁逼供。1968年6月，再次找梁逼供，历时8天仍然毫无所获。同年12月，再派人去逼梁按“专案组”的要求写材料，历时3个月。梁仍未满足他们的要求。梁对外调人员说：“你们这

些做法太主观，按照你们的要求我不写。”他还向当地派出所反映外调人员逼逼供信。1969年10月，外调人员变换手法，要当地派出配合审讯，一个星期提审了7次，仍然达不到目的。11月他们以上海市“专案办”名义写信给武汉市“革委会”，提出要对梁拘押审查（王维国也写函给武汉市军管会熟人，要武汉军区派人陪同“专案组”外调人员去当地公、检、法机关疏通）。11月中旬，梁被拘留。“专案组”一些人软硬兼施搞逼供。一面诱梁“悔功赎罪”，一面将梁的八十二岁的父亲以及老婆、妹妹、妹夫等进行审讯；同时到全国各地去审讯原反省院的任职人员。各方用电信不断联系，想在各人的交代中寻找矛盾、缺口。梁被迫得身患重病，濒临死亡。“专案组”头头们指令外调人员：一面要采取措施，留下活口，一面要加紧审讯。项蓬梁写出“曹拥护三民主义，靠拢国民党，有变节表现”的矛盾百出的假证。几天后，梁即在拘留所死亡。档案中有“专案组”外调人员布置与梁同室关押者对梁进行监视并收集梁的思想动态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此人反映梁曾对他说：“这个大（曹）不是叛徒，我没有办法，外调的人把叛徒像都画好了，叫我来证明，他们外调不下8次，没解决，把我关进来了”。“还不是他们出题目，我来做文章”。

在张春桥一伙的指使下，专案办公室和陈、曹两个“专案组”中的一些人就是这样进行“外调”，制造假证，用以迫害陈、

(三)迫害摧残本人并株连家属，陈、曹坚持据理抗争

自从对陈、曹实行所谓“专案审查”后，他们就被关押在一所警卫森严、“与世隔绝的房子”里，名曰监护实际上等于监狱。张春桥、王洪文、王少庸等指挥下的“专案组”，一面派造人员“外调”，一面即对陈、曹本人进行“审讯”批斗，逼迫“交代”。从此，连续不断的批斗折磨，苛刻的生活待遇，有病不给认真检查治疗，一齐降临到他们头上。有些日子频繁地批斗夜以继日，一天好几场。例如1971年3月4日至13日这10天中，陈丕显就被“提审”16次，1972年5月10日到7月5日，陈被“提审”68次。每次“提审”，都是肆意诬蔑、侮辱、威胁，从精神上到肉体上进行摧残。据“专案组”的一期《审讯简报》记述，陈在一次被“审讯”时气得“双手颤抖硬撑在那里”。曹荻秋同样被无休止地揪斗“审讯”，常常逼迫得曹情绪激动，怒不可遏。

在迫害陈、曹本人的同时，张春桥一伙还以吓人的莫须有的罪名株连陈、曹的家属。陈丕显的夫人谢志成和曹荻秋的夫人石斌，这时都受到株连，而且不是一般的“罪名”，都被诬陷为“特务”，分别成立了“谢志成专案组”和“石斌专案组”公然提出要从谢、石身上打开陈、曹问题的“缺口”。张春桥亲自批示：“要加紧追查谢志成的政治问题，可能对突破陈丕显的问

题有帮助，请少庸××加强指导。”王少庸果然十分卖力“指导”。他指使专案组“要查陈如何与特务挂上钩？如何通过妻子谢志成与特务挂上钩？”把谢的父亲、弟弟也搞起来审查，“看看有否可能取得突破谢的材料。”他又在专案办上报的“作战方案”上作批示：“石斌专案组要加强，并在市材料组领导下进行工作。”谢石二人的工作单位原来分别是市妇联和外经局，她们本属原单位“审查”的，在张春桥、王少庸等指使下，对付她们的专案组都划归市“专案办”直接管辖。王少庸在“市革会”专案办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说：“老实说，陈与谢，曹与石，都是政治交易。”谢、石二位同志都被关押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①受到长期残酷的迫害。

面对张春桥、王洪文一伙指挥专案人员疯狂地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荻秋都义正词严地据理抗争。“专案组”逼迫陈丕显交代“历史罪行”，陈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你们说我1930年有罪，那是你们欺骗毛主席，欺骗群众！”“我（19）30年没有罪，是光荣史！你们要给我讲清楚！你们搞的什么证据当然

① 1967年底张春桥、王少庸、王承龙等要有关部门寻找一个秘密关押处隔离审查的领导干部的地方，提出具体要求是“安全”、“近郊”、“与居民隔绝”，“既不像监狱，又要达到监狱的目的”。经多处察看，最后看中了“上海少年犯管教所”。谈话关押过去的人实际上即过囚徒生活；与家庭隔绝，每人都喊编号不能叫姓名；谈话叫“提审”，如有不满反抗，轻则训斥批斗，重则手铐脚镣。据不完全统计，曾关押二百三四十名重要干部与社会知名人士。

是假的，我没有什么要交代！”专案人员威胁说不交代就采取“革命行动”。陈说：“我历史清白，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你们现在对我的不都是‘革命行动’吗？还有什么‘革命行动’？那么多的大会斗小会斗都经过了，我还怕什么‘革命行动’！”“我告诉你们，我硬是干了几十年革命，工作上错误是有的。……我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我要对党负责，没有的事，硬逼我，我（也）不能讲，我这也是用的毛泽东思想。”1972年5月10日一次“审讯”中陈说：“1968年你们说我是‘老反革命’、‘黑小鬼’、‘叛徒’，戴了三顶帽子，现在你们不敢说我‘黑小鬼’了，如果（你们）还是坚持68年那三顶帽子，现在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你们讲我有罪，有什么罪你们拿出来啊！”关于江青、张春桥等诬陷陈为首组织“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侦查”（这个冤案迫害了大批干部，详情将在第十九章中记述），陈理直气壮地抗辩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无是生非”！曹荻秋不能容忍专案人员乱扣“叛徒”帽子，曾多次向专案人员严正申明：“你们这些材料是分析估计的瞎说，是带着框框往里面填内容！”在一次“审讯”中，曹荻秋拍着桌子说：“我是共产党员，谁也不能污蔑我！”有时当面质问：“我没有叛变自首行为，你们怎么可以强加于人？”以上只是通过“专案组”的《审讯简报》透视的几个镜头，但已经可以反映陈、曹据理抗争的浩然正气。当然，在他们的《简报》中，陈、曹又都被诬为是“极不老实”，“气

焰嚣张”，“猖狂反扑”。

1972年12月陈丕显对某些专案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检查身体以及退还被抄去的马列书籍等。12月30日王少庸竟在“专案组”的报告上恶狠狠地批道：“近来，这个人真是嚣张之极，所提要求，一概置之不理。”

（四）设悬案，留“尾巴”，妄图使陈丕显翻不了身

1974年9月，毛泽东接到陈丕显写给他的信，他在陈的信上亲自批示：

此人如何处理，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毛泽东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
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毛泽东批示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了，既要政治局一议，又提出自己意见是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正因为要政治局议一议，所以提自己的意见加上了“似可作”3个字。

由于毛泽东作了批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眼看硬顶着不“解放”陈丕显是不行了，于是又策划了一连串的阴谋诡计，妄图使陈丕显永远翻不了身。他们的罪恶活动情况，粉碎“四人帮”后从马天水、王秀珍、黄涛等人的交代中暴露了一部分。

据黄涛交代，1974年10月他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闭幕后，张春桥、姚文元召他去。张对他说：“你就要回去了，

有件事同你讲一下，关于陈丕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电话上同老马（马天水）他们又讲不清楚。”姚文元插话：“把陈丕显‘解放’出来，怎么样？”张接着说：“是这样。陈丕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毛主席批的是‘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似可作’，这就是说，可以理解为他的问题的性质是一回事，是严重的。现在，处理可以考虑作为内部问题。”（按：后来马天水等对下面公开说陈是“敌性内处”）张又说：“陈丕显的专案到底搞得怎样了？你回去同马天水他们讲一下，市委好好讨论一下，把市委的意见报来，先送给我们三个（王、张、姚），商量一下，然后再正式报毛主席和党中央。”姚文元说：“先很快解除他的监护。”张春桥又说：“还有一个问题，回去同马、徐、王谈一下，市委要把陈丕显的那些老对手，（如）铁路

局的谢鹏飞①、港务局的梁飞②两个‘飞’，还有小潘③——潘司令这些人，这些老造反，陈丕显的老对手，对这些人的工作要有个安排！不然，陈丕显出来了，又神气起来了，而他的那

① 谢鹏飞，原是上海铁路新嘉坡机厂的技工，“文革”初期为造反组织“铁联”的头头。他勾结王洪文、黄吉海等人，并主动投靠张春桥。一月反革命夺权中曾为“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负责人。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中他都死保张春桥，为张所赏识。他是个凶狠的打、砸、抢分子。1967年8月铁路南站2千多人大武斗，造成死亡4人，重伤22人，轻伤300多人，运输生产瘫痪10多天，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他是策划和指挥者，当时站在指挥车上手摇喊话器高喊“冲呀！冲呀！”他又随王洪文到苏南地区武斗，支一派，打一派，两次为一派运枪（300余枝）运人、运物资。为那里的武斗火上浇油。由于张春桥、王洪文等指名安排，1974年10月谢从下放劳动中直接提升为上海铁路局和上海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市革会”委员。

② 梁飞，原为上海港务局第二装卸区计划调度员。他是一个凶狠的打、砸、抢分子，“造反”初期，为首组织“海港指挥部”，三次冲砸交通部北方区海运管理局和上海港公安局，抢走国家大量机密材料，严重破坏海港生产；还冲砸了船舶运输研究所、第一人民医院等处。他是所谓“文攻武卫第一师”师长，独揽公室，阴谋谋私，残酷地惨无人道地迫害干部群众，就是这样一个人，得到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赏识，当上了上海港务局“革委会”副主任。因他利用窃取的权力，大肆聚敛，滥用职权，包庇重用坏人，民愤极大，马、徐、王等一度不得不将他“下放劳动”。1974年10月经张春桥点名重新启用为港务局“革委会”副主任。

③ 潘国平，原是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文革”初期，伙同王洪文、陈阿大等人策划组织“工总司”，充当副司令，参与制造“安亭事件”、“暴放日报”事件等，积极参与向上海市委、市人委和华东局的反革命夺权活动。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充任执行主席。后充任“市革会”常委，品质恶劣、流氓成性，屡次公安部门审查了解，自1967年始，利用职权，先后与四个有夫之妇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奸污女青年和有夫之妇7人，还对17名女性进行强暴或犯罪活动。一度因群众反映强烈，马、徐、王等不得不将他下放劳动。1974年10月经张春桥直接指名又被安排为市总工会常委，参与接待外宾等工作。不久又继续招摇撞骗，乱搞男女关系，再次拉下来去基层劳动。“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曾伙同张宝祚、耿金章、谢鹏飞、王承龙等人，以过去受马、徐、王的压制为名，妄图重返队伍，再次“夺权”。

些老对手还一个一个地在下面劳动了这件事，在陈丕显放出来之前就要办好，陈出来后，知道‘一月革命’时他的老对手，不仅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在，而且‘两飞’、小潘也都还在！”

1974年10月9日、10日王洪文连续打电话给徐景贤和王秀珍，说陈丕显要“解放”了，赶快把“一月风暴”时期的老头头名单排出来，看有那些人没有安排好工作；“陈丕显可以‘解放’，可以落实政策，新干部为什么不可以落实政策”；要使陈丕显看到他的“对立面”都在。10月15日，黄浦回到上海，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向马、徐、王等作了传达，还说：“陈丕显的‘解放’，不要专门开会，只作通知性的讲一讲就可以了。凡是面对面与陈丕显作斗争的‘老造反’头头要立即安排。”由于王洪文等催得紧，马、徐、王当即要王日初、叶昌明等连夜突击排下台的“老造反、老头头”名单，列出181人，并提了安排意见，由市委办公室派了两名干部第二天乘飞机去北京送给王洪文。

那些所谓“老头头”“新干部”是什么人呢？他们中不少人是劣迹昭彰、流氓成性的社会渣滓、打、砸、抢分子。由于他们造反起家后胡作非为、横行不法，为广大群众所痛恨，马、徐、王等慑于舆论压力，一度不得不把他们下放到基层去“劳动”。例如张春桥这次直接指名要擢升安排的谢鹏飞、梁飞、潘国平，就是这类货色。他们又被安排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据

马天水、王秀珍交代，为了给陈丕显制造对立面，借口给新干部落实政策而重新起用的老头头有70余人之多。不仅如此，马天水、王秀珍等还在党内传达讨论陈丕显“解放”问题之前，先召开所谓“老造反”代表人物座谈会，进行讨论，“统一思想”。

对陈丕显“监护”“审查”了这么多年，现在要“解放”出来了，总该有个审查结论吧，总不能象对待下面被隔离审查的干部那样，任意摧残若干年，到最后却轻松地又蛮横地宣布“你不需要做结论”、“没有结论”或“结论是组织上的事。你不要看了吧！”为了给陈丕显做审查结论，马天水等多次与张春桥通电话密议。

1974年10月24日下午，在锦江小礼堂召开市委四届八次全会。马天水主持会议。马讲了毛主席对陈丕显“解放”的指示，并表示“拥护”。他说对毛主席指示怎样理解？应理解为原来是敌我矛盾，才“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他强调对陈的审查是“应该”的，“线索”是有的，但“作为定案则证据不足，又无法查清”，等等。王秀珍在发言中强调，“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较早的同志一定要争气，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气。陈丕显出来后，不要让他看到他自己‘解放’了，要打倒他的人倒垮台了。”她说，“我觉得这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问题。”马天水在会议总结时说陈丕显“解放”问题现在不要往下传，“怎么往下传，

到‘市革会’开全体会议时再讲。”

1974年11月11日下午，在延安西路200号召开“市革会”全体委员会议，马天水主持会议。他讲话内容基本上与市委全会上相同。他在会议结束时说，还要召开“市革会”扩大会议，向各级党组织简单说一说对陈丕显的处理意见。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说到当年“审查”陈丕显一些历史问题时，讲了这样一句话：“实际上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侦控的问题也不要讲了。”

但是，在1974年11月17日以市委名义写的并与陈丕显见面的《审查结论》中，却继续大搞阴谋诡计，用了“经反复调查，无法查清”，“有的已经否定，有的无法继续查证”等词句，设悬案，留尾巴，继续对陈丕显进行迫害。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清查其党羽的罪行时，马天水多次交代供认：“对陈丕显同志的结论怎么做，我曾打电话问过张春桥。张说：陈有一个侦控问题，要在结论上作为一个悬案。当时我说，关于侦控问题，1973年讨论过两次，已弄清楚了，都是假案。这个问题已经对陈说过了，怎么还要作为悬案写上？张说，你说弄清楚了，是否一点疑问也没有了？我就还有点疑问。就算弄清楚了，已和陈丕显说过，但是作为悬案，又不是定案，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侦控是假案也没关系！现在又没时间推

查，作为一个悬案，这样比较机动。”（现在看到马天水有三份交代谈到这件事，内容一致，但1977年的一份说“这样比较主动”，1978年的两份都说“这样比较机动”。）“我一听他想在这个问题上留个尾巴，我就同意，没再讲了。电话打过后，我对徐景贤、王秀珍以及王少庸等说了张春桥的黑旨意。”“后来我把专案办的同志找来，讲了要把侦控问题作为一个悬案的意见。当时专案办的同志一再说，这个侦控案子已查清了是假案，并且已和陈丕显说过了，结论上再作为悬案不好办。我把电话上张春桥讲的给他们说了，硬逼着他们去和陈谈这个问题。陈丕显同志（当时）住在华东医院北七楼检查身体，‘专案办’去谈了，陈对侦控在结案上还作个悬案不同意。‘专案办’给我说了，说陈不同意。我说被捕疑点结论上不写了，对侦控问题就说还有疑点，现在没时间查了，作为悬案写上，不是定案，有什么关系。他不通，你们可把他叫到外边来，批判他一通。”果然，“专案办”又将已经调离另行分配工作的原专案组人员，再集中起来，对陈丕显连续进行了两次所谓“批判”。

所谓“被捕问题疑点”不提了，是不是真的这样做呢？也不！1975年10月，陈丕显调离上海去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中央组织部发函上海市委来要陈的干部档案材料。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又进行了紧张的密议，马天水并又与张春桥通了电话，最后决定把陈丕显1930年被保问题上所谓“疑点”，一一“即

些没有经过核实的材料”（马天水供词），“那些严重的逼供信搞来的、1974年市委常委会讨论时已确定不能用的材料”（原专案办人员揭发）——硬塞到向中央组织部上报的材料中去。事后，马天水等洋洋得意地说：“这样一来，他（陈）被捕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悬案了。”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1979年8月12日批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为陈丕显同志平反的报告》。“现决定撤销1975年11月7日原市委上报中央的《关于对陈丕显同志审查情况的报告》和1974年11月17日的《审查结论》，‘四人帮’及其余党蓄意捏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并在全市党员和群众中宣布为陈丕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肃清影响。”

（五）在长期迫害摧残下，曹荻秋含冤去世

对曹荻秋的丧心病狂的迫害，直到曹被迫害致死，更是令人发指。曹荻秋1932年在上海被捕问题，中央组织部在1957年10月肃反审干运动中作过明确的结论。结论中说：“曹荻秋同志在被捕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这个结论是有充分根据、完全正确的结论。当年曹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到审讯到判刑，全部敌人档案都在。曹没有屈服于敌人，敌档记录得清清楚楚。曹在狱中表现也是好的，到1937年5月曹的5年刑期届满，国民党派特务来“谈话察看”，认为曹“未肯将过去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谕，未有表示”。总之，敌人认定他毫无悔悟，于是又移

送江苏反省院（在苏州）关押。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战事吃紧，日寇飞机频频空袭，战火逼近苏州，经政治犯集体坚决斗争，要求无条件释放抗日（曹荻秋被推选为向敌人交涉的3位代表之一），终于在8月下旬全部无条件释放出反省院。当然，曹荻秋等所以能争得无条件释放，这同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时的总形势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历史事实。

但张春桥、王洪文和马、徐、王等蓄意陷害，根本不顾历史事实，更不听曹的抗辩，强行把“叛徒”帽子扣在他头上。他们虽经兴师动众，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几乎跑遍全国，甚至不择手段诱供、逼供，制造假材料，最终还是拿不出任何“叛变”的“罪证”来，于是，他们强词夺理地说：曹荻秋在敌人判决书的《送达证书》（实际等于“收条”）上签字，就是承认了判决书的内容，就是“屈服于敌人”，就是“背叛了革命”。又说，据当时报纸记载，1937年8月下旬政治犯集体出反省院时曾在油印的“我愿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抗战锄奸”的誓词上签名，曹荻秋等到上海后又向《立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政治犯要求出院抗日，曾发誓“在最高领袖领导下铲除汉奸”，是所谓“交涉释放时实行投降叛变，接受了敌人的释放条件”。其实，这两条都是不值一驳的。敌法院对曹的审讯只开庭两次，第一次曹荻秋在敌人法庭上坚称从来不认识那个出卖他的叛徒，没

有供出自己的真实情况，更没有供出任何组织和同志，何来的“屈服于敌人”，“背叛了革命”？第2次开庭就是宣布“判决”了。至于对敌人的判决为什么没有上诉，这是因为曹荻秋清醒地认识到敌人都是一丘之貉，上诉不但无效，反会延长关押时间，甚至使案情复杂化。这是狱中斗争策略所允许的。曹荻秋出反省院后与《立报》记者“谈话”等，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形成的形势下，这样做是符合于我党已经公开提出的同国民党合作抗敌的方针的，何来的“叛卖”、“接受敌人释放条件”？他们硬要这样讲，完全是牵强附会，违背了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蓄意诬栽。

1972年7月，当时具体负责“曹荻秋专案组”的人员中，有二人认为曹荻秋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定为“叛徒”实在不行！“变节行为”也定不上！另外有一些干部也认为他们的意见有道理。于是，“专案办”不得不写了一份简报——《情况反映》第八期（增刊），反映了这些干部的看法，并提出拟不定为叛徒的倾向性意见。张春桥的党羽们看到这期简报大为恼火。1972年7月26日晚，在王洪文主持下召开市委常委会，听取“专案组”汇报。针对汇报者所说“根据外调材料，肯定叛徒证据不足，定不上叛徒”的意见，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黄涛等一窝蜂地群起训斥专案组“严重右倾”，说“你们不要站在曹荻秋一边讲

话”，“曹荻秋定不上叛徒，还有谁能定叛徒？”等等。尤其是王洪文，蛮横地重复“判决书接受了，就是承认了（共产党员）”等溢美之词，甚至叫嚷“按照你们的观点，曹荻秋可以‘解放’了，可以当市委书记了”，“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都）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赤裸裸地全盘托出他们一伙蓄意诬陷曹荻秋的罪恶用心。

1973年2月21日，“四人帮”及马、徐、王等被迫决定要解除对曹荻秋的长期的所谓“监护”。（实际撤销隔离是在3月29日）5月份，又把曹发往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劳动。同年9月18日，他们以市委名义，向中央报出了《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市四届六次全体会议上和区、县、局负责干部大会上擅自加以宣传。

对“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诬陷迫害，曹荻秋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市直机关“五·七干校”，他再次严正地表示：“按原政策，我定不上叛徒，如果市里定了，我要向中央申诉。”1973年10月4日和1975年1月5日，曹荻秋先后两次给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写信申诉，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强加在头上的“叛变革命”，“叛徒行为”。但“四人帮”及其党羽一手遮天，恣意践踏党的原则，剥夺党员起码的民主权利，不但扣压申诉信，还以“翻案”罪名批斗曹，继续进行迫害。

1973年9月以市委名义递出的报告，中央没有批下来。到了1975年春，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解放”了一批领导干部。4月，王少庸去北京开会，中央组织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指示，王少庸回来作了传达。迫于这样的形势，马天水等又要“专案办”对曹荻秋的审查结论“再提个意见”。当时“专案办”中有人提出：1972年已提出曹定不上叛徒，结果被批了一通，还要提什么意见？！马天水假惺惺的说：“这次不管你们提什么意见，再不批评了。”后来“专案办”又起草了一份《关于曹荻秋同志的被捕等问题的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两面三刀的马天水看了很不合心意，亲自把报告中的“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恢复组织生活”、“恢复原工资，补发扣留工资”等等词句统统划掉。他说，“曹荻秋定叛徒，怎么能称同志”还亲自写上“组织生活不能恢复”。

转眼到了1975年秋，“四人帮”及其党羽又一次正式向中央递出关于曹的定案问题的报告。他们蓄意诬陷的罪恶目的不变，但狡诈的手法又有了新花样。报告中说对曹荻秋“是否要定为叛徒？党的组织生活是否予以恢复？我们还吃不准。”“请中央来作决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四人帮”被粉碎后，据王少庸1978年7月4日《我的认罪书》中供认，当时在锦江小礼堂一次市委常委会上曾讨论对曹的问题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上报。会后，马天水给张春桥打了电话，在第二天上午（常

）学习时间，马天水说：“对曹荻秋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里要定上定不上（叛徒）上海吃不准，然后由中央转中组部决定。这是张春桥的意见。”中央组织部收到中央转去的上海的报告后，通知上海去两个人汇报情况，时间已是1976年春。马天水、王少庸又专门关照去汇报的“专案办”人员：“中组部若问到上海的意见，就说市委倾向定上”！真是阴险恶毒之极！

1976年3月29日，曹荻秋遭受“四人帮”及其党羽长期的诬陷、侮辱、折磨、摧残，身心交瘁，他未能看到“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彻底垮台，含恨逝世。

“四人帮”粉碎后，197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批示中共上海市委，同意市委1978年3月18日对曹荻秋的复查报告和处理意见。6月23日，在市革命委员会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曹荻秋骨灰安放仪式，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然后，将曹的骨灰专机送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6月24日《解放日报》、《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大量报导追悼大会情况和悼念文章。市委决定将中央批示、市委的报告和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在曹荻秋骨灰安放仪式上的《悼词》印发传达到基层单位的党内外群众，号召大家学习曹荻秋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十七、打击、摧残各级干部和 社会知名人士

1967年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提出所谓“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的谬论。无独有偶，在此之前几个月，张春桥在上海就赤裸裸地鼓吹“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了。1967年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在兴国路张春桥、姚文元的办公室，张春桥召见当时“市革会”文教组的几个负责人。来人刚见面坐下，张春桥就提问：“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来人回答：“是反修防修大演习，普及毛泽东思想，培养青年一代，……”还没有等人家讲完，张春桥就粗暴地打断说：“你讲的这些也对，但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目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把那些老家伙搞掉。”他强调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搞老干部，解决老干部的问题！”在以后的几年中，张春桥竭力打击、摧残老干部。1971年3月30日，在“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会议上，张春桥讲到老干部问题时，恶毒地诬蔑说：“老干部，老了，奸巨猾！”反映了他又恨又怕的情绪。

林彪、江青两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这样仇恨老干部？说穿了，

这是由于老干部确实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难以逾越、必须排除的障碍。

下面，我们要稍为具体地记载他们是怎样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大搞“专案审查”，凶狠地残害上海市的老干部包括与我党长期亲密合作共事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我们记录这些史实，决不是干部受屈辱情况的曝光，而是以充分的事实证明：在“文革”那种“史无前例”的动乱局面下，一切所谓“清理”、“审查”等等，都只能为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造谣诽谤，诬蔑陷害，非法拘禁，严刑逼供，大兴冤狱，草菅人命等等所以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全国全面大动乱已经形成。于是，一方面群魔乱舞，沉渣泛起；而另一方面必然是人民受难，干部遭殃。

（一）诬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

“文革”开始时，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等主要领导干部，共计20人。张春桥黄浦勾结江青，与姚文元一起在1967年1月反革命风暴中篡夺了市党、政大权；马天水、王少庸卖身投靠，上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贼船，成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阴谋改朝换代的同伙与帮凶。除去张、马、王3人，还有17人。这17人中，主要领导核心是陈丕显、曹荻秋，他们被诬陷迫害的情况已在前面一章中记述。还有15人位领导同志是：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书记、副市长梁国

城，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监委书记杨士法，常委、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常委、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兼局长黄声波，常委、市监委副书记秦昆，常委、市财贸政治部主任李研吾，常委、副市长李干成和宋季文，副市长石英、宋日昌、张承宗、金仲华、赵振康，他们不仅全部无例外地被诬蔑为“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甚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 12 人还分别被诬陷为“叛徒”、“潜伏特务”、“老反革命”、“内奸”、“阶级异己分子”、“假党员”或“有严重政治问题”，都是先戴上帽子再批斗“审查”。

他们中不少人是张春桥直接指令“审查”的。如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早在江青、张春桥、聂元梓等“以常误萍为突破口，进而打倒上海市委”的阴谋策划中，就已被列为“打倒对象”。后来又以“审查”历史为借口进一步加重对杨的迫害。1978 年 7 月 4 日王少庸在《我的认罪书》中供认：“对杨西光同志的历史立案审查，更无根据。”杨西光青年时期在上海一个职业学校求学时参加共青团，被校方发觉开除学籍，随即离开了学校，历史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张春桥说那个校长是国民党的什么委员，发现了共产党决不会轻轻放过。这么一句话，就立了案。就此长期“审查”，直到 1974 年 2 月 23 日才宣布杨西光“解放”。

这些领导同志在所谓“审查”中，都备受侮辱虐待，甚至刑讯逼供。市委常委张祺的遭遇就是突出的一例。张春桥一伙

毫无根据地诬陷张祺“是一个罪行滔天的坏家伙”，“很可能是一个潜伏在我党内的大特务”。尤其是王洪文，咬牙切齿地在其小兄弟们面前说：“总工会不砸烂，我王洪文就无立足之地！”“张祺不打倒，我王洪文卷铺盖回厂！”1968 年 1 月，张祺被隔离在总工会地下室，后又被关押在“少数所”牢房。他遭受王洪文等指使的那批恶棍拳打脚踢、抽鞭子、打耳光、罚跪等刑讯逼供，残酷迫害达 6 年之久。

张祺在受“隔离”审查期间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他用写“思想汇报”和回忆历史、总结教训等方式与张春桥、王洪文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认为：“刘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曹荻秋同志不是叛徒，他在监狱内表现很好”。他说自己有四条是过得硬的：一是未被捕过，二是未参加过反动组织，三是地下工作时主观上是努力的，四是生活上也是艰苦的。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不透还得透，逆来顺受，实际还是不通。为什么不通，1933 年至 1968 年，35 年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一心为革命，落得这样下场”。自己现在是“察何无法学比干（接比干系商朝大臣，被妲己迫害致死），赤眉忠心见太阳”。他在“思想汇报”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搞“残酷斗争”，“江西肃反斗争中搞逼供信，对敌人的口供信以为真，结果害死了一批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上了敌人的当而杀共产党员，痛心不痛心？”“延安整风，抓特务，有的机关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特务、

同谋，最后来个抢救运动。”“这些都是教训，但有人硬是不接受教训”，“过去的教训还是重复，泰何！”

对市委常委、市财贸政治部主任李研吾的迫害更显出张春桥一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凶恶嘴脸。李研吾1967年4月曾被“结合”进“市革会”为核心领导成员兼任财贸组组长。但仅仅半年多时间又被拉了下去并受残酷迫害六七年之久。1967年秋，“市革会”在讨论召开上海市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时，张春桥几次讲什么“反对全民工会”，提出仅仅由产业工人参加工代会，产生市总工会，而财贸职工和其他工人都不参加。李研吾坚持财贸职工也是工人，理应选派代表参加工代会，这就劈了张春桥的逆鳞，引起张的极大不满。另一件触怒张的事是李研吾没有批办被称为“林彪行宫”的特需用布问题。张春桥为勾结、奉承林彪，1967年春就动工为林彪建造别墅，借口林彪来上海要带一个人数众多的工作班子，因此基建工程越搞越大，要求越来越高。同年11月，“市革会”办公室派人向财贸组索要6千公尺窗帘用布，都是花色繁多、质量很高的丝绒、薄纱等等，而又不向财贸组干部说明在哪里使用，实际上是“林彪行宫”所需。李研吾拒绝签批办理。张春桥得报后大发雷霆。12月16日，在“市革会”核心组会议上，张大肆训斥李研吾：“过去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办事很卖力”，“现在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没有感情？”“这是反对林彪”。反对林彪

在当时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性质的问题。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等也群起攻击李研吾。会后李就被逐出“市革会”核心组，重又靠边，1968年4月11日被隔离审查，受到无数次的残酷批斗。直到1972年4月，林彪自我爆炸已经半年多时间了，经马、徐、王批准的对李研吾的所谓《审查报告》中，仍然说李研吾当年拒绝签办林彪别墅的用布“影响了工程进展”，“泄了密”，“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错误是严重的。”

李研吾被诬为“反革命”分子，在长达4年多隔离审查期间，坚持斗争，以各种形式抗议对他的迫害。一次，外来专家人员要他在一份旁证材料上揿手印，他故意把手印揿得模糊不清，外调人员要他揿清楚一点，他一下子揿了30多个手印，把外调材料搞得一塌糊涂。他说：“叫我揿手印，就想起旧社会的杨白劳。”1969年3月，李研吾利用大扫除的机会，故意将贴在他床头上的一条“李研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标语下半段撕掉，变成了“李研吾不投降。”同年4月，他从垃圾堆里捡了一顶破草帽，缝上白边戴在头上，又捡了一块破麻袋披在身上，表示对“四人帮”、马、徐、王虐待老干部的抗议。这些事在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一批老同志中传为佳话。

市委书记、副市长梁国斌和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被林彪、江青、张春桥等恶毒诬陷为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指控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使用特务手段，窃取革命机密”，

“收集和整理江青××黑材料”。江青等把正常的公安保卫业务工作，捏造为“监控中央领导同志”，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监控”大假案、大冤案，受到此案陷害的还有一大批公安系统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梁国斌和黄赤波都于1968年2月被押送到北京下狱受审，分别“审查”了7、8年之久。

副市长张承宗在上海解放前是党的地下市委书记。“文革”中张春桥等全面否定地下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地下党冤案。1968年5月张承宗被隔离审查，关押进少教所。王少庸在听取专案人员汇报时搬出张春桥的话，毫无根据地胡说：“张承宗没有被捕是否就沒有问题？”“不捕不是更好吗？捕了就是露了嘛！”张承宗被折磨到1972年10月才获得所谓“解放”。

副市长金仲华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无党派民主人士。他是“文革”中最早被迫害致死的市级领导同志之一。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掀起的诬陷迫害领导干部的恶浪中，1967年12月12日，金仲华被指名批判。“金仲华反对把毛主席著作列入学习规划”、“金仲华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责难逃”等大字报贴上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墙头。1968年1月，在所里“清队”大会上被点名，责令他到台前交代历史问题，并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2月又被抄家。金仲华无法忍受这种种折磨，终于在1968年4月3日凌晨在寓所被迫害而死，遗书悲愤地说自己几年来“一直在

党的外围满怀信心地跟着党前进的……”，控诉那些造反派“上帝下凡，见风使舵”，迫使他“被沉重的包袱拖着”。“四人帮”粉碎后，1978年8月12日在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金仲华骨灰安放仪式，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宋庆龄等送了花圈，市委书记王平致悼词，郑重宣布党对金仲华是了解的、信任的，推翻对金仲华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总之，当年的市委书记、常委、副市长，全部都遭受过张春桥一伙人的严重的迫害与摧残，无一幸免，这里不再作逐个的叙述。这些领导同志在受所谓“审查”的长时期内，绝大多数还停发工资，仅领个人少量生活费，银行储蓄存款被冻结，不少家庭被强迫从原来住处迁出，家属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难以置信的株连。

在市级党政重要领导干部中，还有受到极其凶暴的摧残迫害的。特别令人悲愤的是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赵明新和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被迫害致死。

赵明新1931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在监狱中对敌斗争坚决，经受了严峻考验，1935年由狱中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共党员。全国解放后，1952年底至1955年1月，赵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5年调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后又调中科院华东分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他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关心与爱护干部，平易近

人，深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对赵明新的诬陷迫害同康生、江青阴谋挑起的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简要地提到过这件事。本来，薄一波等61位同志经党中央北方局决定和党中央批准，履行敌人规定手续出狱，根本不是屈服于敌人，而是服从组织的决定。这些共产党员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决，出狱后许多人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有的成为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文革”以前，中共中央对他们的出狱的问题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文革”开始后，康生、江青密谋策划，重新诬陷这61位同志“自首叛变出狱”，妄图打倒这一大批已经在中央和地方担任重要工作的老干部，特别以“包庇叛徒集团”的“罪名”诬陷刘少奇。赵明新是61人中的一位，是最年轻的一个。

1966年11月下旬至1967年1月初，天津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造反派曾四次向赵明新调查所谓“61个叛徒问题”，赵解答出狱经过并请示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魏明确答复：“此事中央知道，这是组织决定。”

1967年一月反革命风暴中，中科院华东分院各派造反组织开始夺权，对领导干部的批斗迫害加剧。赵明新身患糖尿病、冠心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多种疾病，1966年11月起华东医院要他住院治疗，但当年所谓“革命造反兵团”根本不听医院意

见，1967年1月14日将赵强行揪出医院，并声称还要将赵带去长春批斗，强迫医生开具出院证（医生特地在出院证上注明需继续治疗，并开了3个星期用量的药品、针剂，但后来不仅没有给赵治疗，连药物也下落不明）。1月16日，他们在衡山电影院召开“砸烂华东分院党委，打倒大叛徒赵明新大会”，赵被折磨8个小时。赵从医院出来开始被关押在华东分院七号楼“革命造反兵团”总部。18日中午，赵对来看望他的家属说：病情又恶化了。他多次向那些批斗他的造反派坚定明确地表示，“历史上问题从来认为是问题”，“在监狱中从未承认是团员、党员”，“办出狱手续是服从组织决定，中央批准的，完全可以搞清楚”。18日晚赵被秘密转移到生理研究所办公楼底层隔壁一间不见阳光的废弃工场内，并禁止家属探望。19日，几个造反派“审问”赵与陈丕显、魏文伯的往来关系，诬蔑为所谓“黑线”。那天赵已准备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亲笔写了一张纸条给他的夫人罗军，嘱咐买一棉上衣或旧皮上衣、皮靴等。20日中午罗军准备送东西去时，却有人来通知她到中山医院去，到哪里赵已停止呼吸。据说就在20日上午11时，生理研究所有人发现赵仰面躺在生理所办公楼外面，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下午1时45分身亡。《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技术室鉴定书》称死者“系商处坠落颅脑损伤，引起死亡”，而如何“坠落”的，当时没有认真追查。赵明新就这样被迫害致死。

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期间 1924 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历经风险，临危不惧，机智勇敢，豁达乐观，对革命多所建树。如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他曾参加过中央“特科”（即中央保卫局）的战斗。抗日战争期间，在打开新四军东进新局面的著名的黄桥战役中，陈同生受陈毅、叶飞的派遣，英勇地到敌占城市泰州与国民党杂牌军李明扬、李长江部谈判。电影《东进序曲》中那位新四军东进支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即是以陈同生为原型塑造的。

“文革”开始，1966 年 6 月间，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的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上，陈同生遭到张春桥的突然袭击，被点了名，此后，就靠边挨批斗。一月反革命夺权后，对陈的迫害加紧，1967 年下半年起，建立专案，隔离审查，批斗不断。同年 10 月以后，对陈的“专案审查”中出现严重的人身侮辱、刑讯逼供情况。1968 年 1 月 10 日、11 日批斗逼供中，陈被殴打得鼻青眼肿，跌倒在地。1 月 18 日批斗会中，专案人员按陈的脉搏，诬蔑他心跳加快是“心虚”的表现，再次图哄、殴打陈。1 月 20 日、23 日又多次小会批斗逼供。1 月 26 日，陈同生离奇地被发现趴在一个房间里的煤气灶旁，已经停止呼吸。家属要求尸体送第一医学院解剖检验，因造反派阻挠而未做。陈同生就这样被迫害致死。

（二）诬陷迫害部、委、办、区、县、局级主要领导干部和

社会知名人士

全市党和政府的各部门、各区、县、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还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作家、教授、科学家、艺术家等都成为张春桥一伙人疯狂打击迫害的重点对象。除极少数人外，鲜有幸免的。由于人数较多（仅部局级干部当时约 800 余人，其中受到严重迫害的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1969 年 2 月 15 日市委组织组统计：全市原属局级党员干部总数 786 人，被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等打倒的有 353 人，靠边审查的 234 人。两者合计 587 人，占局级党员干部总数的 74.6%。同年 3 月市委组织组统计，全市原局级干部 850 人中，被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等而揪斗审查或打倒的有 643 人，占 75.6%），我们不可能一一记述他们遭受诬陷迫害的情况。我们只能在受到严重迫害的同志中，选择受迫害的情节与后果特别严重——尤其是被迫害致死的，作简要的记述。因此，这里记述的是不够全面的。

关于被迫害致死，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有的是在刑讯逼供中被活活打死的；有的是遭受长期摧残在批斗现场或在隔离室死亡的；有的是忍受不了残酷的折磨、折磨而自尽的；有的是虐待致伤致病，旧病加重，但又不予医治，或病危才送医院抢救不及而死亡的；还有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一手遮天草菅人命的当年被诬蔑为“畏罪自杀”，但种种迹象表明，存在着

杀的很大可能，而又因有关单位造反派头头们的故意破坏（包括破坏现场，阻挠调查，仓促火化，不准家属验视等等），以最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中也难以取得他杀的证据的。

这些罹难的同志，绝大多数死于 1967 年 1 月反革命夺权后张春桥一伙掀起的大迫害浪潮中，尤其是连续几年的“清队”中。（1966 年“文革”初期也有罹难的，如在批判《海瑞罢官》中被张春桥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迫害致死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平心，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作家叶以群以及高教局局长陈传钢、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等）有不少人是全市知名度很高的甚至在全国有影响的人士。如“民建”中央委员、市政协常委、市文史馆副馆长严谔声，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市工商联副主任王性尧，市“民革”常委、市政协委员、市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王裕光，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市委监委副书记郑平，市建工局局长、市总工会副主席朱俊欣；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电影演员上官云珠；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市“三八”红旗手雷宏做；市精神病防治院院长、著名精神病专家栗宗华，上海针灸研究所所长、市中医学院教授、著名中医师陆瘦燕，市“九三学社”副主任委员、上海科技大学教务长毛启虞、全国特等劳动模范金龙山等人。这些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在“四人帮”粉碎后，经过复查，都作了尖

果是的复查结论，推倒一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现在大体上按照这些同志罹难身亡日期的先后顺序，把他们被迫害的简要情况整理于下。

蒋文焕，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在 1966 年“《解放日报》事件”中遭受摧残。12 月 4 日，“工总司”和“红革会”一些人强将他的身体堵塞报社门洞，抵挡从外面进攻的人，以致他多处受伤、当场休克。经报社职工营救，才得去医院治疗。但伤病未愈，12 月底又被“版司”（“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揪出关押，多次残酷批斗、侮辱，身心交瘁。1967 年 1 月 9 日被迫害致死。

应云卫，市电影局顾问。“文革”初期，应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打入“牛棚”，备受折磨。1967 年 1 月 16 日，他和电影局 12 名局、处级干部被押解“游街”示众。应原有严重心脏病，“游街”中途，就走不动了，经人架扶着走，又拦了一辆黄鱼车，叫应跪在车上随“游街”队伍前进；后见应实在支持不住才脱离“游街”队伍返回电影局，途中应从车上摔倒在地，急叫救护车至瑞金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顾圣婴（女），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其父顾高地 1958 年因潘汉年冤案被牵连判刑。“文革”初，她被诬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的黑标兵”。因不堪忍受江青、张春桥爪牙们的凌辱，1967 年 1 月 31 日被迫害与其母亲、弟弟一门三口自尽。

身亡。

马子成，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初马子成任纺织社教二团副团长，在批判所谓“资反路线”中遭受大小会议践踏批斗，揪头、弯腰、罚跪、在背脊踏上一只脚等。1967年2月4日被迫害致死。

胡志群，川沙县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胡身患急性睾丸炎，在两次住院治疗未愈的情况下，仍被造反派揪去频繁批斗，受弯腰90度等体罚；甚至在发高烧刚打针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批斗，逼逼着他交出什么“黑材料”。1967年2月24日早上7时含冤致死。

王晓东，市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王曾任市商业二局社教工作团团长，“文革”初期在批判所谓“资反路线”中受猛烈冲击。1967年2月23日财贸系统造反队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王被诬为“修正主义分子”，列为“砸烂”对象，停职检查，由“群众”监督劳动。1967年4月10日被迫害致死。

苏超，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曾任陈丕显秘书，长期作机要工作。“文革”初期，造反派冲击市委领导同志，把苏超看作是了解市委负责人“修正主义罪行”的“知情人”，夜以继日地勒逼苏交代揭发问题，备受煎熬。5月13日批斗会上，责令苏超交代莫须有的所谓与“二月兵变”的关系。会后，苏回家曾对其妻说：“现在把我的问题越摊越高了，把我和‘二月兵

变’挂起钩来了。”1967年5月14日凌晨，苏超被迫害身亡。

田辛，华东化工学院党委代理书记。他是惨遭刑讯毒打摧残致死的。当时化工学院有“新化工”和“红旗”两大派造反组织，在林彪、江青等人煽起的激烈的派性斗争中，两者都以残忍地迫害所谓“当权派”来标榜自己最“革命”。7月下旬，“红旗”总部以追查田辛所谓政历问题为名，刑讯逼供，用军用武装带毒打田，铜扣子打在头上，鲜血直流。后又落入“新化工”总部手中，同样是大打出手，并莫须有地诬蔑田辛是CC特务，打得田遍体鳞伤，把棍子也打断了。1967年8月2日，发现田死于教工单身宿舍中。

熊中节，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文革”中熊中节被诬为“阶级异己分子”。8月12日下午，机关里贴出“打倒阶级异己分子熊中节”的大字报，勒令熊三天内写出“认罪书”。1967年8月18日被迫害去世。

洪天寿，市民政局局长、党组书记。自1967年1月起，洪天寿就不断地遭受批判所谓执行了“资反路线”以及“审查”政历等折磨和诬陷。洪原患高血压、心脏病，在长时间的折磨下病情急剧恶化，1967年10月22日含恨去世。

史凤，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常委、校总务长。史被诬陷有所谓“叛徒”、“托派”嫌疑，1967年5月起，校“红革会”成立“史凤专案组”，开始逼供信。10月23日晚，史凤被秘密绑架到

市区共青中学，24日晚，又转移到淮海中路1285弄一所房子里，两个晚上都被残忍地拷打，逼取莫须有的“叛徒”口供。10月25日，用车押解史风回嘉定，一路上，不断地用鞭子毒打史。到达嘉定，史被关押在县招待所，当晚又毒打逼供，还召来一些中学生参与拷打。10月26日凌晨3时，史风被活活打死。

马四方，长宁区委常委、副区长。1967年11月15日，在区里召开的“贯彻市革会专案工作精神大会”上，马被不指名地点名，诬他有“重大内奸嫌疑”。会后即被非法隔离、抄家，逼逼交代。17日早上含冤身亡。

倪杰，南市区委监委书记。从1967年12月中旬开始，区级机关里不断贴出“倪杰何许人也”，“问倪杰五个为什么”等大字报，造反派连续找倪谈话，要他交代所谓问题，又去倪家搜查，将倪扣押在机关不准回家。12月23日被迫害致死。

高重实，著名话剧演员、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剧团团长。高重实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是周恩来领导和组织的演剧九队的成员，战斗在抗日前线。“文革”初，江青、张春桥一伙诬陷那些演剧队都是“反革命别动队”，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高为此受到人艺剧团造反派的批斗审查。1967年12月又莫须有地诬高“接受一个国民党中将布置的潜伏应变特务活动”，连续几天拷打逼供，高被打得脸青鼻肿，鲜血浸透衬衣裤。12月15日夜被迫害身亡。

王力行，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从1967年4月起，王力行就被上海科技大学造反组织“红三司”定为打倒对象，被誉为“阶级异己分子”，遭批斗、抄家。7月23日王被绑架到交通大学，又转移到上海第二化工学校，连续被批斗逼供。9月7日至10月20日王又遭绑架监禁和残酷拷打。12月22、23日，科大“红三司”和“红革会”在校内发生大规模武斗。“红三司”毫无根据地诬王是挑动武斗的后台，逼迫王承认挑动武斗，交代问题。1967年12月26日中午被迫害身亡。

张六吉，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被诬陷为“特务嫌疑”、“托派嫌疑”，还诬他参与了所谓“炮打南京路”（捏造的假案）事件。经王洪文、王承龙等策划，张于1967年12月15日被押送到中华造船厂，由那里的“造反派”头头和交大“反到底”红卫兵申明全等打手“审讯”，使用了骇人听闻的酷刑，张被打得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张不堪忍受暴虐，12月28日乘厂休日出逃，12月31日却在康健园附近河浜发现张的尸体。

顾建平，闸北区委副书记。1967年起，顾建平即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记黑店反毛泽东思想吹鼓手”、“闸北区牛鬼蛇神保护伞”等，遭受残酷的批斗，长时间的弯腰、挂牌、殴打等体罚，搞得脸、脚浮肿，身心受严重摧残。1968年

1月，报纸上刊登所谓“李威反革命集团”^①问题，闸北区“革委会”召开专案组组长会议，把原籍为苏北地区的老干部列为“李、戚集团”、“现行反革命”案迫查对象，顾建平也被列入其中。3月8日上午强拉顾去看大字报，随即召开批斗会，逼迫顾交代和苏北的老同事、老上级来往情况及与戚拯等的关系。顾当即表示和戚没有关系，但仍被蛮不讲理地限令交代。顾建平不堪忍受种种政治诬陷与折磨摧残，1968年3月9日凌晨被迫害致死。

孙兰（女），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自从1967年1月中旬起到年底，孙兰在教育局内外已经遭受100多次批斗，多次被打。特别是8月18日“局革会”成立“孙兰专案组”后，对她的批斗更加升级。12月26日，一批中学红卫兵来局“造

① 所谓“李、戚反革命集团案”是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炮制的一件罪案。李震之、戚拯等人解放前在苏南工作过，认识江苏、上海的一些领导同志，“文革”初期，李、戚“造反”，后去常州等地参与反性活动，但张春桥等人蓄意把李、戚的活动与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紧密挂勾，硬说他们是由“中国赫鲁晓夫在沪宁地区的代理人所操纵”的。1967年11月18日戚拯被拘留，之后又拘留了李震之等人，“市革会”专案办建立“1118”专案组，并由又攻武卫指挥部“加工”。大将刑讯逼供。然后根据这些“口供”，在张春桥、徐景贤亲自精心策划下，于1968年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日报》率先长篇诬陷文案。同年5月6日，上海、江苏联合召开电视斗争“李威反革命集团举行大会”，点了谭震林、陈丕显、曹聚秋、杨尚光、陈光、包厚昌、江渭清、蒋晋一等同志的名，胡说这些领导干部都是李、戚的“跟后台”，陈丕显、曹聚秋、张志勇（江苏省农林厅副厅长）等与李、戚一起批斗。陈光、包厚昌也被强行押来上场。这个大会在苏南广大农村拉线广播，影响深远，会后还在上海与江苏猖狂地进行所谓深挖“李、戚集团”的斗争，诬陷一些老解放军区下面的干部。

反”，在局礼堂批斗孙兰，采用严重体罚。会后又把她关在楼上小房间里毒打，孙被打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3月5日、6日又诬孙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大、小会议揪斗，猛摇耳光等等，孙兰不堪凌辱，终于在1968年4月8日凌晨被迫害致死。

常佩池，华东电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文革”初，常即被诬为“走资派”，遭受批斗。常身患糖尿病、高血压等病情日益恶化。1967年5月11日住进医院治疗，期间被造反队从医院拉出去批斗11次之多，病未愈即限令出院，并被拉到杨浦、吴泾、闵行等地批斗。1968年1月13日，常被“造反队”非法绑架到延安中路424弄59号关押审讯。他们将常双手反剪，蒙住眼睛，令其跪在地上，拳打脚踢，常被打得脸部青肿，眼睛充血，腰部疼痛，卧地不起。1月19日才送常回家就医。经诊断，常右眼已失明，左眼淤血，血糖高达260毫克。1968年4月20日下午，局机关“造反队”以冻结“叛徒、特务、走资派”存款为名，把卧床养病的常佩池拉起来审讯，继续大搞逼供信。一直搞到晚8时许，只听见常惨叫一声倒地，口吐白沫，心跳梗塞。常是活活地被“斗”死的。

严志险，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副校长。1968年5月15日被造反派打手们毒打致死。

常溪萍，市委教卫部部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68年5月25日被迫害致死。在前面第六章中已专题记述。

唐文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哲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自1966年10月起，唐即被勒令靠边审查、遭受批斗。1968年5月28日哲学所造反队以唐与历史所某人搞什么“串连”为由决定要对唐搞突然袭击。晚11时派出20多人到唐家，将唐从床上拖起，押到哲学所批斗，出现揪头、打头等粗暴行为，唐即非法扣押、隔离。29日继续批斗。1968年5月30日上午唐悲愤跳楼，当即昏厥，急送医院抢救无效，至中午含冤逝世。

王性尧，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市工商联副主任、市政协会员、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原大华仪表厂经理。“文革”初期，王就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1968年6月，大华仪表厂造反总部和红卫兵团莫须有地诬陷王破坏大幅标语，不仅不听王的申辩，反而横施暴虐，打王的耳光。王性尧被迫害致死，尸体是从黄浦江上漂上来的。

朱俊欣，市建工局副局长、市总工会副主任。朱俊欣在上海解放前长期搞党的地下工作。“文革”中张春桥、王少康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上海地下党大冤案，朱俊欣被诬为“叛徒”、“特务”，作为一个“集团性专案”（代号“320专案”）的重点审查对象。从1967年9月开始，他无数次被批斗逼供，两次被抄家，在曙光剧场批斗中被打伤。1968年2月13日经王少康指示送少教所关押。5月7日市“320专案组”作出计划，要求“六七两月解决（承认）叛徒问题；七八月解决（承认）特务问

题”，经市专案办公室批准，将朱押回机关组织批斗进行毒打。1968年6月14日上午，朱俊欣被迫害身亡。

潘景芝（女），中华护理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市第四届政协委员。“文革”初，潘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1968年初，市第一人民医院造反大队毫无根据地诬称潘是“宋美龄秘书”，逼她交代重大历史政治问题，唆使护士学校“革委会”一些学生对潘大搞逼供信。1968年6月20日潘景芝被迫害致死。

程天赋（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组成员、古史研究组组长。“文革”初，程即被靠边审查。1967年底所里“清队”开始，调查她的所谓“历史问题”。1968年4月程的好友、市教育局局长孙兰被迫害致死，她得讯异常悲痛，对人说：“也好，可以少受点罪！”从4月到6、7月，她不断受到批斗逼供，要她交代“三十年代与胡乔木的政治关系”，要把她打成“黑线人物”、“假党员或叛徒、内奸、特务”。7月10日未见程来所，“专案组”人员各处寻找不到。1968年7月11日晨其女儿在家里衣帽间发现她已自缢身亡。口袋里留有遗书：“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从来没有叛过党，相信组织上和同志们会审查清楚。”控诉了对她的摧残迫害。

筱爱琴（女），著名沪剧演员、市政协委员、市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文革”初期，上海人民沪剧团有两派造反组织“革

造会”和“狂妄兵团”。“革造会”首先诬蔑顾爱琴等在解放初期曾去香港演出是什么“偷渡逃港”事件，又诬蔑是“混进共产党的‘老板娘’”，对被刑讯逼供。“狂妄兵团”把顾从“牛棚”里夺走，同样私设公堂拷打逼供，并押在“隔离室”不放。顾连续被两派轮番逼供毒打，1968年7月11日被迫害致死。

黄武汉，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副所长。黄莫须有地被诬为特务，自1968年5月中旬起非法留在所里，不准回家。7月13日批斗会上被打耳光，眼镜被打落在地，黄深感屈辱。1968年7月16日含冤身亡。

徐德建，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67年12月起，徐德建被诬陷为地主，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7月上旬，在静安区文化馆大厅，强迫徐向毛主席像“请罪”，并对徐大出手，打得鼻青眼肿。打后还要徐写检讨。徐拒绝写检查，当晚再次毒打徐。徐悲愤地抗议：“想不到革命几十年，落得个反革命！”，两次殴打摧残，使徐身体更加衰弱，病情（原患严重哮喘病）急剧加重。7月13日突然昏倒，被送医院急救。徐为抗议非人虐待，拒绝治疗。7月15日，造反派派人去医院严厉“训斥”徐，形成一个现场批斗会。1968年7月16日凌晨1时徐终于饮恨身亡。

何无奇，上海民族乐团副团长兼指挥。“文革”初何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和“走资派”，多次受批斗。“清队”时又诬何

有政治历史问题，1968年4月6日被隔离审查。同年7月何在劳动中对人讲“打得受不了，盖得受不了”。7月18日深夜何逃出隔离室，19日凌晨惨死在延安西路道口火车轮下。

顾毓珍，华东化工学院著名教授。顾先被诬为华东化工学院“五家村”成员之一，后又被陷为“特务”。1967年11月，该院“红旗造反兵团”成立了“顾毓珍专家组”，进行刑讯逼供。1968年7月18、22、25日三天，专家组副组长朱广宁（已判刑）等将顾双眼蒙住，然后毒打。顾受重伤要求就医，朱广宁叫人伪装医生作假诊治。27日，顾已奄奄一息，朱等还只是叫来去校保健科诊治，半路上顾昏倒在地，急送市第八人民医院，到达医院已经死亡。

蒋梯云，同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文革”中，在“四人帮”及其羽翼控制指使下的同济大学内，炮制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特务集团”大冤案，阴谋把33名党的各级干部打成“特务分子”。1968年5月起，蒋梯云即被非法隔离。他们莫须有地诬蒋为国民党员、“历史问题复杂”，对蒋采取罚跪、上铐、鞭抽、棒打，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刑讯逼供，妄图首先从蒋打开缺口。蒋当时已年近花甲，不堪忍受毒打摧残，1968年7月27日晚终于被迫害致死。

王裕光，市民革常委、市政协常委、市邮电管理局副局长。他被诬陷“有严重政治问题”，是“揭开邮政系统阶级斗争盖子，

深挖这方面敌情和地下党的问题的重点人物”。对他办了所谓“抗大式学习班”，进行批斗审查。从9月9日起频繁地进行“小组学习、批判，群众讨论、专案人员个别谈话”，不断逼迫王写出“交代”。1968年9月21日被迫害致死。

顾维汉，市工商局副局长。1968年5月局“清队”开始，顾被批斗。10月，借口下基层，“局革会”把“清队”工作移到上海面粉厂进行，办所谓“抗大式学习班”，晚上不准回家。顾被列为面对面批斗对象。10月25日面粉厂开车间职工会议，“清队”战斗队决定批斗对象挂牌出示众，进行“活人展览”。“造反派”上台逐个点名，点到顾维汉时，诬说顾是“国民党兵痞，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肆意进行侮辱。1968年10月26日，顾被迫害致死。

上官云珠（女），著名电影演员。上官因患癌症“文革”前已在家中休养。1967年“清队”开始，被揪到天马电影制片厂批斗，遭受打骂，并对她的建立“专案”审查。后因查不出问题，仍让她回家休息。1968年11月21日，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工、军宣队3人来上海找上官云珠了解北影厂一个人的问题，逼迫她写材料，交代问题，1968年11月22日被迫害身亡。

朱国华，黄浦区委副书记。1967年8月，“工总司黄浦区联络站”头头张金根诡称曾接到苏北寄来的检举朱国华包庇坏人的信件，又说此信已经丢失。就凭这种离奇的“揭发”，朱就受

到非法审查，身心备受摧残，生了病又得不到很好治疗，于1968年12月24日去世。

孟君谋，上海科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孟君谋因患肺气肿、哮喘等病，“文革”前已退休在家养病。“文革”初，厂造反派勒令他交代所谓“三十年代材料”，并诬指他有“特嫌”问题，加以迫害。1967年底，“市革会”专案办指令将他揪到厂里隔离审查，组成专案组，由市专案办直接联系，孟备受折磨。病情加剧。1968年9月，工、军宣队进驻，孟继续受“审查”。12月12日，送饭去孟的隔离处发现他侧身倒地，口吐白沫，急送中山医院抢救，诊断系脑溢血。由于专案组说孟是“牛鬼蛇神”，得不到很好治疗，两周后即被迫出院。当时孟除右手外全身瘫痪，但厂工宣队、“厂革会”与市专案办联络员一起写报告认为孟的问题未清，仍须继续隔离审查。经王少庸指示同意，仍将孟隔离在厂里，关押在一间狭小、阴冷、终日不见阳光的“动物房”内。由于条件恶劣，又得不到护理，孟的病情日益恶化，终于在1969年1月10日凌晨死在隔离室。

曾宏做（女），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所高级研究员、市“三八”红旗手。“清队”中，戴立清等在科技系统炮制了“二生一会特务集团”大冤案大假案（详见第十八章《炮制集团性冤假错案》），曾宏做惨遭毒手。她是1950年从美国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被诬陷为派遣回来的“特务”，受到极刑残忍的

折磨。1968年12月22日，遭连续“审讯”逼供40多个小时。1969年1月11日又将雷秘密押往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关押审讯，逼她承认是“特务”。由于她会弹钢琴，就诬陷她“把特务电台放在钢琴里”，“弹钢琴就是发电报”，要她交出什么无线电发报机。还逼其14岁女儿写信，要她“交代”问题，进行精神折磨；1月25日，雷被押回所内原隔离室，1月26日被迫害致死。

郑君里，著名电影导演。他是江青、张春桥亲自下毒手迫害致死的。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他曾与江青一起从事戏剧活动，保存有江青的一些照片。解放后也有书信来往。1966年7月张春桥即要郑把江青的信件、照片等全部交给他转交给江青；同时10月18日，江青串通叶群、吴法宪指使江腾蛟派人冒充红卫兵，抄了郑君里等人的家，把所有私人信件、笔记本、三十年代画报等物全部抄去。11月26日，经张春桥批准，将郑拘留，设专案“审查”，又送“少教所”关押。郑在长期关押中受尽折磨摧残。1969年3月，郑肝病恶化，经广慈医院诊断为肝硬化。3月29日住进中山医院治疗，而市专案办仍严格限令郑不准与外人接触。1969年4月23日含冤逝世。

陆瘦燕，著名中医师、上海针灸研究所所长。1969年3月底，陆被诬有“严重问题”受到隔离审查。在关押中，多次被批斗逼供，“限期”交代。1969年4月27日被迫害致死。

穆宏，电影演员。1968年6月中旬，市“124”专案组一个关押“审查”对象，在严重刑讯逼供下编造假口供，涉及天马电影制片厂穆宏等人。天马厂“革委会”接到市“124”专案组转来材料后，派人多次去直接提审，进一步逼供、逼供，带照片去叫对象逐个指认，录音机录下供词等手段，迫使那对象又乱供出许多人姓名，此即所谓“沪中区中统特务组织”假案的由来，其中涉及天马、海燕两电影制片厂的有31人。1969年7月，经电影局“革委会”、工宣队、军宣队3方面商定，由天马、海燕两厂联合将穆宏等18人集中到华东化工学院举办所谓“集训班”。8月6日召开“宽严大会”，胁迫“顽固不化”分子穆宏等人交代。当晚专案人员又集中对穆宏进行逼供，放所谓“证词”录音，又将卑鄙地伪造的“敌档”材料（贴上穆宏青年时代穿西服照片，而此照片是从穆结婚照上翻拍的）给穆看，给穆造成意料不到的压力，有口难辩。穆回到隔离室后曾多次要求和专案组负责人谈话申辩，均不予理睬。当天1969年8月6日，穆终于被迫害致死。

王怀琛，市冶金局顾问、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王怀琛是老专家，1969年已80高龄，重病卧床在家。但张春桥及其党羽们诬陷他有“严重问题”，硬要把他隔离批斗，搞逼供信。从1969年5月29日到7月9日为第一阶段，42天中批斗了80次；7月14日到9月初为第二阶段，45天中也批斗了几十次。

有些日子每天要批斗 8 小时甚至 10 小时。到了王逝世前夕仍不放过，还想从王口中搞他们需要的“材料”。后来看到王实在不行了，怕他死在隔离室才送医院。进院一星期，1969 年 9 月上旬，王含恨去世。

金龙山，全国特等劳动模范、江南造船厂特等功臣。“清队”中被王洪文一伙人诬陷为国民党特务，1967 年 12 月开始隔离审查，遭受毒打、跪三角铁、不让睡觉等刑讯逼供和折磨，1969 年 9 月 25 日含冤身亡。

刘化乡，市邮电局原党委书记、局长。上海解放时，刘奉命接管市邮电局，任局党委书记、局长。1964 年调北京任邮科研究所党委书记。“文革”初期，刘先后两次被揪回上海批斗。1968 年 8 月，刘被诬“特务嫌疑”，揪回上海隔离审查，遭受严重政治迫害。刘在隔离期间，身体一直有病。局保健站医生 4 次提出让刘住院检查治疗，均遭无理拒绝。同年 12 月 28 日，专案小组向局“清队”领导小组汇报刘小便中红血球升高，身体出现浮肿，医生提议住院检查治疗，又遭拒绝，并明确指示“不住院检查治疗”、“战斗不停”。刘化乡终于因长期受虐待、有病不给治疗，1969 年 10 月 8 日死在隔离室中。

严得声，“民建”中央委员、市政协常委、市文史馆副馆长。严得声被诬有所谓“潜伏（特务）嫌疑”，在“市革会”统战小组造反派举办的“市级无所属民主人士清批学习班”受到“审

查”追逼，1969 年 12 月 14 日终于使严含冤而死。

周书民，市三航局副局长。1967 年 11 月，周书民被诬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根本不理会 1956 年审干时组织上已明确作出的用“政治上无问题”的结论。在“审查”中，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至 1968 年 10 月，因“未发现新的问题”，“审查”不下去，才将周下放监督劳动。1969 年市“14 专案组”在“审查”长宁区一个案件中，牵涉到周也有所谓“现行攻击性言论”，市“14 专案组”曾派人找周谈话，并无结果。到 1970 年 4 月 16 日，三航局已决定要解除对周的隔离审查，4 月 18 日市“14 专案组”来人与三航局“革委会”商定，对周举办所谓“专题帮促学习班”。4 月 24 日港务局批复同意撤销对周的隔离审查，三航局内定 5 月 4 日开会宣布，但在 5 月 3 日却召周谈话，继续逼迫周要“竹筒倒豆子”彻底交代问题。1970 年 5 月 4 日周被迫害致死。他留下遗书愤怒地谴责了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行。遗书中写道：

“我怀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她瘫痪了。”

我怀念我们战争时期战友，他们大都被关进集中营——五七干校，和发配边疆——插队落户。

我怀念我国的文化艺术——都被说成毒草。

我备（情）怒谴责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流氓阿飞、贪污盗窃、斗殴成风，破坏了十七年形成的新风尚、新道德。

……
夏春（情）想的出现林彪语录，预料不久也会炮制江青语录和叶群语录。

当我看到五·一观礼的照片时，这一小撮人更少了，想到他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至多维持到毛泽东死后三年。

刺刀已刺到我的胸前；但我不怕；叛徒这个名字你们也可以按在我的头上，但我确实相信三航局的群众不会相信。现行反革命周书民畏罪自杀可以按上的，但我相信没有人敢公布我的罪行内容。这一小撮人自己把自己推向历史的审判台。

我不怪你们几位参加学习班的人，我相信上面的事会触动你们的灵魂，残杀周书民你们必可内疚，历史会使你们醒过……

到了，亲爱的劳动人民，……我原来希望是怒活着看他们倒下，我没有达到愿望终生遗憾。”

张敬人，上海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对张敬人的折磨是惨酷的，从1967年6月将张从医院揪出来批斗，到1970年4月23日第二次送医院抢救，近3年时间的非法隔离，不断地批斗、殴打、侮辱、逼供，在病得连生活也不能自理时，还用凳子抬到会场批斗。1970年6月7日终于多种病并发逝世。

邵光华，上海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兼局长。“文革”初期，张春桥曾在全市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谢鹏飞（铁路局造反派头头）比起铁路局原来局长要好多了，我们都还有一个敌友我嘛！”

把邵光华等置于敌我矛盾之列。1967年6月间，以其须有罪名对邵光华实行隔离审查，肆意摧残侮辱，并在生活上给予种种刁难，有病不准治疗。1969年4月，邵病情恶化，不能进食，经医院诊断为食道癌。4月22日住院。住院期间，仍继续对他进行批斗迫害，甚至在上手术台前，还强迫他去打扫厕所。手术后，明知邵病情严重，仍借口病床紧张，强迫他出院，并继续隔离，不给予照顾和护理。甚至在创口未痊、绷带未解除的情况下，将他拉出去批斗。这就使邵的病情加速恶化，1970年7月17日邵死在隔离室中。

粟宗华，著名精神病专家，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院长、院党委委员。在所谓“119专案”（建立于1968年1月19日）中，粟被诬为“特务”、“地主”、“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与卫生系统一些医务骨干（如市儿童医院院长富文寿等）一起被隔离审查，粟宗华遭受摧残，终于在1970年8月含冤病故。

闻捷，作家。张春桥、徐景贤都直接插手，对闻进行诬陷迫害。1971年1月14日，闻被迫害致死。

许流璇（女），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她是直接受到王洪文小兄弟、“市革会”“三办”负责人戴立清等的诬陷，1971年3月21日被迫害致死。

孙洪钧，市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孙在遭受长期残酷迫害后，1971年4月21日死于隔离室。

·海平，原市委监委副书记。郑平是位体衰多病的老同志，又是驼背。但张春桥、王少庸等借口审查郑“历史问题”，长期隔离审查，撤销隔离后又拖着不作结论，后又将这样一位“老、弱、病、残”俱全的领导干部下放市“五·七干校”。1971年11月，在一个小雨天，郑平在过桥时跌落沟浜，脑溢血逝世。

刘次恭，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自从1967年底起，刘次恭就遭毒打关押，备受摧残。但1969年3月28日，驻局工、军宣队却又离奇地宣布对刘的隔离审查“未经批准”，因此是“无策”的。刘就这样又被称为不需要隔离的对象。然而，刘在1年零3个月的时间中，已遭受140余次批斗逼害。积冤成疾，1972年2月27日终于不治去世。

周信芳，上海京剧院院长、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自从1966年“文革”发动以来，周信芳就受到张春桥的直接指名迫害，长期地遭受批斗和摧残，被强加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1975年3月8日，终于被迫害致死。

以上是根据各有关单位提供的部、委、办、区、县、局负责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中被迫害致死的同志的简要情况。自然，“文革”中遭受迫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止是含冤身亡的同志。有相当数量的同志在酷刑折磨下受伤致残，如耳膜被击穿、骨折、内脏损伤等等。铁道学院副院长叶森，在隔离期间，备受酷刑。那些造反派借口“保护性措施”，竟用铁链条锁捆住双手双脚，

达3个月之久，后来叶身体变成弓型，不能直立。还有不少同志因不堪忍受诬害摧残，悲愤自尽，幸而获救，但留下各种后遗症，甚至造成终身残疾。

至于处、科级领导干部受到严重迫害的，总人数自然比部、局级更多，但现有资料限制（他们和一般干部以及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等受迫害的难以区分清楚），因此具体分析记述比较困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层次的干部由于他们更接近基层或本人就是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当“文革”初期“造反”的野火在其所在单位燃烧起来时，他们就首当其冲，对他们的迫害手段往往极为凶狠与残忍，其中不乏社会上坏人打着“造反”旗号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

原市公、检、法机关局、处级干部66人，全部被加上走“走资派”、“指控无产阶级司令部”、“资本主义代理人”等罪名，除个别人外都被隔离或送进监狱。

据南市区不完全统计，“文革”中受到各种形式毒刑拷打的干部，约有130人左右，其中教育系统和公安分局就占一半左右。该区篾竹街第二小学干部王文娟（女），多次被一伙所谓造反派拳打脚踢，香烟头烫头发，还硬逼着王添大便、喝小便，更残酷的是有人竟用汽枪瞄准她的头部，王急忙用手遮脸，子弹打在手上，鲜血直流。

虹口区吴淞街道造反队长郭某等人，制造假材料，诬陷街

道党委书记赵纪荣为“特务”，对赵搞连续三天两夜的“车轮大战”刑讯逼供，赵被毒打当场口吐鲜血。1968年4月5日被迫害致死。

长宁区努力沪剧团导演金林，被该团一些造反派勾结社会上打手绑架殴打，在转移途中经过长宁公安分局，金跳车逃进公安分局请求将他拘留保护，但仍被拖出分局关进剧团私设的牢房。打手们用压布景的铁块、铁链捆住金的双脚然后毒打他，又用几百支光的电灯照射他的脸部。1968年2月5日，那伙所谓“造反派”把奄奄一息的金林送到“区革会”政宣组，抛下就走。经区里干部急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验尸，金头、脚、四肢多处重伤，肋骨打断十多根。

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副经理李之华，因与市机电一局一位副局长关系较密切，而那位副局长又因在解放前与夏衍有过工作关系，就这样因要打倒夏衍而辗转牵累到李之华，被诬为有“特务”问题，1966年9月被反复抄家、轮番批斗，11月送市公安局拘留审查。当时李患多种疾病，病情恶化，乃至瘫痪。1967年2月由家属接回家时已骨瘦如柴，两股生满褥疮。同年9月含冤去世。

又如市委监委驻闸北区监察组副组长石春林，1968年初在报“假党员”歪风中被诬为“假党员可能性很大”而停职检查。后又因其父亲被诬陷为与“李、戚反革命集团”有勾结，辗转

株连，把石春林也作为“李、戚反革命集团”分子。1968年7月16日被迫害致死。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一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来看，也可反映出干部（包含部分群众）受迫害的严重程度。

1968年9月23日“市革会”正式上报中央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全市已挖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142413人。其中过去掌握和处理的有53344人，新挖出来的89109人。内有叛徒4727人，特务15786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3254人。”“此外，还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1969年5月26日“市革会”办公室调研组编《简讯》第239期《全市清队工作情况综述》内称：“清队”运动自1968年初开展以后，到毛主席“五·一九”批示（指毛泽东5月19日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下达，全市掀起“群众性深挖细找阶级敌人的高潮”，到1968年年底作为九类对象揪斗的有169405人；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下达贯彻后，“清队朝着稳、准、狠方向发展”，到1969年3月，全市作为九类分子揪斗的有136566人。

据1984年4月对全市“文革”案件复查情况统计。

全市共有各类“文革”案件348700余件。加上株连的家属亲友，涉及面100余万人。

其中，干部案件 101295 件。

被诬陷为“叛徒集团”、“特务集团”、“反革命集团”等集团性冤假错案 949 件。

全市非正常死亡人员 11510 人。

这真是一场浩劫！

十八、炮制集团性冤假错案

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党羽，出于“改朝换代”的阴谋目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制造大量集团性冤假错案，残酷地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据粉碎“四人帮”后对全市“文革”案件复查情况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叛徒集团”、“特务集团”、“反革命集团”等集团性的冤假错案共 949 件。这些案件中所涉及到的绝大多数的人与事，经过“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肃反运动和审干工作，早已审查清楚，并由有关党组织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而张春桥、王洪文、王少庸、王承龙等，又重新“大作文章”，节外生枝，罗织罪名。有的案件完全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栽赃诬陷。他们对“审查对象”先套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且硬说是“集团性”的，带着主观主义的框框搞“内查外调”，同时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到了“清队”后期，这些所谓“集团性案件”已经查不到“集团”的任何根据，找不到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再也搞不下去，但他们仍蛮横地不承认是冤假错案，不给予平反。粉碎“四人帮”后，经过认真复查，当初被他们大肆渲染的所谓“大案”、“要案”，竟没有一件站得住脚，被逐一否定，受冤屈者都予以平反。恢

复了历史面貌。

下面讲到的一些案例，虽然只是“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中很小一部分，但从中就可充分看到他们一伙人迫害干部、群众手段之毒辣，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人民、对我党事业的危害之烈！

（一）张春桥一伙制造的一起特大的“集团性”冤案 ——上海“地下党”冤案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并在一段时期内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从党的诞生之日起，党就在上海开展了包括秘密工作的各项活动，逐步发展壮大组织。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推行的结果，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到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去。1935年初，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一次大破坏，许多领导成员被捕。上海党组织一度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幸存下来的一些党员，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自动地组织起来，为捍卫党的事业而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派刘晓、刘长胜等同志到上海领导重新恢复和建设党的地下组织的工作。1937年10月，中央批准在上海建立中共江苏省委。1947年5月建立中共中央上海局。自此，上海地下党在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春桥等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需要，极力诬蔑上海地下党组织，残酷迫害当时领导秘密地下工作的干部和广大党员。1967年，张春桥多次与其同伙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等人，攻击上海地下党组织，说“上海地下党在1945年以后是靠不住的”，“地下党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还有怀疑”。“解放战争期间，上海地下党被破坏得很严重，为什么领导人始终未出任何问题？”“上海地下党主要领导人刘晓、刘长胜、刘宁一都有问题”。王洪文也说，对“地下党要作全面审查，有的地下党员就是国民党、特务”。还提出“一定要从地下党开刀”。王少庸鹦鹉学舌，说：“上海地下党的问题严重，尤其是解放前夕参加的那一批，几乎好人不多。”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对上海地下党员进行了大规模迫害。他们把因斗争需要打入过敌人内部的同志，诬陷为“红皮白心”；把根据组织决定撤往解放区的同志，诬陷为“受敌人派遣的特务”；把遭敌人逮捕坚贞不屈的同志诬陷为“叛徒”；对于没有被捕而始终坚持斗争的同志，则又诬陷为“已向敌人秘密自首的叛徒”；就连地下党领导的公开的群众团体，也被诬陷为“反动组织”。

上海地下党冤案，涉及全市各系统。张春桥等人按解放前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机构：工人运动委员会（简称“工委”）、职员运动委员会（简称“职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

委”)、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以及中共上海市委等系统，建立了39个大案，845个小案，全市被立案审查的对象达3670余人。上海“地下党”冤案，是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起特大冤案。“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在制造这起特大冤案中投入大批力量，由市专案办公室直接抓的就有代号为501、502、503、504、505、506、507、508、509及320等10大专案，至于由各单位造反组织自行掌握的案子则为数更多。大批原地下党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自首变节分子”、“假党员”等等，许多同志被搞得家破人亡，不少人被迫害致残、致死。下面仅举几个例子，即可见其一斑。

“507”专案，又名“江音专案”，是对江南造船厂地下党员金尔音等同志的迫害。这个专案是王洪文直接指挥的，是地下党冤案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江南造船厂副厂长金尔音是地下党员，历史上被捕过，又是“当权派”，“文革”中成了造反派重点揪斗的对象。专案人员在审讯金尔音的过程中，迫查到他的哥哥，也搬到厂里非法隔离审查。他哥哥在专案人员严刑拷打，逼供信的情况下作了假交待，说自己于解放前夕接受其叔丈(国民党官员)布置的潜伏任务，说参加这个“潜伏集团”的有金尔音以及其妻、姐、姐夫、侄女、表嫂等一大群亲戚，后来交待的人数越来越多，最后交待参加这个“集团”的人数多达120人，涉及17个单位。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群系系

中就特务潜伏集团”。材料上报市里，市专案组如获至宝，专门成立了“江音(即江南造船厂金尔音的缩写)专案组”，编号507，列为市属大案之一，由王洪文、王少康直接掌握。

1968年9月4日，以王洪文为团长、黄星为团政委的工宣队(工宣队员多达1500名)开进了所谓老大难单位——江南造船厂。王洪文下令说要向江南厂的地下党、谍报组、旧党委这“三条线”开刀。王洪文说：“从江南厂情况来看，主要是阶级敌人十分猖狂。有新老特务，‘四清’搞了一些，但未搞结束。从历史上看，地下党和特务勾结在一起，表面是地下党，实际上是特务。上面阶级斗争盖子未揭开。”一时间，再一次掀起揪斗地下党员的恶浪。

王洪文一伙在江南厂私设牢房，把一所防空洞变成了“人肉加工厂”，把疗养院和单人宿舍、技工学校、市青少年第一业余体校等处变成了关押“人犯”，进行“粗加工”、“精加工”的“白公馆”。审查中采用的刑罚有数十种，全厂有42人被作为“地下党专案”对象，受到非法关押和刑讯逼供，其中3人被迫害致死，13人被打伤打残。金尔音更是他们要整的“重点对象”。指挥专案工作的黄星在一次“研究”金尔音案情的会议上说：“金尔音肯定不是一个好人，无论从历史和现行(来看)都是叛徒。”为了整金尔音“负隅顽抗”的态度，他要专案人员分两班不停地对金发起“总攻”，大搞“车轮战”，进行10天10夜

的突击审讯。在审讯中，采用法西斯手段进行人身摧残。如用钢笔尖戳面部，使脸部发肿，口腔内膜发炎，牙齿松动，不能进食；压手关节，使 10 个手指头不能伸屈；用筷子卷住头发强拉，拉得发落、头皮红肿；拉住双臂后振，使手臂脱臼；轮番进行拳打、脚踢，在金痛得惨叫时用揩布塞嘴巴，等等。金尔音终于被逼害致死。他留下遗书中写道“一生确未做特务，无以交代怎奈何。何处魑魅施毒计，无中生有把我害。”含着无限的悲痛，用生命控诉了张春桥、王洪文一伙的罪行。

中华造船厂的地下党员，也遭受到同样的迫害。专案组在中华造船厂设立牢房 15 间，刑堂 30 余处，训练打手 200 余人，施用酷刑 30 余种。群众气愤地说，他们简直把工厂变成了“特刑庭”、“渣滓洞”。在这个厂里，不仅残害本厂的地下党，而且把市里或其他单位的领导同志揪来关押，进行迫害。如关押过原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黄浦区副区长张大吉、市总工会副主席周炳坤等。他们全都惨遭毒打。他们打人的方法、工具很多，用电线扎成的鞭子抽击，用竹片打屁股，装进麻袋用木棍拷打，一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大小便失禁。在这个厂被打死逼死的干部和群众有 12 人之多，另有 21 人被逼疯，2 人被“加工”后，送往专政机关判了徒刑。

对纺织系统的原地下党员的迫害，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解放前，申新九厂“二·二”惨案后，地下党在虹桥老街召开紧急

会议，商讨营救被捕人员和准备集会请愿等。集会被敌人破坏，部分地下党员和工会干部被捕。“文革”中，“四人帮”借此事迫害地下党，成立了“502”专案组，说什么要挖出“破坏虹桥会议的内奸”和会议后出的“叛徒特务”。拘留审查了大批原地下党员，动用酷刑，进行残酷迫害。夏明芳解放前曾担任过塘下党沪东棉纺工委委员，“文革”中对夏进行迫害，“审查”其地下党的问题，专门成立了“503”专案组。“审查”中，株连迫害了原沪东棉纺系统的大批地下党员，涉及到 127 个单位，292 人，其中迫害致死的 11 人，致疯的 5 人，致伤、致残的 35 人。

“三区百货业地下党”冤案，是上海“地下党”冤案中又一大案。上海市现黄浦区在解放前称为第三区，南京路上的几家大的百货商店归属三区百货业。这些大的商店中，都有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英勇、艰苦的斗争。

“三区百货业地下党”冤案事情起因是：1947 年 9 月 29 日，上海三区百货业工会被敌特破坏，地下党员与进步职工 10 人被捕。按照张春桥一伙的逻辑：“凡是被捕过的，不当叛徒、特务出不来”，“捕了别人不捕你，你必然有问题”。于是，在“清队”中，三区百货业地下党作为集团性专案立案“审查”。1967 年 11 月 1 日，成立专案组，1968 年 3 月 14 日，搞出了一份 9

千多字的打印材料：《三区百货业“九·二九”事件情况》向下散发，材料中不无生有地说：“永安、国货、新新、大新四个公司的地下党员中不少人，在敌人组织领导下参加工作，有的担任一定职务，有的接受特务训练，充当秘密情报员，干反革命活动。”并下结论说：“三区百货业党内有内奸”，“就是上层有内奸，必须追究”。在材料中，点名道姓地将一些地下党员扣上“叛徒”、“特务”等帽子。1958年5月，专案组又写了长达45页的《关于三区百货业地下党委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诬蔑说：“百货业党委建立以来，时间较长，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问题也多。混进党内的小一批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他们藏了多久，钻得那么深，那么极端狡猾，极端阴险毒辣。”报告点出了31个同志的名，诬陷为“叛徒”、“特务”。另诬陷81人为叛徒、特务嫌疑，诬称三区百货业地下党组织做了“道道地地向敌人屈膝投降的一桩大出卖”。在专案组定的“调子”下，财贸系统的大批原地下党员遭受刑讯逼供，受到冤屈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三区百货业地下党”冤案和其他所有的地下党冤案，经过复查，恢复了历史真面貌，受迫害的大批地下党员，得到了平反昭雪。

(二)凭主观猜想捏造出来的所谓“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
上海科技系统骇人听闻的“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是张春桥、王洪文、王少庸、戴立清等人蓄意制造的大冤案。“两线

一会”中的“两线”，是指日伪时期上海自然科学院和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这“两条线”，所谓“一会”，是国民党溃退时，中央研究院职工为保护设备、仪器、图书资料等，组织起来的“接应安全小组委员会”。张春桥、王洪文等早就污蔑科技界“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是“黑线当权”，他们叫嚣“科技系统敌情复杂，历次运动都没有搞，坏人越积越多”，“整个科技界是‘死水一潭’，死水里面‘乌龟王八’多”。他们凭主观臆测，认为在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工作过的人员都有问题，于是他们把全国解放时不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统统诬陷为“潜伏特务”，把解放后从国外回国的统统诬陷为“派遣特务”，还把解放后党培养的科学工作者也诬陷为“新发展的特务”。这个大冤案牵涉到14个科研单位，直接受审查迫害的630余人，被诬为“特务”并遭到非法关押的239人，打死2人，逼死4人，打伤致残10人，危害和后果极其严重，是上海科技系统第一场空前的浩劫。

“两线一会”冤案的炮制，首先是从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简称“植生所”）开始的。早在1968年2月，植生所“革委会”在分析植生所沿革历史时，认为该所前身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曾是中统特务头子，而中央研究院的前身又是日本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建立的“上海自然科学院”，是日寇侵华收集经济情报的机构，由

此推断在这个所工作的人可能大多数是“特务”；又了解到解放前夕，该院职工曾经组织过“接应安全小组委员会”，凭主观猜测就判定它是“反共特务组织”。工、军宣队进驻后，经过听取汇报和所谓“了解”情况，得出植生所“敌情严重”的结论。于是，于1968年10月15日举办清队“抗大学习班”，重点清查所谓“两线一会”特务集团。

在这个所谓“抗大式”的“学习班”里，植生所大院成为变相隔离的集中营，全所同志都被关在所里不准回家。不论白天黑夜，经常响起紧急集合的尖厉哨音，伴随着而来的是受到一顿臭骂的“集体训话”，个人不得任意行动，不准三个人在一起谈话，否则就被怀疑互相串连；有的同志吃饭不小心将饭粒掉在桌上，或者半夜里讲梦话，甚至一个脸部表情，也都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和严重敌情而受到审查，搞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在大院里，实验室成了审讯室，仓库成了隔离棚，地下室成了牢房。“学习班”里私设公堂，对科技人员施行酷刑，进行逼供。如接连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的“车轮战”，长时间低头弯腰的“疲劳战”，用铅笔戳耳膜，用木尺砍头颈，用硬物插鼻子，用围巾勒脖子，用灯泡烤头皮，用太阳灯照眼睛，火夹烫，皮带抽，揍耳光，头撞墙，还发明什么“蜻蜓点水”、“鸭子喝水”、“鬼推磨”、“坐地状”等刑罚，据被害人回忆共达30余种之多。“学习班”凭借这种疯狂的逼供、诱供手法，抓出了一批

又一批的“特务”来。

1968年11月，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的戴立清，窃据了“市革会”科技组的领导职务。当时正值“清队”深入之后，当他得知植生所“清队”中挖出了一个什么“两线一会”的“特务集团”时，大喜过望，说“这是个大胜利”，“是个好经验”，“可以打开科技系统局面”。他指派“市革会”科技组的核心成员去植生所去总结经验，又亲自到一些科研院所督阵指挥。他听说植生所有人“交代”解放前夕有批“敌伪档案”埋在冶金研究所内，便信以为真，立即批条子向建工局下属单位借来挖土机械，并亲自去冶金所指挥一帮人挖地三尺，结果一无所获。

在马、徐、王和戴立清的指挥策划下，1968年12月9日，在“市革会”礼堂召开了科技系统“对敌斗争”大会。植生所在会上介绍了“清队”的“经验”，宣扬“不花一分钱，不出大门口，揪出特务一大串”。马天水在会上进一步煽风点火，照搬张春桥对科技系统干部群众的诬陷，胡说什么“科研单位敌情比工厂更严重、更复杂，解放20年来历次运动都没有触动”，“这次要好好搞一下”。戴立清发言恶毒地胡说“科技界叛徒成堆，特务成串”，有“5个多”：“知识分子多，统战对象多，进口货多，集团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特务多”，公然把“知识分子”、“统战对象”、“归国人员”同“特务”、“反革命”归在

一起，就统称为“专政对象”。大会的第2天，《文汇报》在第2版作了大篇幅的报导。植生所的“经验”经王洪文亲自批准打印1000份，发至各单位。于是，一场大灾难降临到全市科技系统。如植生所共有职工349人，竟有142人被诬陷为“特务”，有75人被非法隔离，30余人遭到毒打。特别是21位高级研究人员全部受到严重迫害，其中1人被迫害含冤而死，1人因遭受严重的人身摧残，病情恶化而死。原所长、老科学家、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被诬陷为所谓“特务集团”的头子。这位年过70的老人，长期关押在仓库内，白天黑夜在电灯光下生活，不准与任何人接触，生活无人照料，吃着极差的饭菜。还要受到严重的逼供和人格侮辱。这位老科学家后来又被戴上“政治复杂、敢性内处”的帽子，“文革”中长期被“挂起来”。又如原生长发育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市“三八”红旗手雷宏俊被诬陷为特务，在法西斯式的摧残下含冤而死。科研人员金成忠业务水平高，工作勤奋，深得所长罗宗洛的器重。“清队”中，金成忠被诬陷为“罗宗洛特务集团”的骨干分子。金原患有肝炎，但在隔离审查期间，专案人员要金屡弯成90度写检查交代，写不好在屁股上踢一脚，还叫他跪在地上，头钻进小方凳底下，审讯人员坐在方凳上，一边问，一边用香烟头烫他的头颈、小腿等处，烫得伤痕斑斑。由于精神上、身体上受到严重折磨，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致使金病情恶化，终于被迫害致死。植生所

在清查所谓“两线一会”冤案中，许多同志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还在生活上受冲击，仅住房被冲占和“扫地出门”的就有16人。

随着植生所“清队”“经验”的介绍和推广，“两线一会”特务集团假案越搞越大，牵连的单位和被迫害的人越来越多，法西斯暴行愈演愈烈。药物研究所、冶金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等许多单位，都仿照植生所的办法，对科技人员大肆进行迫害。如当时有400多人的药物研究所，被牵连到“两线一会”案的就有108人，占全所人数的24%。药物所有一间实验用的隔音室，里面发出多大的响声外面也听不见，这间隔音室就成为迫害干部、群众的“审讯室”，专案人员在里面进行惨无人道的拷打、逼供。有的同志肋骨被打断，有的耳膜被打穿，许多同志的头部、腰部和关节被打伤，在寒冬腊月，剥去受害者的衣裤，只剩下一汗衫、短裤，还用电扇吹、皮鞭抽。药物所党委委员潘加林，只有一条腿，对他迫害时，先喊一声“敲掉靠山”，将他的拐杖一脚踢掉，使潘顿时跌倒，接着又喊一声“剥去伪装”，立刻把衣服剥掉。这时正是数九寒天，打手们轮番用电线编成的鞭子抽打，从当天深夜一直打到第2天下午，打得肝脾破裂，当场被活活打死。这就是“四人帮”手下一批打手所谓的“党的政策是支票，拳头棍棒是现钞”，“半夜开门叫，清晨出材料”的“清队经验”的“写照”。

“两线一会”特务集团的“案情”，越搞越离奇，以致闹出许多“笑话”来。如植生所有一人被连续刑讯逼供 30 多小时，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特务后，又要他交代发展特务组织的情况。开始，他“交代”了一二个人，过不了关，再扩大到三四十人，最后，干脆照本所职工名单画圈圈。这样，把“发展”的特务成员一下子增加到 140 余人，甚至把军宣队的人也“圈”了进去。再如，实验生物研究所的一位受审查迫害的人交代，他于 1962 年在所内发展了 1 名“特务”。但是一查，这个“发展对象”当时还在部队中服役，同他根本不相识。还有人“交代”这个“特务集团”在 1962 年前后，开了中科院华东分院的介绍信，到上海市公安局从武器库里领取了一批枪支，用三轮车运回华东分院，在院内埋藏起来备用。这些“天方夜谭”式的“交代”，连办案人员自己也不能相信了，这样的“案情”一旦公布于众，只能引起人们的义愤和成为人们的笑柄。1969 年 5 月，“市革委”办公室调研组在上报的一份《简讯》中，也不得不哀叹：“这样大规模的‘两线一会’特务集团存在的可能性很小”。

事实证明，所谓“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纯属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一个大假案、大冤案。在这个案子中，最后没有查出一个特务来！但是，“四人帮”一伙仍然揪住不放。他们明知定不了这些“特务”的案，就把一些高级研究人员统统说成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专家”，宣布对他们“边改造，

边使用”，对其中一些人要“一批二用”，要“不断开展大批判”，要“接受群众‘讲评’，接受群众监督”等等。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制造这一冤案的前后始末才真相大白。1978 年 1 月 4 日，中科院上海分院宣布：凡因所谓“两线一会”特务集团这一假案受诬陷迫害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

(三) “大揭大议”和“刮十二级台风”搞出来的“反动组织”

10 年浩劫中，“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在 10 个郊县制造了大量的集团性冤假错案，广大干部和群众遭受了严重迫害。

他们在炮制冤假错案的过程中，还创造一套所谓的“理论”根据，说郊县解放前有“五多”，即土匪多、特务多、反动道会门多、反动军警宪多、反动党团多，所以郊县“清队”的任务特别重。1969 年 9 月 8 日，市“革委会”郊区组一个核心组成员在郊县清队汇报会上大放厥词，说“现在重点还是抓‘清队’……，我们搞了一二年，埋得很深的敌人还没有搞出来，现在挖出来的大部分是单干户，没有组织联系，这不大可能”，“国民党在上海统治这么多年，蒋介石难道那么熊包，在上海郊县一个组织都没有安排，我有点不信”。他要求各县在抓“反动组织”方面，要“刮十二级台风”。在他的旨意下，各县的专案组唯恐“落后”，组织大批专业人员大抓“反动组织”。据宝山、

嘉定、川沙、崇明、青浦、松江、南汇等 8 个县的统计，“文革”中，“四人帮”及其党羽在这些县共炮制了 227 起集团性冤案，涉及受迫害人数有 7850 余人。

为了搞出“反动组织”，从县到公社，从公社到大队，层层“捕致情，找线索”，“发动群众”大揭大议。当时许多吓人听闻的“大案、要案”，绝大多数都是主观臆测地“排出来”和“说出来的”。下面，我们举崇明县向化公社炮制的“反共救国军”一案为例，即可见其一斑。

1968 年 4 月，崇明县“革委会”布置所属公社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公社普遍举办“清队学习班”，搞“大揭大议”。6 月，滧浜公社中心大队干部在“揭、议”中，有人提出女社员政云忠与外队人员来往接触较多，特别是和向化公社社员施丕林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又联系到政所在生产队附近曾发现过发射信号弹的情况，就将政和施二人列为怀疑对象。滧浜公社将材料转到向化公社，两公社协商共同配合，对政、施进行监视审查。政、施两家一场大祸自天而降，最后，搞得家破人亡。冤案形成是这样的：7 月 7 日，政云忠有事去找施丕林，被监视人员发现，认为政是去通风报信的，向化公社将施隔离审查，并通知了滧浜公社。滧浜公社立即将政押到大队办的“对敌斗争学习班”进行隔离审查。政在“学习班”中，受到严刑拷打，被迫供认和施有“男女关系”。可是，政的交代并不能

满足办案人员的要求，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抓“反动组织”，于是对政的迫害进一步升级，令政跪在砖头上，日夜连续审讯，政受刑不住，不得不按办案人员的暗示“供”出自己参加了特务组织——反共救国军，施丕林是大队长，手下有 40 余人，还有“班长”、“秘书”，“放过信号弹”，等等。政“交代”以后，趁人不备，自杀身亡，滧浜公社更认为政罪行重大，“畏罪自杀”，决定“乘胜追击”。

向化公社原来对施“久攻不下”，当他们得知滧浜公社对此案有“重大突破”后，决定对施“要有一点火辣势”，增加了专案力量，于 7 月 26 日深夜叫民兵蒙住施的双眼从大队转移到公社，由公社专案组直接审讯。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刑罚多达 90 余种，施被关押了 9 个多月，在关押期间，被吊打过 28 次，肋骨被撞断，在残酷折磨下，施被迫承认参加特务组织，并“交代”出“同案犯”有 80 余人。

当政云忠被迫“交代”自己和施丕林参加特务组织后，专案人员连想到政还有个妹妹叫政国芳，平时也和施丕林有来往，就认为政国芳肯定也是特务。当时政国芳刚生小孩，就把她押到大队“清队组”，进行恐吓、体罚。在专案人员的逼供下，政国芳“交代”了参加特务组织，并发展了同大队的姚新珍等人。说参加这个组织的有 33 人，涉及到 9 个大队。施国芳“交代”出姚新珍后，姚于 8 月 8 日被关押，在逼供情况下，姚又“交

代”了 5 名所谓同伙。但专案组仍不放过她，继续逼供，致使姚于 9 月 12 日自杀身亡。专案组又认为施丕林既然是特务大队长，在他所在的生产大队肯定发展了不少特务，于是就大排疑点，共排出 50 多个“特嫌”，最后把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干部都列为“特务嫌疑分子”。社员袁利康被打成“特务”，在“审查”审的过程中，有一天另一社员沈思候经过审室的地方，随便喊了一声“火烛小心”，便认为对袁发“联络信号”，也被揪出打成“特务”。

这一“反共救国军”假案，最后发展到涉及好几个公社，被“审查”逼迫害的群众达 806 人之多。仅在向化公社，就涉及到 20 个大队（全公社共有 24 个大队），6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316 人受迫害，4 人被迫致死，7 人自杀未死，殴打 1 人致残，37 人重伤，31 人轻伤。社员刘友芳因被关押审查，家中小孩无人照管而被闷死在床上。

类似向化公社这样的冤案、假案不是个别的。“文化大革命”中，各类“清队学习班”遍布郊区，这些名为“学习班”，实为刑讯逼供的牢房，以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残酷地迫害被审查的对象。有的“学习班”中，组织专门的打手，采用了几十种刑罚，大搞逼供信。这些刑罚有：火烧下身、吊杠子、挂牌子、吊石头、跪长凳、刺毛虫咬、大头针刺、坐老虎凳、关鸡圈、一字开、葍秋千、跪窖口、竹片战、针关节、烟头战、攀

鱼叉、敲脱牙齿、烧皮骨碌、下馄饨、吃粪糊、腌茄子、大串生、斗鸡、披狗皮、吹西北风、刺名字、吊肥皂箱、打耳光、挂黑板、晒水门汀、西瓜脸、饿饭、跪砖头瓦块，等等。就是靠这种办“学习班”和施用酷刑的办法，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被炮制出来了。仅崇明一个县，就制造出 34 起集团性冤案，如海桥公社的“东南亚反共救国军”案，被审查有 60 人左右；江口公社“忠义救国军”案，被“审查”有 100 人左右；上海第三十五棉纺织厂、堡镇合兴公社的“堡镇地下反共先遣军”案，被“审查”有 150 多人左右；马桥公社“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案，被“审查”有 234 人。1968 年 5 月，奉贤县平安公社在“清队”中怀疑社员沈桂祥参加过“特务组织”，对沈等进行“审查”，大搞刑讯逼供，然后将遭到的假材料转有关单位，有关单位据此再进行逼供，使案件越搞越大，整个案件涉及到奉贤、南汇、金山、上海县、南市区和安徽、江苏等省近千人，仅奉贤县就涉及 126 人。这个案子迫害致死 13 人（奉贤有 7 人），同时株连了一大批家属子女。

“浦东人民解放军”（简称“浦解”）是在我党领导下，在上海郊县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的一支革命队伍。王少庸等人硬说它是“匪特组织”，诬陷迫害了一批革命老同志。1968 年，原“浦解”所属“路北中队”领导人张震言（原川沙县副县长）被隔离审查。1969 年 3 月 30 日，“张震言专案组”把“浦解”定

为中统、军统组织，并把定案材料发到郊县各县的“专案办公室”。有关县把“浦解”所属的“解放大队”和“独立二中队”定为“匪特组织”，把“独立四中队”定为“土匪武装”。直到1975年11月7日，该案由于搞不出什么特务关系，定不了案，但“市革会”郊区组仍在“审查报告”中下了“打着共产党旗号，干了一系列坏事的武装组织”的结论。王少康看了这个报告，认为没有达到目的，又“批请”马天水等人的同意，再次进行“审查”。这样，“浦解”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参加“浦解”的一批老同志受到严重迫害，子女亲属遭到株连；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复查，给予了平反。

（四）在“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专政”的罪名下，炮制大批集团性冤假错案，对文艺界人士进行大规模迫害

1966年2月，江青勾结林彪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江青叫嚣说：“文艺界很复杂”，“17年（的帐）要算，三十年代（的帐）也要算！”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立即呼应，诬蔑17年的文艺界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线专政”，并到处煽风点火，要造反派在文艺界大抓叛徒、特务，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在“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屠刀下，上海大批文艺工作者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据统计，文化局、电影局和文联在“文

革”前共有职工7900多人，“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遭打击迫害的竟达1969人，占24.9%。张春桥、徐景贤等在文艺界炮制的集团性冤假错案有所谓“国民党沪中区特务集团案”、“303专案”、“中国大陆情况调查小组案”、“亚尔培路二号特务集团案”、“评弹沪剧逃港集团案”、“124专案”、以及“演剧九队专案”等。每一冤案中遭到迫害、受到株连的，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余人。

他们在电影系统炮制的“国民党沪中区特务集团”假案，是根据一个被关押“审查对象”在严刑逼供下所做的假口供立案的。他们以假作真，在天马、海燕两制片厂（即现上海电影制片厂）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清队突击周”，对一些人大搞逼供信，日夜审讯、车轮大战。这个假案涉及的多达31人。由于久攻不下，又把其中18人作为“顽固不化分子”隔离审查，举办“集训班”，进一步“加温”，胁迫这些所谓的“顽固不化分子”交待。演员穆宏就是在这个案子中遭受残酷迫害而死的。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相信党最后会审查清楚，我不是敌人，而是同志。不过为此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几句话，是对“四人帮”一伙法西斯暴行的血泪控诉。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复查，所谓“国民党沪中区特务集团案”完全是一个假案、冤案。

“303专案”是把解放后从香港回内地的一批电影工作者和

曾去香港主持美术电影展览会的盛特伟作为“叛国集团”和“文化特务”立案审查。由于这个专案组在303房间内办公，就以房间号为代号，称为“303专案”。他们对这些同志，不但在精神上进行折磨，如在夜间用强烈灯光照射，制造恐怖景象，还在肉体上残酷摧残。在深夜逼供过程中，某些专案人员自己吃饱喝足后，把“审查”对象当作摔跤靶和拳击靶，摔打取乐，名之谓“开夜市面”。

1966年下半年，在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影响下，抗战时期原演剧九队地下党领导人吕复及队员陈家松就开始受到“审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造反派炮制了《伪装剧九队罪行录》、《演剧九队11年是如何颠倒历史的》等颠倒是非的文章，向全国各地散发，并举办了什么《演剧九队反动历史》的展览会，大造舆论。造反派的行径十分符合江青的需要，她在1967年11月9日北京直属文艺单位，造反派头头的会上叫嚷：上海人艺最坏了，还是老京伙把持着……”张春桥和江青南北呼应。1967年12月10日，张在上海文艺界一次文艺界造反头头的会议上，大放厥词，说“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样的人，1935年、1936年后就在南京张道藩控制下，演剧几队、几队，就通过这样一个手引到国民党去。”“演剧九队完全是这样的产物……由国民党的中统、军统控制起来。到解放时，这些人除了到台湾、香港以外，统统到了文艺界。”“人艺可以办个尉官学

习班，尉的单位（也）少不了。”“有多少揪多少，不受比例限制。”张春桥的这个讲话，具有很大的政治阴谋。抗敌演剧队是周恩来亲自组织领导的一支革命文艺队伍，张春桥要把抗敌演出队打成“反革命别动队”，矛头也是对准周恩来的。根据张春桥的讲话，同年12月16日《文汇报》刊登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抗敌演剧九队的反动真面目》一文，并发表了《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的社论。这两篇文章出来后，在全国各地所有的抗敌演剧队的同志都受到残酷打击，数以千计的原演剧队成员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分子”、“文化特务”、“反动军官”、“历史反革命”等。上海因此案而受到“审查”的电影系统有徐桑楚、郑君里等23人，文化系统有18人，仅上海一地在此案中受迫害死去的就有7人，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高重实等。

“124专案”则是在王少庸的支持、怂恿下，以挖据“潜伏特务集团”为名，于1968年1月24日成立的，故称做“124”专案组，先后把滑稽、评弹、话剧、电影界近百名文艺工作者，打成“国民党文化救国团分子”、“中统”、“军统”特务。这个专案组在浦东占用了部队的一个营房，将一些“审查”对象秘密拘关押在那里刑讯逼供。他们别出心裁地搞什么“摸三合土”、“假活埋”、“假枪毙”、“鬼出现”等法西斯暴行，丧心病狂地迫害被“审查”者。原大公滑稽剧团副团长沈一乐，关押

过去后一直遭到毒打，1968年春节年初一的晚上，一帮打手在“新春向阶级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的口号下，凶猛地对沈某打脚踢，用电线管子和木棒毒打他的臀部，打得沈大小便失禁，血肉模糊，当他惨叫时，打手们就用揩布塞住他的嘴巴，继续毒打。沈就这样被活活地打死。有一个被“审查”对象不堪忍受，曾3次上吊自杀未死，这伙打手们竟然逼着他具体“表演”自杀经过，还在现场拍照取乐。这个专案组就是以这种法西斯手段，挖出了一个所谓的“潜伏特务集团”，因而受到张春桥、王少康等控制的“专案办”的表扬，夸奖这个专案组是个“能办案”的典型，让他们到处去介绍办案的“经验”。

在“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这个罪名下，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为党的文艺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艺术家，如巴金、贺绿汀、周信芳、袁雪芬、丰子恺等同志都被诬陷为“老反革命”、“黑线人物”、“老右派”、“反动权威”，遭受打击迫害，长期以来被当作“专政对象”，不准写作，不准演出，有的惨遭迫害，含冤而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用法西斯手段，摧残作家、艺术家，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十九、砸烂公、检、法

1967年8月7日，当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公然在一次大会上喊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江青等人群起响应，诬蔑这些部门“解放后一直是黑线统治着”，“是反革命夺了无产阶级的政”，叫嚷“要下定决心彻底砸烂”！在张春桥、王洪文、王维国等人的阴谋策划和直接操纵下，上海的公安、检察、法院系统面临一场空前的持续10年的大灾难，广大干警与工作人员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迫害。

张春桥一伙人“彻底砸烂”上海的公、检、法的阴谋活动大致可分为3段时间：第1段，1966年秋到1968年初，主要采取煽动内部“造反”和外来冲击相结合，把全市公、检、法机关搞乱、搞瘫痪，以便另立机构“取代”这些部门的职权；第2段，1968年1月到1971年10月，实行“军管”，通过“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制造了大量冤案，疯狂地、无比残忍地迫害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干警，公、检、法机关基本上被“换土”；①第3段，1971年10月以后直到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覆灭，整5年时间。“九·一三事件”后，公、检、法“军管”

① 王维国1968年11月24日在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党委会上传达张春桥的话：“公安机关不是撒沙子，而是要换土。”

撤销，但张春桥等竭力庇护军管会头头、林彪死党王维国，不准揭发军管期间的问题；公开反对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并继续迫害公安干警。不仅如此，还变本加厉地提出“专政的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妄图彻底改变公、检、法机关性质。现将一些主要事件的情况记述于下。

（一）公、检、法是怎样被搞乱、搞瘫痪的

1966年8月下旬，市公安局发生乱揪乱斗干部事件，公、检、法机关开始动乱。到年底左右，公、检、法系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造反队”。在“夺权、夺权”的一片鼓噪声中，那些造反队实行联合或兼并。1967年1月5日，市公安局以文保处干部王维革为首的“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公革会”）抢先宣告成立，这是第一个全系统的造反组织。接着，市局另一派人宣布组织了“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合兵团”（简称“联合兵团”）。1月9日，市局和各区分局一部分人，得到“工总司”的支持，又宣称组织了“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公联司”）。1月20日，市交通民警和下属单位又成立了“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人革会”）。1月27日，消防民警成立了“上海市消防民警革命委员会”（简称“消革会”）。接着，义务消防人员又成立了“上海市消防义务兵革命委员会”（简称“义革会”）。这些组织又与“工总司”等互相联系勾结。

在市法院，先后出现了“上海高、中级法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青年战斗队”）和“上海市司法战线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战斗队”（简称“司革队”）。以后，又成立了一个“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红色造反队”（简称“红革队”）。

市检察院机关一些人也于这时宣告组织了“东方红战斗队”、“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后又合并为“全市检察战线造反委员会”。

这些造反组织建立后，就忙于查封领导同志办公室、逼取所谓“黑材料”、内外串联、揪斗领导干部等事，积极准备夺权。而在夺权过程中又相互摩擦甚至武斗。

1967年1月11日，“公革会”在“红三司”（全称“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等外部造反组织支持下，冲击市公安局福州路大楼，强行宣布“接管”。张春桥、姚文元得讯，亲自赶到公安局政保三处，召见“公革会”的头头们。张春桥说：“有些事情你们最好不要先问我，你们干了再说，因为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表示态度。”“接管公安局这件事，中央没有讲过。”但是，现在“你们已经接管了，话也说出去了，就要干，不能下马。”他在支持造反夺权之外，还露骨地表示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公安部门的工作。他说：“公安部门这一仗很大，不只是50天的问题，而是17年的问题。”当天下午，张春桥、姚文元又召开全市15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会议，张春桥说：上海市委“真正瘫痪

了，瘫痪得彻底了，公安局也瘫痪了。”“今后阶级斗争还会更尖锐。”“公安局的同志接管后，任务实在是重”，等等，要这些头头支持“公革会”的“接管”、“夺权”。在张春桥的煽动下，王维章回去后，得意洋洋地宣称：“我们夺权，（局）党组解散……各处党委行使处长权力”。“一切权力归‘公革会’”。

市法院的“司革队”于1967年1月10日凌晨，强行“接管”了院党组、党委和人事处的“材料”。下午，他们向法院党组宣布了所谓“接管通令”，发布了什么“抓革命、促生产”的通告。1月25日，他们将“接管”的法院7颗“大印”，移交给了华东政法学院“红革会”，参加了“红革会”在全市“夺权”的行动。

市检察院“东方红战斗队”于1967年1月17日宣布：检察院三个领导干部“靠边审查”，另组织业务班子，在造反派监督下，主持日常工作。

在公、检、法三部门中，举足轻重的首推公安局。由于市公安局是“公革会”一派夺权，各派争权夺利，相互摩擦，内讧蜂起。1月28日“公联司”和各区分局、县局的“联合兵团”提出，“公革会”1月11日对市局的“接管”、“夺权”，实际是“接权”，“大方向错了！”他们召开会议，宣称要调动大队人马来市局砸“公革会”，要“第二次夺权”，实行“权力再分配”。“公革会”得讯后抢先动手，组织数百人砸了“公联司”的

总部及所属分部，抢走了他们的印章、袖章和活动经费，还将“公联司”的一些头头和骨干抓走，关押起来。2月3日，“公革会”又出动了两卡车人，把设在长宁区公安分局的“联合兵团”总部砸了，加给他们的罪名是勾结“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将“联合兵团”的头头抓了起来。从此，市公安局内部各造反组织之间冲砸武斗不断。到了7月26日、27日，“消革会”、“义革会”和“公革会”在建国西路市公安局大院内，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双方出动了数十辆卡车和消防车，动用了各种武斗工具，包括消防用的斧头、云梯，还施放了二氯化镁灭火剂。这场武斗双方共打伤了304人。事后王洪文接见“消革会”、“义革会”头头，表示支持。“公革会”吃了亏。

在市法院内，“司革队”和“红革队”相互冲砸，把武斗从内部发展到外部。1月24日，“司革队”和“红革队”发生冲突，华东政法学院的“红革会”和“红三司”各自支持一方，也参加了进来，在法院门外，相互冲击，“三进三出”，把法院大门和桌椅都打坏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67年8月以后，搞所谓“革命大联合”才逐渐平息。

值得注意的是，张春桥一方面支持公、检、法机关内部造反夺权，另一方面又煽动社会上造反组织去冲击公、检、法机关。他在1月11日接见“公革会”头头表示支持他们的“夺权”、“接管”，1月13日却在与部分造反组织头头座谈会上狡辩

声称对公安部门可以去冲击。张春桥说：“接管公安局这件事中央没有讲过，但冲公安局这件事，中央讲可以冲，所以公安部已冲过几次，我们没去保。因为去冲不外乎是两种人，一种是好人，好人是革命左派，好人冲了找坏人坏事；一种是坏人冲，坏人就暴露了”。张春桥援引广播电台为例，说它是最严格的部门，本来不允许冲的，但“后来了解了一下，不冲是不行的，不冲不革命，（不冲一冲）这个电台不是我们的。”因此，他主张对公安机关也要冲。

在张春桥的鼓动、唆使下，“工总司”王洪文一伙小兄弟们特别起劲，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等人多次带人冲击市公安局和静安、青浦等区、县公安分局。2月6日，戴立清、岑麒麟借口支持公安局的“联合兵团”，两次带人企图冲进建国西路市公安局大楼，没有得逞。2月7日，他们乘“公革会”派人去长宁区公安分局时，组织人砸了“公革会”的宣传车，一度扣了王维章。2月9日，他们又在市五十五中学设立指挥部，调动人马，准备和“公革会”大干一场。当天，由“上海人民公社”出面调停，未成。僵持到2月21日，王维章等作了检讨，才逐渐平息。2月28日，“工总司静安区分部”煽动大批造反队员，包围、冲击静安公安分局，当场有一些人被静安公安分局扣留。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等闻讯后，立即赶来。他们以“谈判”为名，带人冲进去，并将分局接待他们的干警，拖出来

扣押在“工总司静安区联络站”内。当晚，陈阿大、叶昌明等人一面找张春桥“告状”，一面又冲进建国西路公安局大院内，找到王维章，把王带到了静安分局，逼迫静安公安分局把关押着的“工总司”人员全部放出才算了事。陈阿大、戴立清等人还在3月和5月，两次围攻普陀公安分局。他们成立了“火线指挥部”，绘制了分局和看守所的地形图，在武宁路边装上了高音喇叭，拉来两辆无轨电车作为临时指挥点，纠集近万人把普陀公安分局团团围住，然后冲了进去，大打出手，砸坏了办公室门窗。他们说普陀公安分局执行了“造反路线”，“镇压群众”，声称要捉几个分局的人作为“人质”，并“捣毁”分局。1967年2月，在青浦县大规模武斗中，青浦县朱家角派出所拘留了“工总司”支持的一派造反组织的几个武斗分子。3月29日，陈阿大、黄金海深夜窜到青浦县朱家角派出所，进门就破口大骂，问“那一个是派出所长，你有手铐，我们也有，你不老实，就抓你走”。然后，他们又驱车到青浦县公安局，指责县局“镇压造反派”，“破坏‘四大’”等等，大闹了一通。

在这种内外夹攻冲击下，全市公、检、法机关被彻底搞瘫痪了。

（二）另立机构取代公、检、法

全市公、检、法机关被搞乱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便欲另立机构，取代公、检、法，把这个“刀把子”捏在自己手中。

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公开说过“（公安局）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怎么办？有一个办法，你们搞你们的，我们另外搞个公安局。”“这个不是开玩笑，我脑子里真的是这样想的。”他不仅这样想了，也确实这样做了。

1967年1月13日，“公革会”的王维章、聂松岩等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搞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简称“文保会”），取代原公、检、法的职能。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张、姚的赞同。在张春桥的支持下，1月16日，经过一些造反组织协商，决定由“工总司”（总部）、“工总司二兵团”、“红三司”、“革委会”和“公革会”5个组织担任“文保会”的常委单位。但这些造反组织互相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文保会”内部重重矛盾很快暴露。矛盾的焦点在控制专政机关的拘留审批权问题上。先是“工总司”的陈阿大，抓了人强行要求公安局拘留，被“文保会”顶了回去。又因王洪文与“二兵团”取金章的矛盾，“二兵团”派了很多人进“文保会”工作，王洪文大为不满，认为“公革会”和“二兵团”联合控制了“文保会”，一再指责“文保会”。张春桥、姚文元见“文保会”内部矛盾激化，争吵不断，逐渐失去了兴趣。因此，“文保会”成立一个多月后，就名存实亡了。

1967年3月初，张春桥另起炉灶，搞了个上海市政法指挥部，作为“市革会”的一个部门，取代公、检、法的职能。主

要负责人是空四军和东海舰队的姬应伍、高志荣等人。1968年2月正式宣布公、检、法3部门军管，成立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3月21日决定撤销政法指挥部。

张春桥还别出心裁地叫“上海市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插手管社会治安工作，取代公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但“上体司”和“工总司”也有矛盾，并数度发生冲突武斗。到了同年10月，张春桥要“工总司”王洪文等人控制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去抓所谓“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代替“上体司”系统的所谓“治安组”。

（三）被称为“王洪文公安局”的杨浦区公安分局

所谓“王洪文的公安局”，指的是杨浦区公安分局。它最早被“工总司”王洪文一伙人直接控制的专政机关。由于它在“文革”初期所起的作用远超过一个区公安分局的范围，因而，有些人就称它是上海市第二公安局。王洪文原是地处杨浦区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干部。1966年夏，他在厂里贴大字报反对市委派驻该厂的“四清工作队”，得到当时杨浦公安分局一个副局长和该分局经保科一些人的“支持”，从此挂上了钩。“安亭事件”后，这个分局以支持“左派”为名，派出了干部和民警去“工总司”总部（当时在杭州路一小学内），担任联络员和门卫值勤，参与了“工总司”一些活动。还指令眉州路和隆昌路的两个派出所负责“总部”的外围巡逻。

康平路事件发生，王洪文得到杨浦公安分局一些人的支持帮助，由分局出面收押“审查”赤卫队这个群众组织的市、区级头头和联络员。据统计，从1966年12月29日至1967年3月8日止，杨浦公安分局共关押了“赤卫队”人员113人。

1967年初，王洪文派黄金海等人到杨浦公安分局支持分局造反派头宋桂生夺了权，分局那个副局长实际参加了策划，从此掌握杨浦公安分局大权的宋桂生等和“工总司”王洪文一伙更紧密地挂靠在一起了。

一月反革命夺权时，“工总司”下令由各区、县的“工总司联络站”接管上海市各区、县公安局。杨浦公安分局随即派出一辆吉普车，由身穿制服的民警开车，送“工总司”的人员到黄浦区、静安区、卢湾区、徐汇区及上海县等“工总司联络站”送“夺权通知”。

在“砸联司”的行动中，受王洪文控制的杨浦公安分局表现更为“突出”。王洪文等派人打入“联司”内部搞“特情”，杨浦公安分局为其支付了“特情经费”。7月31日，王洪文得到“支联站”在开会的消息后，立即赶到该分局，与宋桂生策划后，当晚，由叶昌明带领“上体司”胡永年等一批人，抓来了参加“支联站”常委会议的25人，直接押送到该局关押审查。8月4日，宋桂生又带人亲赴上海柴油机厂，参与了“砸联司”的行动，并组织干警审讯“联司”人员，先后关押过“联司”和支

持“联司”的群众达601名。

1967年10月，在该分局的南大楼210室内，专门建立了一个由8名公安干警组成的“210专案组”。它直接接受王洪文交办指令，凶狠地迫害干部、群众。宋桂生下令规定：“凡是王洪文批的案件，我们要照收照办”。3个月内，他们仅凭王洪文及其小兄弟的一个电话，或一张“交办”条子，搞了29个案子，拘留、关押了36人。

1967年10月，宋桂生在王洪文指使下，与市公安局政治处一些“造反派”相勾结，非法绑架了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邵健。邵健解放前担任我党在日伪和国民党警察局的地下党委书记，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但张春桥等全面否定上海地下党，制造了地下党大冤案；大批原地下党员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邵健也是其中之一。宋桂生为首的杨浦公安分局最早插手了对邵健的迫害，非刑拷打，极为残忍。

1967年11月，市公安局有人贴大字报，诬称“潘、杨案作”（按指潘汉年、杨帆冤案）根子没挖尽。王少庸知道后立即批示“这个案子要抓住，搞清他们和公安局内部关系”。王洪文说：“这个案子质量很高”，他竟以“工总司”的名义，要杨浦公安分局承办。宋桂生马上抽调人员成立专案组，并拘留了市公安局5名干部，来“挤潘、杨材料”，直到军管后，才移交出

去。

(四) 大规模、残忍地迫害公安干警的所谓“进攻战”

张春桥等阴谋彻底砸烂公、检、法，主要是通过在“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制造冤案，疯狂迫害广大干警来实现的。由张春桥、王洪文提名而任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的林彪死党王维国，则是张春桥的主要帮凶。

1967年12月19日，“市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欢迎军宣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张春桥在大会讲话中一再诬陷“上海市公、检、法这条战线，从解放到现在一直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矛头不是对准地、富、反、坏、右，而是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个黑手也在这里伸得很深。……他们在这十几年里面干尽了坏事”。并叫嚣：“我说要打几个硬仗，……就是要把公安局彻底地改造过来，把检察院、法院改造过来。”1968年1月25日，由空军军政委王维国任主任的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正式宣布成立。同时，军管会派出两个军管组分别进驻市检察院和市人民法院。

军管会成立才1个月，张春桥就迫不及待地向王维国提出：“你们该打进攻战了，你们打进攻战，我们就好服了。”“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那里，不然，公安局的班子没有办法摆原。”催促王维国赶快动手，全面开刀。王少庸也说：“这个公安机关，真要翻个跟儿，搞它个翻天覆地。”

王维国是如何打“进攻战”的呢？1968年2月17日、3月6日、3月27日、4月24日，王维国亲自出场，连续4次召开所谓“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大会。他在会上煽动说：“只要有利子揭开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群众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各单位可以串连”。公安局内一些造反派也乘机煽风点火，叫嚷“要象‘一月革命风暴’那样”，“刮十二级台风”，“把火烧得旺一些”，还要“火上加油”。从3月25日到27日数天内，市局政治部、各处室、航运分局以及公安学校等处又出现了第2次疯狂揪斗干部的批斗风。他们拿了食堂的桌子凳子，搭成“批斗台”，把干部揪到上面罚跪在台上，在一片责斥、叫骂声中，对干部拳打脚踢，残酷殴打。有的被剃了阴阳头，有的被逼着从桌子底下钻爬，并拍照肆意进行侮辱。据统计，这几天中被揪斗的有337人，其中副局长4人，正、副处长65人，正、副科长117人，一般干警、公务员49人。在揪斗中，被剪去头发的有104人（内女的9人），罚跪的66人，被打的54人，被挂绳子的37人，打倒在地上爬的21人。有的头上还被扣上了有粪水的痰盂。以后军管会又建立了“清队运动组”，下设71个战斗组（专案组）。歪曲事实，罗织罪名，对大批干部和干警进行丧心病狂的“审查”迫害。

为了彻底搞垮公、检、法，张春桥恶狠狠地说：“公、检、法‘清队’斗争，不是稳的问题，除了‘准’以外，就是

‘狠’的问题”，“要突出一个‘狠’字”。王维国也叫嚷：在公、检、法机关内要“挖地三尺”，“只要不把人打死，怎么打都可以”。他们胡说：公安局“上有黑线，下有脚印”，“上面有人布置，下面就有一批人搞”，坏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两批”。还宣扬什么“豆腐要用榔头敲，假的要当真的打”，“对最斗争就是毛泽东思想加拳头”。为此王维国一伙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大搞刑讯逼供。他们把黄浦公安分局作为“新式武器试验场”，炮制了被称为“大兵团作战”、“夜开花”、“扫进历史垃圾堆”、“万吨水压机”等逼供、诱供办法和几十种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酷刑，极其凶狠残暴地迫害广大公安干警。

据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在上海市公、检、法系统中，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达 5300 余人。非正常死亡 149 人，其中，市公安局 42 人，市检察院 2 人，市劳改局 60 人，区、县、局政法部门 45 人。被戴上各种诬陷不实帽子和受到各种处分的 1254 人，其中：被打成反革命的 457 人，定为敌我矛盾，被逮捕劳教、监督劳动的 297 人，被开除党籍、或取消预备期、成功退出党的 64 人。还有 1326 人被下放劳动。他们名为下放，实际是被控制使用，或是变相监督劳动，并且株连了家属、子女，造成极为严重、恶劣的后果。

1968 年 7 月，王维国对公安局“大改组”，分大小班子。把 82% 的干部编入大班子赶出机关，去搞所谓“斗、批、改”。以

后又分别以“战高温”、“下放劳动”为名，将 3 千多名公安干警撵出了公安队伍。至此，公、检、法基本上实现了张春桥所谓的“换土”。

(五) 江青、张春桥、王维国等制造荒唐离奇的冤假错案

在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下，王维国等人在公、检、法系统，歪曲事实，罗织罪名，制造一起又一起的冤假错案，凶狠地残害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先后制造的有“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案”、“反革命黑调查案”（简称“一号专案”）、“潘、杨黑班底案”、“日本特务集团案”、“苏修特务集团案”、“包庇类蒋在沪潜伏组织案”、“伪警察局地下党案”以及“资敌通敌案”等等。这些案件，蓄意诬陷，颠倒黑白。现举所谓“侦控”和“一号专案”为例可见一斑。

所谓“侦控”问题，是江青首先提出来的，发展为“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专案。“文革”刚开始，江青就恶毒咒骂上海公安机关“比以前的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凶。”造谣说：“我每走一步，他们（指公安部门）都要盯梢”，“偷听（我的）电话，搞特务手段”，还无中生有地说在她住处安装了“窃听器”。江青一点火，张春桥立即煽风，他对王维国下令：“侦控问题要彻底查清”。从此在上海市公安局内，一场灾难，从天而降。开始，江青只是说公安机关对她的行动搞“侦控”，而王维国一伙进一步扩大，说上海市公安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控”，并胡

说什么“没有侦控，就不叫反动的公、检、法了。”他们把市公安局对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上海时所采取的正常的保卫措施，统统诬陷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察、控制”，信口雌黄地胡说黄赤波等指使上海公安人员对中央首长搞窃听，测绘驻地房屋结构详图，“监视”中央领导人的起居、行动。他们捏造的罪证、情节，十分荒唐离奇。一次，他们查到了市公安局侦破的一起国民党派遣特务案件的罪证中，有一盘两个特务谈话的录音，讲的是闽南客家方言。王维国派人送给张春桥听，张一口咬定讲的是“湖南口音”，是“林彪在谈话”。他们如获至宝，认为拿到了“侦控林彪”的“铁证”。张春桥要王维国派专人将录音带送往北京，让吴法亮、叶群作最后鉴定。叶群听后，连连说：“象！象！里面还有林彪的笑声，就是时间不大对头，但有点接近。”因为录音的时间是1965年10月27日，而那天林彪根本不在上海。为了制造假案，王维国派人查阅了历年来中央领导同志来沪的日期，硬把录音时间1965年10月27日篡改提前为10月21日。就这样，定了一个所谓“侦控林彪”的专案，在“审理”这个专案中，有34名干部惨遭毒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另一件，他们把一个基督教徒喃喃作祷告的录音，认定为“林彪在作报告”，又作为上海公安干警搞窃听的“罪证”，也使一大批公安干部遭受残酷迫害。到后来，“侦控”的专案越搞越多。（王维国一伙在上海市公安局先后制造了

17起“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集团性假案）专案“对象”也越来越多，关押人的房间由两间发展到50多间，连走廊、地下室、厕所都成了关押隔离审查对象的地方。大批干部被逮捕、拘留、刑讯逼供。市公安局政保三处有250个干部，被关押的达137人，其中50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2人被迫害致死。该处有一个组15名干部全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整个局机关就有97名干警为此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关进监狱或送去劳改。这样一件大冤案，却被张春桥一伙吹嘘成“军管组最大的成绩”。

所谓“反革命黑调查”案（定名为“一号专案”），也是江青一手捏造出来的。事情的起因是：1954年，上海曾发生过一起政治案件，为了查明这起案件，根据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指示，市公安局派人查阅过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报刊、杂志，其中有些内容涉及到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历史问题。“文革”初期，江青借此诬陷市公安局整了她的黑材料。1967年10月，江青诬陷上海市公安局，说：“过去整我的黑材料，这次才发现。有一个专案组在上海，去拿材料时说其中一箱材料是我的。他们没有办法。我说‘拿来吧！’拿来后，……一大箱呀，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们自己也发现有些地方成立所谓‘特档’，用‘特别档案’对付我们。”1967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使王少庸、王承龙、王维国成立了“一号专案组”，由“公联指”头头王维

革负责，王少庸、王承龙具体分管。吴法宪专程来沪，亲自听取汇报，并将涉及到江青的材料抽去密送北京。吴法宪和张春桥共同密谋，把市公安局黄奇波、屈成仁、林德明、汪吉等13名领导干部，用专机押往北京，长期关押。后来，他们甚至又把奉他们之命今参加“一号专案组”工作的、接触过这些材料的20多名干警，作为“新的知情人”，扣上“扩散专案机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全部打成“反革命分子”。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确非常人所能想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机毁身亡，10月，死党王维国为首的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撤销，主要成员集中办学习班（后又设王维国专案组），进行所谓“审查”。张春桥、王洪文等立即调派亲信薛干青、徐成虎等去抢占市公安局领导大权。10月25日，王洪文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对那些抽调去公、检、法的人员说：“去的任务是短期内把盖子揭开”，“实际上是对公、检、法重新组建，彻底改组”，“解放后权不在我们手里，文化大革命夺过来，以后又逐步丧失掉，这是又一次夺权”。薛、徐就此成为市公、检、法领导小组主要成员。1973年又调派宋桂生去任市公安局党委常委。同去的37人都被安排到市公安局各处掌握领导权。

王维国等人垮台后，上海市广大公安干警纷纷起来要求揭发、清算他们一伙的罪行，并对王维国等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

案进行复查平反。但是遭受张春桥、王洪文等的竭力阻挠，他们继续残酷迫害公、检、法的干部群众。如对于所谓“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案，当时在市公安局已经查明是纯属冤案、假案，但张春桥看了报告大为不满，一笔批倒，说这报告“是靠不住的”，“恐怕难以完全排除有人搞过监听”！还恶狠狠地说：“侦控案件是我交办的，同王维国无关。”王洪文又说，“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最大的罪行是窃听活动，不是一次、二次。”马天水也说“过去可能抓了假的，漏掉了真的”。他批示“要角角落落都查清”。于是，薛干青、徐成虎把过去王维国等都认为“没有价值”不敢立案的所谓材料线索，又重新抖出来审查，扩大和加重对干部、群众的诬栽迫害。

（六）妄图把专政矛头对准所谓“走资派”，彻底改变公、检、法机关性质

在随后几年的“批林批孔”“反对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市革会”马、徐、王等秉承张春桥、王洪文的旨意，竭力加强对公、检、法的所谓“改造”。他们鼓吹专政工作到了一个所谓“转折点”。叫嚣专政机关要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1976年初，“四人帮”从上海调去的安插在中央公安部当副部长的祝家耀窜到上海，他在市公安局一次干部学习班上说：“公安局首要任务也是主要任务不是过去的老框框。不能把眼睛盯住什么地、富、反、坏、右、特务、间谍。我们应把注意力集中到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不然，你们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1976年，中央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王洪文在会上叫嚣“地、富、反、坏、右是明牌货，不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杀几个人、放几把火，算不了什么。公安机关的注意力要集中在党内资产阶级身上，专政的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炮制了一个以打击所谓“走资派”为内容的《会议纪要》。说什么，“公安工作到了一个‘转折点’”，“要转好思想弯子，适应新形势”。中央没有批准印发这份《会议纪要》，但薛干青、徐成虎、宋桂生等改头换面，把《会议纪要》内容作为《讲话材料》下发。并将有关内容传达到公安系统和民兵基层组织。

薛干青、徐成虎、宋桂生等人在一些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叫嚷，说什么“在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资产阶级核心力量转移到党的情况下，公安工作怎么办？这是要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公安工作要坚决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镇压他们的反抗和破坏活动”。他们组织“理论”讨论会，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公安工作怎么办？”“公安工作如何适应新形势，适应阶级斗争新特点”等等。竭力要改变公、检、法的性质，把专政的矛头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并变本加厉地迫害和镇压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

他们大搞所谓“战备监狱”。早在1969年10月林彪搞了“一号通令”后，张春桥、王洪文、王维国等就策划在皖南军天湖农场建造“战备监狱”，阴谋把陈丕显、曹荻秋等29名“重点对象”转移出来。后因林彪自我爆炸，阴谋暂时中止。1972年9月，王洪文重新又提出要在小三线搞“战备监狱”。11月18日，王洪文在北京专电要上海市公安局派人去领受任务，重申“在押重要人物、案犯在战争打起来之前要转移出去，保留活口。要挖点洞关押。”徐成虎等随即又去军天湖农场勘察地形，选定挖坑道地点，计划造1万1千多平方米建筑，坑道牢房1700多平方米，投资185万元。动工以后，因坑道严重塌方，被迫停止，但地面建筑已经竣工。

他们大肆追查1975年7、8、9月的“政治谣言”^①，把矛头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并残酷地镇压群众，当时祝家耀叫嚷“谣言是从上面传出来的”。他来上海在市公安局干部会议上要大家“不要迷失方向，公安局如不理直气壮的追政治谣言，就是站在错误路线上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市公安局为此专门成立

^① 1975年7、8、9月间，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有关江青的生平轶事丑史和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丑闻恶报的传闻，以及有关“四人帮”的各种传说。如江青强迫自己和墨镜国家机密材料让外国人维特克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受到批评一事；江青想当武则天式的女皇的传说，等等。人们对这些议论纷纷，这是人民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行为的强烈谴责。“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党羽对这些传说，均作为“政治谣言”进行追查。

了“造谣办公室”，有一批干部与群众受到残酷迫害。

他们以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暴乱为幌子，搞什么“应急方案”，动员几百辆摩托车、汽车，大批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组织武装民警和秘密侦察力量4千多人，进行了几次实战演习。

他们还以各种荒唐的罪名，对群众实施法西斯专政。如所谓谈元泉^①事件等，当事人不仅遭受残酷批斗，而且被逮捕判处重刑。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后，1980年12月8日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统计：“文革”期间因冤案、错案被判处死刑的有97人，其中冤杀44人，错杀53人。当时已复查平反的冤假错案有关者已达4745人。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江青反革命集团独家霸占上海党政大权的后5年中，上海的公、检、法在薛平、徐成虎、宋桂生等人控制下，完全成了“四人帮”搞篡党夺权的帮凶和工具了。

① 谈元泉，原上海钢管厂工人，“文革”中与一些话剧爱好者在里弄中唱唱沪剧，被诬用为散布封、资、修毒瘤，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小集团”，遭非依法逮捕判刑，谈元泉被处死刑，粉碎“四人帮”后，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二十、“游雪涛小组”

1967年初，上海处于所谓“一月风暴”的动乱之中。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蜂拥而出，在历史的舞台上进行各种表演。1月上旬，在上海延安医院（即华东医院，“文革”中改名为延安医院）的一间小房子里，七八个人围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名称怪异叫“扫雷纵队”的组织。为首的是原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游雪涛，还有原团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夏云开，复旦大学“红三司”负责人谭启泰、延安医院医生赵洪源，游雪涛之妻吴锡敏等十余人。游雪涛等取了个“扫雷纵队”的名称，是要标榜这个组织以“扫除埋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脚下的‘地雷’，即‘隐藏的敌人’”为宗旨。这个小小的“扫雷纵队”，不久改名为“游雪涛小组”，发展成为直接听命于张春桥，干了大量罪恶勾当的反革命特务组织。

（一）投入张春桥的怀抱

“扫雷纵队”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告密者”姿态，收集“炮打”张春桥的情报作为晋见礼，向张春桥献媚造势，一头栽进张春桥的怀抱。

1967年1月15日，上海街头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

语，游雪涛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召集“扫雷纵队”成员布置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提出要“摸清炮打来源”。他派出手下那一伙人钻到各个造反组织、各个阶层之中，收集各方面的“炮打”情报，编写成《扫雷情况》。1月27日第1期《扫雷情况》出笼，标题是《关于上海出现一股反张春桥××的逆流的情况》，预报了“1·28炮打”事件。1月30日出的第2期，标题是《反张春桥××的逆流从何而来》，密告了复旦大学、电影局及团市委的“炮打”活动。诸如此类，陆续编了好几期，通过游原来认识的徐景贤送到张春桥手里，果然引起张的重视，赢得了张的欢心。于是接见、传话，奖勉有加。后来，张通过徐景贤、王承龙、王少庸、李文静等陆续布置游等以各种“特殊任务”。1967年3月，张春桥曾对徐景贤说：“应当肯定他们前一阶段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象上海音乐学院‘革会’和外地学生的一些‘炮打’，我还是从《扫雷情况》上看到的。”3月29日，张春桥又通过徐景贤传话给游雪涛：“前一段时间，你们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做得很好，对领导上起了一定的作用。”1969年5月，张春桥又一次表示对游雪涛这伙人工作的赞赏、满意。说：“游雪涛还是不错的，做了不少事情，从一月革命以前到现在，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徐景贤、王少庸、李文静等人也纷纷“称赞”游是“我们的福尔摩斯”。

（二）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务组织

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篡党夺权”的阴谋，张春桥需要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游雪涛那一伙人卖身投靠，他求之不得。他多次要王少庸、徐景贤等人带信、传话，对游雪涛一伙人的工作表示“关心”。但狡猾的张春桥又怕游雪涛等搞得太露骨，于是1967年3月29日，他通过徐景贤传话给游雪涛：“你们等于有点像情报系统的组织，做的实际上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家攻起来，这是不得了的事，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大了。”他要游雪涛改头换面，取消“扫雷纵队”名目。他说：“今后没有一个组织了，有些情况还可以反映，同样可以起耳目作用，但那已经不是作为一个组织在活动，人家要抓（苍子）也抓不到什么。”游雪涛根据张春桥的旨意，于1967年4月，宣布撤销“扫雷纵队”。张春桥特意叫人传话安抚说：“春桥××对‘扫雷’的评价非常高。对‘扫雷’这个组织的去留问题，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觉得还是归口好。这样做实在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决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且还确实曾经想过用什么办法保留下。”张春桥考虑在“市革会”为游雪涛挂上号，给游以一个合法身份，这样他可以更直接地指挥游那伙人，也避免人家说三道四。1967年4月20日，张春桥指示徐景贤，把游雪涛安排到“市革会”群运组当副组长，徐景贤对游雪涛等人说：“你们帮助春桥、文元作了很多工作，后来想把你们的非法变合法，我看‘群运组’这个组织就

合法了。”同年8月，张春桥又让游雪涛那伙人挂在“市革会”办公室下属机构之列进行活动。遵循张春桥的旨意，游雪涛以“扫雷纵队”为班底，搜罗了35个人，在永福路244号成立了“游雪涛小组”（亦称永福路小组），代号“244”，在张春桥的指挥下，干起了地地道道的特务活动来了。

“游雪涛小组”搞的完全是法西斯特务组织的那一套。永福路244号是一幢墙高院深的花园洋房。这里成为游雪涛等人秘密活动的据点后，平时候门紧闭，不通暗号，谁都进不去。室内安装了保密电话，建立了可以同张春桥等直接通话的“热线”。配备了专用的汽车和摩托车。汽车均有民用和军用二套牌照，以便随时掉换伪装，还装备了袖珍录音机、手枪、照相机、刑讯工具等。同时还使用各种化名，联络暗号，建立了秘密联络点，还在本市和江苏省太仓县设立了13处的可以秘密关押“人犯”的场所。在小组内，规定了一整套强化法西斯特务组织的纪律。如“对组内情况绝对保密，不得对任何人讲，包括自己最亲密的人在内”；“不准泄露工作地点、电话号码”；“泄露244机密，将受到杀头制裁”。还要求所有成员要“任劳任怨”，“不分白天黑夜，有情况都要干”，“要随时（准备）流血牺牲”等等。永福路小组名义属“市革会”办公室，但它直接听命于张春桥。张经常把游雪涛召到兴国路招待所他的住所内密谈，直接面授机宜。张给游雪涛传话带信也只通过是徐景贤、李文静、

王少庸等几个人。

1967年10月16日晚，徐景贤电告游雪涛：“张春桥讲，你们千万不要给人家吊（叨）去喔！你很招摇，要防止人家故意来一点材料到你们这里来一些东西，要注意绝对保密。”

10月22日，徐景贤又代表张春桥转话说：“你们这里工作很重要，要搞好。但要十分谨慎，小心，警惕坏人混进来，从内部搞你们一下。”

4天后，王少庸又传达了张春桥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得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

几天后，张春桥又通过他老婆李文静向游雪涛告诫说：“可要当心呵！不要搞得太杂了。……你钻到人家那里去，难道人家就不会钻到你那里来呀！”

为了“保密”，实质上是为了掩盖张春桥直接操纵“游雪涛小组”搞特务活动的罪行，整个小组除了游雪涛一人外，其余的人员都不发给“市革会”工作证。游雪涛布置进行各种特务活动从不使用“市革会”办公室的名义。如搞情报，要小组成员通过熟人、亲友，通过自己所在的单位、所在的造反组织进行，不能打出在“市革会所属机构工作”的旗号。小组收集的情报，游雪涛都以他个人的名义，油印成《动态》报张春桥、姚文元及“市革会”主要头头。遇有所谓“机密”的情况，则用

手抄的方式单独报送张春桥。在这个小组存在的一年零二个月期间，编印了300多期的《动态》和专题材料，达120多万字。所有简报或手抄件，均由游雪涛的妻子吴锡敏面交朱玉佩，转送张春桥、姚文元等。小组其他人都不与“市革会”办事机构接触。

“游雪涛小组”的成员来自各个单位，但这些人在原单位很少露面，从不参加本单位的运动，他们的行动鬼鬼祟祟，到处打探各种情况，介入社会上的各种事件。日子久了，引起了这些人原属单位群众的怀疑。有的公开责问他们在搞什么。有的说他们是第二办公室、地下办公室。这些情况陆续传到了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那里，他们也感到游雪涛一伙人锋芒毕露，活动的破绽很多，容易被人家抓住辫子。另外，“游雪涛小组”也经常向张春桥打小报告，秘密反映王洪文及其小兄弟的一些情况，为王洪文等察觉引起不满。王洪文等也向张春桥建议，要游雪涛一伙人尽快收摊。尽管张春桥对游雪涛一伙人死心塌地的为他“效忠”有“特殊感情”，但为了摆平内部的矛盾，同时更怕暴露自己搞特务活动的罪恶行径，拖了一段时间后，不得不在1968年9月下令撤销“游雪涛小组”。

在“游雪涛小组”奉命佯装停止活动，永福路244号机构被撤销2个月后，游雪涛向张春桥写了一封长信，送去一份《一年工作总结》，说什么：“过去的一年”，是他“最幸福的一

年”，“时刻都感受得到领导的温暖”。并说他们是“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零二个月”，“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自吹自擂，邀功摆好。张春桥看后，居然批了：“已阅，谢谢同志们。”旋即又把游雪涛塞进“市革会”专案办公室充当领导成员。1969年3月23日，张春桥再次接见游雪涛，表示慰问。并问：“你那些同志现在还经常来往吧？你觉得最近的运动怎么样？社会上有些什么动向？”暗示需要继续搞“场外交易”，继续打探情报。因此，游雪涛等人在小组撤销后，在张春桥的唆使下，依旧进行各种特务勾当，直至1972年被隔离审查为止。

(三) 阴险手段和严重罪行

“游雪涛小组”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下面举一些他们的具体活动，即可了解其大概。

1967年初，游雪涛连续向张春桥密报上海的“炮打”活动是由北京“联动”^①具体策划的谎言。在密报的《情况》中列举了“朱德、李富春的孙子，陈云、陈毅、贺龙、李井泉的儿子，乌兰夫的外孙”等人，说他们都是“联动分子”；总理的一个副

^①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是北京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北京中学的一些老红卫兵组成的。他们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对林彪、江青等人掀起的殴斗老干部之风。“联动”遭到了林彪、江青等疯狂的迫害。

务员之子是“‘联动’嫌疑分子”，“邓颖超同志的秘书的儿子是‘联动’要人。”诬陷的矛头明白地对准党和国家领导人。

1967年2月，张春桥召见游雪涛，别有用心地对游说上海警备区是“一小撮走资派的避风港、根据地”，要游多留意警备区的情况。11月，张春桥听到交通大学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和上海警备区某些人搞了一份“炮轰警备区”的材料，马上指使游雪涛尽快把材料搞来。游立即到交大一个叫“红尖兵”的红卫兵处弄来了这份诬陷攻击廖政国的材料，汇报给张春桥。以后，为了进一步窃取部队的情报，游组小组成员夏云开与上海警备区的某些所谓“反廖派”频繁接触，利用秘密录音、偷窃材料等手段，收集了警备区党委会议记录、廖政国在军内的讲话、警备区14名师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等大量机密文件和各种材料，编写了《警司材料摘编》、《关于上海警备区大搞资本主义路线的情况》、《上海警备区目前运动的情况点滴》等20多份达五六万字的手抄绝密材料。对这些材料，张春桥非常重视，每份必看，还在其中不少材料上作“批示”。并曾利用这些材料当面质问廖政国，以此来迫害警备区领导同志。

1967年8月，游雪涛得到情报，说东海舰队有一批人自己搞了个陶勇专案组，“借查陶勇问题，收集江青的材料”。游立即派小组成员、某剧团一个女演员去接近“专案组”中的某人，游雪涛对这个女演员说：“你脸蛋长得漂亮，这个人一下子就会

走”。你装作和他谈恋爱，把材料搞到手”。要这个女演员以假谈恋爱的美人计手法和此人接触，用秘密录音，偷取材料的手法获取其内部材料。

1968年初，游雪涛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查郭仁杰对侍张春桥的态度问题，又派这个女演员去接近郭仁杰，秘密地把郭交谈内容录了音，向张春桥等人作了汇报。

1967年秋，张春桥叫人传话给游雪涛，并提供了10张照片，要他调查江苏省委10个厅局级干部来沪活动的情况。说这些人组织了“老人串连会”，要游加紧摸清他们的活动情况。游立即布置一些人24小时地守候在各大旅馆、饭店门口，盯梢这些干部的行踪，了解他们和上海哪些人员接触。游雪涛把自己小组中在沪宁沿线各城市有亲友的人，全部派出去摸情况，编成《动态》上报张春桥。张春桥接到这些情报后，亲自找游询问：“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没有？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哪些人跟陈丕显有联系？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4天后，游雪涛便密报了一份《动态》材料，题为《陈丕显在磨刀——我们对苏南一支反革命地下武装的调查的看法》，诬陷华东地区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了一个地下武装，密谋兵变”。文中说：“我们分别派人到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昆山、江阴、大仓等地走了一圈；初步证实了我们原来的想法：即在整个长江

以前，存在着一支以各种名称出现的反革命地下武装。这支反革命武装上受十人指挥部（老人串连会）领导，下同上海红卫军勾结，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所有这些都是荒唐的捏造，但恰迎合了张春桥等诬陷迫害陈丕显等同志的需要。张春桥急忙“批示”，“这些材料还是初步的。请与江苏省‘革委会’取得联系，请他们负责调查江苏的情况。”并要游“集中精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彻底弄清这一支反革命地下力量在上海的上下左右的联系”。在追查所谓“老串会”和上海的联系的同时，游雪涛一人又制造出所谓“上海老串会”的假案，诬陷迫害了港务局党委书记，海洋渔业公司党委书记以及戏曲学校的一位同志等一批干部和群众。

1967年下半年，张春桥指使“游雪涛小组”了解华东局机关的运动情况。游马上派小组成员3人通过各种关系，混了进去。11月2日，游雪涛写了《关于刘瑞龙初步调查情况汇报》，恶毒诬陷刘瑞龙（华东局农办主任），胡说华东局有一个“叛徒集团”。张春桥在材料上来自批了：“刘瑞龙是个大坏蛋，华东局机关造反派不应把这个人放在那里不管。要认真地组织力量批倒批臭，并把问题搞清楚。”使刘瑞龙遭到无数次的残酷批斗。同时，“游雪涛小组”一伙人还炮制了一张《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由游亲笔写信附图，直报张春桥。（粉碎“四人帮”后，在张的办公桌里查到了此件）这张图上挂中央，下联上海市委，

大肆诬陷华东局主要领导同志和局、处级105名干部，逐个扣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托匪”、“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帽子，为“四人帮”阴谋打倒大批领导干部，提供“炮弹”。

1968年4月，游雪涛向张春桥汇报，说上海音乐学院有一个人是叶剑英的亲戚，有“特务嫌疑”。张对游说“你们应该把他揪起来。”第二天游便将张春桥的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市公、检、法军管会。4月3日此人即被拘留，由游进行审讯，猖狂地查问他和叶剑英的谈话内容，妄图搞诬陷叶剑英的材料，结果未能得逞，不了了之。

1969年10月，叶剑英陪外宾来沪，曾在锦江饭店找二位熟悉的京昆剧团的青年演员谈话。张春桥得知后，叫秘书何秀文要游雪涛（此时“游雪涛小组”已撤销）把谈话内容尽快搞到手。10月12日，游雪涛向徐景贤报告说：“今天晚上完成了了解锦江饭店谈话内容的部署，一共兵分八路。但是否能够达到目的……要到明天晚上碰头以后才能看出苗头。”游和同伙找到那两个青年演员，用软硬兼施的特务手法从两个演员口中套出了叶剑英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张春桥。

1968年夏，张春桥得到于会泳的密告信，说北京电影学院有一部分人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查阅三十年代报刊资料，还翻拍有关照片，说他们想整江青的材料。张春桥获悉后，

急忙派游雪涛去“调查”，游雪涛小组成员和这批人混在一起，秘密地收集这批人所谓“攻击江青”的材料，并向张春桥作了书面汇报。张春桥在报告上批下：“把他们先拘留起来，但要保密”，“由公、检、法军管会和于会泳、游雪涛××商量一下，摸准了（再）行动，不要扑空”等指令。在张春桥的命令下，把北京电影学院的孔都等5人抓了起来，秘密地关押在“少教所”，由游雪涛等审讯，并抄了其中4人的家，搜所谓“攻击”材料。以后孔都等人又被押往北京，被秘密关押达5年之久。“游雪涛小组”还死死抓住这条“线索”，诬陷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和他们串连在一起，“阴谋炮打江青”，制造出“上海图书馆现行反革命案”，使上海图书馆不少工作人员遭到残酷迫害。

“游雪涛小组”多次对一些干部、群众进行秘密绑架，非法审讯。1967年2月绑架了参加“1·28炮打”的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名学生。以后又绑架了支持“炮打”的华东政法学院的教师夫妻二人。1967年11月15日夜，游雪涛因怀疑华东局机关干部李学广在“文革”初期接待站工作时，有收集“工总司”头头材料的活动，组织一伙人身带三角刮刀等凶器去华东局机关对李进行突然袭击。李呼救，他们把李嘴巴堵起来，秘密地绑架到822工厂的地下室关押审讯，企图以李为突破口，找出魏文伯、韩哲一、陈丕显、曹荻秋等所谓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材料”。

总之，“游雪涛小组”建立一年多来，在张春桥一伙的豢养和指使下，把反革命的触角伸向各个方面，疯狂地施展盯梢跟蹤、美人计、打入拉出、绑架抄家、秘密拘捕、刑讯逼供等等法西斯特务手段，收集情报，诬陷迫害许多干部和群众，并制造了一大批冤假案件。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制造的冤假案件有26起，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多达816人，其中183人遭到残酷迫害，有5人被迫害致死，不少人致伤致残。真是罪恶累累。

（四）假审查，真包庇

1971年，林彪仓惶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反革命集团搞《五·七工程纪要》，建立特务小舰队的阴谋被揭露出来后，群众对游雪涛那伙人的诡祟活动揭露的更多了，游的一些同伙谭启泰、赵洪源、侯邦琪等人纷纷被原单位宣布审查。游雪涛气急败坏地多次向张春桥、李文静等人写信求援。而张春桥一面故作镇静抚慰说：“何必如此生气”，“请老游不必急急忙忙”。另方面布置徐景贤等人对游雪涛及其同伙采取“保护”措施，不让群众循着“游雪涛小组”的蛛丝马迹追究到张春桥的总根子上来。于是在1972年1月21日，由徐景贤、王洪文两人出面，以“隔离审查”名义，将游雪涛、夏云开等5人庇护起来，演出了一场假审查、真包庇的丑剧。当时张春桥对于“审查”游雪涛有一个亲笔批示：“（对游）不要点什么问题，

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最后一句“大家主动”，道破了天机，原来也是为了张春桥等的主动，防止火烧自身。

整个“审查”的方式也十分奇特。游雪涛的专案既不由他所属单位审理，也不由市专案办公室负责，而是由张春桥指定“市革会”组织组头金祖敏亲自抓。在“审查”过程中，对专案人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查回游雪涛的交代材料；不准查游雪涛插手军队的材料；不准查游插手外地的材料；不准提审。有关的审查材料、案情汇报及审查对象的交代材料，全部密封上报王洪文、张春桥，其他人一律不得拆阅。这个不准，那个不准，可见其包得之严，捂得之实。

这场丑剧，吹吹打打，串演了数年之久，“四人帮”一伙迟迟不肯结案，使游雪涛等人长期逍遥法外。直到1976年10月6日，也就是“四人帮”被粉碎的那天，“市革会”组织组才拿出了一份《对游雪涛定案处理的请示报告》，提出对游雪涛等“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但又说“根据党的政策”“恢复原工资”。游雪涛小组的累累血债、滔天罪行就这样被轻轻一笔勾消了。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4月29日，游雪涛、夏云开、夏宗南、赵洪源、李家振、肖白等游雪涛小组的主要头头和骨干被正式逮捕，对游雪涛小组的反革命特务活动和罪行开展了

全面清查、审理工作。游雪涛及其同伙终于站到了被告席上，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二十一、“上体司”治安组

1967年2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唆使、支持下，以胡永年^①为头头的“上海市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成立了所谓“治安组”。以后各区的“体司”和“上体司”直属基层造反组织都成立了“治安组”。仿照“上体司”的做法，“工总司”等在其所属单位也相继成立了一批“治安组”。这些“治安组”，以打击“流氓阿飞”为名，任意非法抓人，私设牢房，滥施酷刑，草菅人命，其法西斯暴行，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一）“上体司”治安组的产生

1966年10月，原住在江湾体育场的上海市足球队、体操队的运动员搬到南京西路150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市体委”）大楼后，其中的一些“造反派”打着“取缔奇装异服”和

“打击流氓阿飞”的旗号，经常在马路上拦截过路无辜群众，横加罪名，拖进“市体委”大楼内进行毒打，有的还被强行剪头发、剪衣服。群众敢怒不敢言。不久，“上体司”劲松兵团决定专门成立一个小组，从事所谓“打击流氓阿飞”活动。

1967年所谓的“一月风暴”前后，打、砸、抢、抄、揪亚风盛行，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这完全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搞乱上海，以便乱中夺权所造成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张春桥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但他的统治地位一时尚未巩固，急需借助各方力量来控制局势。既然他们自己彻底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进一步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威慑群众了。他得知“上体司”一伙“造反派”的行动，正合他的需要。便同年2月中旬，在上海友谊馆咖啡厅召开的“市革会”全体会议上说：“市公安局已经瘫痪了，上海的流氓阿飞等很猖狂，没有人管，我们的群众组织应该自己把它管起来，‘上体司’可以负责这件事。”

张春桥利用“上体司”来管“治安”，打击流氓阿飞，这是一个阴谋诡计。“上体司”不是国家专政机关，根本无权过问社会治安。“流氓阿飞”的概念又很笼统，什么样的人是“流氓阿飞”，从来没有明文规定，因此他们可以任意扩大范围。张春桥何尝不知道胡永年那帮人的唯一本领就是“打人”，就是根本不讲政策、无法无天的暴虐行为，但出了什么漏子他可以以“这

① 胡永年原是上海市工人足球队的一名运动员，“文革”中“造反”，毒打、砸、抢起家，当上了“上体司”的司令，后来窃据了上海市“革委会”委员、市体委“革委会”主任等职务。他是一个凶残无比的打手，典型的迫害狂，双手沾满了众多无辜者的鲜血。由于他为“四人帮”效劳不遗余力，因而一伙“小兄弟”称他为“张春桥的冤兵团”。“文革”中他犯下的罪行累累，民愤极大，粉碎“四人帮”后，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1983年6月改判有期徒刑20年。

是群众组织搞的”，不是政府搞的，来推卸责任。这就是张春桥宣扬的“群众专政论”的真谛。“上体司”治安组以及形形色色类似的治安组也可能抓了少数真正的流氓阿飞，但他们是在彻底破坏法制的基础上搞所谓打击流氓阿飞的“革命行动”的，他们的人员组成又极为复杂，很多人本身就是流氓成性的恶棍、打手，因此，让这种治安组插手管社会治安只能是愈搞愈乱，并滥抓无辜，只能是破坏治安。

“上体司”的头头胡永年，参加了这次张春桥主持的“市革会”会议。他得到张这道旨意，大喜过望。会后立即召开“上体司”常委会，提出要成立治安组。1967年2月14日“上体司”治安组正式成立，组长楼骏，副组长邱胜平、朱直虹。下设办公室、材料组、接待组、审讯组。整个治安组的行动听命于胡永年的指挥。

“上体司”治安组成立后，楼骏、邱胜平与市公安局造反派挂上了钩，听了“社会动态”的介绍。市公安局造反派派人到“上体司”治安组指导工作当“顾问”，发给楼骏等人可以自由出入市公安局的证件。

“上体司”治安组成立几个月，干了大量坏事，道路侧目，含冤遭难者莫不切齿痛恨。但张春桥在1967年6月3日全市群众大会上却大加赞赏，说：“让他们（指所谓“流氓阿飞”）发展，那它可能造成对我们的威胁。‘上体司’的同志们对这点很

关心，到处去捉流氓阿飞，我们支持他们的这个行动。”过了没几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一个通令（后被称为“六·六通令”），张春桥等指使“上体司”抓治安明显地违背了通令的规定。^①但徐景贤却公然支持“上体司”治安组的违法行为。他嚣张地说：“这个通令是保护好人的，决非束缚造反派手脚，不要在具体问题上钻，要领会精神。抓人，‘上体司’打击流氓阿飞和这完全是两回事，‘上体司’抓流氓阿飞市革会可以授权！”王洪文也号召其他各造反组织要向“上体司”学习。顿时，全市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许多治安组。

从此，“上体司”更加肆无忌惮了。特别荒唐的是它后来居然被推为1967年度“上海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出席了1968年4月7日上海市召开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由邱胜平代表“上体司”治安组在大会上发言并领奖。

（二）一个横行不法的打砸抢组织

“上体司”治安组由于得到张春桥等一伙的支持，在社会上为非作歹，横行不法。他们除了非法捉人，毒打无辜群众外，还

^① 如“通令”规定：一、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四、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财物。五、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作为淫性斗争的工具，砸对立派，参与武斗，是全市名噪一时的一支打、砸、抢队伍；胡永年对治安组的打手们公开讲，对捉进来的人“打打没有关系”，要“加点油才能打开缺口”。因此，凡被抓到治安组的人，一进市委大楼的大门，就得挨一顿耳光，称为“见面礼”；接着一阵拳打脚踢，强令填写所谓《社会渣滓犯罪登记表》，经过肉体和人格的侮辱后，分别被关到2楼大厅、4楼体操房和更衣室内，以后就是过堂审讯。那时胡永年手下的一批打手们大施淫威，他们把打人叫“开章”、“过瘾”。刑讯逼供的手段有以头撞墙，拳击腹部，凌空飞脚，摔背包，皮鞭、木板、球棒抽打，“针刺”（大头针刺），剪头发，“火烫”（烟头烫）、吊打等。甚至纵放狼狗撕咬，用刀子插刺。把人打昏过去后泼浇冷水，敲醒后再打。他们进行通宵的车轮大战，在其附近的里弄居民们，彻夜听到的是打人声、斥骂声、受害人的惨叫声，直到天亮，几乎天天如此。

“上体司”治安组从1967年2月24日成立到1968年9月结束，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究竟抓了多少人，干了多少坏事，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不完整的资料，从其成立到1967年底止，就非法抓了827人，进行疯狂的刑讯拷打折磨，致死3人，致残24人。10个区的“体司”治安组从1967年3月至9月的半年中不完全统计，非法抓了363人；“上体司”的直属单位龙（华）吴（泾）地区治安组、青少年体校文保组、风雨操场治安

组3处非法抓人的170人。10个区治安组和“上体司”直属单位治安组的所抓人员中，被活活打死2人，迫害致死2人，毒打致死5人。另外，被胡永年称为兄弟组织的“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电影分部治安组”，在建立一年多的时间里，非法抓了800多人。当时仿照“上体司”治安组建立的类似组织为数很多，故实际被所谓“治安组”迫害的人数，远远超出上举之数。

下面，我们略举这些“治安组”的暴行事例，以见一斑。

1、毒打无辜群众。

“上体司”治安组及其下属的各治安组，组织了大量的“巡逻队”、“小分队”等。其组成人员十分复杂，有的本身就是流氓阿飞分子和社会渣滓，他们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旗号，日夜出入于戏院、公园、里弄等场所，看到他们认为“不服管”的人，反诬为“流氓”、“阿飞”，抓到治安组进行毒打。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群众。

市卫生防疫站有一个职工，被市公安局造反派中一些人诬为“杀人凶手”，将他拘捕，但几经审讯，“搞不下来”，又不肯就此罢手释放，于是转押到“上体司”治安组，说：“借你们‘上体司’的威力，请协助。”此人被押到“上体司”治安组后，那些打手劈头就威吓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在这里不老实，是要直的进来，横着出去的。”接着，便施行种种酷刑：如

揪住那人双肩，用脚猛蹬，跌倒后轮番用脚乱踢；将他两手绑住，吊在空中，又使劲拉他的头发、揪头，当他痛极呼救时，突然放手使他重重跌在地上；打手们又拉着他的一条腿，作360°旋转，人擦地皮，皮破血流。经过如此反复折磨摧残，造成那人肋骨骨折，严重致残。

1967年5月28日，凯旋路饮食店一个青年艺徒（女）在马路上学骑自行车，被“上体司”下属“风雨操场治安组”的巡逻人员撞上，诬为“流氓阿飞分子”，将她的两眼蒙住，非法绑架到风雨操场大楼8楼，用皮带等毒打3刻钟，威胁她“如不老实交代，要剪掉头发”等等。此人不堪凌辱，被迫跳楼，致脾脏破裂，多处骨折，严重脑震荡，抢救3昼夜才苏醒，但已终身残废，丧失劳动能力。

和平饭店车队有个职工，被诬搞腐化，由楼骏派人将他捉来。楼骏亲自把他压在运动垫子上，几个打手轮番拳打脚踢，打得他遍体鳞伤，口吐白沫。送医院抢救，严重致伤。

“上体司”治安组对未成年的孩子也不放过。有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被打得头破血流，在体育医院缝了6针。

“宝庆路治安组”是上海电力建设局系统的造反派仿照“上体司”治安组的榜样设立的。他们特地布置了一个阴森森的审讯室，将电灯关掉，点上蜡烛，暗淡的烛光随风摇曳，墙上画着骷髅白骨，并贴了“杀、杀、杀”、“镇压”等字标语，墙上

挂着钢丝鞭子、拳击手套、木棍、竹片等打人刑具。这个治安组在1967年7月至9月的2个多月里，就毒打了72人，8人被打得留有严重后遗症。上海铁合金厂有个工人无辜被绑架到治安组后，打手们用钢丝鞭子、木棍抽打他。这个工人对他们的暴行提出抗议，并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一个打手恶狠狠地说：“共产党员值几锱一斤，你是共产党员，我更要打。”一直折磨到深夜，该同志被打得3次昏迷，又被拖上汽车开到淮海路乌鲁木齐路口丢下。打手们扬长而去。后车被人发现送到医院，经抢救才脱险，但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又如上海汽车发动机厂的一名女工和上海锅炉厂的一名家属工被绑架到这个治安组后，都强令脱去长裤，用钢丝鞭子猛抽她们的下身，打得块块青紫，血迹斑斑。

在所有这些治安组里被抓被打的人，最后释放时都被威胁不准讲出在治安组里受刑的情况。

2、乘机挟嫌报复。

“文化大革命”期间，派性恶性发作，造反组织之间勾心斗角，都想把对方搞垮；有些人为了报私仇，乘机打击诬陷别人。这些组织和一些坏头头，便把治安组作为他们挟嫌报复的工具，借助治安组力量整垮对立面，打击陷害干部、群众。

1967年4月，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红旗造反兵团”内部分裂，有人另外组织了“217纵队”。“兵团”的一些头头，对那

一个“纵队”头头十分痛恨，时刻寻机下手，要把他搞下去。1988年1月15日，“兵团”头头得知那个“纵队”头头到了该厂一名女演员郑梅萍家中，即派人于次日凌晨冲进郑家，非法绑架了郑头头和郑梅萍，并通过“上体司”一个常委的关系，把俩人押送至“上体司”治安组，分别关在9楼两间房间内。他们对郑严刑拷打，诬蔑郑“搞腐化”、“腐蚀造反派头头”。当晚，“上体司”头头胡永年单独两次“审问”郑梅萍，直至深夜。16日晨6时，郑突然“坠楼身亡”。

闸北区新路某场职工方钦国因揭发坏人坏事，得罪了该菜场一个女营业员徐丽芳，施挟嫌报复，通过其姘夫邮电局“治安组”头头刘南洲，串通“上体司”治安组赵伯源，于1967年9月2日将方抓走。5日，菜场领导来“上体司”要求保释，赵伯源非但不允，还当众打了方。7日下午，赵伯源、刘南洲等连续数小时对方严刑拷打。8日凌晨，在市体委和国际饭店的夹弄内，发现了方的尸体。当晚，“上体司”治安组召开全体人员会议，统一口径，诬称：“方逃跑时失足摔死”。事发后，有关菜场等处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家属强烈要求查明死因，惩治凶手。市政法指挥部不得不组织了市公安局、黄浦公安分局、“上体司”、“闸北区财革会”等单位进行联合调查。最后由市公、检、法审理组作出了“刘南洲泄私陷害，致使方钦国留书跳楼自杀”的结论。刘南洲被判徒刑5年，但在“监外执行”，徐丽芳

遣返回原籍，对赵伯源未作处理。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9月赵被拘留审查，1983年1月20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赵剥夺政治权利3年。

肯云中学“教革会”头头勾结“上体司”治安组朱直虹，诬陷该校人事保卫干部、共产党员苗廷富有“奸污女学生”、“偷窃公款”等问题。1967年1月10日上午，朱直虹等将苗抓至“上体司”严刑拷打，一直打到晚上10时，苗被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灌喷也未醒过来。11日凌晨5时许，在“上体司”大门口左侧人行道上发现苗的尸体，经医生检验已“死亡较长时间”。当晚，治安组召开了全体人员会议，统一口径诬陷苗“畏罪自杀”。12日夜，他们又把苗的弟弟（是外科医生）押来“上体司”，威胁说：“家属不准验尸，不准上告，如要验尸就作为反革命家属。”苗的家属在第二天还是去市政法指挥部上告，但未被接待。17日，苗的尸体被送往西宝兴路火葬场火化时，家属与邻居五六十人看到苗二肘关节全被打断，头枕项被打扁，肋骨被打断，全身是皮带、皮鞭抽的紫血印子，衣服、裤子全被撕开，因此坚决要求验尸。“上体司”治安组那些头头们慌了手脚，一面骗家属说去办验尸手续，一面硬令火葬场抢走尸体去火化。18日，治安组仍以苗系“强奸、盗窃犯罪分子……畏罪跳楼”上报市政法指挥部，企图结案，逃避罪责。以后在家属不断上告和社会舆论压力下，1971年不得不进行“审查”。当时

有人交代苗是被打死后抛下楼去的。但不久，这些人即翻了供。直到粉碎“四人帮”后 1977 年 6 月，经市有关部门复查，推翻了原来诬陷苗的种种问题，确认：苗系被“非法绑架，严刑拷打，迫害致死”。对苗的死亡应负直接责任的朱直虹被判处徒刑 10 年，另两名打手，一被判徒刑 8 年，一被判徒刑 5 年。

3、参与砸对立派。

“上体司”是上海一些武斗事件的积极参与者。而治安组的那批心狠手辣的打手们，又是“上体司”参与武斗的“突击队”。1967年初，“上体司”楼骏、邱胜平、朱直虹等参与砸“红卫军”组织。2月，邱胜平等参与砸“文体军”组织。2月下旬，又参与砸“支农职工造反司令部”（简称“支农司”）。1967年7月31日，王洪文等指挥砸“支联站”，“上体司”派 50 人担任主攻，负责抓人。“上体司”治安组通知市举重队参加去泰安路冲砸“支联总站”召开的联席会议，当场抓了 28 人（其中 3 人是过路群众），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蒙上眼睛塞进汽车里送往杨浦公安分局关押。8月3日，“上体司”治安组参与在南京东路外滩到手工业局门前捉“联司”和“支联人员”的行动，抓了一二百人。由朱直虹逼令他们高举双手，嘴里喊“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押到“市体委”大楼进行毒打。8月4日，胡永年带领“上体司”人员至上海柴油机厂参加砸“联司”大武斗。后“上体司”治安组人员又在外滩抓了“联司”群众 20 余

人，胡亲自用电线鞭子抽打他们，有两个女工身受重伤。8月6日，楼骏到华东化工学院对该校“搏斗兵团”、“迅迅兵团”头头煽动说“野派（指新化工）是‘支联站’，市政法指挥部要取缔它，现在他们顽抗，要上体司攻下来。”于是，他们手持长矛、携带燃烧瓶，齐挑火攻，烧坏教室，破坏图书，砸了 25 个大小仓库和 42 个实验室，国家损失 10 多万元。8月 15 日，由楼骏负责，调集“上体司”治安组和各区治安组约 1000 人左右，分两路去砸闸北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总革命委员会”（简称“总革会”）和“体育战线总指挥部”（简称“总体司”）。当场捉了五六人带到“上体司”拷打。

4、参与全市“刮红色台风”。

1967 年 12 月 25 日，王洪文指挥全市的所谓“刮红色台风”，由市公安局、市政法指挥部、“上体司”、“文攻武卫指挥部”等单位参加，成立所谓“打击流氓阿飞指挥部”。“上体司”治安组和各区体司等的治安组被作为“刮红色台风”的主要力量。

“上体司”接受任务后，由常委、治安组组长楼骏亲自部署。25日晚 12 时，全部人员集中在“市体委”2 楼大厅，然后分 3 路出发。至次日晨，抓到“流氓阿飞分子”七八十人，都关在 4 楼体操房，由审讯组负责审讯。当晚，王洪文、徐景贤、朱玉泉等人都到市体委大楼现场“视察”。在审讯中，打手们竟放出

事先借来的狼狗咬人，场内气氛极为恐怖。胡永年、楼骏、朱直虹等人则在旁狞笑取乐。有一个姓郑青年被狼狗咬伤，躲避时又被人用小刀子在背上戳了两刀，郑的母亲因保存儿子的血衣受到本单位造反派的批斗。

5.勒索和贪污财物。

“上体司”治安组非法抓人以后，即要被抓对象交出财物（钱、粮票、布票、手表等物品）作为治安组所谓的开支费用。有些物品，被治安组人员随便取走了。所以，这些财物根本无帐可查，是一笔糊涂帐。此外，他们还借口捉拿外逃的“流氓阿飞”，到各地去游山玩水，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公家钱款。

（三）臭名昭著，草草收场

“上体司”治安组这种胡作非为、横行不法的法西斯暴行，彻底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激起上海人民的切齿痛恨，纷纷向当时的“市革会”控告，要求解散治安组，严惩打人凶手。“市革会”迫于广大群众的抗议怒潮，不得不于1967年10月19日，召开有市政法指挥部、各区公安分局、各区治安组和“上体司”治安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治安组的撤销问题。“上体司”治安组组长楼骏在会上首先发言，反对撤销，他指出张春桥这个“后台”，说：“上体司搞治安组是春桥××表态的，是授权委托（我们）的。”市公安局有的造反派也说“现在里弄治保组织还不健全，工厂保卫组织还

未发挥作用”。认为对撤销治安组问题，“市革会”要慎重考虑，为“上体司”帮腔说话。他们还要挟说，如果一定要撤销，“市革会”要发正式文件，对“上体司”治安组予以肯定，以免受“坏人”打击报复，保护治安组“战士”的生命安全，反映了他们自知罪孽深重，怕受惩罚的心理状态。这次会议乱轰轰闹了一番，没有结果。以后拖了近1年，1968年9月在康平路办公楼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又提出撤销治安组问题，但胡永年仍不同意，会上发生争吵。当时张春桥另一个镇压群众的得力工具“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已经发展壮大，可以取代“上体司”治安组的作用；而“上体司”治安组在社会上的名声大坏，利用价值不大了，张春桥决定甩掉这个包袱。因此，张对胡永年说：“你们好事不要做过头，好事做过头要变坏事的，可以结束（了）。”胡永年见大势已去，“靠山”不再支持，只得同意撤销。回到“市体委”后，宣布了张的决定，还装模作样要楼骏做出工作总结来。但“上体司”治安组罪行累累，人人痛恨，能做出什么样的总结呢？最终并无总结便草草收场。

三十二、“清档”与“防扩散”

张春桥及其党羽的操纵控制下的上海“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简称“清档”),配合当时的“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为诬陷迫害大批革命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的。在“清档”中,他们又搞了所谓“防扩散”的规定,把涉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历史上问题的一切材料严密地封锁起来或擅自销毁掉,并残酷地迫害曾经手接触过这些材料的人。

(一) 张春桥提出“清档”要“究底翻”,要为上海和中央的“专案”服务

“文革”开始不久,康生别有用心地大肆赞扬天津南开大学“卫东”和“八一八”红卫兵组织,查阅敌伪时期的报刊,揪出所谓“六十一大叛徒集团”的功绩。他批准和支持一些红卫兵去各地查阅机密档案,调查中央和省、市某些领导同志的“历史问题”。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效尤,刮起了“抓叛徒”风。

1967年2月上海“市革会”成立后,张春桥就下令要搞“清查敌伪档案材料”的工作。他首先叫王少庸、王承龙、李文普商量抽调人员建立一个材料组,还给材料组规定了一条“为中央专案服务”的任务。5月间,那个市委机关造反派头头、窃

署了“市革会”常委的王承龙,根据张春桥的旨意,召开了有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水产学院等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布置对敌伪时期报刊的清查任务。王承龙在会上传达了张春桥的讲话,说对“敌伪档案要究底翻”,强调上海的“清档”工作,“不但为上海的‘抓叛徒’、‘清队’服务,也要为全国和中央(搞专案审查)服务”。当时,提出要把上海市图书馆藏书楼存放的敌伪时期的报刊全部翻一遍,把上面刊登的《反共启事》、“投敌”材料等摘出来。这项工作指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个造反派小头头、“市革会”材料组领导核心之一的刘和德负责。

刘和德带领11所大专院校的150余名红卫兵,伙同上海图书馆的20几个造反队员组成了“抓叛徒、查黑线小组”,对外称“市革会”材料组的“查资料小组”。他们查阅了上海图书馆藏书楼内的敌伪时期的各种报刊200多种、期刊1300多种,约70000余册。从中摘抄了大量的所谓“线索材料”,编写了《抓叛徒简报》、《自首叛变资料汇编》和《“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历史材料汇编》等材料。

1967年6月,刘和德派人带了23个红卫兵到江苏省公安厅、中国第二历史博物馆、南京图书馆等处去查阅敌伪档案,抄录有关上海地区被捕、叛变人员材料。从6月19日至7月16日,共查阅了敌伪档案材料3700余卷,把摘录的材料带回了上

深。

1967年10月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上海实际上早在中央指示之前4个多月就抢先动手了。中央指示下达后，在张春桥授意下，“市革会”建立了由王少庸、王承龙和“三军”的高志荣、李彬山、姬应伍等人组成“市革会”敌伪档案清查领导小组。11月初，正式成立了“市革会”敌伪档案清查小组，组长由刘和德担任。接着，全市各区、县、局、大专院校中凡有敌伪档案的都相继成立“清档组”。

“市革会清档组”先后接管、查封了市档案馆、公安局、人民法院、民政局等103个单位的敌伪档案，全市抽调了6000多人清查了187万余卷的敌伪档案材料。

根据张春桥“上海的清档工作要为中央（专案）出点力”，“除了把上海敌伪档案搞彻底，我们还要支援外地”的指令，市清档组千方百计从各方面收集整理诬陷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材料上报中央专案办、中央清档组，为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击迫害大批革命老干部提供“炮弹”。上海的清档范围不断扩大，他们还把手伸向了外省市。

1967年11月，市“清档组”抽调50余人组成银行保管箱清理小组，对全市32家旧银行、9家外商银行在解放时留下来的9742只保管箱，进行查封和开箱清理。清理小组收集整理了诬陷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线索材料”编入《银行保管箱清查

简报》上报张春桥、姚文元和中央专案办。在清查中还发现了一批三十年代文化界的材料（计有86份），江青得知后，立即派人持她亲笔信，在高度保密情况下，坐专机来上海取走。

12月底，张春桥又批准查封了某些国家驻沪机构的档案材料，进行了查阅。

市“清档组”又在1968年1月向张春桥、王少庸、王承龙等人提出“收回洋奴私自保存的敌伪时期外商档案”的意见，并作出“行动计划”，要对全市2800个所谓“洋奴”（按指解放前外商机构所雇用的中国高级职员）特别是其中155个“重点对象”实行“统一行动”。他们策划由红卫兵出面查抄，逼令“洋奴”交出材料。后因王少庸与王承龙的意见不一，未能采取统一行动。但其中有些对象经王承龙个人批准，由“文攻武卫”指挥部出面抓人并逼取所谓“材料”。

1968年3月，市“清档组”组织人去杭州、南京、苏州、合肥等地，打着“学习工作组”的名义，进行“调查”。这些人去后很快写出《关于江、浙、皖敌伪档案状况及其接管、清查工作的情况汇报》，说外地“清档”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对张春桥指定要了解的保存在安徽省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档案，以及江西“上饶集中营”的材料，他们除了整理和复制外，还提出了要将两份档案材料带回上海的无理要求，遭到了安徽、江西有关方面的拒绝。

1968年7月，张春桥提出“敌伪时期的影片、胶卷也属敌伪档案的一部分”。徐景贤、王少庸立即指定由电影系统的工、军宣队和市“清档组”共同负责成立清查小组来抓此事。他们对电影制片厂中保存的、从抄家中抄来的、以及流散在社会上的4000余卷影片胶卷，进行了清查，以有些胶卷“为清理阶级队伍和有关专案提供证据和线索”、“对专案发展线索有一定价值”为由，对部分胶卷作出控制使用或查封的规定。

1968年10月，市建工局专案组和商业二局“革委会”分别向市专案办写了情况，说解放前饭店和旅馆中的旅客登记簿上有住宿人员的政治身份。从“清档”角度看，是有价值的，建议“认真清理，妥善保管，为‘清队’工作提供敌情资料。”王少庸立即要清档组进行认真清查。刘和德马上布置各区、县以及派到各大饭店的清档组，对解放前的旅客登记簿，进行清查。

1969年2月后，在张春桥、王少庸的布置下，“清档组”又抽调了3400余人组成6个清查外文档案团（营），集中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上海图书馆、市工商联和市委党校8处，对市公、检、法系统、宗教局、石油站、图书馆、银行、海关和档案馆等60个单位，70余万卷的外文档案进行清查。

（二）利用“清档”搞阴谋诬陷活动

市“清档组”在兴师动众的大规模的“清档”过程中，先

后汇编了10余种简报和资料。其中有：《敌档材料呈阅件》245期；《敌档材料摘编》403期；《自首叛变资料汇编》106期；《抓捕简报》58期；《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简报》53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历史资料简编》19辑；《银行保险箱清查简报》29期；《自首叛变资料照片汇集》42本；《被捕资料照片》6本等等。

“清档”中，张春桥等一伙利用这些材料搞了哪些阴谋诬陷活动呢？

首先，推翻党组织过去对干部的政治历史所作的正确结论，无限上纲，肆意诬陷迫害。党的干部，尤其是老干部，在几十年中多次受过党的审查，特别是建国以后经过镇反、肃反等运动和审查干部工作，绝大多数人的政治历史情况都已搞清，并且有组织上的明确结论。有的同志，过去曾被捕过，他们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气节和英雄气概，以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对这些同志，张春桥等人不顾历史事实和组织上的审查结论，将凡是在敌伪时期的报刊、资料、档案内记载被捕过的，一律诬为“自首变节分子”、“叛徒”；凡是出狱后接上了组织关系，重新为党工作的，则诬为“潜伏特务”、“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定时炸弹”等。

二是一些干部历史上的问题，经组织审查后本已经作过处理的，“文革”中重新审查处理，来回“翻烧饼”，往死里整。有

的历史上曾经被捕过，曾一度动摇，或有轻微变节行为，旋即悔悟。全国解放后经过镇反、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和审查干部工作，情况已经审查清楚，并作过处理，其中多数同志经过长期考验，表现也是好的。而张春桥等人割断干部长期的历史表现，仅凭“清档”搞到的材料，重新加以残酷迫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三是对敌人捏造的材料，不辨真伪，全盘接受，作为迫害干部的依据。过去，反动派为了迫害共产党人，在一些报刊中刊登过一些伪造的“自首书”、“悔过声明”等，混淆视听。张春桥等一伙在“清档”中，对所有刊登在敌伪报刊上的这类材料，不作任何调查，不听本人的申辩，一律拿来作为迫害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定案材料。

四是肆意捏造假材料。有的干部，历史上既未被捕过，也无复杂的“社会关系”。对这些同志，张春桥一伙通过“清档”，或是凭空捏造材料，或是“张冠李戴”采取逼供信手段，制造冤假错案。

从下面我们所举的几件事中，就可以看出张春桥等一伙人是如何交替运用以上手法来进行诬陷活动的。

如《敌档材料呈阅件》第30期中称：“发现刘少奇的4个材料，载有刘少奇被捕之事”。一份匪淞沪警备司令部发给警察局的情报云：“自10月10日（1945年）后日趋活跃在政界及劳

工界策动及宣传工作尤为紧张，其负责推动者刘少奇、陈××、潘××等人其活动中心为沪西区……。”另一份材料中又有“军统特务组长1945年10月给组员王×的密电，指使王×侦查刘少奇在沪的活动”。但在另外一份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密电中又宣答：“刘少奇已于10月6日潜返苏北……。”事实是1945年10月刘少奇根本不在上海工作。对于敌人这种自相矛盾，明显是假情报的荒唐报告，《呈阅件》却别有用心地说“特务王×采取了何种行动，有否将刘捕获，我们正在追查中”。王少庸、刘和善一伙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把这作为诬陷刘少奇有被捕叛变嫌疑的线索材料上报中央专案组。

如《敌档材料呈阅件》第45期，标题为：《发现敌人报导彭德怀叛变的材料》。内容是根据市档案馆保存的《字林西报》1931年4月1日和《字林西报周刊》4月10日的报导。报导说王振路（译名）将军和彭德怀将军作出决定“要背弃共产党，求得国民政府的宽恕”；说王的妻儿和彭的母亲“被指名为人质”，“已送到政府指定的地点”，以表明他们的“真心诚意”；说政府方面发表“公报”称：“王、彭两人都将成为……师长，他们手下的士兵将编入反共远征军，仍由原来的长官指挥作战。”在这段报导后面，这家报刊提出：“如果江西的那些报告还有可信的话，那么王、彭两人至今已宣布改变信仰了”。但是“据说王将军最后的决定是不放弃布尔什维克事业。”这种明显由敌人制造

的语言，也作为他们获得的“重要材料”上报。

第3期《自首叛变汇编》中，列举了被国民党逮捕后曾关在“江苏反省院”后被营救出狱或被释放的部分人员目前下落的情况。说，“这个反省院出来的许多人是刘少奇包庇的叛徒集团人员”。为打击迫害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同志罗织罪名。

38期《资料汇编》中，把因“畜生事件”而被捕的5人列为自首变节人员。其他许多被捕后未暴露身份，或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以各种方式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而被释放的，或者因材料不足而轻判的，或经组织营救出狱的，统统被认为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是“嫌疑”被列入汇编。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在“清档”中除了搞了大量的诬告陷害材料外，1968年3月经刘和德提出，并经王少庸、王承龙的批准，又在市“清档组”内设立了线索组，把从敌档中找出的“对象”，制成线索卡片，布置各区、县、局“进行对号，查明下落”，进行迫害。他们先在杨浦区和纺织局进行试点，以后推向全市，被查到下落的“对象”，无不被戴上各种罪名，遭受到残酷的陷害。如“清档组”在市档案馆发现1955年《市郊工委常委会记录》中，记载讨论审干工作时提到了市农业局一位副处长历史上曾被敌人逮捕后释放的情况，1959年对这位同志的审查结论中明明已写明“审查清楚”，但仍被作为“叛变嫌疑”上报王少庸、王承龙。致使该同志即遭隔离，受到残酷迫

害，于1969年6月被折磨致死。这个冤案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昭雪。又如市“清档组”在上海第一粮食采购供应站的敌档中发现有《国民党粮食部上海碾米厂防奸小组》名册，内有宋××名字。即写了《发现出国投敌的宋××是个特嫌分子的紧急报告》，经王少庸、王承龙批准，向中央“清档组”发出致档线索单。致使宋××被提前押送回国隔离审查，受到了抄家、大会、小会多次批斗。而事实是，这个防奸小组的名单是由伪厂长和几个工头开列的，本人根本不知道。类似情况还有：市“清档组”发现敌档中有1948年2月伪上海县民众自卫队的正副队长名册，就作为线索下发查找。其实，这是伪乡、镇公所、伪保长根据户口册编造出来的，本人都不知道。有些人因此而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如永联大队生产队长唐兴弟、共和大队生产队长何杏浦等人就被迫害致死。

（三）所谓“防扩散”的由来和贯彻

上海是“四人帮”的发迹地。但上海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构成潜在的威胁。这是因为在三十年代，江、张都曾逃亡于上海滩，留下了不清不白的历史记录；而姚文元又因其父姚蓬子早就是货真价实、丑名远扬的叛徒，姚文元幼年由其父的关系曾认国民党中央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老婆、中统局总干事费侠为过房娘，姚称呼为“费寄娘”。这件事追究起来，也确是极不光彩的。“文革”开始，这些历史问题就成为江、张、姚等

的心病。在他们恶毒地以“反革命”历史罪名诬陷打倒别人的时候，不能不想到会有人揭他们历史老底。这就使他们心惊肉跳、寝食不安。为了掩盖自己的丑史，张春桥一伙人别出心裁地炮制了所谓“防扩散”的文件，把张、姚等人直接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划等号，谁也不准触动他们的历史问题，否则就是弥天大罪，就要对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权。在 1967 年底和 1968 年初这段时间里，不断有人到徐家汇藏书楼翻阅三十年代文艺资料。1968 年 3 月，上海图书馆又向“市革会”报告，准备进一步开放所收藏的图书资料，为抓叛徒服务。王少庸急忙批示，“在清查假伪图书资料中要特别注意其中有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资料。但也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资料，因此要特别警惕，严格划清界限，凡属无产阶级司令部方面的资料，千万不要扩散，发现后要立即报春桥××处理，并且一定要十分可靠的人经手，稍一疏忽，便会犯大错误。”根据王少庸的批示，市“清档组”即组织力量，从 3 月到 5 月，分 5 批把搜集到的“防扩散”材料密封上交。这些材料中有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材料，直接送张春桥的有 29 卷、30 页、3 张卡片。7 月，又将 15 卷（册）、28 页材料递交给吴法宪。

1968 年 6 月 27 日，张春桥的上海党羽们正式炮制了沪革的第 76 号文《关于在对敌斗争中严禁扩散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容的规定》，其中规定“恶毒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具体内容，一字一句不准扩散”，“对有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书刊和敌伪档案，应即加封，并报告公、检、法军管会，听候处理”。市“清档组”要求：参加“清档”工作的人员对规定要认真执行，反复检查，“仔细地检查每一期简报，每一份汇编，每一张照片，每一页材料，发现引用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原文，立即涂掉”，“要共同努力，把扩散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口子统统堵死。”1968 年 10 月底，市“清档组”又抽调了 60 余人，组成了 13 个“防扩散检查小组”，专门到 108 个“清档”单位检查“防扩散”材料，发现材料即行扣走。

1968 年 11 月 13 日，市“清档组”又炮制了一份《关于处理档案中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容的请示报告》，更具体地规定了“防扩散”的范围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还规定，“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家属，如在档案中发现他们的材料，也应立即将原件送‘市革会’王少庸、王承龙。”有了这些规定，他们就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及其家属的有关材料，进行收缴、窝藏了。如市档案馆保存的日文《自然》杂志中评兰萍（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时的化名）演“王者五”电影的文章、半身照片；以及演《娜拉》的情况报导等，即被进驻市档案馆的“清档小组”抽出上交。当刘和徇得知张春桥的审干材料《关于张春桥入党问题和失掉关系的审查结论》，

已随市委机关机密档案转移去安徽黄山，放进上海市档案仓库时，即报告王少庸、王洪文，得二王批示派专人去安徽调卷，作为“防扩散”材料密封上缴保存。原先市委宣传部《思想动态》上刊登的批判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反党言论材料等也被取走封存。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的历史材料，则早已被“清档组”取走上缴封存。尤其恶劣的是，他们任意挖掘、抽走档案材料，有的迄今查不到下落，有的已被销毁，至使一大批历史档案残缺不全，造成不可弥补的遗失。据市公安局档案处统计：全市 159 个单位交来的从档案资料中抽出、挖下的“防扩散”材料约有 26000 余卷（册）；市档案馆中的档案被整卷抽走 4 卷，被抽页 536 页，被挖掘 532 处，被贴盖的有 39 页。

（四）借“防扩散”名义，疯狂迫害“知情人”

江青、张春桥等人对了解他们底细的人，对于接触过“防扩散”材料的同志，一个也不放过，狠下毒手，进行残酷的打击迫害。

1968 年 3 月，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反映该处保存有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的有关涉及到现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剪报材料 5 卷，请示处理意见。市“清档组”知悉后，立即派人去市公安局将材料取走，并写信报告张春桥，说“这次清档中，清点的同志发现这批材料，即报告公安局档案处清档小组，但他们一

直没有及时处理。”张春桥在收到这些材料和信后，借此大做文章，他亲笔写信给吴法宪，并转报陈伯达、康生、江青，诬说“上海市公安局在 1958 年 6 月将这些材料重新整理，加了封面，加了标题，变成了市公安局档案。这件事，又一次证明上海市公安局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共产党的公安局复辟成国民党的公安局了。”吴法宪接信后，立即派人来上海调查。在 1968 年 3 月 15 日深夜，他们将市公安局档案处处长王学纯、副局长陆廷芳等 4 人，押上专机送往北京，收监“审查”，诬说他们“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加以迫害。王学纯于 1970 年 2 月 6 日被迫害致死。其他 3 位同志则被关押近 5 年，在实在审查不出什么结果的情况下，才释放出狱。

1968 年 2 月，市“清档组”在藏书楼内的“三十年代”文艺刊物中，发现有江青扮演《赛金花》以及和唐纳婚姻纠纷的报导，即向“市革会”写了《关于部分反动报刊查禁办法的请示报告》，经王少庸、王承龙批准后封存 20 种“三十年代”的影剧刊物。1968 年 4 月北京电影学院、上海图书馆的某些人写信诬告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原海燕电影制片厂）、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原天马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一些人员，与藏书楼一些人“勾结”，“搜集、复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张春桥知道后很恼火，咬牙切齿地说：“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徐景贤也跟着大肆叫嚷：“有人到上海图书馆去查三十

年代的文艺资料，很明显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属“反革命集团”。刘和德奉张春桥之命在进行所谓“藏书楼问题”调查后也诬称本市和外地一些人，“在徐家汇藏书楼大量翻阅三十年代文艺资料，大量江青××的黑材料”，“很可能有一个共同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的反革命集团”。经张春桥、王少庸、王承龙批准，先后3次查封了藏书楼。同时，又派出工、军宣队进驻上海图书馆，由徐海涛坐镇，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大搞政治迫害。他们在所谓“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动员大会上，杀气腾腾地叫嚷要对敢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进行专政。以抄家、拘捕、隔离审查、办封闭式学习班等形式，打击迫害图书馆的干部和群众。1971年又把徐家汇藏书楼的问题列为全市10大专案之一，进一步加以镇压陷害。在残酷迫害下，上海图书馆卷入此案遭受打击迫害的有50多人，占全馆人数七分之一。其中1人被迫害致死，2人遭拘捕（内1人被逼疯），10人被隔离。与此同时，原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的一些人，因到藏书楼查调过三十年代文艺刊物，被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列为“接触防扩散材料”的“危险人物”，扣上“搜集、整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的“反革命阴谋小集团”的帽子，进行残酷镇压。39人中有37人被关进学习班遭批斗，其中1人被迫害致死，3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3人作敌性内处，另1人的家属被迫害自杀身亡。

这种打击迫害，还扩大到无辜的基层群众。1969年3月，市“清档组”听到市公、检、法军管会“清档组”的汇报说东方红照相馆（即王开照相馆）有人翻拍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照片和底片，有扩散可能。刘和德马上向“市革会”汇报，王少庸、王承龙下令“要刹车”，王维国批：“应作一个政治案件查清。”刘和德等立即派“清档组”一些人带了20余名工宣队员进驻东方红照相馆，责令停业，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政治审查，并抄了一些职工的家。其中1人遭拘捕，被隔离审查。同时，他们还组织力量到全市各照相馆进行检查，将“凡不符合规定的照相全部抽出，整理上报”。

江青、张春桥一伙人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不择手段迫害知情者，任意地破坏和销毁有关档案材料，他们却反过来又以所谓“上海毁档销毁情况严重”的莫须有的罪名，诬告潘汉年、杨帆、罗文等领导同志“破坏档案，包庇坏人”，是“罪魁祸首”，提出要组织专案追查。1967年12月30日，市“清档组”还专门写了《关于上海市毁档情况及其追查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人，主张把曾任上海政法系统领导工作的杨尚、杨凯、李士英、黄赤波、王鉴，市委秘书长李家齐，市档案局局长罗文、徐禹民等120余名同志，建立专案隔离审查或拘留审查，对所谓“破坏毁档”的事件进行追查。从1968年10月起，

陆续建立了一批专案，在全市的89个单位中提出150起所谓“破坏档案事故”，王洪文、王维国、王少庸等人都批了“追查清楚，严肃处理”的意见，致使这些同志遭到严重迫害。

“文革”中的这场“防扩散”，几乎搞得人人自危，谈虎色变。许多干部、群众，无端被扣上“扩散”的罪名，含冤入狱，受尽磨难，有的甚至被搞得家破人亡。

二十三、“一打三反”和清查 “五·一六”运动

“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紧接着“清理阶级队伍”发动的。江青、张春桥等乘机把反对过他们的人都诬之为“现行反革命”。作为运动要打击的重点对象，这就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迫害了干部和群众。

（一）把“一打三反”运动着重点放在抓“现行反革命”

所谓“一打三反”，就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1970年1月底2月初，中共中央连续发下3个有关文件，上海据此成立了“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由王洪文总抓，全市各系统先后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近4年，通过所谓“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在上海揪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所谓“阶级敌人”。但张春桥一伙认为揪出的以历史反革命居多数，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击得还不力，有必要再一次集中力量进行打击。“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四人帮”在上海的羽翼们，动员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大造声势，层层发动，议敌情，排线索，排

出一批又一批的“重点对象”。凡是排不出“重点对象”或“重点对象”不多的单位，统统被斥之为有“右倾轻敌麻痹思想”，派了工作组去“升温”、“点火”。

虽然有张春桥、王洪文一伙人的鼓噪，但上海市的“一打三反”运动仍然起步艰难。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伙人总是利用各种运动来陷害和打击反对他们的人，广大干部和群众身受其害。因此，“一打三反”开始后人们对之存有戒心。1970年2月底工业系统对9个局的35个试点单位分析，就有16个单位的运动推而不动或者工作一般化。如第二机床厂有职工1300多人，半个月内只贴出大字报8张，厂内的“一打三反”了无声息。还有些单位的群众公开表示不满，上海第二医学院运动开展后，一些学生不满地说：“在学生中揪现行反革命分子，不符合《十六条》精神，违背了大方向。”

由于运动推不开，特别是揪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多，于是张春桥一伙亲自上阵督促。1970年6月29日，在一次研究“一打三反”问题的会议上，张春桥听说运动中揪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多，多数是男女关系问题，大为光火，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对公安局可有意见了，有些案子一到他们那里就完了！”对什么人该定“反革命”，标准是什么，他大发谬论。张春桥说：“周信芳根据什么定人民内部矛盾？我就定他是死不改悔的反革

命！”“这种人不在判不判刑，要看效果，这些人社会效果就是反革命，他可能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但他就是反革命，他写反动文章和戏，他是用演戏来反对革命的吆！”张春桥在会上强调“要警惕右的苗子”。在张春桥一伙人的压力下，一些单位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如办“封闭式学习班”等，大搞逼供信，扩大打击范围。

“一打三反”运动，涉及到的方面多、内容广，究竟有多少群众在运动中受到迫害，缺乏全面的统计数字，但从部分单位的统计资料来看，运动的打击面是相当大的。郊县10个县，“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干部、群众6.4万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520人。在市区，每个区在“一打三反”中揪斗的所谓“重点对象”，都在数千人以上，有的高达万余人。闸北区在运动中揪斗了5700余人，其中属“政治问题”的360余人，属“经济问题”的5400余人。徐汇区在运动中揪出有所谓“政治问题”的570余人，“经济问题”的5500余人。各大专院校，各局也都程度不同的迫害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一打三反”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在高压手段下，搞出了一起又一起的所谓“反革命案件”，绝大多数是在张春桥、王洪文一伙人的策动下，由一些专案组炮制出来的冤假错案。如上海县农业良种繁育场，在专案人员逼供、逼供的压力下，挖出一个以“右派分子”为首的所谓“现行反革命集团”，无中生

有地诬蔑这个所谓的集团有一整套的“反革命理论”、“纲领”、“计划”，“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制度”，“阴谋策划叛国投敌”等等。上海县公、检、法军管组为此专门建立了专案组，“审查”结果，提出拟判死刑二人，判20年徒刑一人，上报市公、检、法军管会。经市里审批，改判死刑为徒刑20年。这完全是一起假案，粉碎“四人帮”后都彻底平反。奉贤县在“一打三反”中，县“一打三反调查组”把五金公司下属火炬煤球店的一个职工列为“怀疑对象”，办了“学习班”。在严重逼供的情况下，其人作了假供，说自己同煤球厂的负责人（党员，转业军人）“合伙贪污煤款”和“收听苏修电台广播”。“调查组”不作任何调查，又办了该负责人的“留宿学习班”，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进行百余次的批斗逼供，最后被迫害致死，搞得家破人亡。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严重违反党的政策，打击迫害了许多无辜群众。一些专案组，为了把“案子”搞得耸人听闻，动不动就扣上“小集团”、“地下组织”等政治帽子。只要一件事涉及到几个人，就被列入“小集团”，于是，什么“颠覆新生政权小集团”、“赌博小集团”、“流氓阿飞小集团”，罪名层出不穷。至于“地下组织”更是名目繁多，无奇不有，什么“地下图书馆”、“地下音乐会”、“地下照相馆”、“地下婚姻介绍所”等等。一些青年，业余时间聚在一起，看看书，听听音乐，或介绍介

相对象，就被打成搞“地下组织”，搞得人人自危，生怕什么时候一顶“政治帽子”会自天而降，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但“一打三反”运动也遇到一些“老造反”头头的问题。这些人篡夺了领导岗位以后，胡作非为，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群众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打三反”运动中，群众激于义愤，揭发了这些人的罪行。如上海第八棉纺织厂，群众揭发厂“革委会”4个常委、造反派头头都有严重的经济、生活等问题。张春桥、王洪文一伙，原想借“一打三反”运动之机，进一步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但随着运动的深入，这把“火”却烧到自己营垒中来了。许多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被群众揭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为了保护这些造反派头头过关，他们紧急“刹车”。1972年10月，张春桥在听取市专案办公室汇报“一打三反”运动情况的会议上说：“‘一打三反’，其他省市都不这样提了，我们上海什么时候可宣布告一段落了吧？”这以后，“一打三反”就不那么着重提了，尤其是在经济上反贪污浪费问题基本上不提了。至于抓所谓“现行反革命”则与清查“五·一六”运动结合在一起搞。

（二）借口清查“五·一六”进一步迫害反对过张春桥一伙的人

“五·一六”分子来源于北京一度存在过的“首都五·一六兵团”。他们在1967年6月至8月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和张贴

诬蔑攻击周恩来的反动传单，引起了群众的义愤。1967年9月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江青、张春桥等人原来早就反对周恩来来了，这时却摇身一变，也起劲地要抓“五·一六”分子。在上海，根本不存在“五·一六”的组织。（后来的事实证明搞了几年“清查”也未查出北京的“五·一六兵团”在上海发展组织）。他们打着“清查‘五·一六’”的旗号，实际上是对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蓄意报复，大肆打击迫害。1968年2月6日，王少庸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上讲：“造江青××谣就是现行反革命，攻击‘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作反革命。”这样，凡是参加过“1·28”和“4·12”炮打张春桥的人，首当其冲，被作为打击的重点对象。王洪文在布置清查“五·一六”的会议上提出清查的重点是：“一查‘1·28’、‘4·12’炮打，二查‘共向东’^①，三查‘批文艺黑线联络站’，四查藏书楼^②。”王洪文说：“没有‘五·一六’，清查出‘五一七’、‘五一八’也是好的。”当时他们都摆出一副狰狞嘴脸，如张春桥凶狠地说：“要打击、杀人”；

① “共向东”：1967年，当时在“市革会”政宣组工作的朱根富、胡志宏、同瑞恩、吴教军等同志，以“共向东”名义，书写张贴并散发反对江青、张春桥的大字报和传单，受到残酷镇压和迫害。具体情节本章后面有详细记述。

② 指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该处一些人因接触江青三十年代的有关历史资料而受迫害，是“文革”中的一件冤案。具体情节在《清档与防扩散》中已作过介绍，本章将再作补充记述。

“上海‘五·一六’总是有的，我相信这条。”徐景贤更明确的说：“对有恶毒攻击的不能吹掉，有搜集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的也不能吹掉。上海查‘4·12’（炮打），目的是查‘五·一六’，‘4·12’的根子是‘五·一六’，是一致的。”

“市委五·一六专案办公室”（对外称第二专案办公室）按张春桥、王洪文的意图，除了把“1·28炮打”、“4·12炮打”事件列为清查重点外，又增加了“联司”、“中革会”、“共向东”、“反复辟学会”、“狂代会”等作为清查的重点，把参加这些组织的人都列为“五·一六”清查对象。

“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大批反对过江青、张春桥的干部、群众，遭到严重迫害。据1971年10月统计，全市列为“五·一六”清查对象的达1300余人。下面，是当时发生在全市影响较大的一些事件和冤案情况。

1、残酷镇压“共向东”。

1967年11月份张春桥一伙在上海制造了轰动全市的“共向东事件”。在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直接发动和指挥下，从1967年底到1973年春，包括“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3次掀起全市批“共向东”高潮，4次建立所谓“专案组”，直接打击迫害反对“四人帮”的干部、群众多达500余人。

1967年6月上旬开始，当时在“市革会”政宣组工作的朱

根富、胡志宏、闻晓思、吴教宏等人，因对江青、张春桥等一伙的所做所为不满，反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以造反派替代党组织等做法，在宣传系统多次召开“党员座谈会”、“党员学习会”、“形势分析会”，进行串联活动。7月1日，为纪念党的生日，朱根富等4人起草了《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传单，驳斥了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损害党的论调，号召共产党员“百倍的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意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传单署名“共向东”（意即共产党员心向毛泽东）。从7月到11月，朱根富等4人以“共向东”名义，印发了8种传单，提出应立即解散“文攻武卫”队伍，对干部不能“一概打倒”等主张。同时还召开了40余次大小会议，宣传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出版、文化和电影系统。

朱根富等人的主张，同张春桥造反夺权、改朝换代的阴谋活动尖锐对立，他们的活动情况传到了张春桥的耳朵里，触到了张春桥的痛处。1967年11月21日晚，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朱根富，说“宣传部内有人开会，是否知道？张春桥要了解。”朱即整理了一份材料送张春桥。材料送出后第3天，11月24日晚，宣传部造反队即开会要朱根富等交代“共向东”活动情况。会后朱根富等同志被关押到红旗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内接受“审查批判”，当晚遭到了毒打。

11月30日，经张春桥同意，“共向东”问题调查小组正式

成立，对朱根富等人的刑讯逼供开始了。从1967年12月到1968年4月间，张春桥在讲话和批示中4次提到“共向东”问题。他说：“看来这个组织适应了、代表了保守派的要求”；“是否有人操纵，要清查”；“他们的全部观点，他们的主要政治方向，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方向，是保守的观点，是代表保守势力的”。说：“共向东主要是一种思潮，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为“共向东”定了性。1968年4月4日，张春桥在全市“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讲话，再一次“升温”，他污蔑“共向东”是“共向西”，是“阶级敌人”。6月10日徐景贤说“不能停止对‘共向东’反动思潮的批判和幕后操纵者的追查。”

张春桥、徐景贤讲话后，对朱根富等人的迫害升级了。大小会批斗逼供，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许多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当场昏迷。上海美术出版社的赵福昌被打伤后，又被装进麻袋里，扬言要丢到黄浦江里去，又拉到野外搞“假枪毙”。有两个女同志，一个被折磨得流产，另一个被打得腰部以下全部血肿，还恶毒地叫她喝冷水。此案上撤下扫，牵连到本市和外省市许多单位，从地方追到军队，从本人追到亲朋好友，许多干部被打成“共向东分子”、“共向东同情分子”、“共向东的黑后台”、“共向东的黑高参”、“不是共向东的共向东”等等。

1971年6月又借清查“五·一大”的机会，由王洪文出面，

说“共向东”是上海10个“反革命大案”之一，下令继续追查。由“市革会”文教组直接领导，再一次成立“共向东”专案组，对朱根富等继续进行迫害，要将“共向东”往死里整。搞了一年多，搞不出新材料来，1973年7月，专案组写了一份结案报告，报告称“‘共向东’散布不满情绪，对抗和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文攻武卫’口号进行诬蔑和歪曲”，说朱根富等“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纠集保守势力，企图搞反夺权”等。报告经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审查，批准同意由有关单位作出“适当处理”。结果，朱根富、胡志宏受到“严重错误”结论和党内警告处分。直到这时，他们还认为整得不过瘾，王洪文对徐海诗说：“共向东的问题，水落而没有石出”，还准备以后再开刀。

2、诬陷上海音乐学院是“炮打的大本营”。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音乐学院不少教职员对江青、张春桥表示不满，抵制过他们搞的所谓“革命样板戏音乐”，被扣上了“炮打”的帽子，音乐学院被张春桥称为“炮打的大本营”，使一批干部、群众遭受严重迫害。

1968年2月至7月间，上海音乐学院的李江、戚永林等人对江青搞的“钢琴伴奏《红灯记》”有意见，对张春桥、江青调于会泳去北京搞样板戏音乐有看法，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并在行动上也有所抵制，因而触怒了江青反革命集团。1968年8

月，张春桥、徐景贤直接插手音乐学院。8月5日，张春桥发表讲话，说音乐学院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被摧毁！而且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两年来一直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张春桥定调后，李江、戚永林等人立即被隔离审查，后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大批干部、群众被诬为参与这个“小集团”搞“炮打”，受到了政治迫害。当时以查清与“小集团”有牵连的“根根派”为名，曾一度把全院700多名师生员工，关在学校不准回家。

“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后，张春桥等再算旧帐。1970年1月13日、14日，张春桥对音乐学院的运动下指示说：“音乐学院本身就是炮打的大本营，是革命样板戏的对立面”，“你们可以准备些材料，抓几个，枪毙几个才能震动。”“文化系统清队都那么宽能行吗？该杀的杀，该关的关。”徐景贤说：“‘五·一六’活动已经到上海来啦，前一段时间你们就是查不下去，你们这里的‘五·一六’骨干一定要查，一定要查清。”

张春桥、徐景贤讲话后，他们及其党羽对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员工的镇压达到“文革”以来的最高点。1970年1月15日，张昆平作为音乐学院第一个被揪出来的“五·一六”分子；接着，一批干部、师生被隔离审查。隔离对象被关在地下室，四周没有窗户，阴暗潮湿，高音喇叭整天对着他们乱叫，并且经

常在晚上“提审”，逼供、诱供，搞得一刻不得安宁，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之中。有的同志被整得精神失常，反说他“装疯卖傻”、“无理取闹”，捆脚手脚，以示惩罚。

当时受到不同程度打击、审查、被扣上“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派”、“反革命小集团骨干”、“第二套黑班底成员”等各种政治帽子的达到 110 余人，占全院总人数的 15.8%，其中被迫害致死 3 人，被逼致疯 3 人，一度精神失常 4 人，有许多同志摧残后留有后遗症。

3、查封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为了篡党夺权，掩盖江青和他在三十年代时丑恶历史的面目，曾指使他们在上海的羽翼查封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张春桥进一步打击和迫害上海图书馆的干部、群众，以达到其整人和“封口”的目的。1970 年 1 月，在“市革会”一办召开的会议上，徐景贤根据张春桥定下的调子，说“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上海图书馆曾提供三十年代资料，就是提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还说：“上海图书馆和外单位的‘五·一六’分子有勾结。”不久，徐景贤亲自召集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追查上海图书馆的所谓“炮打”问题，并确定由徐海涛带队到上海图书馆坐镇，进一步搞政治迫害。

徐海涛等人一到上海图书馆，即大搞逼供信。1970 年 2 月 9 日在那里召开了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动员大会。会后即找所谓的对象谈话，随后即陆续宣布对一批干部和群众进行抄家，办学习班，直至隔离审查、拘捕。如该馆编目部主任葛正蕙因对别人讲过：“‘狄克’就是张春桥”，并为外来人员提供过“文艺资料”，“动员大会”后即被抄家、隔离审查，2 月 26 日遭到拘捕，一关就是 5 年，直到 1975 年 4 月才放出来。原保管部工作人员袁嘉锡，因讲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张春桥罪证”等话，“动员大会”后办了学习班，4 月 23 日进行隔离审查，同年 11 月 11 日由公安部门拘留，关押 3 年之久，被逼得精神失常，到 1973 年 3 月释放时仍定为“敌性内处”。

清查“五·一六”开始后，“上图”的干部、群众又遭了殃。1971 年 4 月，王洪文在一次全市性的所谓抓“五·一六”的经验交流大会上，把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所谓“炮打”问题，列为全市 10 大案件之一，下令要重点清查。王秀珍杀气腾腾地说：“‘五·一六’分子在藏书楼搞了那么多材料，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徐海涛在“市革会”一办召开会议，批评当时驻图书馆的“工、军宣队”不得力，决定增派 20 多名工、军宣队队员，加强“上图”的专案力量。4 月 28 日，在文化系统召开的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上，传达了王洪文、王秀珍的话。6 月，举办了徐家汇藏书楼学习班，把凡是在藏书楼工作

过的人员，包括“文革”初期在藏书楼参加过“抓叛徒小组”工作过的人，都关进学习班中，清查所谓“炮打”问题，搞了三、四个月，迫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

4. 对所谓“胡守钧小集团”大施淫威。

“一打三反”运动中，“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在复旦大学一手炮制了骇人听闻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对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师生进行残酷迫害。

这个所谓“小集团”中的主要成员胡守钧、周谷声等，都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组织了“孙悟空”、“反叛队”等红卫兵造反组织，首先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在“工总司”的筹建和成立时，他们曾出过力，因此当时他们自己认为也被人认为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但在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却受到了冷遇。他们对张春桥很不满意，认为张春桥有问题，又是旧市委当权派，可以“炮打”。他们成为“1·28炮打”的主要组织者。“炮打”失败，他们受到批斗。1968年“清队”中，胡守钧、周谷声被隔离审查，进一步遭到批斗迫害。“4·12”第二次炮打中，周谷声在“炮司”一些人的帮助下，逃出隔离室，去北京准备告张春桥的状。1968年9月初，复旦大学数千名师生的宿舍和住家被逐个查抄，胡守钧等人的笔记本和信件被洗劫一空。

1970年2月3日，“一打三反”运动刚开始，徐景贤、王秀

珍、徐海涛把复旦大学“工军宣队”的负责人找去开会。会上，他们宣布：“复旦（大学）是‘市革会’的‘一打三反’的点，由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直接抓，由办徐海涛协助。”同时，当场点出了胡守钧、周谷声、邱勋歌等十几个人的名，说这些人组成了“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要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王秀珍还说，他们搞这个案子，归“春桥××直接指挥”。2月8日开始，胡守钧、周谷声、邱勋歌等先后被隔离审查。2月9日，传来了张春桥的话：“猴子（指胡守钧等人组成的“孙悟空战斗队”）的问题，六指导员（指复旦大学六名学生指导员，当时亦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问题，……要一个一个抓。”这时，有一批被他们认为是“胡守钧小集团”的学生已毕业，分配在外地，都一个个弄了回来，王秀珍亲自写信给兰考县委，把去那里的红鸥和海鹰（这两名是女中学生）揪回上海。这些人被揪回来时，有的戴了手铐，有的则是五花大绑。受隔离审查的人最多时达到40多人。

徐景贤、朱永嘉等人从胡守钧、周谷声处抄来的笔记、信件中，摘取片言只语，断章取义，煞费心计地加批语，搞注解，炮制了《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材料》的“小册子”。徐景贤诬陷他们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集团”，并说“胡守钧的罪行够得上杀头”。这本“小册子”经张春桥看后同意，印刷了近20万册，向全市和

全国许多单位散发。他们在江湾体育场两次召开万人大会，对胡等人进行批斗。这两次会，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都参加了。张春桥听了大会录音。

在张春桥等人的残酷迫害下，“首犯”胡守钧被关押5年后，判刑10年；“主犯”周谷声、邱励耿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其他所谓“小集团骨干”、“小集团成员”分别被送去劳动教养，或作“致性内外”、留校教育改造，或作“犯有严重错误”等处理。他们的亲友受到株连，有的还弄得精神失常。据不完全统计，本市和外省市因为与所谓的“胡守钧小集团”有幸连而受到政治迫害的在100人以上。

5. 狱擒故纵，大盖艾玲等人。

《文汇报》社是“4·12炮打”的主要单位，艾玲和朱锡琪等是发动“炮打”的主要人物。他们原来是参与或支持过“造反夺权”的，但当他们胆敢反对张春桥，张照样要给他们点颜色看。张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当初信誓旦旦，保证对艾玲和朱锡琪等不采取报复行动，“不记帐”，实际上这是他耍的“欲擒故纵”的手法，最后是新帐老帐一起算。

艾玲（原《文汇报》编委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文革”中任《文汇报》“革委会”主任，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在“4·12炮打”事件后写了一份检查，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找艾谈话，说她的检查“认真、合乎事实”，要她“汲取教训”，仍让她在北京工作，以后又让她当了“九大”代表、“市革会”常委，上海市第四届党代表大会代表。从表面上看，张春桥真是“宽宏大量”。可是待清查“五·一六”运动一开始，立即将艾玲隔离审查。借口是审查艾同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关系以及同北京“五·一六”的关系，实际是搞她参与“4·12”炮打的问题。对艾的专案搞得非常神秘，控制很严，由王洪文亲自抓，艾写的材料要先送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看后，才转专案组。艾经过4年多审查，查不出什么名堂，主要就是“炮打”张春桥的问题，到1975年7月14日，市委才批：“先放出来，结论慢一步作”。长期拖延不予“解放”。对艾的审查，还牵连了当时在解放军总参二部工作的她的丈夫。1974年2月8日，王洪文跑到“总参”端风点火，他对“总参”负责同志说艾玲有反动言论与行动，同她的丈夫有关系，应该发动群众揭发。同年3月28日，她的丈夫也被隔离审查。

《文汇报》社参加“炮打”的朱锡琪，多次挨整。1970年2月“一打三反”运动中，对“4·12”事件重新进行审查，又把朱锡琪隔离起来。结果查不出新的问题，于12月解除隔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春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后，王洪文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不指名地点出：“4·12”有一个“大坏蛋”（大意）。朱锡琪听到传达后，认为指的是他，想这次非逮捕判刑不可了，即于3月12日逃到浙江省海盐县海塘公社去

隔离，但 23 日被捉回，又被隔离审查。搞到 1972 年 10 月，因查不出新的问题，办案人员提出将朱锡琪解除隔离，放到干校劳动。张春桥下断语说：“朱锡琪倒有点象‘五·一六’，不要解除隔离。”结果又审查近一年，还是搞不出问题，到 1973 年 8 月才解除隔离。

看，这就是张春桥的所谓对艾玲、朱锡琪等“不记帐”、“不整人”的真相。

二十四、从“文攻武卫”到市民兵指挥部

“文革”中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及其前身“文攻武卫”指挥部，是由张春桥、王洪文一手扶植起来用以掌握“枪杆子”的，并且阴谋利用它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革”初期，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一次会议上说过，他就是靠“工总司”和“文攻武卫”这两支队伍来稳定上海局势的。张春桥一伙在上海搞篡党夺权以及“四人帮”最后覆灭时上海党羽们发动的武装叛乱活动中，“文攻武卫”、民兵指挥部起过极其恶劣的作用。

(一) “文攻武卫”怪胎的诞生及其演变

1967 年 7 月 22 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团时提出了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自从“一月风暴”篡夺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后，深感自己手中必须掌握“枪杆子”、“刀把子”，才能支撑统治的局面。而人民解放军是他们不能任意指挥的。因此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正合他们心意，他们马上借口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有成立“武卫”组织的要求，在 1967 年 7 月底提出了逐步建立起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武装组织的设想。

1967 年 8 月 4 日，张春桥、王洪文等血腥镇压“联司”后，8 月 7 日，姚文元即打电话给王洪文等人说：“春桥和我两人共

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文攻武卫”统一指挥部。”张春桥在一次唯“联司”的汇报会上也说：“听了‘8·4’的情况，给我一个新的启发，就是革命不能没有武装，‘8·4’是怎样组织武装的一次演习”。他说这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现有新政权的大事”。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旨意，王洪文和徐景贤搞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其中特别强调“文攻武卫”是“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张春桥批了7条意见，提出要“把造反派组织起来，按班、排、连、营、团、师组织好”，“武装5万、10万、15万人”。8月26日，“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打算》。并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小组，确定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上海港务局、江南造船厂等12个所谓“造反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占优势”的单位进行筹建“文攻武卫”队伍的试点。9月1日，“市革会”正式批准建立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由王洪文的小兄弟“工总司”常委张宝林以及“文革”初期紧跟徐景贤一起造反的原监委干部钟定林执掌指挥部大权。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下辖若干直属师（团），各区设立“文攻武卫”指挥分部。

1967年10月1日，由12个试点单位5100余人组成的一支用步枪、冲锋枪、机枪和高射炮等武器装备起来的“文攻武卫”队伍正式在国庆游行队伍中“亮相”了。张春桥、王洪文

等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检阅”了这支队伍。张春桥得意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为了把“文攻武卫”的领导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周密策划，用尽了心机。其核心问题是改变民兵的军事工作由所在军区人民武装部领导的传统管理体制，不让人民解放军插手。张春桥、王洪文一伙首先否定“文革”前的民兵建设，竭力进行污蔑和攻击，强调“文攻武卫”有别于原来民兵。张春桥说：“（‘文革’前）城市民兵都是官办的，和人（民）武（装）部挂钩，保守的人多”，“没有打过政治仗和经济仗”。王洪文也污蔑道：“民兵工作三落实抓了这么多年，……有的地方名单有，营长、教导员也有，都是纸上的，过去搞的都是形式主义。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王洪文还强调说，“‘文攻武卫’是新生事物，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冲杀出来的’，是对‘民兵的整顿和改造’。提出：‘民兵不要了。‘文攻武卫’搞好了，就可以替代民兵。’当上海警备区不同意他们这样搞法时，张春桥蛮横无理地指责上海警备区领导同志，说：“警备区要明确，不是‘文攻武卫’排斥你们，而是你们警备区不愿意管，从你们廖司令开始”；“有一点我是不動搖的，上海市区还是‘文攻武卫’，再搞民兵，或者另外搞一套，我是不同意的。”强行要上海警备区接受他们自成体系、另搞一套的做法。

以后“文攻武卫”组织不断扩展，在全市各基层单位纷纷

建立了以排、连、营、团、师为编制由造反队员组成的“文攻武卫”队伍，下发了“上海市文攻武卫”的胸章标志，配备了棍子、长矛、麻帽等装备。

1970年5月，为了和全国各地的民兵组织统一名称，张春桥、王洪文等不得不把基层的“文攻武卫”改名为“上海民兵”，但为了有别于过去的城市民兵，市、区两级机构仍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牌子。1970年6月15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特别强调：“‘文攻武卫’还是‘文攻武卫’。名字（改称‘上海民兵’）我们是考虑同全国统一叫民兵，但名字改变，并不涉及到它的内容，还是要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1972年9月，张春桥、王洪文一伙又不经南京军区的批准，擅自将上海警备区直接领导的“野营拉练指挥部”和“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正式改名为“上海市民兵指挥部”。

张春桥、王洪文多次强调：“这支队伍的调动权是属于革命委员会的，不能随便调动。”1968年2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市革会”的名义起草了《调动文攻武卫的权限和命令》。这个《命令》规定，“文攻武卫”队伍的各级组织、各个成员，都必须听从张春桥、姚文元的领导和指挥。动用一兵一卒都要经过“市革会”批准。他们选派心腹亲信，进入“文攻武卫”领导班子，控制指挥大权。“文攻武卫”筹建时，派了钟定栋去主持工作，1967年9月，又派张宝林去当负责人。以后

为了掩人耳目，制造军队参与管理民兵的假象，由紧跟张春桥一伙的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充任了“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实际还是帮派势力紧紧控制着“文攻武卫”各组的领导权。在组建各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班子时，王洪文伙同李彬山、钟定栋从基层挑选了一批造反派头头充当各区指挥部的领导成员。1973年，马天水、王秀珍按照王洪文“总工会去管民兵指挥部”，“培养工人指挥员和工人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旨意，借调整机构为名，进一步把帮派势力渗透到民兵各级组织中去。1973年底，王秀珍对王日初（市委组织组负责人）说：“上海的民兵是工人武装，……你要抓紧送一些工人干部到指挥部去。”于是，周宏宝、施尚英、印玉泉等都窃据总工会常委职务进入了市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核心，一批造反派头头即所谓“工人新干部”也纷纷被安排到各级民兵指挥部担任要职。同时，一些不听他们指挥的军队干部从民兵指挥部系统中被排挤出去了。

张春桥、王洪文为了把郊县民兵组织控制在自己手里，1973年在整顿和恢复郊县民兵组织时，要市民兵指挥部召开郊区各县县委书记、县人民武装部负责人会议，以加强和健全郊县民兵工作为名，下令各县成立民兵领导小组（以后又陆续建立各县民兵指挥部），由市民兵指挥部直接领导，强行把民兵工作从人民武装部管辖中分离出来。

“文攻武卫”初成立时只有几万人。在张春桥、王洪文以及马、徐、王的阴谋策划下，这支队伍从人数到武器装备，不断扩充壮大。到了1976年，在市民兵指挥部指挥下的这支队伍已经扩充到有9个师，602个团，1287个营，18700多个连，约300万人。不仅有步兵，而且有摩托、高炮、水上及防化、通讯、工程等各个专业兵种。拥有各种枪支20.6万余件，火炮1900余门，火箭筒2600具，各种车辆500余辆，以及耗资100多万元建造起来的“上海民兵101艇”。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

（二）擅自赋予“文攻武卫”、民兵指挥部以专政机关的权力

“文革”初期，张春桥一伙为了控制上海局势，曾借助专搞打砸抢的造反组织“上体司”，成立治安组，作为他们镇压群众、为“帮天下”看家护院的“打手”。但“上体司”胡作非为，名声越来越臭。“文攻武卫”建立后，这支力量就代替了“上体司”，成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御用部队，而且更加人多势众。但是，他们并不满足“文攻武卫”仅仅起着“上体司”这帮“打手”的作用，他们还要赋予“文攻武卫”更大的权力，以维护他们法西斯专政统治。1968年1月2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就为“文攻武卫”鼓吹：“现在‘文攻武卫’指挥部实际上起着专政（机关）作用。”3月27日，他又说：“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权威，从（1967年）11月份我们一抓阶级斗争，

比如查封各个省市（驻沪）办事处……就树立起来了。”王洪文也说，“现在社会治安由‘文攻武卫’出面处理比较主动。”他们赋予“文攻武卫”种种权力，要“文攻武卫”把社会治安“管起来”，把公安工作“统起来”。从1968年起，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以抓所谓“社会阶级斗争”的名义，打着民兵、公安“统一行动”的幌子，由“文攻武卫”指挥部介入执法工作。张春桥、王洪文等无视宪法有关规定和法律程序，擅自批准给“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指挥部抓人、关人、办案等特权。1974年底，上海市高级法院召开“审判工作会议”，会上市民兵指挥部头头周宏宝提出：“关于民兵办的案子的法律手续，可以有3种做法：（1）凡需要逮捕判刑的，转公安机关审理，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判决。（2）不转公安机关，民兵自己审理，直接向法院起诉。（3）由民兵提出判刑意见，党委批准，法院办手续。目前3种做法都可试行。”周讲话后，王少庸接着说：“周宏宝是市委分管公安、法院、民兵方面工作的领导，他的讲话代表市委，你们都要认真贯彻执行”。这就为民兵擅自抓人、办案开了“绿灯”。于是，民兵指挥部成了“执法机构”了，而法院成了办办手续一种形式。

为了攫取更多的权力，王洪文又“发明创造”了所谓的“三位一体”。1970年6月7日，王洪文在同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党委成员谈话时说：“民兵、治保、消防员，三位一体，一个

“部门管”，首次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口号，并在该厂进行试点。以后王洪文在各种会议上多次贩卖“三位一体”，为它吹捧叫好。1970年9月8日，王洪文在纪念毛主席发表“大办民兵师”指示12周年大会上说：“公、检、法抓治保、消防，民兵指挥部抓民兵，这怎么行呢？造成民兵不管治保，治保不抓民兵，这不好。民兵要把治保、消防担负起来，不要再另外组织了。”1972年3月29日，他在上海民兵第2次“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上又宣扬说：“在单位里要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如消防、对四类分子监督、平时保卫安全工作等，民兵都应担负起来作用。”王洪文历来吹嘘上海民兵是他搞起来的，他是这第二武装的总司令，他企图通过“三位一体”的贯彻推广，进一步抬高民兵指挥部也即提高他自己的权势。但由于广大公安干警、基层单位治保干部的抵制，直到1973年，在全市有民兵建制的3千多家工厂企业中，勉强凑合起“三位一体”的不到10%。

王洪文为此大为恼火。他气急败坏地对党羽们表示：“‘三位一体’是上海首先提出来的，全国都在学上海，（经验）总结不出来，交待不过去。”于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纷纷出马，以市委名义接二连三地召开各种会议，一再鼓吹基层单位实行“三位一体”是民兵建设上的一场“革命”，是改造民兵和加强民兵建设的需要，强行下令推广。他们规定各工厂、大学

的保卫工作由实行“三位一体”后建立的武保组接管，并一律由民兵指挥部负责指导；民兵组织的负责人是武保组的当然负责人；武保组长的任免一律要通过民兵指挥部的批准等等。武保组名义上是武装（民兵）和保卫机构合在一起，实际的指挥权落到了民兵指挥部的手中。

1971年初，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虽然不能避免在“左”的方针指导下抓“阶级斗争”为纲，但重新确定了公安、司法等专政机关的作用，明确规定：非专政机关不准抓人、关人。这对张春桥、王洪文一伙利用民兵镇压广大群众起了制约作用。王洪文对此极为不满，他在一次会议上攻击说：“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文件是背著中央搞的，针对上海‘文攻武卫’的，中央也不了解，就批发了”，“说什么民兵不能搞无产阶级专政，如不能搞，要民兵干什么，否则就不叫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了”。王少庸也对钟定栋等人说：“公安部这样笼统的规定还是老框框，思想路线有问题”，“上海‘文攻武卫’搞群众专政是‘市革会’批准的，我们这样做不叫抓人，叫冲击审查，你们不要怕，可以继续搞”。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后，公布了新的宪法。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违反宪法，任意抓人关人的行径表示强烈不满。王秀珍赶忙对施尚英、钟定栋等人打气说：“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是‘新生事物’，不能动摇，民兵就是抓了阶级斗争才有战斗力的。不要一

有风浪来了就自己否定自己。”王洪文并一再下令要公安局将每天发生的大案要件和民兵指挥部通气，将公安部下发的《敌情通报》以及对敌台监听材料等绝密文件报送民兵指挥部。

在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支持和怂恿下，施尚英、钟定株等人更加有恃无恐。钟定株露骨地叫嚣：“民兵要管法、立法、执法，民兵可以处理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公安局有的，我们一定要有；公安局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他们有《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我们有《里弄民兵小分队条例》；他们有劳改农场，我们有劳动学习班；他们有拘留所、留置室，我们有管教站，小病房；他们有档案室，我们有材料室”。强调民兵要“独立工作”，“独立作战”，“独立办案”，“自成体系”。气氛十分嚣张。

（三）大搞打、砸、抢，疯狂迫害干部群众

“文攻武卫”建立以后，乱捕乱抓，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根据粉碎“四人帮”后有关方面的统计，“文革”10年中，“文攻武卫”及其以后的“民兵指挥部”共抓获了10.4万余人。“文攻武卫”迫害群众的重大行动和主要手段，有以下一些：

1、冲砸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驻沪办事机构。

这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冲砸行动。1967年12月初，张春桥在兴国路招待所住处对王承龙、朱玉佩说：“北京专门查抄

各省市驻京办事处，收获很大，把走资派从秘密联络点、防空洞全部赶走。上海也要这样搞。要‘文攻武卫’指挥部制订计划，抓紧准备。”随即，王洪文布置“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张宝林、钟定株等人在原市委办公地点延安西路33号大院内，秘密地聚集队伍进行训练，并派人到实地侦察，画出地形图，制订了冲砸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驻沪办事处的《1125工程方案》，建立了指挥部，由王洪文、王承龙、张宝林、钟定株亲自任指挥。12月7日，指挥部调集了大量的卡车、小轿车，出动了5千余名“文攻武卫”队员和1千多名大专院校红卫兵，分几路冲进各驻沪办事处，开始了一场野蛮的打、砸、抢行动。他们设置岗哨，不许人员进出，以查询为名，勒令办事处工作人员停止办公，将所有物品一律封存。同时将办事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名曰“学习”，实为审查、软禁，最后勒令他们限期离开上海。为了掩饰这种疯狂野蛮的行为，他们利用《工人造反报》大造舆论，把各驻沪办事机构污蔑为“走资派的安乐窝、坏人的避风港”。他们还信口雌黄，造谣惑众，把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早已封存的股票、保险单据、账本、地契等说成是“保存了变天帐”；把封存的报废枪支和渔船使用的武器说成是“私藏武器”；工作电台被诬为“敌特电台”。冲砸行为从1967年12月7日开始，直至1968年3月份才全部结束，先后冲砸了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地驻沪办事处，各省、市

所属县、地、厂矿企业驻沪办事机构等 631 处，这些单位正常的业务活动被迫全部停顿，严重影响了工作和生产，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冲砸中，还强行“收缴”20 多部汽车据为己用。

2、进驻所谓“老大难”单位。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煽动下，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全市有相当一批工厂、学校、科研等单位，因各派造反组织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火并，武斗不断，生产和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所谓“大联合”、“三结合”在那里都长时间搞不成。或一时联合，不久又分裂；或实权被操纵在与王洪文“工总司”对立的派系手里。这些单位被统称为“老大难”单位。有一些单位，一批造反上台掌权的头头们劣性难改，因政治、经济、生活等问题纷纷被群众撵下了台，一些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老干部被批而不倒，使张、姚等人寝食不安，感到威胁，叫嚷“这是右倾翻案风”，是“反夺权”。这些单位也被称作“老大难”单位。他们诬蔑在这些“老大难”单位中，有幕后黑手在捣鬼，幕后黑手就是“走资派”（指老干部）。于是，张春桥、王洪文等指令“文攻武卫”指挥部出面插手这些单位，批斗老干部，镇压各种异己派别，扭转局面。1968 年 8 月 7 日，王洪

文在人民广场召开的“落实中央‘7·3’、‘7·24’布告”^①群众大会上声称要“捅马蜂窝，要揪幕后黑手”。点了大隆机器厂、梅林食品厂、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上海第二十八棉纺织厂、101 厂等 33 个所谓“老大难”单位的名（以后又扩展到 400 多个单位）。随即，“市革会”成立了“落实布告、解决‘老大难’办公室”（后来改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由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了 300 多个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进驻这些单位。进驻后，他们拉一派、打一派，煽动群众“掀盖子”、“揭矛盾”，大搞批判会、游斗会，把这些单位搞得更加混乱。在所谓解决“老大难”的过程中，“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虽然不得不把那些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造反派头头撤掉了一些，但他们真正要打击的对象是那些受到群众拥护、不依附帮派势力的老干部。这些同志被诬为“幕后黑手”、“挑动群众斗群众”，再一次受到批斗、冲击和靠边审查。

3、“刮红色台风”。

所谓“刮红色台风”，即是由文攻武卫指挥部出动大批人员，在全市范围内的各个工厂、街道里弄开展大冲击、大清查。“冲

^① “7·3”、“7·24”布告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 1968 年 7 月 3 日和 1968 年 7 月 24 日发出的两个布告。布告针对广西和陕西两省发生的武斗事件，作出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运输，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等项决定；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冲击监狱、监禁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依法予以惩办。

“打击对象”名义上指的是“流氓阿飞”、“小偷”、“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一些造反派头头挟嫌报复的；或是毫无事实根据捕风捉影的；或是故意夸大问题的。在这些行动中，“文攻武卫”任意抓人、关人，以办“学习班”、“冲击审查”、“留置”等方式，非法行使拘留、逮捕、审讯之权。每年的几大节日，这样的“红色台风”都要刮几阵。为了给这种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径披上“合法”外衣，王洪文说：“‘文攻武卫’搞冲击，应该搞个证件，可以避免混乱。”为此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印制了大量的“查询证”，抓人时亮出所谓的“查询证”，使非法行为“合法”化。“文攻武卫”指挥部还私设了“审理组”、自行审理“犯人”，“审理”后不通过公安部门，直接要法院按他们的审理结果对“犯人”判刑。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把这种荼毒生灵、草菅人命的行为，吹捧为“打击阶级敌人的好形式”、“民兵改造过程中的新生事物”。“文攻武卫”指挥部还私自设立了许多关押人的地方。除了市、区两级指挥部有专门的“监房”（全市计有 11 处）外，许多工厂单位的仓库、地下室、防空洞都成了关押人的“牢房”。此外一些巧立名目的学习班也成了变相的拘留所。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民民兵系统每天关押“人犯”达三四千人之多。1970 年以后，民兵在抓人、关人等方面又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形式和方法越来越多。发展到民兵团部、“三位一体”武保组，可

以随意抓人，甚至连进驻里弄只有五六个民兵的民兵小分队都可以任意抓人。关人的“监房”、“拘留所”、“留置室”也越设越多。正是这种所谓“刮红色台风”，在大冲击、大清查中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镇压迫害了大批群众。

4、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抓“阶级斗争”。

1970 年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文攻武卫简报》上登载了一篇关于上海焦化厂在所谓抓“社会阶级斗争”中，派出民兵进驻工厂附近街道里弄的情况。王洪文看到后，认为“上海民兵”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扩大权势，进一步插手社会治安工作。立即批示说这是“新鲜经验”，下令总结推广。1971年上半年，解放日报《增刊简报》上又发表了上海电梯厂组织民兵小分队进驻杨浦区眉州路街道里弄的所谓“经验”，王洪文又马上批转，要“市革会”把这个所谓“民兵改造中的新鲜经验”在全市企事业单位中推广。马、徐、王接到指示，积极贯彻执行。1972年上半年，马天水布置“市革会”办公室派人了解民兵小分队下里弄情况，王秀珍在一次会议上则鼓吹什么：“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要意义，如果没有民兵小分队进驻，就要大乱。”1976年6月，马天水亲自到静安区愚园街道召开民兵小分队座谈会，提出要“总结工人阶级长期占领上层建筑，占领里弄阵地的经验”。在这伙人的卖力宣传下，进驻里弄的民兵小分队发展迅速。到了 1976 年，全市 111 个街

道都设立了民兵小分队办公室，全市 1124 个里委都派驻了民兵小分队。市民兵指挥部规定民兵小分队办公室负责地区治安保卫工作，由区指挥部垂直领导。

6、办“劳动学习班”。

1970 年以来，“文攻武卫”指挥部在多次所谓“刮红色台风”中，抓、关了大批无辜的或仅有般性错误的青少年，少教所、拘留所里人满为患。王洪文、王少康等人便提出在一部分工厂里设立劳动学习班，把关押的青少年放到工厂里，由民兵管教。胡说什么“把一些犯罪严重、又不够判刑条件的人放到工厂单位去，采取‘几个好人夹一个坏人’的办法，边教育、边劳动、边审查，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这些劳动学习班名为劳动、教育、集训学习，实为宪档的拘留所。白天强迫管教对象干重体力劳动，晚上集体关押、武装看管。这些青少年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和权利。王洪文等利用民兵搞这种所谓“劳动学习班”，又自吹自擂是什么“新鲜经验”，是“用马列主义占领法律阵地，民兵参与社会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在全市一部分工矿企业里，先后开辟了六七十个劳动教育集训学习班的点，看管、关押了一大批青少年。

1973 年 11 月，王洪文又提出：“把判刑 15 年以下的犯人放到工厂改造”，“要闯出一条新路子”。市公安局薛干青和市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接到“指示”，立即从关在上海市监狱内被判刑 15

年以下的罪犯中，选择了 80 名男犯，90 名女犯分别放到沪东造船厂和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进行所谓“劳动改造”的试点。这些犯人在这两个单位中分别被放到各个车间和班组，由工厂的一些干部和民兵组成的管教队管教。1975 年，马天水布置“市革会”办公室对“试点”进行总结，说“这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依靠广大民兵、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是群众专政的好经验”等等，提出“要进一步扩大试点”，陆续又将一部分罪犯下放到工厂。1976 年 1 月 30 日，马天水、王秀珍等人以“市革会”的名义，向中央、国务院写了《关于上海把部分判刑罪犯放到工厂进行改造的试点情况报告》，企图把这种做法推向全国。

6、在郊县搞“民兵抓阶级斗争”的试点。

1973 年 9 月，马天水、王秀珍等人按照王洪文关于民兵工作要“农村学城市”的旨意，钟定栋带人到上海县新泾地区搞“郊县民兵抓阶级斗争”试点。钟定栋一到该地区就大造舆论说：“我们这个‘点’是带了中央王洪文的指示来搞的”、“新泾这个点向市委报告过，是马老、秀珍批准的”，“我们的民兵建设能不能搞好，这是关系到领导同志（指‘四人帮’）能不能在中央站住脚的大问题”。说这个点“是全国农村中唯一的试点，要为全国作出贡献。”并伙同上海县主要负责人宣布：“郊县民兵要负起抓阶级斗争的责任来，在各公社和各城镇均要建立民兵团

部，公开挂牌。民兵团都有 3 天（扣押人）留置权。”在所谓试点中，他们赶制了大批木棍、长矛和麻帽，还在新泾地区许多厂房和地下室里，设置了关人用的“小班房”，建立起郊县农村第一个民兵团部。10月1日，他们出动了 290 名民兵，进行大冲击，乱捕乱抓，在地区召开了 5 千人的批斗会，显示“威风”。市民兵指挥部为了配合行动，壮大声势，送来了大量长矛，并调集一批摩托车，在大街小巷里武装巡逻。以后，民兵团部陆续派出民兵小分队，进驻到新泾地区所属的 22 个企业、学校、里弄以及生产大队，插手各个方面，揪斗群众，胡乱抓人。他们还在新泾地区召开现场会，将新泾“经验”推广全县。上海县先后成立了 23 个民兵团部，设立了 24 个“小班房”以及 3 个变相关人的劳动学习班，在全县刮起了一股冲击抓人风。据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县人民武装部揭发，从 1973 年底至 1976 年 10 月，全县共抓、关了 9755 人。他们对关押对象采用打、吊、铐、捆绑、嗅粪桶、烟头烫、罚跪、不准睡觉等 10 多种手段，搞刑讯逼供，造成了死亡 6 人的严重后果。就是这样一个血腥、残酷镇压干部群众的试点经验，马天水、徐景贤却极为赞赏。马天水说：“新泾试点，旗开得胜，上海县民兵首战告捷，这支队伍有朝气、有战斗力。”徐景贤吹捧道：“我们有了这支队伍，感到自豪，要大力宣传。”1973 年 12 月 24 日，“市革会”专门召开民兵工作会议，由上海县介绍所谓民兵改造“经验”，会后，

10 个郊县都挂起了民兵指挥部的牌子，240 多个公社（镇）人民武装部统统被民兵团部所取代了。

7、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党内资产阶级”。

1975 年底和 1976 年初，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紧密配合“四人帮”一伙的阴谋活动，提出：“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施尚英、钟定栋等人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叫嚣：“民兵的主要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民兵抓小流氓不是主要目标，党内资产阶级最危险，民兵的眼睛要瞪得大大的。”他们在民兵系统里组织“理论讨论会”、“反击右倾翻案风现场会”、“研究‘走资派’学习班”。等等，大量印发各种所谓“批判”材料，要各级民兵组织“层层批”，“层层揪”。他们还总结了揪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方法：一是通过办案，从犯罪分子身上寻找“党内后台”；二是派出小分队打入内部，查找领导班子中所谓“复辟倒退派”；三是抓住党员干部的一般错误缺点，无限上纲，残酷迫害。进一步加剧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对老干部的镇压和迫害。

（四）《上海城市民兵调查》的出笼

王洪文调到北京后，为了扩大“上海民兵”的影响，1973 年 7 月指派秘书肖木给朱永嘉写了一封信，要上海搞一份城市

民兵调查情况。信中说：“这个材料……要讲三位一体，把民兵、治保、消防统起来。在中央究竟怎么办？还得想一想。”朱永嘉接信后立即派写作组一些人会同上海市民兵指挥部成立了上海城市民兵调查组，由写作组核心之一章树焜牵头。马天水、徐景贤等人提出：上海的工人武装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不挂牌子的派出所”，“群众专政的铁拳头”。强调要写出民兵的“威风”。朱永嘉对调查组成员说：“要把上海民兵的实力写出来。”8月初，《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上海城市民兵情况的调查》及8个附件，正式报送王洪文。1973年12月，“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将《调查报告》批发全国。王洪文立即打电话给马天水，要上海抓住这个时机，大力宣传“上海民兵这个新生事物”，“扩大上海民兵在全国的影响”。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立即布置各个方面，写小说、拍电影、办展览会、写文章、谱写民兵歌曲、举办全市民兵歌咏会等等，为“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唱赞歌。1973年12月24日召开全市民兵工作大会，马、徐、王在会上进一步贩卖、宣扬王洪文搞民兵的那一套东西。当时全国有20多个省市前来上海“取经”，马、徐、王等人对他们大肆鼓吹上海“改造”、“重建”民兵的“经验”，使“四人帮”在上海所搞的“自成体系，另立山头，搞第二武装”的阴谋做法，流毒全国。

（五）阴谋吞并人民武装部，疯狂强化“帮武装”

1970年8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召开以后，江青、张春桥多次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密谋，指使他们加紧利用上海民兵，扩展一支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

1、搞“秘密战备”。

1974年全国掀起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上海在“四人帮”直接指挥下，不仅把矛头直接对准党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并且借机反军乱军，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负责同志。3月份，王秀珍秘密去北京后返沪，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关于“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加强战备”的指示。会后王秀珍赶到市民兵指挥部对那些头头说：“现在批林彪、批孔老二，要批到某些人头上了，防止有人搞什么军事行动，我们要加强战备，要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她还提出具体要求：加强重点目标、康平路办公室和机场的保卫工作；手里还要抓几支民兵战备值班队伍，应付可能突然发生的问题；人数不一定太多，要经常抓落实，选择九、十两次路线斗争中有战斗力的单位，人、枪、弹落实好。根据王秀珍的意见，周宏宝、钟定栋、吴立义等人立即制订了《关于加强战备的几点意见》的秘密战备方案，王秀珍批示同意，并要求“要切实有人抓，有人落实”。在这个方案中，市民兵指挥部拉起了由4个区指挥分部（徐汇、静安、长宁、杨浦）、2个直属师（港务局、上钢三厂）约20多个单位组成的有1万余

名民兵的战备队伍，配备了四管机枪 10 挺，重机枪 79 挺，步枪、冲锋枪等 6000 余支。另外还组织了一支有 120 名民兵，配有 54 辆摩托车的战备机动小分队，昼夜值班待命。为了保卫马、徐、王等“市委领导”的安全，钟定株还安排徐汇区民兵指挥部组织 2 支人枪弹配套的机动队伍，分别驻扎在徐汇区委 4 楼和高安路 63 号，每夜在周围马路上巡逻。这次“秘密战备”从制订方案的指导思想，到武器配备，人员兵力部署，都是以上海警备区为“假想敌”的，把矛头直接指向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次露骨的反军活动，前后持续了 4 个月之久。

2、搞所谓的“二部合并”。

所谓“二部合并”，是指民兵指挥部和人民武装部两个机构合并，实质是由民兵指挥部并吞了人民武装部，这是王洪文为扩大民兵指挥部的势力范围又一阴谋活动。

1975 年 6 月，中央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明确提出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是一个统一的武装力量体系，并强调要加强人民武装部的建设。这无疑对张春桥、王洪文一伙搞“帮武装”的阴谋是沉重的打击。1975 年 7 月，王洪文窜来上海，他在上海民工作座谈会上狂妄地叫嚣：“现在军委要把民兵置于武装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只要我不死，20 年后我还要把这支队伍拉出来！”

1975 年 9 月 18 日，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召集市民兵指挥

部全体领导成员开会。他一再地煽动说：“有一点同志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为了和军委扩大会议对着干，王洪文提出：“试点一下，把人武部做的一些工作都并过来。复（员）、退（伍）征兵（等工作）都可并过来，人防工作也可带过来。对外牌子不一定叫武装部，可以叫指挥部。4 个月内拿出材料来，这个问题老不解决，就危险。”会后，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株等人立即向市委打了报告，确定以杨浦区、卢湾区、上海县进行“四部合并”（指人民武装部、民兵指挥部、人民防空办公室、征兵办公室）的试点。10 月 13 日，施尚英和钟定株分别带领了试点调查组下到了 3 个试点单位。

1975 年 11 月 12 日，马天水、王秀珍在市委召开各组办负责人会议后，单独把施尚英留下询问试点情况，要市民兵指挥部化力量上去，尽快搞出过硬的材料。11 月底，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又把施尚英、钟定株找到康平路办公室，要他们汇报试点情况。马天水提出：“搞四部合并，太复杂了，民兵体制问题，主要是民兵指挥部和人民武装部的合并问题，关键是人民武装部，把人民武装部并起来了，其它的好解决。”12 月 4 日，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又专门听取了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株的汇报。王秀珍提出：“合并后的名称还是叫民兵指挥部。”12

月10日市委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3个试点单位“二部合并”情况汇报会。马天水进一步鼓动说：“王洪文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人民）武装部实际上已指挥不了民兵了”，“四部合并分2步走，第一步先把人民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起来。”

在“二部合并”实施试点中，民兵指挥部独断专行，完全把上海警备区排斥在一边。从炮制合并方案到出情况简报和总结报告，都是在施尚英、钟定株等人一手操纵下进行的。他们这样做，引起了上海警备区和区、县人民武装部同志的强烈不满，纷纷质问“人民武装部是国家正式编制，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怎么能随便撤并？”“四部合并为什么只有一个部门的调查组？读一个方面的文件？”这些问题的提出，使马天水、王秀珍等人感到十分棘手。施尚英恨恨地说：“这些问题不简单，人家都是以军委扩大会（决定）为依据提出来的。”马天水攻击说，“军委扩大会没有解决武装部和民兵的矛盾，军委扩大会一开，矛盾反而更大了，我们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王秀珍也说：“合并有斗争，合并后还会有斗争的。”他们决定马上就并起来，不要等了。于是在1976年3月30日，杨浦区和卢湾区同时召开了合并大会，正式宣布“人民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分别建立了名为“杨浦区民兵指挥部”和“上海民兵卢湾区指挥部”的机构。原有的人民武装部的机构和编制被取消了，人民武装部机关党支部被撤销了，办公用房和用具被

收掉了，牌子也被摘下来扔在一边。人民武装部完完全全被“消化”了。由于马天水、王秀珍强调新机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许多人民武装部干部遭到排斥，纷纷被撵走。一批“帮派弟兄”、“造反派头头”则充斥在领导班子里。以后王洪文还多次要求抓紧总结试点经验，企图将“二部合并”的做法推向全国。

(3) 私自加强“第二武装”装备。

“四人帮”一伙为了抓枪杆子，多次强调“民兵武器要配足、配齐”，地方上对民兵要“自己武装自己”。早在1970年5月，王洪文就在一次民兵干部会议上提出：“各区、县、局都要抓一些点，试制民兵武器”。上海电缆厂从这一年开始试制半自动步枪。1971年2月21日，王洪文看到该厂上报市委《关于发动民兵制造半自动步枪的请示报告》后，欣喜若狂，马上批示有关部门继续试制下去。1973年8月9日，他又要“市革会”工交组下去摸情况，物色可以造子弹和手榴弹的单位。并在一次民兵座谈会上急不可耐地叫嚷：“民兵武器要上得快”。“上海民兵要早点武装起来，不要按步就班，我们要快点、早点。”于是，王洪文那些上海党羽加紧了私造枪支、私自装备的活动。

新中华机器厂原是国家计划内武器生产点，每年生产的武器全部上交入库。1973年马天水、王秀珍等人以修理民兵武器为借口，提出将新中华机器厂转为专为民兵制造和修理武器的

定点厂，强行将该厂生产的武器全部用来装备上海民兵。以后在王洪文的指使下，不經國家計委批准，马天水、王秀珍要“市革会”工交组专拨地方经费，搞了一条半自动步枪的生产流水线，擅自为“第二武装”生产武器。从1974年至1976年马、徐、王又特意批准支出3200余万元的地方经费，为上海民兵私造私购了枪支弹药、摩托车、高炮牵引车、雷达指挥仪、巡逻艇等各种武器装备。

1974年8月，南京军区召开三省一市民兵武器装备10年规划会议。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之一吴立义带了4个人去参加会议。会后吴立义组织了7个人搞上海民兵10年装备规划。根据中央军委精神和南京军区会议的要求，上海民兵10年规划只要装备15万件武器就够了，但李彬山、周宏宝却根据马天水传达的王洪文指示，把上海民兵10年武器装备，按50万件规划搞。1974年以前，上海民兵原有6个高炮师，25个武装基干团，拥有各种高炮、高射机枪800多门（挺），各种轻武器43万件。按《上海民兵十年装备规划》，全市则要扩充到装备10个高炮师，185个高射机枪连，3个地炮师，1个130火箭炮团，1个水陆坦克师，36个武装基干团，1个摩托团，1个通信团，共计装备民兵65万人。这个擅自扩大的规划经马天水、王秀珍审核同意，又上报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处。在这期间南京军区几次催市民兵指挥部上报规划，但马天水、王秀珍扣着不报，说要

等“中央首长”同意后才能上报。直至11月8日，张、姚、王3人批示同意后，才将《关于上海民兵装备10年规划设想意见书报告》报到南京军区。马天水、王秀珍等人是用“张、姚、王”3人的批示来逼迫南京军区批准同意他们蓄意超量扩大的装备规划。马天水、徐景贤、黄涛、陈阿大等人为能更多更快地装备上海民兵，在上海按国家计划生产制造武器装备时，还以增产、超产为名，不經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就自行截留、挪用了大量的高炮、新四〇火箭筒、高射机枪、步枪以及各种炮弹、枪弹、手榴弹等武器装备。

微型冲锋枪原来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秘密试制的，“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觉得这种枪很适合搞秘密阴谋活动时使用，便迫不及待地从王维国处接管过来。1972年下半年他多次派秘书廖祖康到空军修造厂了解试制情况，但由于技术不过关，没有搞出来。1974年10月，工交组黄涛到北京开会，王洪文将试制任务直接交给黄涛，黄涛立即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有关部门，要求马上落实试制任务；与此同时，廖祖康又打电话给陈阿大传达王洪文“先按样品试制10支，图纸以后出”的要求。陈阿大决定先“试制10支，设立专门小组抓，保质保量尽快攻下来。”并布置上海压缩机厂承担这项任务。由于这是王洪文背着中央偷偷搞的，黄涛、陈阿大在安排任务时，都特意交待“枪是做保卫工作用的，接触面越小越好”，“对下不要说是王洪文亲自

抓的”。整个生产不按军工审批程序，没有正式文件，处在一种特殊的秘密状态之中。

小批枪试制后，黄涛、陈阿大先后两次派专人给王洪文送去4支，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制作了精致的棺匣。冲锋枪送到北京后，王洪文亲自试射，觉得不满意，向黄涛等人提出“射得大快，不利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要放慢射速一倍，子弹从20发增加到30发。”1975年9月，王洪文来上海又专程到上海压缩机厂，详细了解微型冲锋枪的性能和生产情况，煽动工厂要多造这种枪。黄涛和陈阿大也一再下指令“这件事要狠抓”，“一定要在短时间里搞上去”，“要积极创造条件，从小到大（批量生产）”。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一伙急于抢班夺权，准备动手了。9月21日王洪文急令廖祖康飞往上海，当面向黄涛传达密令“要加紧赶制微型冲锋枪四五十支，质量要好。50支不行，20支、10支也可以”，真是迫不及待了。可是由于微型冲锋枪在试制中一直没有完全过关，王洪文的“秘密任务”直到他垮台之日也没能如愿完成。

（六）妄图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

“四人帮”把上海民兵看成他们阴谋用来对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武装”。但是光有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这样一支队伍是不能成全面篡权的“大气候”的。因此王洪文还想建立一个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由他任总指挥，企图把全国所有的民兵组织

抓到手。

1973年9月，王洪文在上海对王秀珍说：“上海民兵这支队是有战斗力的，我是信得过的，光有下面指挥部不行，上面有人抓才行。我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我任总指挥。”

1974年5月底，王洪文打电话给马天水：“全国准备建立民兵总指挥部。如这个组织正式成立时，准备调周宏宝到全国民兵总指挥部工作，你们可作好准备。”

1974年11月26日，军委三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民兵指挥部体制问题调查组来上海调查。马天水、王秀珍得报后马上把李彬山、周宏宝、钟定株找去密谋。马天水、王秀珍对他们说：“你们要多向三总部的同志讲上海民兵的经验，用我们的观点影响他们，使全国各省市民兵都能象上海这样搞。你们要建议全国成立民兵总指挥部，由王洪文兼任全国民兵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些话用你们自己的话去说，不要说是我们的意见。”周宏宝、钟定株接到“密令”后，对工作汇报作了“精心”安排。他们在汇报中反复向军委调查组提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应成立民兵指挥部，受地方党委直接领导，不受当地军事机关的领导，也不受大军区的领导。中央成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统管全国民兵工作，由王洪文任总指挥。总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不受三大总部的领导等等。

这种自成体系，另搞一套的做法，遭到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坚决反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搞，是搞‘第二武装’”。‘四人帮’的这个阴谋始终没有得逞。

10年动乱，“四人帮”及其上海党羽，出于其篡党夺权的需要，大搞“第二武装”，以民兵指挥部这个工具，残酷镇压群众，干了大量坏事。在“四人帮”垮台前夕，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株等人在徐景贤、王秀珍的指挥下，秘密调集了大量兵力，配备了枪支弹药，制订了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参与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搞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但不论他们要出什么花招，都逃不脱覆灭的命运。他们的垂死挣扎，只不过是为他们自己又加上一笔确凿的罪证而已。

在本章结束之前，我们要说明一点，上海市民兵指挥部是“四人帮”及其党羽精心培养、严密控制的一支帮派武装工具，干坏事的是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株、印玉泉、吴立义等一些坏头头。全市300多万的基层民兵是无辜的，是受欺骗、受蒙蔽的。事实正是如此，一旦“四人帮”彻底垮台的消息传来上海，他们搞武装叛乱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广大民兵象火山爆发那样纷纷起来愤怒揭发和批判“四人帮”一伙的罪恶活动。“四人帮”猖狂得意时，曾经夸口：他们有几十万支枪，有几百万民兵。但是他们永远不能争取到广大民兵、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的。

二十五、“工总司”帮体系及其在“四人帮”篡党夺权中的作用

从“文革”动乱开始，张春桥、姚文元就注意拉拢，收买那些造反起家的所谓“群众组织”的头头们，为所用，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目的。其中，以王洪文为头目的“工总司”帮体系，特别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倚重。“工总司”的核心与各级骨干成员，大多数是些品质恶劣、对党和新社会有不满或仇恨的人，其中不少人流氓成性，是靠打、砸、抢起家的。这些工人阶级的败类，纠集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帮性。在王洪文得势之后，把他的“帮兄弟”安排到各个领导岗位上去，直至后来完全篡夺了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权，独霸一方，自成体系。张春桥看中了“工总司”打着“工人”旗号、人多势众这一点，倍加青睐，利用这股力量来控制上海局势；王洪文等乘“造反”的浪潮，依赖张春桥的支持而崛起，借助张春桥的权势，排除异己，扩大其帮派势力。“工总司”帮体系在江青、张春桥等篡党夺权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 王洪文独霸“工总司”，进而篡夺市总工会领导权
“文革”初期成立的“工总司”，内部派别林立，“工总司”

总部下面的所谓“联络站”、“指挥部”和“直属兵团”等也为数众多，其中比较大一些的约有 102 个。它们的头头共计 170 多名，他们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互不卖帐。那时的王洪文，并没有多大的地盘，他蹲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里，死死抓住“工总司”的大印不放，自吹自夸，沽名钓誉。作为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当时，那些造反组织的大小头目们，在造反夺权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尚能麇集在“工总司”的旗子下，搞一些统一行动，但更多的却是各有野心，争夺对“工总司”的控制权。后来，王洪文以张春桥为靠山，从一些大厂中拉来一些造反派头头到“工总司”作为他的亲信，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67 年初，王洪文把王秀珍拉到“工总司”，当“群远组”组长，做他的左右臂。同年 2 月，上海警备区“支左”小分队进驻“工总司”，其头头王日初、康宁一参加了“工总司”头头们的活动，王洪文的地位有所加强。

在一月反革命夺权的过程中，“工总司”内部以及各造反派组织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白热化。王洪文的地位岌岌可危。但由于王洪文有张春桥这座靠山，又倚仗自己的狡诈手段和赤裸裸的暴力，这些“工总司”内部造反活动和成立的各种组织，都被王洪文及其亲信小兄弟次第搞垮。1967 年 12 月 3 日，召开了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简称“造代会”），产生了以王洪文为总头目的“工总司委员会”，那时，王

及其小兄弟基本上做到了独霸“工总司”帮体系的目的。

王洪文投靠张春桥，张春桥支持和利用王洪文，他们之间的这笔交易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原来，“安亭事件”后，张春桥与王洪文结交之初，对王洪文一伙人还摸不清底细，对王也不是很放心。因此，张除了“支持”王洪文一伙人外，还支持了“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以及一兵团的戴祖祥等，使他们互相牵制，都为张所用。尤其对耿金章，张认为他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对二兵团的物质支援十分优厚，如发给的“造反派”袖章用布特别多等，使二兵团的势力迅速膨胀。二兵团又在血腥镇压赤卫队的“康平路事件”中立了功，一时间成为与王洪文一派激烈争夺的对手。但后来在一月反革命夺权过程中，耿金章表现对张春桥不那么“听话”，使张十分恼火，而王洪文却比较乖觉，对张是一付俯首贴耳的恭顺嘴脸。特别在两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中，王洪文及其小兄弟死保张春桥，疯狂镇压“红革会”等反张势力，竭力帮助张渡过难关，博得了张的极大欢心。从此，他们勾结得更加紧密了。

张春桥对王洪文为头子的“工总司”帮体系，采取了又打又拉、恩威兼施的手法，迫使王洪文等就范。1967 年 4 月下旬，上海“市革会”派出王秀珍等组成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住在民族饭店。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来探望他们。张春桥气势汹汹地讲了一番话。张春桥指责王

秀珍说：“王秀珍，你说说看，你们‘工总司’哪一个能代表工人？王洪文是保卫科的一个干事，根本没摸过机器；潘国平是个艺徒，还没满师；陈阿大也是刚刚做了几天工；你王秀珍是从东北到上海读纺织技校的一个毕业生，也没上过机器吧！你们能代表上海工人阶级？我看都不能！要说真正能代表工人的还是耿金章，共产党员，十二年工龄，手上有老茧，在工人中还有点影响。可是，二兵团不听我们的话，搞分裂，我们不支持他们，而支持了你们，这样，二兵团就垮了，你们‘工总司’才起来了。假定没有我们的支持，我看你们不一定干得过二兵团！”张的这番话，直言不讳地指出“工总司”王洪文等人不能代表上海工人阶级，而王洪文等之所以能在上海滩站住脚跟，全靠他张春桥的支持。王秀珍听了，诚惶诚恐，诺诺连声，赶紧连夜打电话，逐句逐字向在上海的王洪文传达。王洪文听后，对张春桥的态度更加恭顺了。

对传“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张春桥俨然以帮会头子自居。他曾得意地说：“那些工人组织都把我当老头子看的”，“我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的话不算数。”王洪文有了这个“老头子”的支持，野心进一步膨胀，积极活动由“工总司”取代上海市总工会，搞成全市造反组织由“工总司”名正言顺地统一天下的局面。1972年2月，他们策划再次召开“造代会”，但当时全国各地在名称上不再突出“造反派”这三个字了，王洪文等虽然

十分留恋这个词，也不得不把“造代会”改为“上海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后，“工总司”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工代会”。“工代会”的领导成员仍是“工总司”的原班人马。

1973年4月16日，召开了“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重新恢复了“上海市总工会”。然而，其领导成员基本上仍是“工总司”的头头们。张春桥对他们讲：“‘工总司’这几员大将，对文化大革命是有贡献的。”同意不宣布撤销“工总司”。王洪文一伙人在内部仍以“工总司”自称。王洪文等人多次宣称：“现在的‘总工会’是由‘工总司’改名而来，不是原来的‘总工会’的恢复。马天水附合着献媚说：“各级工会领导班子，只能由新干部（组成），只有在工会工作班子中，可以有少量原工会干部协助搞些具体工作。”王秀珍、叶昌明公然宣布：“原来的工会干部只能放两个当当代表，当当参谋，不能当把手”。他们一概排斥原来市总工会机关干部，不给安排工作，只有极个别的留下来了。同时，他们还规定，“各级工会主任要由党委副书记或革委会副主任或党委组织组负责人兼任；所有工会主任的任免，都要经市总工会审核同意”。各区、县、局工会直到基层工会纷纷照此办理，“工总司”帮体系就此篡夺了全市各级工会的领导权。

（二）篡党夺权中“工总司”帮体系的独特作用

王洪文控制的“工总司”帮体系，在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实施其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阴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大量的造反派头头、帮派骨干通过“工总司”这个渠道，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比较重大的集中的行动有三次：

第一次，利用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机会，把“工总司”帮体系的人，以“群众代表”的名义，大量塞进各级“革委会”。

张春桥曾经说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如果）具有一点新意的话，（那就是）因为它有群众的代表。而干部的代表和军队的代表都是原来就有的。好就好在有群众的代表。”张认为干部和军队的代表都没有什么“新意”，只有王洪文小兄弟们这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才有“新意”。他要全力扶植他们作为自己统治上海的主要支柱。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2月23日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38个发起单位，为首的就是“工总司”。当时除张、姚分任正副主任外，所谓常委、委员的人选都由各造反组织派出代表来参加会议，没有正式任命手续。到了1970年3月28日正式公布经中央批准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除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第一副主任外，“工总司”的王洪文、王秀珍都成了副主任，陈阿大、叶昌明、张宝林、金祖敏、金阿姨、金传德都成了“市革会”的常委。黄金海等人成

为委员。“工总司”人员占了很大比例。这时的“工总司”，权势急剧上升，张春桥、姚文元又把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所谓“考核”，能否“解放”、如何安排使用甚至领导班子如何搭配等都交给以王洪文为头子的“工总司”，由他们提出意见后再由“市革会”审批。而王洪文一帮人则极力推行他们那条“只要老头头（即‘老造反’）、不要老干部”的“闹而优则仕”的干部路线。这条路线贯彻的结果是：在区、县、局的“革委会”中，“工总司”各“联络站”的头头们照例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有的任常委，有的任把手，把持了“革委会”很大的权力。下面工厂企业的“革委会”也是如此，没有“工总司”的人参加“掌权”，就得不到上级的批准。

为了扶植这股势力，张春桥不断地鼓吹，这些新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要培养，要压担子。他曾“教训”一些被结合进区、县、局“革委会”的老干部：“工作要你去做，有了成绩要归功于‘新干部’，出了问题要你老干部负责！”他们就是这样培养所谓“新干部、接班人”的。不仅如此，张春桥、姚文元还公然提出，“以造反派代替党的基层组织，代替党支部，让造反派发挥党支部的作用。”鼓吹“以帮代党”。

第二次，突击选拔任用“工代表”，去要害部门夺权。

1968年7月，张春桥从北京窜回上海，他心急火燎地把黄浦、陈阿大召到康平路办公室，与王洪文、王少庸一起，布置

了一项紧急任务，即挑选抽调 140 名到 150 名工人，到市级机关和重要部门去“工作”。按照张春桥的说法，就是“去代替那些旧机关的‘老爷们’。”

第二天，由黄浦主持，向各局传达并分配任务。由于张震得累，限各局在 4 天内完成，各局要公司一级在 2 天内上报，公司要基层工厂、企业报送名单、材料的时间只有 1 天。选拔的条件说来说去是一条：“造反早”“造反的表现好”。这正是“工总司”扩大权势的大好机会，王洪文立即要下面抓紧物色人选。由于时间紧迫，只挑了 128 名，后来在上海习惯地称之为“128 个工代表”。

人员集中以后，为了培养对“四人帮”的感情，由金祖敏负责，办了两周的学习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曾等亲自接见了全体人员。张春桥对他们大肆煽惑、鼓劲。他说：“把你们选上来，你们就要大胆干，要把旧机关老爷们老一套的工作风格冲掉，搞出成绩是你们的，搞错了我负责。”他又当面笼络许愿说：“你们是真正的工人代表，是要派到‘市革会’各组、办和区、县、局等去参加领导工作的。”

分配方案定了以后，张、姚等又下令，凡有“工代表”去“工作”的单位，要热烈欢迎他们去。于是，当这些人到达时，许多单位都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夹道欢迎这些“真正的工人代表”来机关工作。

这一来，使已经“结合”的或已经参加机关“工作”的“工总司”一帮小兄弟，颇有点醋意。王洪文的得力小兄弟、五虎将之一的黄金海就为此愤愤不平，背后骂娘：“怎么，他们是‘真正的工人代表’？原来以群众组织代表名义结合进‘革委会’的‘工总司’的人难道是假的‘工人代表’？！”

但这种“分歧”很快就消除了，因为这些人中的原来就是“工总司”帮体系的人，有的是与“工总司”一起“造反”的，他们到机关“工作”后，背靠的还是“工总司”。

这“128 个工代表”，到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彻底垮台时，在机关的还有 77 人。其中大部分成为“市革会”各组、办所属小组和区、县、局“革委会”的组、办的负责人，一部分人得到“四人帮”和马、徐、王的赏识，在更重要的岗位上“掌权”。例如徐世玉（吴泾化工厂工段长，后为“市革会”组织组负责人之一）、汪湘君（上海停经片厂“革委会”委员，后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市妇联主任）、徐成虎（上海柴油机厂工段指导员，后为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杨有根（上海自行车厂“革委会”召集人，后为“市革会”财贸组领导核心）、苏桂珍（上海第七针织厂“革委会”第一召集人，后为中共徐汇区委副书记）等人，帮助马、徐、王干了大量坏事。此外，有 51 人因各种原因先后被打发回原来的工厂劳动去了，其中也有少数不愿和“四人帮”马、徐、王等同流合污而被排挤回去的。

第三次，“工总司”调派骨干，控制“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篡夺领导权。

1968年8月，王洪文等人，打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幌子，从“工总司”抽调了“工总司”委员26人（占“工总司”委员总数的60%左右），以“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市革会”各组、办。并由“市革会”决定设立了“工宣队”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共5个办公室（缺第四办公室，据说“四办”谐音“死办”，那些造反派头头还真有点封建迷信，认为不吉利，回避了）。王洪文的小兄弟们，纷纷以“工宣队办公室”负责人的名义，在“市革会”各组、办发号施令。

“工宣队一办”负责人王秀珍、徐妙林（“工总司”政宣组的正副组长）等，进驻“市革会”文教组；

“工宣队二办”负责人张宝林（“工总司”市政组组长、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孙玉喜（“工总司”委员）等，进驻“市革会”地区组；

“工宣队三办”负责人戴立清（“工总司”委员）、耿金章（“工总司”委员、二兵团“司令”）等，进驻“市革会”科技组；

“工宣队五办”负责人王明龙（“工总司”委员，组织组副组长）、王胜利（“工总司”委员、政宣组副组长）等，进驻

“市革会”郊区组；

“工宣队六办”负责人黄金海（“工总司”委员、办公室组长）、杨有根（“工总司”财贸系统头头之一）等，进驻“市革会”财贸组。

“市革会”的工交组，因为已经有陈阿大（“工总司”常委兼工业组组长）在那里掌权，就没有派“工宣队”进驻。

王洪文等规定“工宣队”的任务：不仅要到大、中、小学校中去，扭转和稳定那里的“混乱不堪”的局面并管理学校，还要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到一切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中去，“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及各级“革委会”里去，还要解决400多个所谓“老大难”单位的问题。他们急如星火地从各工厂抽调了9万多人，以“工宣队”名义开进了全市各大、中、小学，各文化、教育、卫生、财贸系统，以及各区、县。“工总司”的一批人，成为各系统、地区新设立的“工宣队办公室”的负责人，掌握了那里“革委会”各组、办的大权。总的说来，上海的“工宣队”初期虽然在制止一些单位武斗方面起过一点作用，但它在“工总司”头头们的控制下，贯彻他们那个“帮派”路线，消极作用极大。

近10万大军的“工宣队”按团、营、连、排、班的建制，在市“工宣队”各办公室的指挥下，分层次进驻各单位。例如一个局，一般设“工宣队”团部，下属公司、大厂有“工宣

队”管部或连部，全市 26 所大中院校进驻了 1.1 万余人，区属中、小学进驻 5.2 万余人；医疗卫生、财贸、科技等系统、区级机关和街道以及郊县各进驻数千人不等；市委、市人委机关、华东局机关进驻了 500 余人。

王洪文对进驻各单位的“工宣队”头头们说：“要当领导，不要当办事员”，“要多用一些‘工总司’的人”。王秀珍则要求他们“不要忘本”即不要忘了“工总司”把他们扶上台。

“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后，先搞“大联合”，接着搞“清队”，再搞“整党建党”。人们把这称之为“工宣队”的“三斧头”。在整个“斗、批、改”的过程中，采取“掺砂子”、“层层结合”等方法，把“工宣队”的一些头头和虽未参加“工宣队”而是“工总司”帮体系各级造反派头头，塞进各单位领导班子去篡夺那里的党政领导权。据当时“工总司”和后来“总工会”的统计资料记载，先后进入“市革会”各组、办的有 33 人，派到各区、县、局的有 93 人，派到各公司基层的 4 人，派到总工会直属单位的有 38 人，共计 168 人，其中担任区、县、局党委副书记以上的就有 33 人。

王洪文、王秀珍仍嫌“权”夺得不够，不久又搞了“组、办合并”，即把“市革会”的“组”与“工宣队”的“办”合二为一，此事引起徐景贤的强烈不满，他曾对他手下的一伙人说过：“‘市革会’各组改为‘工宣队’各办，是王洪文的阴谋，权被

王洪文控制了。”1968 年冬，在王洪文的支持与赞同下，由叶昌明（当时留守“工总司”本部）起草，用“工总司”的名义向“市革会”写了报告，建议“工总司”所属各区、县、局的联络站以及基层造反队对同级“革委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阴谋把联络站的人员全部拉进“革委会”。在“市革会”尚未表态前，叶等就急不可耐地向所属各联络站作了布置，并首先在黄浦区等单位“强令执行”。由于这种由“工总司”独裁并吞“革委会”的做法大露骨，张、姚没有同意，示意他们仍要利用“工宣队”这个旗号行事。

大专院校是“工宣队”进驻的重点单位，当年“炮打”张春桥人数较多的院校，更成为重点的重点。这些院校进驻“工宣队”人数之众，达到惊人的地步。有的为全校师生人数的二比一，有的甚至达到一比一。“工宣队”队伍开进各学校后，打着参加单位“斗、批、改”的旗号，首先是重新夺权，他们对情况不同的单位，采取不同的夺权手段。第一种，对那些他们认为是“老大难”或“重点”单位，先将大、小班子的领导成员，包括单位的“革委会”、“革筹会”、以及各个造反组织和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都集中起来，举办什么“抗大式”、“封闭式”的“学习班”，通过“揭矛盾”、“揪坏人”、“抓黑手”，“纯洁”队伍，组建新的领导班子。第二种，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健全”“不理想”的领导班子，即派“工宣队”的负责人担任“革委

会”的一、二把手，“革委会”下属机关负责人，也由“工宣队”派人担任，取而代之。他们引用张春桥的说法，这“不是拆台，而是补台”。第三种，少数单位采取“工宣队”和“革委会”开联合会议的形式决定重大问题。有的“工宣队”在队部下还设立各组、室，与单位“革委会”下设的各组、室对口，名义上共同决定问题，实际上还是“工宣队”说了算。

这种由“工宣队”、实际由“工总司”称霸天下的做法，引起了“工总司”与其他行业造反组织之间的激烈矛盾与摩擦。例如，进驻“市革会”直属机关的“工宣队”，与“市直属机关造反联络站”的那批人物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市财革会”、“上体司”、“顾司”等造反头头也因大权旁落而极为不满，就是“工总司”帮体系内的一些人，有的也因所在单位作为“老大难”单位换了整，产生对立情绪。另一方面，“工宣队”那些团、营、连各级头头们，奉命来“占领”上层建筑，“领导一切”，虽然大多数人如愿以偿地抓了权，进了“市革会”，但终究是志大才疏，占而不领，“三斧头”用光了，第四斧头又没有。加上不少人原来是沉疴逆起，表现恶劣，问题很多，没有多久，“工宣队”在群众中的威望、声势就一落千丈了。

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亲自出马来抓“工宣队”的工作了。1969年8月18日，张、姚主持召开专题讨论“工宣队”工作的“市革会”扩大会议。张在讲话中为“工宣

队”鼓劲打气，说：“工宣队”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市革会’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工宣队各办在管”，“工厂、学校、商店、街道，主要在‘工宣队’领导下开展工作”，“上海解放了二十年，从未有象现在这样的由工人阶级控制局势”，“在整个工作中，影响全局的是‘工宣队’工作”。面对广大群众对“工宣队”独断专行、霸道作风的愤慨心情，以及“工宣队”与各方面的紧张关系，张春桥不得不出面做些安抚工作，他承认“‘市革会’在领导‘工宣队’方面，应该讲是有缺点的、有毛病的”、“由我负责”，说这是由于他“派‘工宣队’时匆匆忙忙，派后又没有去管”所致，企图以虚伪的“承担责任”掩盖其利用“工总司”帮派势力进行“改朝换代”篡恶活动的实质。另外，他又笼络、讨好“工总司”一伙人，希望那伙人少搞乱子。他说：“我和文元两个这次来上海，开的第一个会就是‘工总司’的会。我们说，如果你们的队伍好，那上海也就好办。（我）给他们打防疫针。”姚文元插话打圆场，“后来他们整了一下风。”

“工宣队”是打着“斗、批、改”旗号进驻的，“斗、批、改”任务完成后，“工宣队”的使命就应该算完成了，但是进驻各单位的“工宣队”仍然赖着不走，他们又扯起“工宣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的旗帜，提出“‘工宣队’一定要在上层建筑坚持战斗下去”，要“成为反复辟的战斗队”。“党组织成立后，

“工宣队”组织作用不应削弱”，要“作为一个阶级去战斗”，“不要怕被置于党组织之上”。王秀珍还多次在市总工会召开的“工宣队”负责人会议上提出：“要保持‘工宣队’的独立（性），“工宣队”可以单独行动”。后来又在市总工会内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抓“工宣队”的工作，把它作为一项经常任务，由叶昌明总管。

（三）自成体系与强烈的“帮”性

“九大”以后，王洪文和他的小兄弟们，纷纷粉墨登场。王洪文窃据了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等项领导职务，几乎包揽了上海市的党、政、工会大权。王秀珍也窃据了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等职务，并兼“市革会”组织组组长。这些人心里都明白自己能有今天，靠的是“工总司”帮组织。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他之所以能爬到如此高位，“上有春桥、文元支持，下靠‘工总司’力量支持。‘工总司’是我的后盾，没有这支力量就站不住脚”。又说，“别看这些老头头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今后一有风吹草动，真正反映情况的还是这些人。”王洪文把“工总司”帮体系的骨干分子，一一拉进党内，委以重任，分别安插在“市革会”各组办、各系统、各区、县、局等重要领导岗位上。只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他们篡党夺权出过力的，哪怕是为王洪文撑

过伞、开过车、保过驾、解过围的人，都是有功之臣，王洪文都要一一论功行赏，予以加官晋爵。王秀珍则更加露骨地说：“文化大革命把我们（指‘工总司’那帮小兄弟们）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命运和文化大革命系在一起，要是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我们这些人要么杀头，（要么）坐牢……。”这些人知道他们之间利害相关，谁也离不开谁，紧紧抱成一团，自成体系，具有强烈的“帮”性。

“工总司”经过几次内讧、火拼，排除了异己力量，逐步形成了以王洪文为首领，有王秀珍、金祖敏、陈阿大、黄金海、叶昌明、戴立清、马振龙、王日初、王胜利、张宝林、王明龙、王成龙、康宁一、汪湘君等15人参加的一个核心集团。王洪文遇事都要他那些核心人物帮他出主意。在“市革会”召开重要会议之前，他总是先在“工总司”内暗中商量策划，力求使“市革会”会议的决定符合他们帮体系的利益。他在会议上的讲话稿，也要征求核心小兄弟们的意见。

1972年9月，王洪文调往北京工作。临行前在上海大厦纠集“核心集团”成员设宴践行，他说：“我去北京工作，不是我个人问题，是代表造反派，代表在座各位的。”“你们有事，可以直接找我嘛！”他表示去北京后，“我这个‘工总司’的司令还是要当的”！“上海市委的工作我还是要管的”。他把“工总司”一摊子交给王秀珍负责，一方面鼓励她“大胆工作”说

“有什么困难问题找我，我支持你”。另一方面一再叮嘱王秀珍，“千万不要忘记‘工总司’那些老头头”，“有事要多同他们商量，多做他们的工作，多依靠他们”。王洪文生怕他苦心经营的“工总司”帮体系，在他这个头子走后大权旁落或散了摊子。

“十大”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虽然都到了北京，但他们通过各自的线来控制上海，他们的秘书都可以参与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的活动。张春桥、姚文元主要通过市委“写作组”进行遥控。王洪文则通过王秀珍、黄琦等人遥控“市革会”和市总工会。经王洪文、王秀珍等策划，他们把已经在“市革会”各组、办及各局掌权的“工总司”的那些老头头，都安排为市总工会的常委，组成一个小集团，其成员为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汪湘君、王日初、康宁一、施尚英等10人。人们称他们为市总工会常委中的常委，核心中的核心。他们借加强集体领导为名，建立每周一次的总工会“常委碰头会议”制度，使帮体系的阴谋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有些事情和活动，他们往往在市委、“市革会”开会正式布置之前，就以总工会常委会的名义，抢先作出决定或对下发号施令，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实际上形成上海的“第二市委”。

这时的所谓“常委碰头会”活动，大体上有5方面的内容：

(1) 以“关心大事”、“抓大事”、“议大事”为名，分析所谓“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如周总

理逝世后，黄金海就在“常委碰头会”上叫嚷：“按照党内的名次，王洪文当总理比较恰当。”陈阿大跳出来，说，“春桥最合适。”他们通过自己控制的体系，把这股“风”刮到下面，唆使一些人上街贴出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

(2) 以“通气”、“吹风”、“讲精神”为名，传达“四人帮”的“指示”并布置下去，使帮工会系统得到讯息最早。如张春桥要肖木带回上海的口信：“今后斗争更复杂，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中国可能分裂、发生内战，大家要有信心，要有准备。”等等。这个口信，只在市委常委中讨论，原话没有向下传达。而王秀珍尚下传达了。王秀珍得意忘形地说：“现在工会的威信很高”、“很多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经常跑到工会问问运动如何搞？”

(3) 议论区、县、局等党、政领导班子和干部情况，策划安插亲信，排除异己。这是所谓“常委碰头会”中经常性的议题之一。往往在交谈其他问题时就夹带着议论干部了。他们首先强调上下级工会垂直领导，剥夺了党委对同级工会的人事审批权。接着就扩大到议论其他党、政领导干部。他们提出的意见常被马天水、徐景贤采纳照办，有的意见就由王秀珍直接报在北京的王洪文批下来办；有的则不经“市革会”而由金相敏、王日初以市委组织组名义直接办理了。1975年，他们还对全市区、县、局的领导班子状况作了两次“全面分析”。叶昌明布置

区、县、局工会揭同级党委的“盖子”，编印了 89 期《简报增刊》，其中告党委状的就有 72 期，被点名的老干部有 198 名。据此由“工会”的“常委会”来对党、政领导干部评头品足，决定谁行，谁不行，谁要拉下来，谁可提拔，提出对一批领导班子“动手术”作调整的意见，彻底破坏了党管干部的原则。

(4) 以“谈思想”、“小整风”为名，掩盖、包庇这些“核心”人物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调节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

(5) 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和军队负责人，散布流言蜚语。

“工总司”帮体系控制的市总工会，还举办了“工人政治学校”，作为他们扩张势力的一个渠道。王洪文非常重视“工人政治学校”的作用。他说：“政校是影响整个上海形势的重要部门。”他们对工人政校学员灌输忠于“四人帮”的思想教育，培养学员对“四人帮”的感情。王洪文讲：“感情出路线、出干部嘛！”市工人政治学校共举办了 14 期“马列读书班”（被人们称为“升官班”），5 期“工人新干部学习班”，1 期“全国总工会‘九大’选苗学习班”和 5 期“工会干部学习班”。并配合市委组织组办了 2 期“选苗学习班”。共训练学员 1900 余人。在办学过程中，讲“文化大革命历史”，参观“一月革命风暴展览会”，吹捧“四人帮”的功绩，给学员树立“四人帮”是“正确路线代表”的形象。通过学习考察和“相面”，提拔一批忠于“四人

帮”的所谓工人新干部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任职，壮大帮体系的势力。

(四) 包庇重用社会渣滓

对于“工总司”帮体系的人，特别是对那些所谓“一月革命杀出来的老头头”，王洪文、王秀珍等总是千方百计地拉拢、庇护。那些人大多数是流氓成性的社会渣滓，借口“造反”，“打、砸、抢、抄、拿”，贪污腐化，无所顾忌。有些人民愤极大，被轰下台。但王洪文等在张春桥的支持下，竭力要把他们再扶上台。突出的有三次重大行动：

第一次是在 1969 年 4 月党的“九大”时，毛泽东在审查主席团名单时提出要把一位老同志“解放”出来参加“九大”，以体现团结胜利的路线。王洪文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从北京打电话给马天水和叶昌明，要他们将当时拘留在公安局的几个犯罪分子、老头头立即释放，胡说这些人是什么“左派”，要“落实政策”，要体现“团结胜利路线”！其中有“工总司”徐汇区联络站头头周妙兴、“工总司”闵行地区联络站头头赵万和、“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头头袁根林、“工总司”手工业局联络站头头黄文海等人。那些人之所以被拘留审查，都有本身的严重问题，如周妙兴是因“工总司”徐汇区联络站人员与华东化工学院“红旗造反兵团”发生武斗，前者绑架了后者的负责人邱贤宏并私设公堂把邱活活打死。事发后周又涉嫌唆使毁尸灭迹，订

攻守同盟，妄图嫁祸别人。象这样的罪犯怎么可以轻易释放？但马天水接到王洪文的电话即要王承龙负责，由“市革会”出面，强令市公安局军管组把对那些人的审讯记录抽调出来移交给了“工总司”处理。同时，“工总司”的核心成员王秀珍、叶昌明、黄金海、王日初、汪湘君、王成龙、王明龙等人领真出动，分别乘坐小轿车到关押地点欢迎他们出狱。同年12月15日，王洪文又批示：“本着政治上从严，经济上从宽，我意见工资可以发给他们。”于是，这些人领到了拘留期间停发的全部工资。不久，他们大多数又“官复原职”，有的还被拉入党内，提拔重用。这次行动被“造反派”称颂为“打开牢门找左派”。

第二次是在“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等借口复查受林彪迫害的案件，提出要“关心文化大革命中杀出来的老造反”，在市总工会内设立“专案复查组”，负责对“工总司”老头头所谓受林彪、王维国迫害案件的审理。戴立清露骨地说：“过去公、检、法专政机关刀把子不在我们手里，他们利用合法身份把老造反搞下台去，炮打张春桥，再（要）把王洪文搞下去，镇压了不少造反派，我们要乘‘批林整风’的机会，把这些案子搞清楚。”据市总工会统计，专案组从1972年3月到1976年10月，共复查了86件案子，他们在专案组内采取封锁、勾销、篡改材料等卑劣手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搞翻案活动，为一些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而被群众拉下台的坏头头开脱罪责，“恢

复名誉”。明显地枉法包庇的有30多人，其中有：“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文攻武卫”的头头张宝林，“工总司”委员岑麒麟、刘广德、沈干和，组织组负责人徐美英、苗世和以及一批“工总司”局、区联络站的负责人。有些案子是十分突出的。如那个“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造反起家后飞扬跋扈，为非作歹，食污挥霍公款，贩卖毛主席像章，套购钢材，偷窃物资，还强奸、猥亵妇女20余人。连张春桥也称他是“保不住”的“阿飞司令”。当时王洪文曾说，“潘国平的罪行可判15年徒刑”，但因为“陈丕显骂我们是渣子，如果我们处理了潘国平，就会让他骂对了，还是让他（指潘）下去劳动吧！”为了给潘国平开脱罪责，王秀珍竟指使人把被潘奸污的妇女扣押在“工总司”，以后又转移到“文攻武卫”指挥部，并根据其荒谬地追查这些妇女“是否故意腐蚀潘国平”。又如“工总司”虹口区联络站常委袁松柏，因奸污女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工作，被判处徒刑五年，王秀珍、金祖敏等竟批示政法部门可免于刑事处分。当时受到虹口区委、区法院的抵制，施在那里不办。王秀珍、叶昌明又串通马天水，对区委施加压力，最后硬逼着区委同意免于刑事处分，将袁释放，还补发了工资。

第三次是在1974年10月9日，当张春桥、王洪文知道毛主席作了批示，陈丕显即将“解放”时，他们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徐景贤和王秀珍，“陈丕显要解放了，你们赶快把一批‘一

月革命风暴”的老头头名单排出来，要落实政策。这是给陈丕显看看，他的老对手还在。”“凡是面对面与陈丕显作斗争的，如潘国平、谢鹏飞、梁飞、林波、瞿达等，立即安排。”马天水等奉命立即开会布置，由市委组织组牵头，市总工会参加，审定186个造反派“老头头”的名单，要落实政策。其中，仅属于“工总司”帮体系的就有132人。

在“工总司”的核心成员之间，更是抱着“一损皆损、一荣俱荣”的“帮”性，互相包庇成风。如掌管市财贸大权的黄金海，实际是个大贪污分子。对他的经济上的问题，群众早已议论纷纷；后来市直属机关党委有人把情况报给马、徐、王，他们也置之不理。那个在“四人帮”垮台后自称“出卖原则”的马天水，竟把揭发材料转交给黄金海本人。又如戴立清，“文革”前是倒流户，在一家工厂做临时工，因乱搞男女关系，受到工厂领导批评。“文革”开始就造反，反诬厂党支部书记打击他，造反中与王洪文结成死党小兄弟，夺权后青云直上，成为“市革会”掌管科技系统大权的头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指名派他负责搞王维国专案。但他劣性不改，在此期间又奸污妇女、违法乱纪，干了大量坏事。他的问题终于暴露了，群众舆论哗然，惹坏了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人。王秀珍赤膊上阵，一定要保戴立清过关，仅仅叫戴在所谓“常委碰头会”上承认一下错误，以便搪塞了结，包庇过去。不料戴却拒不认帐。

王要马天水找戴谈话也不行。最后还是迁就再迁就，由王洪文决定叫戴“调换一下环境”，到后方基地管理局去当党委副书记。还怕他不肯去，一再讲半年之后再调回上海去到“工交组”任职。戴去上任之前，王秀珍等小兄弟们特地设宴送行，要戴去后方基地好好干，要争气，“不然人家要抓辫子”！

“工总司”帮体系的那伙人，特别是那些作恶多端、劣迹昭彰的社会渣滓，所以能横行上海十年之久，说到底仍然因为他们得到张春桥等的庇护支持。张春桥不是不知道那些人是一些什么货色。他有一次对王秀珍谈到，他在安亭事件时就知道“工总司”有一些人“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他“为了路线斗争就没有讲”。当“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因胡作非为实在闹得不象话而被迫处理下台了，张春桥怕另一个全市闻名的流氓打、砸、抢分子陈阿大也保不住，他对王洪文说：阿大再保不住，你王洪文不成为“光杆司令”了？于是拼命吹捧陈阿大是“难得可贵的工人干部”。张春桥曾经对王洪文一伙人说：“上海是无产阶级的堡垒，而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要“工总司”头头之间搞好团结。还说：“为什么要有个‘工总司’？这样有什么事可以关起门来解决，不要搞到外面去”。公然宣传“家丑不可外扬”那一套。而王洪文、王秀珍也一再告诫这伙人要为张、姚争气，“不要给‘中央领导’（即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添麻烦，给他们背包袱。”“不要内部闹意见，给

人家看笑话”。他们是相依为命的。陈阿大就恬不知耻的说过：“王洪文靠牢张春桥。阿拉靠牢王洪文，今后会有好日子过。”“张春桥一倒，我们就要树倒猢狲散”！

这些人，就是张、姚搞篡党夺权所依靠的社会骨干力量。

二十六、江青、张春桥等利用召开“九大”进行的阴谋活动

1967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要求在上海先作点调查。同年11月23日，中央决定要上海市搞一个准备提交“九大”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这里我们着重记述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怎样以上海为基地，利用召开“九大”的错误的指导方针，施展的一系列阴谋活动。

（一）“九大”前的小风波——批判《一切为了“九大”》

1967年秋冬间，上海出现一个红卫兵组织叫“中学生串连委员会”（简称“中串会”），其成员主要是本市一些中学的红卫兵，但也有些本市大学的红卫兵，还有少数北京等外地红卫兵。他们出版一种油印的和照相版的《红卫战报》，在1968年1月20日出版的第48期中，刊出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标题为《一

切为了九大》(以下简称《一切》)。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一场风波。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说它是反动社会思潮的反映。徐景贤3月7日发表谈话，说《一切》“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一切为了破坏九大”。这个罪名可谓大哉！于是，在一段时间内，发动了对《一切》进行的所谓“反动社会思潮”的围剿。那个“中串会”当然被作为反动组织砸掉了；《一切》的那几个青年写作者和“中串会”主要头头，都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有的被迫逃亡，有的后来被打成“胡守狗小集团”^①、“小爬虫”、“现行反革命分子”。

《一切》究竟怎样触犯了张春桥一伙人，以致他们暴跳如雷的呢？我们翻阅那年头对《一切》的批判文章，却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原来《一切》挨批的主要论点，只不过是一年前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等在造反夺权时高唱过的调子！例如，《一切》里说：“（要）把精力集中在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砸烂走资派的旧班底上。”“砸烂旧班底，要把走资派手中的权，把新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没有改造好的修正主义苗子手中的权统统夺过来。”“（要）夺好党权”，“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是

① “文革”初期，复旦大学内以胡守狗、周谷声为首，成立了一个名叫“孙悟空战斗队”的红卫兵组织。这个战斗队因参加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多次受到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等人报复打击。后来其主要成员被打成“胡守狗反革命小集团”。详情见本书《一打三反与调查“五·一六”》一章。

阶级斗争焦点的焦点”。“十七年来左派队伍并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革命的暴风雨中，已经暴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右派，为数众多的是中间派。”等等。还有一些用华丽的革命的词藻修饰的“豪言壮语”，也是当年造反报刊、传单中屡见不鲜的。例如，“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一代，在决定命运的政治搏斗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失去的只是精神枷锁，革命的铁扫帚将扫荡一切污泥浊水，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以其无限的光辉榜样磅礴于整个宇宙。”“一场大决战”正在面临“集中爆发”，要“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疾风暴雨”，在“九大”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进行再一次交锋”，等等。

这些话不都是响当当的造反语调吗？怎么忽然变为反动思潮了？

原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煽动和指挥造反英雄好汉们高唱这些“革命”的调门，是为了篡夺上海市的党、政大权。现在他们已经控制和掌握了上海市的领导权，谁还要再唱那些老调，再叫嚷“砸烂旧班底”、“夺权”、“来一场大决战”，岂非要打到他们自己头上，挖他们统治的根基了？此乃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为了进一步篡党夺权，围绕着“九大”，林彪、江青、张春桥等正在进行一系列阴谋策划和幕后交易。当时，他们是名副其实地“一切为了‘九大’”。但阴谋岂可暴露公开？而一个小小的“中串

会”，竟喊出了这个极富煽动性的口号，泄露了天机，自然要遭大忌了。

(二) 上海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的突出问题

1967年11月25日，张春桥主持召开“市革会”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上海党章修改小组”，由他自己、姚文元、徐景贤3人为小组召集人。他在动员报告中说：“无论如何不要把修改党章当作孤立的事，(要)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整顿和改造党的斗争结合起来，……那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集中了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搞所谓“征求意见”，编写简报，实质是假借党员和群众的名义，讲张、姚等要说的话。这些简报，每期都经张春桥亲自修改审定，然后上报中央。党章修改草案在上海起草过程中，有两点是十分突出的：

1. 吹捧林彪，竭力要把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

从“文革”前夜到“九大”，林彪、江青等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其关系处于“顶峰”时期。在修改党章中，江青、张春桥为了讨好、奉承林彪，竭力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1967年12月，张春桥多次要党章修改小组写吹捧林彪的简报上报中央。他通过徐景贤对小组成员指示说：“毛主席谦虚，看了党章修改稿，不同意把(他)个人(名字)写进党章。如果把上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强烈愿望，要求告诉毛主席，党章上就好写了。”张的意思是党章上写进了毛泽东“四个伟

大”称号，林彪的名字也就可以写进党章了。他强调简报的措词要“写出强烈的激情来。”于是在上海党章修改小组的简报中，出现了一连串吹捧林彪的话。在第5期简报中，强调要在党纲中写进林彪的“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的话，说这是“防修反修的根本保证”。在第9期简报中写道：“大家强烈要求在新党纲、党章中，进一步提高林彪××的崇高威望。”在第25期简报中说什么，“林副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象当年恩格斯捍卫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一样”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张春桥本人多次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吹捧说：“林副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贡献很大，是毛主席的可靠接班人，应该写入党章”；“把林彪作为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正式写入九大党章。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第九次路遥斗争的胜利，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江青也在1968年10月一次修改党章讨论会上执意要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在党章上。说什么：“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后来在党中央开会讨论党章时，她又叫嚷：“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到了“九大”预备会议期间，初步讨论了党章草案，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同意在党章中写上个人名字”的指示。江青、张春桥等怕吹捧林彪和规定他是党的领袖的当然接班人的那段话被删掉，于是，他们在代表中大肆活动，一再做“思想工作”。张春桥在上海代表大会上说：“对林副主席

的评价问题，不能写在政治报告里……是否把这个问题放在党章中比较适合，你们讨论一下，然后把你们的意见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他还说：“你们手头的稿子中，有两段话（即‘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及‘江青领导文艺革命的功勋’），毛主席说不要写得太多，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写了下来，……这两段话很重要，就怕给主席勾去，我们要努力保存下来，你们讨论一下，把代表们一致意见，报给主席。”后来，当党章修改改革案稿定下来后，张春桥、姚文元十分得意。他们认为，在林彪面前立了一大功。

2. 取消党员预备期的规定，为一些“造反头头”“帮派骨干”的入党、掌权创造条件。

1968年4月，张春桥在接见江西省“革委会”赴沪学习团时讲到：“修改党章，在我们国家是头等大事。抓修改党章的问题，对造反派很有意义。”王洪文在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更是赤裸裸地叫嚷：“党权是权中之权”，“（入党）要看站过来以后的表现。如果路线斗争觉悟高了，当然可以是党员。”这些话露骨地表达了“以帮划线”、“以帮代党”的意图。而那一批靠打、砸、抢造反上台的头头们，讲得更加露骨和疯狂。在一次徐景贤、王秀珍主持召开的“工总司”常委关于修改党章座谈会上，这些人声嘶力竭地大叫大嚷。有的说，“绝对不能要预备期，如果要，我们造反派大多数人就掌不了权。”有的说，“党权是权中之权，

我们没有党权，造反就白造了。”有的叫嚷，“如果要预备期，就剥夺了我们做‘九大’代表的权利。”“如果谁要在新党章中规定有入党预备期，我们就造谁的反。”对这些极端错误的言论，张春桥、徐景贤居然以他们是代表上海工人阶级说话的名义，整理成《上海工总司常委对修改党章的意见》，上报中央。

（三）“九大”的上海代表产生过程中的阴谋活动

1、“市革会”产生“九大”代表工作小组”和下属的“九大”材料小组”干了些什么。

“九大”召开前，上海各区、县、局以及各基层的党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根本没有恢复起来，全市的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大批的各级领导干部还处于被靠近审查、被隔离、以至被监禁的状况。“九大”的准备工作根本无法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而是完全被张春桥及其羽翼、帮派骨干所控制了。

1968年11月22日，“市革会”发了沪革（68）第158号文，宣布成立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组成的“上海市‘革委会’产生‘九大’代表工作小组”，操纵了用“民主协商”办法推选“九大代表”的领导权。同年12月，张春桥、姚文元又提出在这个工作小组之下，要成立一个“‘九大’材料小组”。材料小组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张春桥说：“除了准备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的参考材料以外，还要收集‘二月逆流黑干将’的材料，准备在‘九大’会议上继续

批。”王洪文、徐景贤便根据张的布置，迅速调集人员搭起“材料组”架子。徐景贤在向小组人员交底时，公开地把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领导同志称作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明确地告诉他们：“‘九大’期间斗争是复杂的，‘九大’会上还有斗争。要把‘材料’汇集起来，准备‘九大’会上用。”于是，这个“材料小组”在王洪文、徐景贤直接指挥下，打着为上海代表准备材料的幌子，处心积虑地收集、整理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们查档案，搞“调查”，甚至利用特务组织“游雷诗小组”提供的材料，先后整理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材料 76 份达 1100 多页。并按照王洪文、徐景贤的意见，按上了醒目的标题。如《上海青年京剧团演员揭发叶剑英》，《陈毅——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李先念的部分反动言论》，《李富春操纵“联司”妄图挑起上海第二次大乱》，《大叛徒谭震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材料》，《大搞独立王国，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聂荣臻流毒之一、之二》，《陈云美化资本家部分言论》等等。这些材料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恶毒的诽谤和攻击。以后，“‘九大’材料小组”又将这些材料汇编成 14 个单项材料，编入“九大”代表的参考资料，作为他们在“九大”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同志发难的“炮弹”。

2. 把一些帮派骨干分子“推选”为“九大”代表。

1968 年 11 月 18 日，“市革会”发出《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几点意见》。文中在谈到产生代表的方法时是这样说的：“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产生‘九大’代表工作小组的主持下，经过各单位提名，并经各单位、本系统的协商，提出代表的初步名单，然后再由全市各方代表共同协商一致，报请中央、中央文革批准。”这个规定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党的组织尚处于瘫痪状态，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选举的实际情况。但这个规定给了张春桥等极大的方便，利用所谓“民主协商”上下其手，把某些他们所赏识的造反头头推选为“九大”代表。

1968 年底“市革会”开会，讨论上海市出席“九大”的代表名单时，张春桥对着名单，大摇其头。十分不满地说代表中“老造反”太少了，这样不能反映“一月夺权风暴”的新形势，要增加“老造反”代表。他直接点名陈阿大① 可以当代表。但当时陈阿大根本不是党员，于是张春桥下令，要上海良工阀门厂把发展陈阿大入党作为“市革会”下达的紧急任务立即解决。当时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党组织根本没有恢复，张的那些党羽们决定由厂“革委会”行使党组织权力，来讨论通过陈阿大入党。就这样，陈阿大凭张春桥一句话，马上入了党，当上了“九

① 陈阿大原是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文革”初期追随王洪文造反，任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五虎将”之一。“一月夺权”后，被安排为市总工会副主任、市工交组负责人、“市革会”常委、市委判研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委员会委员。

大”代表。粉碎“四人帮”后在清查运动中发现，陈阿大连入党志愿书也没有填写过。

又如同济大学的陈敢峰，^①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内定他为“九大”代表时，也是一个“党外人士”。为了让陈“合法”当上代表，张春桥面授机宜。1968年11月25日，徐景贤、王少庸赶到同济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王少庸装模作样地宣布：“市革会”授权同济大学党的核心小组可以发展新党员。摸清了张春桥意图的同济大学“革委会”的头头，马上报出了陈敢峰和另一个造反派头头的名单。当时同济大学基层党组织还未恢复建立，根本无法履行入党手续。“革委会”某些头头别出心裁地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用鼓掌通过的方式来表决。名单一报到市“革委会”，马上就批了下来，陈敢峰立即成为“九大”代表，后来还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又如有一个商业系统的“九大”代表，自己事先根本不知道已被“推选”上了，睡梦中，横里糊涂被喊醒去机场上了飞机，才知道去北京参加“九大”。

3. 猛狂地攻击中央提名由上海推选的陈云和陈毅两位领导同志。

① 陈敢峰原是同济大学红卫兵团组织《东方红》的头头，因在“1·28”和“4·12”两次炮打事件中，保张春桥有功，被张春桥赏识，担任了“市革会”副主任、市委委员的要职。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罪恶活动。1983年1月被判有期徒刑八年。

陈云和陈毅是中央提名在上海选举的“九大”代表。江青、张春桥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心狠，竟进行非法调查，甚至私设专案，企图制造诬陷材料。张春桥、王洪文、王少庸抓住一个所谓“陈云和白首叛变分子的关系”的案子，布置专案办公室查陈云的历史，想从中捞点什么诬陷材料，但一无所获。1968年10月张春桥获得一份材料，诬陷陈毅于抗日战争初期，在江西根据地遵照中央指示，为推动国民党地方军队抗日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可能有叛变自首”行为。张如获至宝，当即说道：“请专案办公室查一查。”为了隐瞒自己的阴险居心，张还授意对陈毅的立案审查，以填写“九大”代表资格履历表为幌子来掩饰。在立案审查中，“专案办”派出了大批人员，先后到9个地方，做了20余次的调查，搞了53份调查报告和审讯笔录，费尽苦心地写出了185页的《关于陈毅政历问题的调查综合报告》，企图在陈毅当选“九大”代表问题上制造麻烦。当毛泽东明确陈毅当代表参加“九大”后，张春桥表面上无可奈何，背地里又千方百计竭力贬低陈毅。1969年1月，张春桥对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指示说：“中央确定陈毅的‘九大’代表在上海选，要把陈毅在上海的材料整理出来报送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要把陈毅的‘反动言论’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进行批判。”王洪文、徐景贤跟着鼓舌说：“陈毅当代表、当中委，我们是想不通的，主席一定要放，我们没有办法，但对我们对陈毅

还是要批的。”

4、秘密炮制《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和办上海“九大”代表学习班。

1969年初，张春桥、姚文元指使徐景贤、朱永嘉等组织撰写所谓《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徐景贤传达张、姚的话说：“九大即将召开，上海代表多数来自基层，不了解上海‘一月革命’是怎么回事，开起会来人家一攻就没办法了。要搞一份大事记一类的材料，给代表们武装一下”，“要给‘一月革命’留点东西”。这份“大事记”除了疯狂诬蔑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还用了一半以上篇幅记载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言论和活动，反复宣扬“没有张、姚，就没有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为张、姚等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大事记》草稿曾拿到上海“九大”代表学习班上征求意见，修改定稿约1万余字，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扩充成7万余字的“长编”。

1969年1月20日，上海的“九大”代表除极少数人外，集中在延安中路200号参加为期7天的“迎接‘九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是根据张春桥“要给代表们武装一下”，强化“阶级斗争觉悟”的旨意而办的。开班的第一天，王洪文作动员报告，狂妄地讲述了他作为上海“市革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上如何同一些老帅“斗”的情况。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金祖敏、王维国、陈

阿大、戴立清等人接连地在学习班上发言、作报告。他们肆意诬蔑、攻击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同志。整个学习班的基调是，“这次召开‘九大’，斗争是非常激烈的，特别对几位老帅，我们上海代表要作好思想准备。”同时极力吹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功绩”，为他们涂脂抹粉。每个代表在学习班中都拿到了厚厚一叠的《九大代表参考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九大’材料小组”精心搜集和整理的。材料的主要内容：一类是所谓上海各条战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新生事物、新面貌的情况，这是欺世盗名，往江青、张春桥一伙人脸上贴金；另一类就是挖空心思搜集的诬陷、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其中最突出的是收有103条之多的所谓《陈毅反动言论集》。由于这些材料都是背着中央干的，因而他们又极其心虚地对代表们讲：“你们看了材料要心中有数，但要保密，不得外传，这是国家机密。”

（四）在“九大”的上海代表大组里的阴谋活动

1、疯狂地组织围攻陈毅。

陈毅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上海人民对他更有深厚亲切的感情。于是，陈毅就成为林彪、江青等人阴谋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之一。早在“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在上海就多次恶毒地诬蔑

咒骂陈毅。1968年11月，他在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万人大会上，攻击陈毅是“二月逆流黑干将”。以后又在“市革会”讨论“九大”人选会议上恶狠狠地说：“陈毅这个人根本不会打仗，只会下棋。……他从苏区、井冈山一直是反毛主席的。”马天水、冯国柱、张敬标等那些委身投靠的“老干部”也紧紧追随者张春桥的调子，恶毒污蔑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国民党部队搞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是“戴黑眼镜、结黑领带、说黑话的黑线人物，是一门炮口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大炮。”他们说“对上海来说，对陈毅存在着迷信，因此要通过揭发、批判来肃清陈毅的流毒。要把他的一些假象剥去。”

上海的“九大”代表一到北京，张春桥、王洪文等就开始了组织围攻、打击陈毅。这里，我们引用“九大”代表、川沙县文教局凌新麟的揭发材料：“九大”开幕前，我们上海代表在京西宾馆开预备会，我们看到一个身穿淡绿色军装上了年纪的同志慢慢地走进来，在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这就是陈毅同志。有个人叫陈毅同志到组长那里去报到。陈毅同志问：“组长是谁？”有人对他说是王洪文。陈毅同志就到王洪文那里去报到。王洪文见了陈毅同志冷冷地问：“谁叫你来的？”陈回答他：“毛主席叫我的。”王听了大为不满，又问：“你现在做什么？”陈毅同志说：“我在蹲点。”王洪文又问：“你到底在做什么？”陈

毅同志说：“我和朱老总在点上劳动。”王洪文竟狂妄地大声训斥道：“什么朱老总，都是右派。”

第二天，张春桥、姚文元迫不及待地把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找去策划说：“今天晚上召开会议，‘帮助’陈毅（认识）所犯的错误，先叫陈毅交代！”当天晚上，上海大组就召开会议围攻陈毅，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金祖敏、陈阿大、唐文兰等轮番上阵，对陈毅进行所谓“批判”，会议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半夜12点才结束。

经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精心策划和组织，4月中旬某天上午在京西宾馆9楼会议室，上海大组又一次批斗了陈毅。据陈阿大交代，张敬标曾对他说“今天批判陈毅的会议，专门组织了徐景贤、金祖敏、陈敬峰等人发言，他们都作了充分准备来剥陈毅的画皮”，“陈毅资格很老，要把他批臭，叫他在上海大组里没有市场”。张还对他说：“今天会议没有叫你发言，但你要坐在前面，会中间可以站起来插话，进行助威，但不要放空炮。”会议中间，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盛气凌人地提出各种荒谬的问题，攻击陈毅。当陈毅愤怒地予以驳斥时，张敬标插话：“你放老实一些，不要表功。你想用讲历史为自己错误辩解，来糊弄。你可以欺骗青年人，但欺骗不了我们，你要老实交代历史上怎样反对毛主席，怎样反文化大革命的。不要忘了你是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的。”会后，王洪文自吹自擂：“今

天会议组织得最好。这些发言都是重磅炮弹，震得他坐不住跳了起来。”还夸奖张毅标“在关键时刻的插话，很起作用”。

“九大”会议期间，陈毅收到了一封上海柴油机厂的群众来信。信中表示拥护陈毅当选主席团成员，并揭露了张春桥及其同伙在上海血腥镇压群众的罪行。陈毅按规定的程序把信交给了大会主席团。张春桥一伙知道后，十分恼火，马上在这封信上大做文章，硬把此信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的来信，借机又一次批判陈毅。4月21日，王洪文向上海大组的各小组布置说：“春桥××指示我们批陈毅，‘上柴厂’的反革命拥护陈毅当中央委员，他就代表这一小撮反革命。”22日下午，在宾馆会议室里，又一次组织了批斗陈毅的所谓“帮助会”。一些帮派骨干围绕着这封人民来信，纷纷地查问、训斥、攻击陈毅。王少康阴阳怪气地说：“这封信不给别人写，而给你写，这个问题是值得警惕和深思的。”王秀珍恶毒地讲：“你是‘老右’，上海柴油机厂来信的人就是（你）的社会基础。这种人排你，可见你代表他们的利益，你要认识这个问题。”唐文兰也责问道：“这封信是谁写给你的，要讲清楚。为啥反革命分子写信给你，不写给别人。”在“批判”中，这伙人还诬蔑说反革命写信给陈毅，说明拥护陈毅是反革命，他就代表这一小撮，他作右的代表是够格的。当陈毅对这些荒谬诬蔑之词据理反驳时，他们又气势汹汹地给陈毅套上“想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帽子。会后，徐景贤还继续攻

击说：“陈毅是个老右，是个老运动员，有经验，在会上光讲自己的功劳，想欺骗我们……。还是要好好剥削（他的）威风。”

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张春桥等在上海大组所搞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干预，不同意陈毅继续参加上海大组的活动，围攻陈毅的闹剧才收了场。

2、选举中的阴谋。

“九大”选举前，张春桥、姚文元等就四下活动，在上海、山东、浙江等大组内，到处煽风点火：“朱德、陈毅等几个老帅检查交代问题，态度不老实，立场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看法，还要很好进行批评帮助教育。即使他们选上了中央委员，也是没有好处的。”煽动代表们不投老帅们的票。张春桥、王洪文还别有用心地在上海代表面前讲，“我们这次选票问题上要注意，只有毛主席可以选全票，就是周总理也不能和主席一样。特别对几个老帅不能选全票，选票多了，他们就要翘尾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紧密配合，王洪文参加了吴法宪召开的秘密会议。回来后马上向徐景贤、王秀珍等传达了吴法宪的话：“这次选举对一些‘老右’不能满票，要杀杀‘老右’的威风。”张春桥也通过王洪文向上海代表传话说：“对几位老帅等，不能给满票，要剥削他们的威风。”王洪文还遵循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具体布置大家不要投朱德、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陈云、李

富春、张云逸、肖劲光、邓子恢、陈其南、张鼎丞、徐海东等14人的票。王洪文气势汹汹地说：“选票不能给他们太多”，并公然向代表们煽动说：“我们主席团上的人，不大好动手，你们在台下，可以多划掉几个。”徐景贤也在一旁鼓噪道：“在选举问题上是有斗争的。对这些老家伙，毛主席讲了话，不选不行，但要剥削他们的威风，不使他们今后翘尾巴。”王秀珍则咬牙切齿地说：“看看这些老右们，不服我们，通过选举把他们威风扫地。”

在“九大”选举中，还有一个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的小插曲。为了讨好林彪，张春桥、姚文元两次把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人召到钓鱼台，授意他们在上海代表中做工作，把不是“九大”代表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提名九届候补中委。张春桥向他们透露这是征求了空军吴法宪的意见的。张春桥亲自大肆吹嘘王维国，说：“王维国在浙江就是支左的，到上海后继续从左的方面介入，是有贡献的。”王维国就这样被提名并选上了中央候补委员。事后张春桥曾对其老婆李文静说过：“空四军、空五军是林彪最喜欢的部队，我提（王维国、陈勋桓）当候补中委，林彪一定很喜欢。”

4月24日，“九大”正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成为中央委员，马天水、金祖敏、王维国、陈勋桓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江青、张

春桥一伙人一方面弹冠相庆，有那么多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为墨党夺权上了一个新台阶而狂喜。另一方面，他们虽然当选了，但得票数都很少。听了公布的选举结果，这伙人又气急败坏，丑态百出。王秀珍流着眼泪骂“中央右的（势力）太强了，对中央新生力量恨得很，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打了叉。他们对毛主席有什么感情。”当天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听到江青、叶群、春桥、文元的票少，我非常气愤”，“一定不要忘记权的可贵，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斗争到底，至死为止”。王洪文则狂叫：“我们提议大会应该查票，谁把江青打叉的，是现行反革命，揪出来斗。”为了掩盖他们这一伙人的“不得人心”，当天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急忙把上海代表集中起来做“思想工作”，规定代表们回上海后不得传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得票数，说“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严格保密”。

（五）天安门城楼上“晋见”江青的一幕

1969年4月24日下午，“九大”终于闭幕了。当时中央批准新当选的九届“中委”和“候补中委”留京参加庆祝“五一”的活动。5月1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急忙把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带到天安门城楼上“晋见”江青。江青热情地拉着上海那些人一起拍照留念，她说：“我同上海的感情很深，文化大革命初，是我和春桥、文元××在那里搞起来的，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也是我的根据地，是我们老家，所

以我看到你们这么多人进入中央，我特别高兴。”王洪文、王秀珍则肉麻地对江青说：“中央有坏人，把你的名字也又去，我们想不通，要和他们斗。”徐景贤也紧跟着讨好：“‘中央文革’只剩下你们几个人了，他们还怀恨在心，我们真想不到。”江青又说：“以后的斗争还是很复杂的，我也要提醒你们，你们跟人要跟得对。”张春桥说：“你们现在不是一般的造反派头头，而是高级干部了。各种力量都在争夺你们，不要被人争夺过去。”对江青、张春桥这样的“关怀”、和“特殊感情”，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感激涕零”，共同表示了效忠江青的“决心”。他们说：“我们坚决跟‘中央文革’、跟江青××干革命。”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一幕“晋见”和“表忠心”的行动，为张春桥所说“上海是以江青××为首的‘左派’堡垒”作了最好的说明，充分地反映了后来在中央形成的“四人帮”，就是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二十七、“文革”中的整党建党和市第四次党代表大会

张春桥早在1967年3月就公开提出什么“党要改造”的论调。1968年1月15日张春桥在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座谈会上说：“旧市委这个组织不行，现在提整顿、改造，有的就是重新建设一个党。……实际上也是清党。……这次运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要相当大部分改造，有的是重建。”同一天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群众集会上讲话，提出“党的名称不一定叫共产党，可以改别的名称。”1968年11月，“市革会”根据张春桥的旨意，选择所谓“老造反基地”上海良工阀门厂、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等3个基层单位，进行整党建党的试点工作。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以后，整党建党正式被列为“文革”中“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5、6月份，上海全面推开了这项工作。到了1970年2月党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时，全市已经有80%的基层单位搞了整党建党。张春桥、姚文元及其羽翼们对整党建党工作抓得这么紧，是为了他们阴谋“改朝换代”、结帮篡党的需要。

（一）造反派操纵整党

张春桥、姚文元搬出了所谓“群众整党”的“理论”。张春桥说：“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党组织的恢复建立，都须经群众的讨论同意。发展党员要充分征求群众意见。”他们控制的《解放日报》于10月20日、22日、25日连续发表《整党建党是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开门整党》、《整党建党领导班子必须经过更新》等3篇社论，明确地提出：“整党建党依靠谁？要紧紧依靠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开门整党，首先要向党外的革命造反派开门。”并一再宣扬：“整党建党工作不能依靠站错队的党员干部，必须吸收优秀的造反派”，“整党建党的领导班子，必须吸收新鲜血液，吸收一些优秀的造反派入党。”于是，那些搞打砸抢、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头头们，在所谓“群众整党”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插手整党，干预整党，以至操纵整党。

在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抓的整党建试点单位之一的上海良工阀门厂，全厂的整党建工作就在一个非党造反派头头的操纵下进行的。这个非党造反派头头不仅包办了全厂整党建工作，还主持了厂党委的筹建、讨论党委委员人选等工作。全厂党员的考察、评议、鉴定、党员恢复组织生活、预备党员转正、发展新党员等理应由党组织负责处理的工作，都由一个以造反派为主组成的“整党调查组”来负责，党组织完全被抛到了一边。

公用事业局在整党建党中举办基层单位整党负责人学习班。在这个有71人参加的学习班中，各基层造反组织的头头就

占了50名，其中竟有29人是非党群众。更为出奇的是，以局整党核心小组身份在学习班上作整党建动员报告的竟是一个非党的造反派头头。

有一部分单位，尽管一些非党造反派头头没有进入整党的领导班子中，但他们把一些听命于自己的人塞进领导核心，充当“代理人”，自己在幕后操纵整党。如新华铸钢厂，该厂“革委会”第二把手、造反队长没能在厂整党核心小组中占到位子，就把两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干部塞进了领导小组。评论党员时，他强行干预，迫使整党领导小组按他的意见，暂缓恢复一部分党员的组织生活；在筹建党支部时，他又私自策划安排了对他唯命是从的5人支部委员会名单。

以上所举的事例，不是存在于个别的、少数单位之中，而是普及全市的现象。整党建党工作的领导权被造反派头头攫取了，造反派成了整党建党工作的“主角”。

（二）“群众评议”结合“革命大批判”——造反派整党员

整党建党工作开始不久，张春桥、姚文元便以党员恢复组织生活要经过群众评议为名，实行对广大党员的政治迫害。何谓“群众评议”呢？即党员在恢复组织生活之前必须经过所谓造反组织“从九次路线斗争的高度”“考察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群众评议”通过了，方能恢复组织生活，承认是党员；反之则剥夺其参加组织生活的权利。

1968年1月26日，张春桥在接见上海戏剧学院“革委会”、革命“狂妄大队”的代表时说：“中央文件谈到消除党员问题，但没有讲什么时候清除。……事实上有些人不让他们过组织生活，实际上就已不承认他们是党员了。”

“群众评议”究竟怎样搞呢？1970年6月初，王洪文在整党建党试点单位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叫嚷：“我看还是要找点活靶子批，否则还是和平整党。……要上挂下联。”6月18日，《工人造反报》上发表了《活学活用新党章，深入开展整党建党工作》的文章，介绍了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所谓“整党建党工作经验”。其中指出：“要把整党建党中群众评论，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强调“群众评论不能和和平平，不痛不痒，要提倡斗争哲学。”“市革会”在向中央汇报上海整党建党情况报告中也写道：“改变整党‘温吞水’状况，关键在于发动党内外群众，坚持斗争哲学，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干部和党员，发动群众拉破情面，进行批判帮助，挑起灵魂深处对立面的斗争。”这里所谓“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一切都是以是否顺从他们那一伙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们说：“整党要以大批判开路，大批判要紧紧贯穿在整个工作的始终”。于是，共产党员成为被“批斗对象”，必须在造反派面前三番五次地“斗私批修”，“深挖思想根源”，端正“对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态度”；造反派则诬蔑广大党员“保守”、“复古”、“对资本主义路线有感情”等等，肆意进行攻击，不容许提出任何申辩和异议。许多党员被套上“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文化大革命站错队”或“不关心政治”等等罪名，过不了“群众评议关”。他们中有的被作为废料清除出党，有的被“挂起来”，“暂缓”恢复组织生活，也有的受到其他各种党纪处分。

商业二局“革委会”规定，党员恢复组织生活不仅必须经过造反派的评议，而且即使被批准恢复了组织生活，也要由非党造反派列席组织生活进行“监督”，稍有不对，即“拎”出来进行“再处理”。

《文汇报》社的造反派头头在整党中借群众评议的名义整党员。一些党员因为给工、军宣队提过意见，以及对报社造反派夺权有看法，被迫三番五次在群众大会上作“深刻”检查，检讨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要得到造反派头头点头，才能获准“通过”。

上海第一医学院在整党中搞所谓“揭露矛盾、分析矛盾、斗私批修”，逼迫每个党员深挖思想根源，“上纲上线”^①斗私批修，并让“群众”和党员开展面对面斗争，把党员作为斗争、批判

① “文革”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一切工作的总纲。“上纲上线”就是把问题提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分析。实质就是给自己扣罪名、戴“帽子”。

的对象。

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党羽尤其把广大知识分子党员看作“异己”力量，借口“吐故纳新”^①来整他们。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科技、文化、教育等系统，搞得特别厉害。姚文元在1969年5月16日同上海市新闻界负责人和写作组人员座谈时，就曾恶狠狠地说过：“对知识分子怎么看法？复旦大学要大大吐故一批，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出党。”

在“市革会”调研组1969年8月28日编的《简讯》第393期《怎样正确估价知识分子中的党员队伍？》一文中公然说：“高知（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党员是知识分子队伍中最复杂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一个够得上‘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条件，即使不是九类分子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是死气沉沉的党员，经教育也不会有多大转变，完全是‘二氧化碳党员’。对这种人，应大量劝退，少数开除。”

华东师范大学，全校有720名党员，整党中有118人被认为“有严重错误”或“死气沉沉”，被宣布暂缓恢复组织生活或停止组织生活。有38人在“清队”中被扣上“九类分子”或

① 1947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吸陈腐空气，党就没有朝气。”这段话后来在整党内被称作“吐故纳新指示”。“吐故纳新”在整党内被作为吸收新党员、清除犯错误不合格党员的专用名词。

“政治面目不清”的政治帽子，被开除、劝退或取消预备期。二者合计占全校党员22%。

华东纺织工学院，全院有390名党员参加整党，受审查被暂缓恢复或停止组织生活的党员就有69人，占党员总数的18%。

上海师范大学，在20名正副教授党员中，有8人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或叛徒、特务，有5人被“审查”后定，其余的7人都被认为有程度不同的政历问题或是“学术思想问题严重”，整党中，都不能如期恢复组织生活。

文化系统有党员782人，其中竟有525人（占党员总数的67%）被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而暂缓恢复或停止了组织生活。

原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因编演过《海瑞上疏》这出戏，“文革”中被诬为同“毛主席唱对台戏”，惨遭迫害。1968年3月，由市专案办公室设立专案隔离审查。1970年11月，经张春桥批准，强行给周信芳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作出“永远清除出党”的决定。

在工业、交通系统，错误地被“吐故”处理的党员也不少。如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全厂原有党员1033人。被以各种“罪名”暂缓恢复或停止组织生活的党员就有152人，占全厂党员总数的14.5%。在这部分党员中，有许多是被强行戴上各种帽子而遭“清洗”的。如二纺工场有名女党员，仅因家庭有困

准，对政治学习和党内一些活动，有时不得不请假，便说她“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文化大革命”，套上“死气沉沉的党员”的帽子，暂缓恢复组织生活。又如有一名党员，因爱人外地工作，孩子幼小，家庭有困难，要求把爱人调回上海。就说她“不安心工作”“私心重”，也把她划为“死气沉沉党员”。

上海医疗电镀厂有一个老工人党员，“文革”前工作积极，多次被评为市先进生产者。这样一位勤勤恳恳的老工人党员，就因不会唱“革命样板戏”，背不出“老三篇”，而被斥之为“革命意志衰退”，竟被劝退出党。

张春桥、王洪文到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搞整党建试点，点名要发展两名有严重错误的造反派头头入党。有个老党员表示不同意，触怒了这伙人。结果被污蔑为“死气沉沉”的党员，作为“吐故”对象，强行清除出党。

据“市革会”组织组 1972 年 10 月 18 日向市委汇报的上海整党建党情况中的统计数字，“到同年 9 月底止，全市处理了 18841 人，其中开除党籍的有 4137 人，劝退的有 2227 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有 4166 人，给予其他各种党纪处分的有 8411 人。”其中，就包含着一大批被强行扣上各种各样帽子、遭受政治迫害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党员。

（三）突击发展帮派骨干入党，篡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

“九大”以后，全市各单位在整党建党中，陆续恢复、建立

了各级党组织。先是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到 1969 年 10 月，在全市 11900 多个基层单位中，有 1700 多个单位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张春桥一伙嫌进度太慢了，不能适应他们尽快召开党代表大会，建立由他们一手控制的“新市委”的需要。1969 年 11 月 10 日，张春桥批评“市革会”有关部门“整党为什么（搞得）那样繁琐，为什么一定要经过建立整党领导小组、核心小组再建立党委。中央没有这样规定，‘九大’通过的党章也没有这样规定。”他下令加快建立各级党委的速度。按照张春桥的旨意，王洪文等催促各单位加快“建党”步伐，并提出全市要有三分之一的单位在 1970 年春节前建立党组织。不按照他们的旨意行动的就是“思想上保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快以“合法”面目召开市党代表大会，选举“新市委”，进一步为全面篡党夺权披上合法外衣。

在“市革会”的“号召”下，全市各单位一哄而起，都想抢先建立党组织，挤进三分之一的“先进”行列。有的根本不经过党员选举，在造反派的控制下，凑几个党员，召开一个什么会议宣布一下，就建立了党支部；也有的由几个“革委会”把手和造反派头头直接点名，不通过广大党员，就产生了党委的领导班子；还有将整党领导小组直接转换为党的核心小组，又转为正式党委的，种种怪事，纷纷出笼。这段时间里全市出现了大小不等的报喜队伍，向上级机关、向社会上宣告本单位党

组织成立了。用这种敲锣打鼓表面上的热闹来掩盖他们对党组织的阴谋篡权活动。

如搪瓷机修厂的党支部，完全是在马振龙、曹德宏等造反派头头的操纵下成立的。党支部一成立就宣布，今后任何工作都由支部委员和马振龙、曹德宏（二人均不是党员）一起研究决定后才能贯彻执行。党支部并马上把马振龙、曹德宏列为首批发展对象。

沪东造船厂一些非党造反派头头，为了挤进党委抓党权，在筹建厂党委时，公然提出要保留一部分党委委员名额，留给以后入党的造反派。他们胡诌什么：“不吸收新鲜血液，不保留名额，就体现不出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厂党委委员应选 20 名，结果只选了 10 名，其余名额被强行保留了下来。

机电二局 822 厂，该厂“革委会”主任岑麒麟（“工总司”委员、王洪文小弟兄）虽然没被批准为党委成员，但工厂大权实际掌握在他手中。党委的决定和安排，必须先征求他的意见，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不能贯彻下去，他完全凌驾在厂党委之上。

上海港务局装卸二区，形式上成立了区党委，但实际领导权还是掌握在一名任“革委会”副主任的造反派头头手中。虽然这个造反派头头在党委里没位子，但党委书记对他言听计从，完全成了造反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当外贸局和商业一局的党员正在讨论恢复建立党组织，领导班子的人选还没有酝酿出来的时候，上面却突然批下了这两个局党的核心小组的名单，连这两个局的工、宣队和“革委会”头头也感到奇怪，难以理解。广大党员更是议论纷纷。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市革会”六办（财贸组）的头头为了抢进度，随手将这两个局的整党领导小组名单，改为党的核心小组批了下来。

在这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下，恢复、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数目，迅速膨胀起来。1969 年 11 月 30 日统计，全市建立了党委、总支或支部的，只占全市基层单位总数的 10%。两个月后，建立党组织的已达到全市基层单位总数 46% 了。

在恢复建立各级党组织的同时，张春桥一伙又大搞“突击发展”、“火线入党”的所谓“纳新”。首先被接纳的对象是那些造反起家占据了各级“革委会”和“群众组织”领导岗位的头头们。把这些人抢先发展入党，是为了让他们进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篡夺领导权。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物，“文革”前大都表现不好，不少人甚至是前科分子，连积极分子条件都不够，根本不能入党。他们一朝成为各单位的头头，都急于钻到党内来。王洪文的小兄弟们说得非常露骨：“党权是权中之权。没有党权，造反就白造了。”1968 年 10 月，王洪文在“工总司”机关建立了“文革”中上海第一个党支部，自封为书

记，一帮“小兄弟”们欣喜若狂，戴立清等说：“这一下子，我们都可入党了！”他们说什么：“造反就是最好的入党申请书”，“入党就是看九次路线斗争的表现”等等。然而，正直的共产党员是决不会同意这种人入党的，这些人的入党问题受到许多党员的抵制。为此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气急败坏，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指责建党问题上“右倾保守势力”作梗。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竟规定：已进入市、区、县、局领导班子的（造反派），都要发展入党。

1968年9月，张春桥在一次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说：“老党员为什么没有朝气？这里可以提出个结论，发展一批优秀造反派入党，他们就可以老实，如果不发展，他们一些人就会翘尾巴。”

1969年6月28日，他又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方针是定了的，要首先在产业工人中的优秀的造反派战士里发展新党员。”王洪文说：“我们培养干部，发展党员，重要的就是看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现实表现好，就大胆地提，大胆地用！”“不要看有的人屁股上有毛（屎），但关键时刻他能起作用！”他们认为，只要是听话紧跟的，只要是忠心为帮派体系效劳的，管你是否有前科，什么流氓、骗子都可以发展入党，都可以大胆地提，大胆地用，为发展那些劳资班班、党员群众通不过的人入党大造舆论，大开“绿灯”。

马振龙原是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文革”中起来造反，投

靠了王洪文并得到王的赏识，当上了“工总司”轻工业联络站负责人，后又当上了轻工业局“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在准备召开上海市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前，王洪文要把马拉入党内。但马品质恶劣，表现极坏，基层广大党员坚决反对。王洪文下令该厂的上级公司党组织在对马的所谓“政审”中，把马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派局“革委会”常委和组织组负责人去支部坐镇，这样马才被“通过”入党。马入党不久，即被任命为局党委副书记。

戴立清是上海标准件一厂工人，“文革”中带头刮经济主义风，大搞打、砸、抢，还有强奸妇女罪行。而王洪文夸他是“关键时刻用得上的人”，点名要把他拉进党内。于是，王秀珍、金祖敏下令上海标准件一厂的上级党组织限期发展。由于基层党组织的抵制，拖了一年多。在王秀珍等人压力下，直到1971年5月，才把戴拉入党内。上海标准件公司党委在批准戴入党决议上写明：“现按上级批示，戴立清入党。”

“工总司”徐汇联络站头头周妙兴，“文革”中大搞打、砸、抢。他曾因阻止他那一派的打死人的凶手投案，并主谋策划聚尸灭迹而受到拘留审查。后在王洪文的包庇下释放并受到重用，任命他为徐汇区“革委会”工交组长、区工会副主任。以后王洪文又要发展周妙兴入党。王洪文、王秀珍亲自在发展周妙兴入党的报告上划圈批准。入党后不久，这个有犯罪行为、被

群众称为“土霸王”的打、砸、抢分子，即被提升为区房地局党委书记。

上海县“革委会”秉承徐景贤的旨意，要突击发展造反派头头杨根宝入党。当杨根宝所在的公社党委指出杨有“三开”（即杨曾经犯错误被开除公职、开除团籍和当兵开小差）的劣迹时，县“革委会”头头竟然说：“杨根宝是农村造反派，大方向正确。（我们）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三开”是“资反路线”迫害的。”逼迫公社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发展杨入党。

为了达到把一些造反派头面人物、帮派骨干、角刺人物拉到党内来的目的，张春桥、王洪文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施展了种种卑劣手法。如什么“飞过海”，^①“压指标，消灭空白点”，“下任务，据比例”，“先升官、后入党”，“领导压阵、限时限制发展”等等，真是费尽了心机。

“文革”中紧跟王洪文造反的倪叔英，在1965年因写信攻击党中央和司法机关，受到留党察看2年的党纪处分。在整党建党中他看准时机，提出要撤销处分，其所在党支部48名党员均不同意。但由于倪是“老造反”，王洪文亲自给“上钢五厂”

① “飞过海”即特基层党组织、本单位党员不同意发展的对象，调到另一单位，采用暗箱操作，缩小问题，甚至抽去档案材料等瞒天过海的办法，将其拉入党内。这是张春桥一伙人在拉拢混骨干分子入党时惯用的手法。

党委写信，责成党委一定要撤销倪叔英的处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对厂党委施加压力。于是厂党委书记、副书记都亲自出马，召集倪所在党支部全体支委开了3个晚上的会，“打通”思想。王洪文还派金祖敏、叶昌明来厂“督阵”。在这样的高压手段下，强行通过了一个“撤销对倪叔英处分的决定”。处分一撤销，“四人帮”的羽翼马上对倪委以重任，调到普陀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兼区工会主席的要职。

在整党试点单位之一的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王洪文要发展一个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头入党，多数党员反对，几次开支部大会都通不过。王洪文亲自提出“要走新路子，支部大会可开得大些，声势要大。”于是召开了500余人参加的“支部大会”。参加会议的造反派、非党群众的人数超过党员人数几十倍。表决时，违反党章规定，由党员表决改为参加支部大会的全体人员鼓掌通过。就这样，这个造反派头头的入党“申请”被“通过”了。

早在1968年初，张春桥就在一次会议上说到：“我和文元认为，如果比‘二月逆流’更大的风浪来，我们怎么依靠？我们设想就是要把一批（不是一二个）最可靠、造反早的先进单位发展成为红色的堡垒，这样风浪来了，我们就会有依靠了。”怎样来发展可以依靠的“堡垒”呢？张春桥的另一番话讲得更明确：“工人中的造反派要充实到市、区、局的领导机关中来。

现在习惯势力还很强，……应该由造反派占优势。”张春桥及其党羽把大批造反、帮派骨干、角刺人物拉入党内，控制各级党政领导大权，就是为了让帮派势力占“优势”，建立他们可以依靠的“堡垒”。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清查与“四人帮”有幸连的人和事、处理打、砸、抢分子、处理突击发展、突击提干的双突对象，充分证明：在这一段整党建党工作时期被突击发展入党的对象，绝大部分是不符合党员标准的，因而被清除出党。

（四）上海市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1970年12月，上海市“革委会”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整党建党运动，已在全市普遍开展。……半数以上的区、县、局也建立了新党委。各级领导班子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更新。……”张春桥等认为经过一连串的“改朝换代”手术，召开上海市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条件具备了。

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什么？张春桥提出：“中心议题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他这样讲是有原因的。经过4年时间的“文革”运动，在上海的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中，很多人对于“文革”仍然是“很不理解”的；对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篡夺了全市党政领导权后所作所为，更是抵触不满的。张春桥等不能不强烈感觉到这种状况。1970年12月7

日，张在讨论修改党代表大会决议草稿的会议上说：“回顾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焦点是政权。”“上海一月革命夺权4年了，究竟政权比较巩固的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有多少？”“我们现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级党组织，经过文化大革命班子更新了，大多数领导班子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还有少数单位领导班子问题严重一些，甚至还有坏人混在里面，……有些同志现在觉得新人马、新班子，政权问题解决了，路线问题也解决了。（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余毒没有肃清，有些抬头。所以，这个决议和我们整个会议就特别要把这个问题反复地说。”他强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要）落实到每一个单位，……不要以为刘少奇我们批了好几次（年）了，陈、曾我们也批了，但是（他们）这条路线，思想影响仍然很大，需要继续批判。”

从1970年12月7日起，市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1000名代表们集中办了10天的所谓“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学习班，实际上成为这次党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过了年，1971年1月4日至10日，正式召开了上海市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在学习班和正式会议中，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张春桥及其党羽反复讲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宣扬“文革”初期他们一伙人造反夺权的“光荣史”，进一步诬陷攻击刘少奇、陈丕显、曾获秋等领导同志。张春桥一再“告诫”说：“领导权的问题，这个经验是需要我们经常记住的。”

我们从没有政权到夺得政权，又部分地丧失政权，到这一次又重新夺回来，这个经验教训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最主要的经验教训。”大会通过了题为《在党的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奋勇前进》的决议；选举了中共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59 人，候补委员 17 人。从中选出市委常委 16 人，书记 7 人。

“文革”前选举产生的中共上海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 66 人中（除去已逝世的和调出上海的 10 人，则为 56 人），仍列在第四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 76 人名单的只有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1965 年 3 月增补为市委常委、候补书记）冯国柱、黄涛、张辑五、刘杰等 7 人，其余全都消失了。在 7 个市委书记中，除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外，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是“四人帮”成员及其死党。至此，他们篡夺上海市党组织的领导权的阴谋，可以说完成了“组织手续”。因而张春桥洋洋得意地宣布：这次大会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向走资派夺权的”，是完成了“夺取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一次盛会”。会后，在这个由张春桥、姚文元领衔挂帅，由帮派势力严密控制的“上海新市委”的指挥下，配合“四人帮”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不断掀起一阵阵反革命的恶浪，向中央、向全国各地发难。